

列宁全集

LIENING QUANJI

列 宁 全 集

LIENING QUANJI

第二十二卷

1912年7月—1913年2月



人 民 出 版 社

参加本卷译文校订工作的有：李鸿敬、罗启华、谢德琳、王同梅、熊培粹、邓铭庆。

参加资料编写工作的有：李洙泗、张瑞亭、孔熙忠、刘方清、王丽华、王锦文。

参加编辑工作的有：许易森、李京州、薛春华、韩英。

全卷译文由袁 坚、何宏江审订。

列 宁 全 集

LIENING QUANJI

第二十二卷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编译局编译
列宁 斯大林

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20.25印张 500,000字
1989年2月第2版 1990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10,200

ISBN 7-01-000434-X/A·18 定价 10.00 元

《列宁全集》第二版是根据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
由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
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的。

凡 例

1. 正文和附录中的文献分别按写作或发表时间编排。在个别情况下,为了保持一部著作或一组文献的完整性和有机联系,编排顺序则作变通处理。

2. 每篇文献标题下括号内的写作或发表日期是编者加的。文献本身在开头已注明日期的,标题下不另列日期。

3. 1918年2月14日以前俄国通用俄历,这以后改用公历。两种历法所标日期,在1900年2月以前相差12天(如俄历为1日,公历为13日),从1900年3月起相差13天。编者加的日期,公历和俄历并用时,俄历在前,公历在后。

4. 目录中凡标有星花*的标题,都是编者加的。

5. 在引文中尖括号< >内的文字和标点符号是列宁加的。

6. 未说明是编者加脚注为列宁的原注。

7. 《人名索引》、《文献索引》条目按汉语拼音字母顺序排列。在《人名索引》条头括号内用黑体字排的是真姓名;在《文献索引》中,带方括号[]的作者名、篇名、日期、地点等等,是编者加的。

前 言

本卷收载的是列宁 1912 年 7 月至 1913 年 2 月的著作。

随着斯托雷平反动时期的结束，俄国工人运动逐渐恢复生机。1912 年 3 月勒拿惨案激起了工人阶级的强大抗议浪潮，俄国各地罢工斗争风起云涌。俄国革命进入了新的高潮时期。为了更靠近俄国，便于领导革命斗争，列宁于 1912 年 6 月从巴黎移居当时已并入奥匈帝国的波兰古城克拉科夫。列宁在这里同国内的《真理报》编辑部、国家杜马社会民主党党团的布尔什维克代表以及俄国各地区的党组织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他在这里经常接见来自国内的党的工作者，了解各地斗争情况，给他们以具体指示。在这里，列宁还召开了党中央委员会的会议。克拉科夫成了布尔什维克思想和组织中心。列宁非常关注国际和俄国国内形势的发展，经常在党的合法报纸上发表文章，对重大事件迅速作出反应，及时回答党所面临的迫切问题，分析和评述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势，阐述布尔什维克的策略，揭露自由派的反动实质，批判孟什维克取消派和托洛茨基调和派的机会主义立场。本卷所收的著作，除克拉科夫会议的通报和决议及另几篇非公开文献外，绝大部分是在《真理报》或其它合法报刊上发表的文章，少数是为报纸撰写但当时未刊登的文章。

在《陆海军中的起义》、《关于 11 月 15 日事件问题》、《革命罢工

和街头游行示威的发展》、《生活在教导人们》、《谈谈罢工》等文章中，列宁分析了俄国新的革命高潮的性质和特点，批评自由派和取消派对群众革命运动的错误态度。1912年是俄国罢工斗争突出发展的一年，是俄国工人运动发生重大转变的一年。这一年罢工人达150万，参加政治罢工的有100万人。罢工运动的规模超过了西方各国。席卷全国的罢工浪潮既有经济罢工，也有政治罢工，这种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互相结合、互相交替的形势，使运动具有强大的威力。列宁认为，这不是一般的罢工，这是群众性的革命高潮，这是工人群众对沙皇君主制进攻的开始。列宁高度评价11月15日彼得堡工人在第四届国家杜马开幕日发动的游行示威。他指出，这表明从罢工向游行示威的过渡已经完成，群众运动已经上升到了更高的阶段；尤其具有重大意义的是游行示威时机的选择，“有本领用首都街头上的红旗飞舞来同黑帮‘议会’的开幕式相对照，相比较，这真是卓越的无产阶级本能！”（本卷第224页）列宁在评述海军士兵中的起义事件时指出，“俄国的群众性的罢工同武装起义是紧密联系着的，罢工发展了，起义也就发展”（本卷第3页）。不过列宁认为号召起义为时尚早，还必须为胜利的即适时的起义创造条件。同俄国第一次革命前夕的罢工运动比较，列宁认为新的革命高潮具有如下特点：无产阶级人数增加了，分布更集中了，运动中的纯无产阶级的支柱加强了，农业和手工业中的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的人数大大增多了，工人阶级的觉悟程度提高了，经验丰富了，革命性更强了。同西欧各国那些目的在于争取局部改良的罢工相比较，列宁指出1912年俄国的革命罢工具有全民意义，因为它反映了全国人民的要求，沉重打击了反动势力，得到绝大多数人民的支持。这是新的革命浪潮的历史特点。列宁还指出，更加明

确地划清自由派和民主派之间的界限，乃是这场新的运动的一大优点。

取消派对1912年的罢工和起义都持非议、指责的态度，认为经常举行罢工是“危险地浪费力量”，“是罢工游戏”，士兵起义是被迫所作的绝望抗议。列宁批驳了这种对待群众性革命运动的非马克思主义态度。他指出，虽然起义尝试开始是不顺利、不适时、不正确的，但马克思主义者相信，群众只能从不成功的起义经验中学习举行成功的起义，我们应该做的是向群众解释：为了什么和应当怎样准备成功的起义。个别的罢工也可能遭到失败或时机不当，但是，人为地制造罢工办不到，而当几十万人已经被卷进罢工浪潮时，想阻止罢工也是办不到的。党应当积极支持、加强和发展那种自发兴起的罢工，为农民和军队的起义作好准备。列宁指出，取消派对罢工和起义的立场表明他们是自由派的奴仆和走卒，群众自己朝气蓬勃的、规模壮阔的运动正在清除一切迂腐的东西而不断向前发展，这就是新的革命高潮的历史意义所在。

为了总结1912年1月布拉格代表会议以来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根据新的形势进一步加强对革命运动的领导，列宁于1912年12月26日至1913年1月1日在克拉科夫召开了有党的工作者参加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会议。除中央委员外，参加会议的还有彼得堡、莫斯科、乌拉尔和高加索等地的党组织的代表。列宁在会上作了《革命高潮、罢工和党的任务》、《关于对取消主义的态度和关于统一》两个报告，并为会议草拟了决议和通报。列宁的报告没有保存下来，本卷只刊载会议的《通报》和决议。

克拉科夫会议的《通报》和关于《革命高潮、罢工和党的任务》的决议对1912年罢工斗争的形势和特点作了科学的分析，指出“全

面支持群众的公开的革命斗争,组织这种斗争,扩大、加深和加强这种斗争,——这就是当前的基本任务”(本卷第270页)。列宁在决议中要求各党组织把举行游行示威作为迫切任务对待,既可以使它同政治罢工相结合,也可以单独举行。列宁强调从实际出发对罢工进行具体领导的重要性,要求党组织必须考虑到每次罢工、每个部门、每个地区的不同经济条件,根据其特殊性寻找新的斗争方法。

建设党的秘密组织是克拉科夫会议的主要议题之一。《通报》指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要坚决利用一切合法机会,但绝不是高唱无原则的合法主义,而是要把一切生气勃勃的力量逐渐聚集到秘密党的周围。关于《秘密组织的建设》的决议明确表述了秘密党组织的性质和意义:“当前组织建设的唯一正确形式是秘密的党,它是有各种合法的和半合法的工人团体作外围的许多党支部的总和。”(本卷第278页)在党的建设问题上也表现出列宁一贯反对脱离实际生搬硬套和因循守旧的实事求是精神,他要求党的工作者根据实际条件在既定原则下发挥创造性。他指出:“秘密建设的组织形式适应当地的条件是绝对必要的。用各种各样的形式来掩护秘密的支部,使工作形式尽可能灵活地适应当地生活条件,是秘密组织具有生命力的保证。”(本卷第278页)列宁在决议中也就秘密组织建设的任务和方法方式提出了具体要求。

克拉科夫会议的另一个重要议题是同取消派的斗争和争取实现党的统一。取消派在布拉格代表会议上被逐出党以后,其力量 and 影响已大大削弱。但他们还在用“统一”的虚伪口号欺骗工人,继续鼓吹公开的党,反对秘密活动,宣扬改良主义的纯合法的策略。1912年8月托洛茨基同取消派结成了反布尔什维克的八月联盟,声称要通过同各派别的领袖进行“外交”谈判和达成协议的途

径来实现党的统一。列宁在克拉科夫会议之前写的《第四届杜马选举的前夜》一文中就指出，取消派是一具死尸，任何吓人的国外集团、中心、派别的同盟都不能使这具死尸复活。在克拉科夫会议的《通报》和《关于对取消主义的态度和关于统一》的决议中，列宁揭露了取消派破坏党的统一的分裂活动，指出继续同取消派斗争的必要性，提出了自下而上实现党的统一的方针。列宁认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统一是无产阶级取得胜利的重要条件，统一的问题不是在合法报刊上空谈或以外交手腕进行派别谈判所能解决的，只能自下而上地，即在承认秘密组织和革命策略的基础上从基层组织做起，由工人自己来实现。本卷中在克拉科夫会议前后所写的一些文章，如《秘密的党和合法的工作》、《改良主义病》、《论公开的党》、《彼得堡工人的代表》等，也揭露和批判了取消派的机会主义观点和破坏活动。

克拉科夫会议《关于“民族的”社会民主党组织》的决议，同本卷所收的《致社会党国际局书记处》、《我们党的“迫切的难题”》和《波兰社会民主党的分裂》等文一起，都表明列宁为波兰以及其他民族的社会民主党队伍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统一所进行的原则性斗争。列宁号召俄国各民族的工人最坚决地反击反动派的黩武的民族主义，反对劳动群众中民族主义情绪的任何表现；号召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员紧密团结起来，组成当地统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组织。

1912年在彼得堡创刊的《真理报》在革命宣传和组织秘密工作中都起了重要作用。列宁非常重视《真理报》的工作，认为它是“团结和开展运动的必要的组织手段”（《列宁全集》第2版第46卷1913年2月9日《致维·米·斯维尔德洛夫》）。鉴于《真理报》编辑部

工作中存在着一些弱点和错误，克拉科夫会议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决议，批评编辑部没有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精神，对揭露取消主义没有足够的重视，决议中提出了改组编辑部并改进其工作的措施。在此之前，列宁所写的《工人和〈真理报〉》一文也体现了列宁对《真理报》工作的关注。

克拉科夫会议使党有了一个在群众斗争高涨条件下进行活动的纲领。列宁认为“会议开得好极了。它的意义不亚于1912年的一月会议”（《列宁文稿》第6卷第4页）。

本卷中一批文章是论述第四届国家杜马选举运动以及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的活动的。列宁揭示了参加选举的各个政党的纲领的实质，阐明了布尔什维克党在选举运动中的任务和策略。列宁认为俄国选举运动的政治舞台上三个政治营垒，即执政的黑帮反动势力、自由派资产阶级和民主派。立宪民主党人和取消派不承认民主派是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而把斗争格局归结为拥护宪制和反对宪制两个阵营。列宁在《谈谈“吃掉立宪民主党人”》一文中指出，两个阵营的论点是俄国整个自由派的阶级本质所决定而必然产生的。在经济上，自由派资产阶级政党为了保持俄国式的超额利润，决不容许第三个阵营独立存在；在政治上，资产阶级害怕劳动群众甚于害怕反动势力，为了维护自己的一些政治特权，也不容许第三个阵营存在。列宁反复阐述自由派与民主派的区别，在《一些原则问题》、《立宪民主党和土地问题》、《米留可夫先生的“立场”》、《两种乌托邦》等文中，揭开自由派冒充“民主派”的面纱。他指出，俄国的自由派是指立宪民主党以及“进步派”和第三届杜马中的大多数民族集团，他们代表着上层资产阶级，同大地主贵族有千丝万缕的经济联系，本能地倾向于同右派结成联盟。他们主

张政治自由和“立宪”是有条件的，目的是要维护封建专制制度的特权，同大地主贵族和平共处，瓜分特权。因此他们害怕群众运动，在斗争中极其软弱无力。代表着居民大多数的民主派包括无产阶级民主派和资产阶级民主派，前者指工人阶级，后者是形形色色的民粹派和劳动派。民主派都主张彻底消灭一切中世纪特权，都相信群众运动的力量和正义，但无产阶级民主派是坚定的，资产阶级民主派是动摇的。

列宁还在《两种乌托邦》、《新民主派》、《论民粹主义》和《民粹派内部的情况怎样？农村中的情况又怎样？》等文中对动摇于自由派和工人阶级之间的资产阶级民主派作了分析和评述。列宁批判了民粹派和劳动派的乌托邦，批评他们以为可以用公平合理地重分土地的办法来消除资本的权力和统治的幻想，同时指出，它不同于自由派的乌托邦，民粹派的民主主义作为社会主义乌托邦是错误的，但是作为农民群众的特殊的、有历史局限性的民主主义斗争的表现却是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剔除民粹派乌托邦中的糟粕，细心剥取它所包含的农民群众的真诚的、坚决的、战斗的民主主义的健康而宝贵的内核”（本卷第133页）。

在《第四届杜马选举的前夜》、《立宪民主党人带着什么参加选举？》、《改良派的纲领和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纲领》等文中，列宁阐述了无产阶级对于杜马选举的鲜明态度。他认为，对社会民主党来说，选举不是一种特殊的政治交易，不是捞取代表资格的交易，而只是宣传无产阶级的基本要求和政治观点的特殊机会，是争取革命原则和争取把群众团结在革命政治纲领周围的斗争。不是为了“竞选”而制定纲领，而是要通过竞选来贯彻社会民主党的革命的政纲。列宁批评取消派利用第四届杜马选举来鼓吹立宪改革，

宣扬合法主义，实际上是做了自由派的尾巴。在《给社会党国际局的报告〈第四届杜马的选举〉》和《选举结果》两篇文献中，列宁对选举结果作了评述，指出布尔什维克对选举运动的分析是正确的，选举结果表明了取消派政治上的破产，而布尔什维克却获得一大胜利。

在《工人阶级及其“议会”代表团》一组文章中，列宁总结了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在第二届和第三届杜马中的工作经验，确定了它在第四届杜马中的任务。《关于工人代表的某些发言问题》、《关于杜马中的工人代表和他们的宣言问题》和《关于预算问题的发言提纲》，是列宁为社会民主党党团的布尔什维克代表在杜马中发言而写的。列宁同布尔什维克代表保持着密切联系，直接领导着他们在杜马党团中的活动，教导他们要善于利用杜马讲坛，把合法活动同秘密活动结合起来，坚决维护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

收入本卷的一部分文章是评论国际政治问题，特别是论述帝国战争危险和各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反战斗争的。在《孤注一掷》、《巴尔干人民和欧洲外交》、《论狐狸和鸡窝》、《可耻的决议》、《战争的惨状》和《资产阶级和改良主义》等文中，列宁揭露了奥匈帝国、意大利、俄国、德国、英国、法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政府的扩张主义政策，痛斥帝国主义者的血腥冒险罪行，阐明战争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号召劳动者团结起来回击侵略者。列宁揭露和批判了以“争取独立的神圣斗争”的冠冕堂皇口号作掩护实则帝国主义侵略战争辩解的沙文主义者。

《告俄国全体公民书》、《世界历史的新的一章》、《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的胜利的社会意义》等文评述了巴尔干战争的实质，揭露了沙皇和其他帝国主义列强在巴尔干的掠夺行径，阐明了布尔什

维克党和俄国工人阶级支持巴尔干劳动群众为摆脱民族压迫和社会压迫而斗争的立场。列宁指出,东欧存在着的专制制度、封建制度和民族压迫,是严重阻碍社会发展和无产阶级成长的顽强的中世纪残余;塞尔维亚人和保加利亚人的胜利,意味着马其顿封建统治的垮台;尽管在巴尔干建立的是君主国的联盟,而不是共和国的联盟,整个东欧在摧毁中世纪残余方面,还是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列宁阐明了民族解放同经济解放的关系。他认为只有彻底摆脱地主和专制制度的压迫,民族解放才会必然到来。列宁号召俄国工人和其他劳动群众起来用革命的方法推翻沙皇制度,他说,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俄国和整个东欧的自由发展。《意土战争的结局》一文抨击意大利帝国主义在非洲对阿拉伯人的大杀戮,指出这是所谓“文明”的国家发动的一场典型的殖民战争。

《美国工人的胜利》、《美国总统选举的结果和意义》、《美国在选举以后》、《彭加勒当选的意义》和《白里安内阁》等文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作了评述。列宁揭穿了资产阶级民主的骗人实质,指出英美的两党制是诱使劳动人民离开同资本主义的斗争,阻止独立的工人政党产生的一种手段。

《在瑞士》、《英国关于自由派工人政策的争论》、《在美国》等一批文章是为批判国际机会主义而写的。列宁揭示了英美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的根源。他指出,长久以来的政治自由以及同其他国家相比特别有利于资本主义向深广方面发展的条件,使工人阶级中出现了贵族,他们背叛了自己的阶级,跟在资产阶级后面亦步亦趋。

本卷收入了一些阐述土地问题和经济问题的文章。《最后一个气门》一文是上一卷《斯托雷平的土地纲领和民粹派的土地纲领的

比较》一文的续篇。列宁在文中阐明了斯托雷平对中世纪土地占有制的破坏为什么不能消灭奴役制和工役制，指出斯托雷平的“改革”只是延缓了濒于死亡的农奴制的末日，使它以另一种形式生存下来，使农村中旧的危机在新的环境下以新的形式加深起来。《俄国的生产集中》一文分析了俄国大工厂在20世纪头10年中的发展情况，说明大企业在整个生产中所占的比重比企业本身的数量增长得更快，俄国资本主义生产愈来愈集中，工人也愈集中到少数大企业中去，千百万工人所创造的全部利润落入一小撮百万富翁手中。《资本主义社会的贫困化》一文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财富以难于置信的速度增长着，与此同时工人群众却日益贫困化，“工人的贫困化是绝对的”，而“工人的相对贫困化，即他们在社会收入中所得份额的减少更为明显”（本卷第239、240页）。在《俄国工人的工资和资本家的利润》、《莫斯科省工厂的工作日》、《莫斯科省的工作日和工作年》等文中，列宁根据俄国工厂统计资料，说明资本家如何加强工人的劳动强度和延长工作日，如何竭力压榨工人的血汗，降低工人的实际工资。列宁指出，工人阶级为增加工资和改善劳动条件而进行的斗争，阻碍了资本主义社会劳动群众贫困化和物质状况恶化趋势向前发展。1905年的革命斗争使俄国工人工资的增长超过了平常几十年的增长幅度。

本卷中的《新生的中国》一文评述了辛亥革命后中国的政治形势，分析了中国各个党派的性质。列宁在文中批评俄、日、英、法、德等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民主革命不怀好意，把中国视为一块可以伺机瓜分的肥肉。列宁热情称颂中国人民推翻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他指出，4亿中国人争得了自由，地球上四分之一的人口已经从沉睡中觉醒，投入斗争，走向光明。

《关于布尔什维主义》一文阐述了布尔什维主义的由来和它走过的道路，指出了它同孟什维主义的主要分歧以及彼此斗争的几个重要阶段。此文对于研究苏联共产党早期的历史具有重要意义。

本卷文献比《列宁全集》第1版相应时期所收文献增加10篇，其中编入正文的有：《罗莎·卢森堡和波兰“党”总执行委员会步马尔托夫的后尘》，《对〈莱比锡人民报〉所载取消派文章的答复》，《告俄国全体公民书》，《谈谈政治上的动摇性（给编辑部的信）》，《再论第四届杜马中的农民代表》，有党的工作者参加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克拉科夫会议的一项决议《关于〈真理报〉编辑部的改组和工作》，《关于预算问题的发言提纲》。《附录》中的3篇文献都是新收载的。

目 录

第二十二卷說明V—VI

1914—1915年

关于农業中資本主义發展規律的新材料。第一編。

美国的資本主义和农業1—92

1. 三个主要区域的一般說明。垦殖的西部和垦殖地段5

2. 工业的北部9

3. 过去奴隶占有制的南部11

4. 农户的平均面积。南部“資本主义的衰落”14

5. 农業的資本主义性質19

6. 高度集約的农業区域24

7. 农業中的机器和雇佣劳动31

8. 大农户排挤小农户。耕地数量36

9. 續上。关于农户价值的材料43

10. 通常用的經濟研究方法的缺点。馬克思論农業的特征47

11. 比較小农户和大农户的更精確的方法54

12. 农業中的各种农户类型61

13. 农業中大生产排挤小生产是怎样被忽視的67

14. 小农被剝夺74

15. 工业和农業进化情形的比較82

16. 总结和結論90

給布哈林的小册子“世界經濟和帝国主义”写的序言	93—98
机会主义和第二国际的破产	99—112
一	99
二	103
三	105

1916年

关于召开社会主义者第二次代表會議的決議草案	113
給 1916 年 4 月 24 日代表會議。代表团的提議	114—115
在伯尔尼国际群众大会上的演說 (1916 年 2 月 8 日)	116—119
論法国反对派的任务 (給薩登罗夫同志的信)	120—124
組織委员会和齐赫澤党团有没有自己的路綫?	125—130
論俄国当前的口号: 不割地的和平和波兰的独立	131—134
威廉·科尔布和格奧尔基·普列汉諾夫	135—136
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 (提綱)	137—150
1. 帝国主义、社会主义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	137
2. 社会主义革命和爭取民主制的斗争	138
3. 自决权的意义和它对联邦制的关系	140
4. 無产階級对民族自决問題的革命提法	141
5. 民族問題中的馬克思主义和蒲魯东主义	143
6. 三类国家对民族自决的态度	144
7. 社会沙文主义和民族自决	145
8. 無产階級在最近将来的具体任务	147
9. 俄国社会民主党和波兰社会民主党以及第二国际对 自决的态度	148
国外組織委员会給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各支部的信	151—154

論“和平綱領”	155—162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向社会主义者第二次 代表會議提出的提案	163—173
是分裂还是腐化?	174—175
論德国的和非德国的沙文主义	176—178
帝国主义是資本主义的最高阶段(通俗的論述)	179—297
序言	179
法文版和德文版序言	181
一	181
二	181
三	183
四	184
五	185
一、生产集中和垄断	188
二、銀行和銀行的新作用	202
三、財政資本和財政寡头	218
四、資本輸出	232
五、各个資本家同盟分割世界	238
六、列强分割世界	246
七、帝国主义是資本主义的特殊阶段	257
八、資本主义的寄生性和腐化	268
九、对帝国主义的批評	278
十、帝国主义的历史地位	292
論尤尼烏斯的小册子	298—313
关于自决問題的爭論总结	314—354
1. 社会主义和民族自决	315

2. 在帝国主义时代民主制能不能“实现”？	319
3. 什么是兼并？	322
4. 贊成兼并还是反对兼并？	325
5. 为什么社会民主党要反对兼并？	329
6. 在这个問題上是不是可以把殖民地同“欧洲”对立起来？	331
7. 馬克思主义还是滿魯东主义？	334
8. 荷兰和波兰社会民主党人国际主义者立場中的特殊 之点和共同之点	342
9. 恩格斯給考茨基的信	346
10. 1916 年的爱尔兰起义	348
11. 結束語	353
注释	355—372
列宁生平事業年表	373—376
譯后記	377

插 圖

1917 年列宁“关于农業中資本主义發展規律的新材料。

第一編。美国的資本主义和农業”一書的封面

1916 年 2—3 月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向
社会主义者第二次代表會議提出的提案”手稿第 1 頁

1917 年列宁“帝国主义是資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書的
封面

1916 年 1—6 月列宁“帝国主义是資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一書手稿第 1 頁

关于农业中资本主义 发展规律的新材料

第一編

美国的资本主义和农业¹

在研究现代农业的社会经济制度及其发展情况方面，现代的资本主义先进国家是特别重要的。無論就 19 世紀末和 20 世紀初资本主义的发展速度来说，或者就已经达到的资本主义发展的高度来说，無論就根据十分多样化的自然历史条件而使用最新科学技术的土地面积的广大来说，或者就人民群众的政治自由和文化水平来说，美国都是举世無匹的。这个国家在很多方面都是我們资产阶级文明的榜样和理想。

研究美国农业发展的形式和规律是比较方便的，因为美国每 10 年要进行一次人口調查（“戶口調查”），同时并对全部工农业作一番極其詳細的調查。这样就提供了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的确切而丰富的材料，使我們有可能来检查現在流行的許多論断，这些論断在理論上多半是牵强附会的，通常总是貫穿着资产阶级的观点和偏見，可是人們总是不加批判地談来談去。

吉姆美尔先生在“箴言”杂志² 1913 年 6 月号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其中引用了第十三次戶口調查，即 1910 年进行的最近一次戶

口調查中的某些材料，并且根据这些材料一次又一次地重复着最流行的、在理論基础和政治意义上都是十足資產階級的論断，說什么“美国大多数农戶都是劳动农戶”，“在比較發达的地区，农業資本主义正在瓦解”，在“全国絕大多数地区”，“小劳动农業正在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正是“在文化較悠久、經濟發展較高的地区”，“資本主义农業遭到破坏，生产正变成分散而零碎的”，“沒有一个地区不是处在垦殖过程中，沒有一个地区的大資本主义农業不是正在解体，并受到劳动农業的排挤”，以及其他等等。

所有这些論断都錯得离奇，同实际情形正好相反，完全是对实际情况的嘲弄。对于这些論断的錯誤應該更詳細地加以說明，因为吉姆美尔先生并不是一位初次露面的、偶尔在杂志上写写文章的作者，而是代表俄国和欧洲社会思想界中極端民主的、最左的資產階級派別的許多知名經濟学家之一。正因为如此，吉姆美尔先生的观点就有可能得到特別广泛的散布和产生影响，而且在一部分非無產階級階層中已經極广泛地散布开并产生了影响。因为这不是他个人的观点、个人的錯誤，而是带着特別民主色彩的一般資產階級观点的表现，并且是用貌似社会主义的詞句特別粉飾起来的。在資本主义社会中，無論是只走已經开辟出来的道路的御用教授，或者是在千百万与自己相同的人中以觉悟出众的小农，都最容易产生这种观点。

吉姆美尔先生所捍衛的資本主义社会中农業的非資本主义發展的理論，實質上是絕大多数資產階級教授、資產階級民主派以及世界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者即最新的变种的資產階級民主派的理論。說这种理論是整个資產階級社会的一种錯覺、幻想和自我欺騙，是并不过分的。在以下的闡述中我要推翻这一理論，同时将

Книго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ЖИЗНЬ и ЗНАНИЕ“.
Петроградъ, Поварской пер., д. 2, кв. 9 и 10. Телефонъ 227-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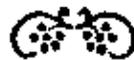
Библиотека Обществольдьяня. Кк. 42-ая.

В. ИЛЪИНЪ (Н. Ленинъ).

НОВЫЯ ДАННЫЯ О ЗАКОНАХЪ РАЗВІТІЯ КАПИТАЛИЗМА ВЪ ЗЕМЛЕДѢЛІИ.

—
ВЫПУСКЪ I.

Капитализмъ и земледѣіе въ Соед. Штатахъ Америки.



ПЕТРОГРАДЪ.
1917.

1917年列宁“关于农业中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新材料”。

第一編。美国的资本主义和农业”一书的封面

(制版缩小的)



尽力描绘出美国农业资本主义的全貌，因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一个主要错误，就是他们往往把个别细小的事实和数字同政治经济关系的总的联系割裂开来加以研究。我所引用的材料全部取自北美合众国官方出版的统计材料：首先是1900年第十二次户口调查和1910年第十三次户口调查中有关农业方面的第5卷[⊖]；其次是1911年的统计汇编(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指出这些来源，我就不必列举每一个数字原来的页码和统计表的号码了，那样会加重读者的负担，毫无必要地使文字变得非常累赘；有兴趣的人可以按照上面所说的出版物的目录毫不费力地找到相应的材料。

1. 三个主要区域的一般说明。

垦殖的西部和垦殖地段

美国幅员之大稍逊于整个欧洲，全国各个角落的经济条件又异常复杂，因此，我们对各个经济状况十分不同的主要区域必须分别地进行研究。美国的统计学家在1900年把全国划分为5个区域，在1910年又划分为以下9个区域：(1)新英格兰，即东北部大西洋沿岸的六个州(缅因、新罕普什尔、佛蒙特、马萨诸塞、罗德岛、康涅狄格)；(2)大西洋中部各州(纽约、新泽西、宾夕法尼亚)；这

⊖ Census Reports. Twelfth Census 1900. Vol. V. Agriculture. Wash. 1902. — Thirteenth Census of the United States, taken in the year 1910. Vol. V. Agriculture. Wash. 1913 (调查报告。1900年第十二次调查。第5卷。农业。1902年华盛顿版。——美国1910年第十三次调查。第5卷。农业。1913年华盛顿版。——编者注)。

两个区域在 1900 年是“北大西洋”区。(3)中部的东北各州(俄亥俄、印第安纳、伊利诺斯、密歇根、威斯康星);(4)中部的西北各州(明尼苏达、艾奥华、密苏里、北达科他、南达科他、内布拉斯加、堪萨斯);这两个区域在 1900 年是“中北”区。(5)大西洋南部各州(特拉华、马里兰、哥伦比亚区、弗吉尼亚、西弗吉尼亚、北卡罗来纳、南卡罗来纳、乔治亚、佛罗里达);这个区域还是同 1900 年一样。(6)中部的东南各州(肯塔基、田纳西、亚拉巴马、密西西比);(7)中部的西南各州(阿肯色、俄克拉何马、路易西安纳、得克萨斯);这两个区域在 1900 年是“中南”区。(8)山区各州(蒙大拿、爱达荷、怀俄明、科罗拉多、新墨西哥、阿利桑那、犹他、内华达);(9)太平洋岸各州(华盛顿、俄勒冈、加利福尼亚);这两个区域在 1900 年是“西部”地区。

这种划分过于复杂,因此美国的统计学家在 1910 年又把它压缩为三个大区:北部(1—4),南部(5—7)和西部(8—9)。我们可以看出,这样划成三个大区是极其重要的,绝对必需的,当然,在这里也像在其他任何情况下一样,还存在着过渡形式,而且在某些基本问题上,还必须把新英格兰和中部大西洋岸各州单独划分出来。

为了确定这三个主要区域的根本差别,我们可以称它们为:工业的北部、过去奴隶占有制的南部和垦殖的西部。

下面是一个关于土地面积、耕地比例、人口数目的材料:

区 域	全部土地面积 (单位百万英亩)	其中耕地的 百分比	人口(1910年, 单位百万)
北 部.....	588	49%	56
南 部.....	562	27%	29
西 部.....	753	5%	7
全美国.....	1 903	25%	92

北部和南部的土地面积大致相等，西部则几乎比它们大一半。但是北部的人口比西部多7倍。西部可以说几乎没有人烟。至于西部的居民是以怎样的速度增长着，可以从下面的数字看出来：从1900年到1910年这10年间，北部的人口增加了18%，南部增加了20%，而西部竟增加了67%！在这10年中，北部的农户几乎毫无增加：1900年是2 874 000户，1910年是2 891 000户，只增加了0.6%；南部增加了18%，从260万户增加到310万户；而西部却增加了54%，从243 000户增加到373 000户，即增加了一半以上。

至于西部的土地占有形式怎样，这可以从关于垦殖地段的数字看出来。垦殖地段是一块土地，一般有160英亩，约等于65俄亩，由政府无偿发给，或者只收有名无实的一点租金。从1901年至1910年这10年间，在北部，有主的垦殖地段共占土地5 530万英亩（其中5 430万英亩即98%以上在中西北部这一个区域）；在南部共占土地2 000万英亩（其中1 730万英亩集中在中西南部这一个区域）；在西部共占土地5 530万英亩，分布于西部的两个区域。这就是说，西部是一个连绵不断的垦殖地段的地区，都是无偿地发给的闲置土地，这种土地使用制和俄国边远地区的圈地很相似，不过不是由农奴制的国家来调整，而是通过民主的办法加以调整（我险些说成通过民粹主义的办法；共和制的美国用资本主义的方法实现了“民粹主义的”思想，把闲置土地分给每一个希望有土地的人）。北部和南部都只有一个区域是有垦殖地段的，它好像是由无人烟的西部过渡到有人烟的北部和南部的一种过渡形式。顺便指出，近10年来完全没有分给垦殖地段的，只有北部的新英格兰和中部大西洋岸这两个区域。在这两个工业最发达的区域，

垦殖过程已經完全停止，这我們在下面还要談到。

上面引用的关于有主的垦殖地段的材料，只是指最初申請發給的垦殖地段，而不是指最后有主的地段；按区域分列的后一种材料，我們現在还没有。如果把我們上面引用的材料作为絕對数字来看，那是夸大了，但是它無論如何确切地表明了各个区域之間的比例。在北部，农戶占有的土地在 1910 年总共为 41 400 万英亩，也就是說，近 10 年来申請發給的垦殖地段占它的 $\frac{1}{8}$ 左右，在南部占 $\frac{1}{17}$ 左右（35 400 万英亩土地中占 2 000 万英亩），在西部竟占一半（11 100 万英亩土地中占 5 500 万英亩）！有些区域实际上几乎还没有土地私有制，另一些区域全部土地都是有主的，如果把关于这两种区域的材料混在一起，那显然是对科学研究方法的嘲弄。

美国的事实特別明显地証实了馬克思在“資本論”第 3 卷中所強調的那个真理³，即农業中的資本主义并不取决于土地占有制和土地使用制的形式。資本会碰到中世紀的和宗法制的各种各样的土地占有制：有封建的占有制，有“份地农民的”（即依附农民的）占有制，有氏族的占有制，有村社的占有制，有国家的所有制等等。所有这些土地占有制，資本都使之服从于自己，只是采取的形式和手段有所不同而已。农業統計如果是建立在合情合理的基础上，它就应当根据資本主义滲入农業的各种形式而改变自己的研究方法和分类方法等，例如，就应当把垦殖地段单独划分出来，并探討其經濟前途。可惜在統計学中非常盛行的是因循惯例，毫無意义地、千篇一律地重复着同一的方法。

同其他区域相比，西部的农業究竟粗放到什么程度，这从关于人造肥料費用的材料也可以看出来。在 1909 年，每英亩已耕地的

这种费用在北部是 13 分 (0.13 美元)，在南部是 50 分，在西部仅有 6 分。南部的肥料费用特别多，是因为种植棉花需要很多肥料，而植棉在南部占着最显著的地位：棉花和烟草占农业总产值的 46.8%，粮食只占 29.3%，干草和牧草占 5.1%。相反的，在北部居于首位的是粮食，占农业总产值的 62.6%，其次是干草和牧草，占 18.8%，其中主要是播种牧草。在西部，粮食占农业总产值的 33.1%；干草和牧草占 31.7%，而且草地牧草比播种牧草多；此外水果占产值 15.5%，这是商业性农业中的一个特殊部门，在太平洋沿岸一带发展得非常迅速。

2. 工业的北部

在 1910 年，南部城市人口占 22.5%，西部占 48.8%，而北部则占 58.6%。从下列材料可以看出工业的作用：

	产 值 (单 位 10 亿 美 元)			工 业 (原料价值除外)	产业工人数 (单位百万)
	农 业	畜牧业	总 数		
北 部……	3.1	2.1	5.2	6.9	5.2
南 部……	1.9	0.7	2.6	1.1	1.1
西 部……	0.5	0.3	0.8	0.5	0.3
全美国…	5.5	3.1	8.6	8.5	6.6

这里的农业总产值是夸大了的，因为一部分农产品，例如牲畜饲料，在畜牧业的产值中又计算了一次。但是，无论如何可以得出一个无可怀疑的结论，就是美国有将近 5/6 的工业集中在北部，北部的工业比农业占优势。相反，南部和西部则是农业占优势。

从上面引用的材料可以看出，北部同南部和西部不一样，它有

極發達的工業，這就給農業开辟了市場，並且促進了農業的集約化。但是，具有這種意義的“工業的”北部依然是農產品的主要生產者。農業生產的一半以上即將近 $\frac{3}{5}$ ，都集中在北部。至於北部的農業同其他區域相比究竟集約到什么程度，這可以从下面關於每英畝土地的全部農業財產（包括土地、建築物、農具、機器和牲畜）的價值的材料看出來：在1910年，每英畝土地的這種財產的價值，北部是66美元，南部是25美元，西部是41美元。其中每英畝土地的農具和機器的價值，北部是2.07美元，南部是0.83美元，西部是1.04美元。

同時，應該把新英格蘭和中部大西洋岸這兩個區域單獨划分出來。我們曾經指出，這兩個區域的墾殖過程已經停止。在1900年到1910年間，農戶的數目已經絕對地減少了，各農戶的耕地以及全部土地也絕對地減少了。根據職業統計，這兩個區域只有10%的人口從事農業，而全國從事農業的人口平均占33%，北部的其他兩個區域各占25%和41%，南部占51%—63%。在這兩個區域，糧食生產占耕地的6%和25%（全國平均占40%，北部平均占46%），牧草（多半是播種牧草）生產占耕地的52%和29%（全國平均占15%，北部平均占18%），蔬菜生產占耕地的4.6%和3.8%（全國和北部平均都占1.5%）。這是集約程度最高的農業區。在1909年，這兩個區域每英畝耕地的肥料費平均為1.30美元和0.62美元；第一個數字是最大的數字，第二個數字僅次於南部的一個區域。每英畝耕地的農具和機器平均值2.58美元和3.88美元，這在美國是最大的數字。我們將從以下的敘述看到，工業的北部的這兩個工業最為發達的區域的特點，是它們的農業進行着最高度的集約經營，具有最多的資本主義性質。

3. 过去奴隶占有制的南部

吉姆美尔先生写道：美国是一个“根本不知道封建制度为何物，绝对没有封建制度的经济残余的国家”（见该文第41页）。这个论断直接违反了事实，因为奴隶制度的经济残余同封建制度的经济残余丝毫没有区别，在美国过去奴隶占有制的南部，这种残余至今还很大。如果认为吉姆美尔先生的这个错误不过是仓促写成的杂志论文中的一个错误，那就不值得一谈了。然而俄国自由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全部著作证明，它们在俄国的工役制度问题上，也就是在我国的封建制度残余的问题上，一贯地、非常顽固地犯着与此完全相同的“错误”。

在1861—1865年的国内战争废除奴隶制度以前，美国的南部一直存在着奴隶占有制。南部的黑人至今还占全部人口的22.6%—33.7%，而北部和西部各区则不超过0.7%—2.2%。就美国全国来说，黑人平均占人口的10.7%。关于黑人所处的屈辱地位是无需多说的，因为美国资产阶级在这方面一点也不比其他国家的资产阶级好些。美国资产阶级在“解放了”黑人之后，就竭力在“自由的”、民主共和的资本主义基础上恢复一切可能恢复的东西，做一切可能做到和不可能做到的事情，来达到它最可耻最卑鄙地压迫黑人的目的。要说明黑人的文化水平，只需指出一个小小的统计事实就够了。在1900年，美国白人中的文盲只占6.2%（按实足年龄10岁以上的人口计算），而黑人中的文盲却占44.5%！！超过了6倍以上！！北部和西部的文盲只占4%—6%（1900年），而南部则占22.9%—23.9%！！不难想像，同这种国民文化水平方面最可

耻的事实相适应,在法律和日常生活方面会有怎样的总的情况。

这个可爱的“上层建筑”是在什么样的经济基础上产生出来和维持下去的呢?

它是在典型的俄国式的、“真正俄国式的”工役制即分成制的基础上产生出来和维持下去的。

在1910年,黑人农户有920 883户,占农户总数的14.5%。在全体农户户主中,佃农占37%,私有者占62.1%,剩下0.9%是由管理人经营的农场。佃农在白人中只占39.2%,而在黑人中竟占75.3%!在美国,典型的白人农户户主是自己土地的所有者,典型的黑人农户户主是佃农。在西部,佃农一共只占14%,因为这是一个垦殖地区,是一片新的自由的土地,是一个小“独立农民”的黄金国(暂时的、不牢固的黄金国)。在北部,佃农占26.5%,而在南部竟占49.6%!南部的农户户主有一半是佃农。

不仅如此。这里所说的佃农还根本不是欧洲的、有文化的、现代资本主义意义上的佃农。这里所说的主要是半封建的佃农,或者就经济方面来说,也是半奴隶制的分成制的农民。在“自由的”西部,分成制的农民只占佃农的少数(53 000个佃农中有25 000个分成制的农民)。在早已人烟稠密的古老的北部,766 000个佃农中有483 000个分成制的农民,即占63%。在南部,1 537 000个佃农中有1 021 000个分成制的农民,即占66%。

在1910年,自由的、民主共和制的美国有150万分成制佃农,其中黑人占100万以上。分成制的农民在农户户主总数中所占的比例不是在降低,而是不断地、相当迅速地在增长。分成制的农民在全国农户户主总数中所占的百分比,1880年是17.5%,1890年是18.4%,1900年是22.2%,1910年是24%。

美国統計学家在 1910 年人口調查的結論中写道：“南部的条件一向和北部有些不同，南部有很多佃农农戶是种植园的一部分，这种种植园产生于国内战争以前，拥有相当广大的土地”，在南部，“靠佃农，主要是靠黑人佃农經營的制度代替了靠奴隶劳动經營的制度”。“租佃制度的發展在南部最显著，那里过去由奴隶劳动耕作的許多种植园，現在多半都已分为許多小的地段（小塊土地），出租給佃农。……在很多情况下，这些种植园直到現在實質上还是作为一种农業单位經營着，因为佃农受到一定程度的监督，和北部农戶的雇佣工人受到的监督多少有点相像”（前書第 5 卷第 102 頁和 104 頁）。

为了說明南部，还須作个补充：南部的居民紛紛从南部跑到別的資本主义比較發达的区域和各个城市去，正像俄国的农民从最落后和保留农奴制残余最多的中部农業省份、从馬尔柯夫之流的統治下，紛紛跑到俄国資本主义比較發达的区域，跑到各省城、各工业省份和南部去的情况一样（見“俄国資本主义的發展”[⊖]）。分成制的区域，無論在美国或俄国，都是最停滯的区域，都是劳动群众受風辱和压迫最厉害的区域。对美国的經濟和整个社会生活起着十分重大作用的外来的移民，都不肯到南部去。在 1910 年，外来的居民占美国人口的 14.5%。但是在南部各区只占 1%—4%，而在美国其他区域最少也有 13.9%，甚至达到 27.7%（新英格兰）。閉塞不通，粗野無知，缺乏新鮮空气，好像一座对付“解放了的”黑人的監獄，这就是美国的南部。在这里，居民的定居性最强，“对土地的依恋心理”最重：南部除了进行着显著的垦殖过程的一个中西南

⊖ 見“列宁全集”第 4 版第 3 卷第 514—519 頁。——編者注

区以外，其余两个区域内有 91%—92%的居民是土生土长的。全国这样的居民大体上占 72.6%，这就是说，居民的流动性比南部大得多。在西部这个连绵不断的垦殖地区，只有 35%—41%的居民是土生土长的。

黑人从南部未垦殖的两个区域往外跑：在最近两次人口调查之间的 10 年内，美国其他地区增加了约 60 万“黑人”居民，都是在这两个区域跑去的。黑人主要是跑往城市，在南部，77%—80%的黑人是住在农村中，其他地区住在农村的只占 8%—32%。在经济状况上，美国的黑人和俄国中部农业地区的“前地主的”农民是极其相似的。

4. 农户的平均面积。南部“资本主义的衰落”

我们已经研究了美国这三个主要区域的基本特征和经济条件的一般性质，现在可以来分析一下人们通常运用的那些材料了。这里首先要谈到关于农户平均面积的材料。有许许多多经济学家，其中包括吉姆美尔先生，根据这些材料作出了极其武断的结论。

美国农户的平均面积(单位英亩)

年 份	全部土地	耕 地
1850.....	202.6	78.0
1860.....	199.2	79.8
1870.....	153.3	71.0
1880.....	133.7	71.0
1890.....	136.5	78.3
1900.....	146.2	72.2
1910.....	138.1	75.2

大体上说来,从这个材料一眼看到的是,全部土地平均数的减少和耕地平均数的忽增忽减的不固定的变化。但是在1860年和1870年之間有一个明显的界限,因此我們在这里划上了一条綫。正是在这个时期,全部土地的平均数大大地减少了,减少了46英亩(199.2—153.3);耕地的平均数也發生了極大的变化(79.8—71.0),也是减少了。

原因何在呢?很明显,在于1861—1865年的国内战争和奴隶制的废除。这就使奴隶主大地产遭到了决定性的打击。下面我們还要一再地証实这个事实,虽然这个事实誰都知道,再来証实它是令人感到奇怪的。現在我們把南部和北部的材料分別列出来。

年 份	农 戶 的 平 均 面 积 (单 位 英 亩)			
	南 部		北 部	
	全部土地 的平均数	耕地的 平均数	全部土地 的平均数	耕地的 平均数
1850.....	332.1	101.1	127.1	65.4
1860.....	335.4	101.3	126.4	68.3
1870.....	214.2	69.2	117.0	69.2
1880.....	153.4	56.2	114.9	76.6
1890.....	139.7	58.8	123.7	87.8
1900.....	138.2	48.1	132.2	90.9
1910.....	114.4	48.6	143.0	100.3

我們看到,南部每个农户耕地的平均数在1860—1870年間大大地减少了(101.3—69.2),北部則稍微增多了一点(68.3—69.2)。問題正在于南部的發展条件。我們看到,那里就是在奴隶制废除以后,农户的平均面积仍然在减少,虽然这种减少是緩慢的,断續的。

吉姆美尔先生作出結論說:“在这里,小劳动农业正在扩大自

己的勢力範圍，資本投入了其他部門而放棄了農業”。“……在大西洋南部各州，農業資本主義在急劇地衰落……”

真是咄咄怪事，與此相類似的怪事恐怕只有在我國民粹派的言論中才能找到。我國的民粹派說過，俄國在 1861 年以後由於地主從徭役制經濟過渡到工役（即半徭役！）制經濟而引起了“資本主義的衰落”。把奴隸主大地產的瓦解叫作“資本主義的衰落”。昨天奴隸主的荒地變成了今天黑人的小農戶，而這些黑人中有一半是分成制農民（試回想一下，分成制農民的百分比一直是隨着每一次的戶口調查不斷增長的！），把這種變化也叫作“資本主義的衰落”。這樣歪曲經濟學的基本概念，真是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

美國統計學家在 1910 年人口調查的說明書第 12 章中援引了關於南部現代的、而不是奴隸制時代的典型“種植園”的材料。在 39 073 個大農戶中有 39 073 個“領主農戶”（Landlord farms）和 398 905 個佃農農戶。這就是說，平均每一個“領主”，即“地主”、“大地主”有 10 個佃農。種植園的平均面積是 724 英畝。其中耕地只有 405 英畝，平均每個種植園有荒地 300 英畝以上。昨天的奴隸主老爺為未來的剝削計劃儲備了很不少的土地……

中等種植園土地的分配情況如下：“領主農戶”有地 331 英畝，其中有耕地 87 英畝。“佃農”農戶，即照舊為“領主”工作並且受他監督的分成制的黑人的地段，平均有地 38 英畝，其中有耕地 31 英畝。

南部昨天的奴隸主擁有廣大的地產，其中 $\frac{9}{10}$ 以上的土地直到現在還荒着，隨着人口和棉花需要的增長，他們正逐漸把這些土地出賣給黑人，尤其常見的是按對分制把小塊地段租給黑人。（從 1900 年到 1910 年，南部完全占有自己土地的農戶戶主，從 1 237 000

人增加到 1 329 000 人，只增加了 7.5 %，同时分成制的农民竟从 772 000 人增加到 1 021 000 人，即增加了 32.2 %。) 而现在居然出现了一位把这种现象说成是“资本主义的衰落”的经济学家……

我们把拥有土地 1 000 英亩以上的农户算作大地产。这样的农户，1910 年在全美国只占 0.8 % (共 50 135 个)，可是它们拥有土地 16 710 万英亩，占全部土地的 19 %。这样，每个大地产平均有土地 3 332 英亩。大地产中的耕地只占 18.7 %，全部农户中的耕地，一般地说占 54.4 %。此外，在资本主义发达的北部，大地产最少，它只占全部农户的 0.5 %，拥有全部土地的 6.9 %，其中耕地占 41.1 %。西部的大地产最多，它占全部农户的 3.9 %，拥有全部土地的 48.3 %，其中有 32.3 % 的土地已经耕种过。在过去奴隶占有制的南部，大地产中荒地的百分比最高；在那里，大地产占全部农户的 0.7 %，拥有全部土地的 23.9 %，其中已经耕种的土地只占 8.5 %!! 这个详细的材料清楚地表明，不对每一国家每一地区的具体材料进行特别的分析就把大地产算作资本主义经济，这种流行的做法是毫无根据的。

在 1900—1910 年这 10 年间，正是大地产 (也只有大地产) 的土地总数减少了。而且减少了很多：从 19 780 万英亩减少到 16 710 万英亩，减少了 3 070 万英亩。南部大地产的土地减少了 3 180 万英亩 (北部增加了 230 万英亩，西部减少了 120 万英亩)。可见，大地产的耕地百分比最低 (8.5 %)、大地产处于大规模瓦解的过程中，正是奴隶占有制的南部、也仅仅是奴隶占有制的南部的特点。

从这一切必然得出如下的结论：有十分之九的土地根本不耕种的奴隶主大地产正转变为小规模的商业性农业。这才是正在进行的经济过程的唯一确切的说明。不是像吉姆美尔先生、民粹

派和一切向“劳动”唱廉价頌歌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所愛講的那樣，轉變為“劳动”農業，而是轉變為商業性農業。“劳动”這個詞非但沒有任何政治經濟意義，而且間接地會使人產生誤解。這個詞是毫無意義的，因為在任何社會經濟結構下，無論在奴隸制度下，或是在農奴制度下，或是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小農總是要“劳动”的。“劳动”是一句空話，是一種空洞的叫喊，它掩蓋了僅僅對資產階級有利的東西，即把各種不同的社會經濟結構混同起來。“劳动”這個詞會使人產生誤解，對公眾是個欺騙，因為它暗示僱傭劳动是不存在的。

吉姆美爾先生和一切資產階級經濟學家一樣，恰好對有關僱傭劳动的材料避而不談，雖然這在農業資本主義問題上是極為重要的材料，雖然這個材料不僅在1900年的人口調查中有，而且在吉姆美爾先生所引証（見該文第49頁的注釋）的1910年的人口調查“公報”（Abstract—Farm crops, by states[⊙]）中也有。

南部小農業的發展也就是商業性農業的發展，這從南部主要農產品的性質可以看出來。南部的主要产品是棉花。在南部的全部谷類作物和禾本科植物的總產值中，糧食占29.3%，干草和牧草占5.1%，而棉花則占42.7%。從1870年到1910年，美國的羊毛產量從16200萬磅增加到32100萬磅，增加了一倍；小麥從23600萬蒲式耳增加到63500萬蒲式耳，增加了將近兩倍；玉蜀黍從109400萬蒲式耳增加到288600萬蒲式耳，也增加了將近兩倍；而棉花則從400萬包（每包500磅）增加到1200萬包，即增加了兩倍。主要作為商品的農產品的增長超過了其他商業性較少的農產

⊙ 各州農戶收成的材料摘要。——編者注

品的增长。此外，“大西洋南部各州”这个南部的的主要区域的以下几种作物的生产也获得了相当大的发展：烟草（在弗吉尼亚州占全部农业产值的 12.1 %），蔬菜（在特拉华州占全部农业产值的 20.1%，在佛罗里达州占 23.2 %），水果（在佛罗里达州占全部农业产值的 21.3 %）等等。所有这些农作物都表明了农业的集约化，表明了在地面积减少的情况下经济规模的扩大和雇佣劳动使用的加强。

现在我们来详细地研究一下关于雇佣劳动的材料。我们只要指出，虽然南部在这方面比其他区域落后（这里使用雇佣劳动的比较少，因为半奴隶制的分成制还比较强大），但是在南部雇佣劳动的使用也正在增长着。

5. 农业的资本主义性质

人们通常是根据关于农户的大小或者关于大（就其土地面积而言）农户的数量和作用的材料来断定农业中资本主义的程度的。这种材料我们部分地研究过，今后还要作部分的研究。但是必须指出，所有这些材料都是间接的，因为面积的大小远不是任何时候都能说明、也远不能直接说明经济的真正的巨大规模和它的资本主义性质。

在这方面，关于雇佣劳动的材料有无可比拟的更大的证明力。近年来的农业调查，如奥地利 1902 年的调查和德国 1907 年的调查（这些调查我们将在别的地方加以分析）都表明了，现代农业中尤其是小农业中使用雇佣劳动的规模，比人们通常想像的要大得多。再没有能像这种材料这样明显无疑地推翻关于小“劳动”农业

的市僧的無稽之談的材料了。

美国的統計在这个問題上收集了非常广泛的材料，因为在每个农户的調查卡片上都記載着，是否有用在雇用工人上的支出，如果有，那末究竟支出了多少。与欧洲的（例如刚才提到的那两个国家的）統計不同，美国的統計沒有把当前每个業主的現有雇佣工人数目登記下来，虽然这是很容易做到的，而且用这种材料作为有关雇佣劳动支出总数的材料的补充材料，其科学意义也是很大的。然而最糟糕的是 1910 年的調查，其中的这种材料編制得根本不适用，一般說来要比 1900 年的調查編制得坏得多。在 1910 年的調查中，全部农户是按土地面积的大小加以分类的，这和 1900 年一样，但是与 1900 年不同的是它並沒有根据这些类别列出关于使用雇佣劳动的材料。因此我們就不可能比較大小农户（土地多少）在使用雇佣劳动方面的情况。我們所掌握的只是各州和各区平均材料，即把資本主义农户和非資本主义农户混在一起的材料。

我們在后面将单独来研究編制得較好的 1900 年的材料，現在我們先引用 1910 年的材料。其实它們是 1899 年和 1909 年的材料：

区 域	雇用工人的农户 所占的百分比 (1909年)	雇佣劳动費用 增加的百分比 (1899— 1909年)	每英亩耕地的 雇佣劳动費用 (单位美元)	
			1909年	1899年
北 部………	55.1	+ 70.8	1.26	0.82
南 部………	36.6	+ 87.1	1.07	0.69
西 部………	52.5	+ 119.0	3.25	2.07
全美国………	45.9	+ 82.3	1.36	0.86

从这个材料首先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确定無疑的結論：北部的农业具有最大的資本主义性質（使用雇佣劳动的农户占 55.1%），

其次是西部(52.5%),最少的是南部(36.6%)。如果把人烟稠密的工业区域同垦殖区域和分成制区域加以对比,情形也应该是这样。要准确地比较各个区域,关于使用雇佣劳动的农户所占百分比的材料自然要比关于每英亩耕地的雇佣劳动费用的材料更为适用。比较后一种材料时,各个区域之间的工资标准必须是一致的。我们没有关于美国农业工资的材料,但是,既然我们知道各个区域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差异,那就很难设想它们的工资标准是一致的。

总之,在北部和西部这两个集中了全国 $\frac{2}{3}$ 耕地和 $\frac{2}{3}$ 耕畜的区域,一半以上的农户是不能不使用雇佣劳动的。南部使用雇佣劳动的较少,只是由于那里分成制的半封建(也是半奴隶制)剥削还很厉害。毫无疑问,在美国也像在世界上其他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一样,一部分处境最坏的农民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可惜美国的统计根本没有提供这方面的材料,而德国1907年的统计则不同,它不仅收集了这种材料,而且编制得相当详细。根据德国的材料,在5 736 082个农业业主(这是农业业主的全部人数,其中包括最小的“业主”)中有1 940 867人,即30%以上的农业业主,就其主要职业来说是雇工。自然,这许多有一小块土地的长工和短工都应列入下等农户。

按照美国一般的惯例,最小农户(不到3英亩)是根本不登记的。假定在这个国家里,出卖劳动力的农户只占10%,那我们就得到这样的结论:全国有 $\frac{1}{3}$ 以上的农户是直接受地主和资本家剥削的(受过去奴隶主的封建剥削或半封建剥削的分成制农民占24%,加上这10%受资本家剥削的农户,一共是34%)。这就是说在全部农户中,只有少数,未必超过 $\frac{1}{5}$ 或 $\frac{1}{4}$ 的农户,既不雇用工人,也不受人雇用,或者说也不受人奴役。

在这个“典型的和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在这个無償地分發千百萬畝土地的国家中，实际情况正是如此。臭名昭彰的所謂“劳动”农业，即非资本主义的小农业，在这里也是無稽之談。

美国农业中的雇佣工人有多少？同农户户主的人数比起来，同全体农业人口比起来，他们是逐渐增加呢，还是逐渐减少？

对于这些極端重要的問題，可惜美国的統計沒有作出直接的答复。現在我們来寻找接近的答案。

第一、能够提供接近的答案的是职业統計数字（职业調查材料第4卷）。这种統計美国人也“沒有做好”。它編得死板、荒誕，而且完全是按照官方意志編制的，其中甚至关于人們在手工業中所处的地位，即关于業主、家庭工人和雇佣工人的区别的材料都沒有。不在經濟上作确切的划分，反而滿足于“流行的”、“一般的”玩弄字眼，而且在“农业工人”这个标题之下，毫無意义地把农户家庭成员和雇佣工人混在一起。大家知道，在这个問題上，并不是只有美国的統計中才充滿这种極混乱的現象。

1910年的調查曾試圖稍微澄清一下这种混乱現象，糾正一些非常明显的錯誤，至少要把一部分雇佣工人（working out）从家庭工人（working on the home farm）中划分出来。統計学家們进行了一系列的計算之后，对农业中在業人員的总数作了修正，从这个数目中减去了468 100人（第4卷第27頁）。其次，确定女雇佣工人在1900年是220 048人，在1910年是337 522人（增加了53%）。男雇佣工人在1910年是2 299 444人。假定1900年农业雇佣工人在全体农业工人中所占的比例和1910年一样，那末1900年的男雇佣工人就是1 798 165人。这样我們就得出如下的圖表：

	1900年	1910年	增加的百分比
农业中的全部在业人数……	10 381 765	12 099 825	+16%
农户主人人数……	5 674 875	5 981 522	+ 5%
雇佣工人人数……	2 018 213	2 566 966	+27%

这就是说，雇佣工人增加的百分比要比农户主人增加的百分比大四倍以上（27%比5%）。农户主人在农业人口中所占的比重降低了，雇佣工人所占的比重提高了。独立业主在全体农业人口中所占的比重降低了，依附的、被剥削的人增多了。

1907年德国农业中的家庭工人和雇佣工人总数是1500万，其中有农业雇佣工人450万，即占30%。根据上面大致的计算，美国1200万全部农业在业人员中，雇佣工人只有250万，即占21%。很可能由于存在无偿地发给的闲置土地，由于分成制农民占着很大比重，就降低了美国雇佣工人的百分比。

第二、能够提供接近的答案的是1899年和1909年的关于花在雇佣工人上的费用的数字。在这期间，工业中的雇佣工人从470万增加到660万，增加了40%；而他们的工资则从200800万美元增加到342700万美元，即增加了70%（不要忘记，产品等价格的提高已经使这种名义工资的提高等于零了）。

根据这个材料可以这样假设：农业中花在雇佣工人上的费用增加了82%，同时雇佣工人大约增加了48%。我们给三个主要区域也作同样的假设，那就得出如下的图表：

区	域	全部农业人口 增加的百分比	农户增加 的百分比	雇佣工人增 加的百分比
(1900—1910年)				
北	部	+ 3.9%	+ 0.6%	+40%
南	部	+14.8%	+18.2%	+50%
西	部	+49.7%	+53.7%	+66%
全美国		+11.2%	+10.9%	+48%

这个材料向我们表明，就全国整个地来说，业主的增加落后于农业人口的增加，而雇佣工人的增加又超过了农业人口的增加。换句话说，就是独立农户的比重降低了，依附农户的比重提高了。

我们看到，按第一种计算所得的雇佣工人增加数（+27%）和按第二种计算所得的增加数（+48%）之间有很大的差额，这是完全可能的，因为第一种计算只包括职业雇佣工人，而第二种计算则包括在任何情况下对雇佣劳动力的使用。农业中对雇佣劳动力的间或使用有着巨大的意义，因此不应该只满足于确定雇佣工人（固定的和临时的）的数目，而要尽可能地确定花在雇佣劳动上的费用总数，这在任何时候都应当作为一项准则。

不管怎样，这两种计算都向我们确切无疑地表明了美国农业中的资本主义的增长，即对雇佣劳动使用的增长，而且这种增长超过了农业人口和户主的增长。

6. 高度集約的农业区域

我们已经研究了资本主义在农业中的最直接的标志——雇佣劳动的一般材料，现在就可以进而更详细地来分析一下，资本主义在国民经济的这个部门中是以什么样的特殊形式表现出来的。

我们已经知道，有一个区域的农户平均面积正在减少，那就是南部。在那里，这个过程表明奴隶主大地产正转变为小规模的商业性农业。还有两个区域的农户平均面积也在减少，即北部的一部分：新英格兰和大西洋中部各州。下面就是关于这两个区域的材料：

	农户耕地的平均面积(单位英亩)	
	新英格兰	大西洋中部各州
1850.....	66.5	70.8
1860.....	66.4	70.3
1870.....	66.4	69.2
1880.....	63.4	68.0
1890.....	56.5	67.4
1900.....	42.4	63.4
1910.....	38.4	62.6

新英格兰的农户平均面积在美国各区域中是最小的。在南部，有两个区域的农户平均面积是 42—43 英亩，第三个区域即还存在着垦殖现象的中部西南各州的农户平均面积是 61.8 英亩，这和大西洋中部各州差不多。在新英格兰和中部大西洋岸各州，即“在文化较悠久、经济发展较高的地区”（吉姆美尔先生的著作第 60 页），在没有进行垦殖过程的地区，农户平均面积的缩小使得我们的作者也像很多其他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样，得出结论说：“资本主义农业遭到破坏”，“生产正变成分散而零碎的”，“没有一个地区不是处在垦殖过程中，没有一个地区的大资本主义农业不是正在解体，并受到劳动农业的排挤”。

吉姆美尔先生得出这些根本违反事实的结论，是由于他忘记了……一件“小事”：农业的集约化过程！这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但这是事实。几乎所有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虽然“在理论上”清楚地“知道”并且承认农业的集约化过程这一点，但是在谈到农业中的小生产和大生产时，总妄想不愿这件“小事”，因此我们需要特别详细地谈谈这个问题。资产阶级的（包括民粹派的和机会主义的）经济学在小“劳动”农业问题上错误百出，基本根源之一就在这里。他们忘记的一件“小事”就是：由于农业的技术特点，农业的集约化

过程往往会导致经济规模的扩大,引起生产和资本主义的增长,同时农户的平均耕地却在缩小。

首先我们来考察一下,新英格兰和大西洋中部各州同北部其他各区比较起来,同全国其他各区比较起来,在农业技术上,在农业的一般性质和集约程度上,有没有根本的差别。

下面的材料表明了农作物方面的差别:

几种作物在农业总产值中所占的百分比(1910年)

区 域	粮 食	干草和牧草	蔬菜、水果 等特种作物
新英格兰.....	7.6	41.9	33.5
大西洋中部各州.....	29.6	31.4	31.8
中部的东北各州.....	65.4	16.5	11.0
中部的西北各州.....	75.4	14.6	5.9

在农作物方面是存在着根本的差别的。我们看到,前两个区域的农业是高度集约的农业,后两个区域的农业是粗放的农业。在后两个区域中,粮食占总产值的大部分,在前两个区域中,粮食只占小部分,而且在新英格兰只占微不足道的一部分(7.6%),同时这里的特种“商业”作物(蔬菜、水果等)在产值中所占的百分比却大于粮食。粗放农业已经让位给集约农业。这里牧草的播种也非常广泛。在新英格兰,提供干草和牧草的380万英亩土地中,有330万英亩是播种的牧草。在大西洋中部各州,提供干草和牧草的850万英亩土地中,有790万英亩是播种的牧草。相反,在中部的西北各州(这是一个垦殖区和粗放农业区),提供干草和牧草的2740万英亩土地中,有1450万英亩,即一大半是“野生”牧场及其他。

“集约化”各州的收获量是相当高的:

区 域	每英亩的收获量(单位蒲式耳)			
	玉 蜀 黍		小 麦	
	1909年	1899年	1909年	1899年
新英格兰.....	45.2	39.4	23.5	18.0
大西洋中部各州.....	32.2	34.0	18.6	14.9
中部的东北各州.....	38.6	38.3	17.2	12.9
中部的西北各州.....	27.7	31.4	14.8	12.2

“集約化”各州特別發達的商業性畜牧業和牛奶業的情況也是这样：

区 域	每个农户的 奶牛平均数	每头奶牛的平均产乳量 (单位加仑)	
	(1900年)	1909年	1899年
新英格兰.....	5.8	476	548
大西洋中部各州.....	6.1	490	514
中部的东北各州.....	4.0	410	487
中部的西北各州.....	4.9	325	371
南部(3个区域).....	1.9—3.1	232—286	290—395
西部(2个区域).....	4.7—5.1	339—475	334—470
全美国的平均数.....	3.8	362	424

从这里可以看出，“集約化”各州的牛奶業規模比其他一切区域大得多。农户最小(按耕地数量)的区域是牛奶業規模最大的区域。这个事实具有極大的意义，因为大家知道，在城市近郊和工業特別發達的国家或区域，牛奶業發展得最快。我們在另一个地方[⊙]談到的关于丹麦、德国和瑞士的統計材料，也向我們表明了产乳牲畜日益集中的事实。

⊙ 見“列宁全集”第4版第5卷第187—202頁和第13卷第149—193頁。——編者注

我們看到，在“集約化的”各州中，干草和牧草在農業總產值中所占的比重要比糧食大得多。這裡的畜牧業在很大的程度上是靠購進飼料發展的。下面就是 1909 年的關於這方面的材料：

区 域	賣出飼料的 收入總額 (單位百萬美元)	購進飼料的 支出總額	收入超過 支出(+) 或支出超過 收入(-)
新英格蘭……………	+ 4.3	-34.6	- 30.3
大西洋中部各州……	+ 21.6	-54.7	- 33.1
中部的東北各州……	+195.6	-40.6	+155.0
中部的西北各州……	+174.4	-76.2	+ 98.2

北部的粗放各州出賣飼料，集約化各州則購買飼料。顯然只有小塊土地上的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大農戶才能購買飼料。

我們現在把北部的兩個集約化區域——新英格蘭和大西洋中部各州拿來同北部的最粗放的區域——中部的西北各州比較一下：

区 域	耕地數量 (單位百萬英畝)	牲畜總值 (單位百萬美元)	賣出飼料 的收入	購進飼料 的支出
新英格蘭+大西洋 中部各州……………	36.5	447	26	89
中部的西北各州……	164.3	1 552	174	76

我們看到，集約化各州每英畝耕地的牲畜費($447 \div 36 = 12$ 美元)大於粗放各州($1 552 \div 164 = 9$ 美元)。就是說，在每個單位面積上用在牲畜上的資本比較多。這裡每個單位面積的飼料貿易流轉(買和賣)總額(3 600 萬英畝有 $26 + 89 = 11 500$ 萬美元)要比粗放各州(16 400 萬英畝有 $174 + 76 = 25 000$ 萬美元)多得多。很清楚，集約化各州的農業比粗放各州具有更大的商業性質。

关于肥料费、农具价值和机器价值的材料是说明农业集约化程度的最准确的统计数字。下面就是这种材料：

区 域	购买肥 料的农 户的百 分比	每个农户 的平均肥 料费(单 位美元)	每英亩耕 地的平均 肥料费(单 位美元)		每个农户 的平均耕 地(单位 英亩)	
			1909年	1899年 (1909年)		
北 部	新英格兰……………	60.9	82	1.30	0.53	38.4
	大西洋中部各州…	57.1	68	0.62	0.37	62.6
中 部	中部的东北各州…	19.6	37	0.09	0.07	79.2
	中部的西北各州…	2.1	41	0.01	0.01	148.0
南 部	大西洋南部各州…	69.2	77	1.23	0.49	43.6
	中部的东南各州…	33.8	37	0.29	0.13	42.2
	中部的西南各州…	6.4	53	0.06	0.03	61.8
西 部	山区各州……………	1.3	67	0.01	0.01	86.8
	太平洋岸各州……	6.4	189	0.10	0.05	116.1
全美国……………		28.7	63	0.24	0.13	75.2

在这里，北部粗放各州和集约化各州之间的差别是十分明显的，粗放各州购买肥料的农户所占的百分比(2%—19%)是微乎其微的，每英亩耕地的肥料费(0.01—0.09美元)也是微不足道的；而集约化各州的大多数农户(57%—60%)都购买肥料，而且肥料费也相当可观。例如新英格兰每英亩的肥料费达1.30美元，这个数字在所有各区域中是最大的(又是农户土地面积最小而肥料费最多的例子!)，超过了南部的一个区域(大西洋南部各州)。要知道，在使用分成制的黑人劳动最盛行的南部，种植棉花是需要特别多的人造肥料的。

我们看到，在太平洋岸各州，使用肥料的农户的百分比是很低的(6.4%)，而每个农户的平均肥料费却最高(189美元)，当然这

里所計算的只是使用肥料的那些農戶。這又是一個農戶土地面積減少而資本主義大農業却增長的例子。在太平洋岸的三個州中，華盛頓和俄勒岡這兩個州一般很少使用肥料，每英畝土地的肥料費不過 0.01 美元。只有第三個州，即加利福尼亞州的這個數字比較大些：1899 年是 0.08 美元，1909 年是 0.19 美元。在這個州中，水果生產起着特殊的作用，它以純粹資本主義的形式飛速地發展着，在 1909 年，它在全部農業總產值中所占的比重是 33.1%，而糧食只占 18.3%，干草和牧草只占 27.6%。生產水果的典型的農戶，土地面積都低於平均數，所使用的肥料和僱傭勞動則大大超過平均數。後面我們還要談到這種關係，因為它是實行農業集約化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典型關係，也是最容易被統計學家和經濟學家忽視的關係。

現在我們再回過來談北部的“集約化”各州。新英格蘭不僅是一個農戶耕地面積最小（38.4 英畝）而使用肥料最多（每英畝 1.30 美元）的區域，也是一個肥料費增長得特別快的區域。在 1899 年到 1909 年的 10 年中，每英畝的這種費用從 0.53 美元提高到 1.30 美元，增加了一倍半。可見，這裡農業的集約化、農業的技術進步以及農作物產量的提高都是進行得非常快的。為了更清楚地表明這個事實的意義，我們把北部高度集約化的區域新英格蘭和北部最粗放的區域中部的西北各州比較一下。後一個區域幾乎不使用人造肥料（使用肥料的農戶占 2.1%，每英畝的肥料費是 0.01 美元），然而這裡的農戶面積在美國所有區域中是最大的（148 英畝），其增長速度也是最快的。人們通常正是把這個區域當作美國農業中資本主義的標本，例如吉姆美爾先生就是如此。我們在後面還要更詳細地說明這個流行的見解是不對的。所以產生這種見解，

是由于人们把最粗野最原始的粗放农业形式同技术进步的集约农业形式混同了起来。中部西北各州的农户面积几乎比新英格兰大三倍（148 英亩比 38.4 英亩），而它的每个农户的平均肥料费（只按使用肥料的农户计算）只有新英格兰的一半：41 美元比 82 美元。

可见现实生活中是存在着农户土地大量减少同人造肥料费大量增加相联系的情况的，因此“小”生产（如果仍然按照惯例，根据土地面积把它看做小生产）按其对于土地的投资来说原来是“大”生产。这种情况并不是个别的，而是所有正在以集约农业代替粗放农业的国家的典型现象。一切资本主义国家都是这样的国家，忽视这个典型的、本质的、根本的农业特点，就会犯只按照土地面积的大小来判断问题的小农业崇拜者常犯的错误。

7. 农业中的机器和雇佣劳动

现在我们来看看在技术上与前一种不同的另一种向土地投资的形式，也就是农具和机器的使用。整个欧洲的农业统计都无可辩驳地证实，农户的土地愈多，农户使用各种机器的百分比就愈高，使用的机器也愈多。大农户在这个极重要的方面的优越性是绝对无可怀疑的。美国的统计在这一点上也做得有些奇怪：无论是农具或农业机器它都没有分别加以登记，而只是确定它们的总的价值。自然，这种材料在每一个别情况下可能不太准确，不过一般说来，它却能使我们对各个区域和各类农户作一些比较，而这种比较靠别的材料是办不到的。

下面就是各个区域关于农具和农业机械的材料：

区 域		每个农户的农具和 机器的平均价值 (1909年, 单位美元)	每英亩土地上的农具 和机器的平均价值
北	新英格兰……………	269	2.58
	大西洋中部各州……	358	3.88
部	中部的东北各州……	239	2.28
	中部的西北各州……	332	1.59
南部(三个区域)……………		72—88—127	0.71—0.92—0.95
西部(两个区域)……………		269—350	0.83—1.29
全美国……………		199	1.44

可以看到,过去奴隶占有制的南部,即分成制的区域在使用机器方面居于最末位。北部集約化各州每英亩土地的农具和机器的价值要比这里大两倍、三倍以至四倍(在各个不同区域)。这些集約化各州不仅在全国各州中居于首位,而且也是所謂美国粮倉的标本农業区域即中部的西北各州望塵莫及的,然而至今还有一些膚浅的观察者常常把这些农業州看作是資本主义和使用机器的典型区域。

我們看到,美国統計学家在确定每英亩土地上的机器价值时,也像确定土地、牲畜和建筑物等的价值一样,不是按照耕地来計算,而是按照农户的全部土地来計算的;这样就低估了北部“集約化”各州的优越性,根本不能認为这个方法是正确的。因为各个区域在耕地所占的百分比上有很大的差别:西部山区各州的耕地只占26.7%,而北部的中部的东北各州的耕地則达到75.4%。对于經濟統計,更重要的無疑是耕地的数量而不是全部土地的数量。在新英格兰,农户的耕地及耕地所占的百分比在急剧地下降,尤其自1880年以来下降得更厉害,这大概是受了西部自由(摆脱地租和地主老爷的貢稅的自由)土地竞争的影响。同时在这个区域里

机器的使用特别普遍，每英亩耕地的机器价值特别高。在1910年，这里每英亩的机器价值是7美元，大西洋中部各州是将近5 1/2美元，其他各区域则不超过2—3美元。

农户土地数量最少的区域原来又是以机器向土地投资最多的区域。

如果我们把北部的“集约化”区域中的大西洋中部各州拿来同北部的最粗放区域中部的西北各州比较一下，我们就会看到，按每个农户的平均耕地数量说来，第一个区域的农户是不到第二个区域的一半的(62.6英亩比148英亩)“小”生产，可是按使用的机器的价值说来，第一个区域却超过了第二个区域(358美元比332美元)。小农户按使用机器的规模说来原来是比较大的农户。

现在我们还要把说明农业集约性质的材料同关于使用雇佣劳动的材料比较一下。在前面第5节中，我们曾经简单地引用过后一种材料。现在我们应该更详细地、分区地考察一下。

区 域	雇用工人的农户的百分比 (1909年)	每个农户的平均雇 佣劳动费 (单位美 元)	每英亩耕 地的雇佣 劳动费		雇佣劳动 费增长的 百分比 (1899— 1909年)	
			1909年	1899年		
北 部	新英格兰.....	66.0	277	4.76	2.55	+86%
	大西洋中部各州...	65.8	253	2.66	1.64	+62%
中 部	中部的东北各州...	52.7	199	1.33	0.78	+71%
	中部的西北各州...	51.0	240	0.83	0.56	+48%
南 部	大西洋南部各州...	42.0	142	1.37	0.80	+71%
	中部的东南各州...	31.6	107	0.80	0.49	+63%
	中部的西南各州...	35.6	178	1.03	0.75	+37%
西 部	山区各州.....	46.8	547	2.95	2.42	+22%
	太平洋岸各州.....	58.0	694	3.47	1.92	+80%
全美国.....		45.9	223	1.36	0.86	+58%

从上表可以看到：第一、北部集約化各州的無可怀疑的特点就是它們农業中的資本主义的發展在各方面都比粗放各州高；第二、資本主义在前两个区域比在粗放各州發展得快；第三、农戶最小的区域新英格兰的农業中的資本主义，無論在發展水平方面或發展速度方面，都高于全国其他各区。这里每英亩耕地的雇佣劳动費增长了 86%。在这方面，太平洋岸各州居于第二位，其中最突出的是加利福尼亚，我們已經講过，这个州的“小”規模的資本主义的水果業發展得很快。

中部的西北各州农戶的面积最大(在 1910 年，单就耕地計算，平均是 148 英亩)，从 1850 年以来，这里农戶的面积就以最快的速度直綫地增加着，因此人們通常总是把这个区域看作是美國“典型的”农業資本主义区域。現在我們看到，这种見解是極其錯誤的。只有使用雇佣劳动的多少才是資本主义發展的最可靠最直接的标志。而这个标志向我們表明，在所謂美國的“粮倉”的区域，也就是有許多特別引人注意的声名远揚的所謂“小麦工厂”的区域，那里的資本主义要少于工業的和农業集約化的区域，农業集約化的区域的农艺上的进步不表現于耕地面积的扩大，而表現于在耕地面积縮小的情况下对土地投資的增多。

尽管雇佣劳动費增长得不太快，但是在使用机器的情况下，仍然可以很快地扩大“黑土”或一般未开垦处女地的耕种，这是完全可以設想的。在中部的西北各州，每英亩耕地的雇佣劳动費 1899 年是 0.56 美元，1909 年是 0.83 美元，只增加了 48%。而新英格兰(这里耕地的数量和农戶的平均面积不是在增加而是在减少)的雇佣劳动費不仅在 1899 年(每英亩 2.55 美元)和 1909 年(4.76 美元)都要高得多，而且在这个期間它的增长(+86%)也是無比迅速的。

新英格兰每个农户的平均耕地只等于中部的西北各州的四分之一（38.4 英亩比 148 英亩），而这里的平均雇佣劳动费却比中部的西北各州高（277 美元比 240 美元）。因此，农户面积的缩小在这种情况下就意味着农业投资的增多，农业资本主义性质的加强，以及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生产的增长。

如果说占全国耕地 34.3% 的中部的西北各州显著的特点是最典型的资本主义“粗放”农业区域的话，那末山区各州就是在垦殖进行得最快的条件下同样性质的粗放经济的典型。与中部的西北各州相比，山区各州就雇用工人的农户所占的百分比来看，使用的雇佣劳动是比较少的，但是它的平均雇佣劳动费却高得多。不过这里雇佣劳动的增长在全国各区中是最慢的（共增加了 22%）。决定这种发展形式的想必是这样一些情况：在这一区域，垦殖和分垦垦殖地段进行得极快。这里耕地的增加比其他任何区域都快：从 1900 年到 1910 年竟增加了 89%。自然，垦殖者即垦殖地段的占有者，至少在开始经营时是很少使用雇佣劳动的。另一方面，这里真正大规模地使用雇佣劳动的：首先是某些大地产，这里也和整个西部一样，大地产特别多；其次是种植高度资本主义的特种作物的农户。譬如在这个区域的某些州中，占农业总产值很大比重的有水果（阿利桑那占 6%，科罗拉多占 10%）和蔬菜（科罗拉多占 11.9%，内华达占 11.2%）等。

吉姆美尔先生说：“没有一个地区不是处在垦殖过程中，没有一个地区的大资本主义农业不是正在解体，并受到劳动农业的排挤。”总结以上所述，我们应该说：吉姆美尔先生的这个论断是对实际情况的嘲弄，是与实际情形正相反的。新英格兰就没有任何垦殖现象，它的农户最小，而农业的集约程度却最高，我们看到，这个

区域的农业中的资本主义最发达，发展得也最快。这个结论对于了解资本主义在农业中的一般发展过程，具有最本质最根本的意义，因为农业集约化以及与集约化相联系的农户平均土地的减少并不是偶然的、地方的、意外的现象，而是各文明国家的普遍现象。一切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有关大不列颠、丹麦、德国等国的农业进化的材料上犯了许许多多的错误，原因就在于他们对这个普遍现象认识、了解、领会、思考得不够。

8. 大农户排挤小农户。耕地数量

我们考察了农业中的资本主义发展过程所采取的各种主要形式，深信这些形式是极其多种多样的。南部奴隶主大地产的解体，北部粗放区的大规模粗放经济的增长，北部集约区在农户平均面积最小的情况下资本主义得到最快的发展，这是其中最主要的几种形式。许多事实确凿地证明，能够说明资本主义发展的，有时是农户面积的扩大，有时是农户数目的增加。因此，关于全国农户平均面积的一般材料说明不了任何问题。

各个地区的特点和各种农艺上的特点的总的情况怎样呢？关于雇佣劳动的材料向我们表明了这种情况。雇佣劳动的使用日益增长是贯穿所有这些特点的总的过程。但是绝大多数文明国家的农业统计，都自觉地或不自觉地按照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观点和偏见办事，根本没有系统地提供关于雇佣劳动的材料，或者只是最近才提供了这种材料（如德国 1907 年的农业调查），因此不可能和过去进行比较。美国的统计对 1900 年到 1910 年的雇佣劳动材料的综合和研究，搞得非常糟糕，关于这一点我们到适当的地方

再詳細地談論。

美国和其他大多数国家在編制总结材料时所使用的最普通最流行的方法，仍然是按照土地面积的划分来比較大农户和小农户。现在我們来看一下这种材料。

美国的統計在按土地多少划分农户类别时，是按全部土地的数量而不是仅按耕地的数量；当然只有按耕地数量划分才是比較正确的，德国的統計就是这样做的。美国在 1910 年的調查中，把全部农户分为七类（20 英亩以下的，20—49 英亩，50—99 英亩，100—174 英亩，175—499 英亩，500—999 英亩，1 000 英亩以上的），但是沒有說明这样分类的合理根据是什么。显然这里起主要作用的是老一套的統計办法。我們把 100—174 英亩的这一类叫作中等农户，因为其中包括的主要是垦殖地段（法定額是 160 英亩），同时正是掌握这么多土地才能保証农民在使用雇佣劳动最少的情况下保持最大的“独立性”。較高的两类我們称之为大农户或资本主义农户，因为按照一般情况，这两类农户不使用雇佣劳动是不行的。1 000 英亩以上（其中的未耕地，在北部占 $\frac{3}{6}$ ，在南部占 $\frac{9}{10}$ ，在西部占 $\frac{2}{3}$ ）的农户我們称之为大地产。不到 100 英亩的农户我們称之为小农户；在这三类小农户中，無馬农户在第一类中占 51%，在第二类中占 43%，在第三类中占 23%，根据这个事实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判断小农户的經濟上的独立性。不用說，这个說明是不應該从絕對意义上理解的，也不應該不作具体分析就把它应用于每一个区域或具有特殊条件的个别地区。

在这里，我們不可能把美国各个主要区域的所有这七类材料都加以引用，这样会以大量的数字使叙述变得过于累贅。因此我們只簡略地指出北部、南部和西部之間最主要的差別，只有关于整

个美国的材料我們才全部加以引用。我們要記住，北部的耕地占全国耕地的 $\frac{3}{5}$ (60.6%)，南部不到 $\frac{1}{3}$ (31.5%)，西部不到 $\frac{1}{12}$ (7.9%)。

这三个主要区域之間最显著的差别就是资本主义北部的大地产最少，但是这里的大地产数目及其全部土地和耕地正不断地增加着。在1910年，北部1000英亩以上的农户占0.5%，占有全部土地的6.9%和耕地的4.1%。南部这样的农户占0.7%，占有全部土地的23.9%和耕地的4.8%。西部这样的农户占3.9%，占有全部土地的48.3%和耕地的32.3%。我們已經知道的情况是：南部的大地产是奴隶主大地产，西部的大地产更加广大，它一部分是最粗放的畜牧业的基地，一部分是“垦殖者”霸占下来的空地，准备出卖或出租(比較少)給开发“遥远的西部”的真正的农民的。

美国的例子清楚地告訴我們，把资本主义大农业同大地产混同起来是十分輕率的，因为大地产往往是资本主义以前的許多关系的残余，即奴隶制、封建制或宗法制的残余。無論在南部或西部，大地产都处在分裂、瓦解的过程中。在北部，农户的全部土地增加了3070万英亩；大地产的土地一共只增加了230万英亩，而资本主义大农户(175—999英亩)的土地就增加了2200万英亩。在南部，农户的全部土地减少了750万英亩。大地产的土地就减少了3180万英亩。小农户的土地增加了1300万英亩，中等农户增加了500万英亩。在西部，农户的全部土地增加了1700万英亩；大地产的土地却减少了120万英亩，小农户的土地增加了200万英亩，中等农户增加了500万英亩，大农户增加了1100万英亩。

三个区域的大地产的耕地都有所增加：北部增加得最多(370万英亩，即增加47%)，西部次之(280万英亩，即增加29.6%)，南

部最少(30万英亩,即增加5.5%)。但是北部耕地增加得最多的是大农户(175—999英亩),南部是小农户和中等农户,西部是大农户和中等农户。结果,耕地比重增加了的在北部是大农户,在南部和西部是小农户和一部分中等农户。这种情况与我们所知道的这三个区域的不同条件完全相符。南部的小商业性农业是在奴隶主大地产瓦解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西部的这个过程却是在更大的大地产瓦解得不太厉害的情况下进行的,这种更大的大地产与奴隶主大地产不同,它具有粗放畜牧业和“圈地”的性质。此外,关于西部的太平洋岸各州的情况,美国的统计学家指出:

“太平洋沿岸的小水果农户及其他农户的强大发展,是由于,至少也是部分地由于近年来进行的灌溉工作。这就使得太平洋岸各州的50英亩以下的小农户有所增加。”(第5卷第264页)

在北部,既没有奴隶主大地产和“原始的”大地产,也没有大地产瓦解的现象,以及在大农户瓦解的基础上小农户增加的现象。

整个说来,全美国的这个过程如下:

农户类别	农户数目 (单位千)		农户的百分比		增加或 减少
	1900年	1910年	1900年	1910年	
20英亩以下的	674	839	11.7	13.2	+1.5
20—49英亩	1258	1415	21.9	22.2	+0.3
50—99英亩	1366	1438	23.8	22.6	-1.2
100—174英亩	1422	1516	24.8	23.8	-1.0
175—499英亩	868	978	15.1	15.4	+0.3
500—999英亩	103	125	1.8	2.0	+0.2
1000英亩以上的	47	50	0.8	0.8	—
总 计	5738	6361	100.0	100.0	—

总之，大地产在全部农户中所占的比例照旧未变。其余各类对比关系上的变化的特点是：中间削弱了，两头加强了。中间的一类（100—174 英亩）和小农户中最接近中间的那一类被排挤到后面去了。增加得最多的是最小的农户和小农户，其次是资本主义大农户（175—999 英亩）。

现在我们来了解一下全部土地的情况：

农 户 类 别	农户的全部土地 (单位千英亩)		农户土地所 占的百分比		增加或 减少
	1900年	1910年	1900年	1910年	
20 英亩以下的 ……	7 181	8 794	0.9	1.0	+0.1
20— 49 英亩 ……	41 536	45 378	5.0	5.2	+0.2
50— 99 英亩 ……	98 592	103 121	11.8	11.7	-0.1
100—174 英亩 ……	192 680	205 481	23.0	23.4	+0.4
175—499 英亩 ……	232 955	265 289	27.8	30.2	+2.4
500—999 英亩 ……	67 864	83 653	8.1	9.5	+1.4
1 000 英亩以上的 ……	197 784	167 082	23.6	19.0	-4.6
总 计 ……	838 592	878 798	100.0	100.0	—

这里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大地产所占土地的比重大大降低了。应该提起注意的是，绝对减少的只有南部和西部，在这两个区域里，大地产中的未耕地在 1910 年分别占 91.5% 和 77.1%。其次，小农户中最高的一类（50—99 英亩）的全部土地所占的比重稍微降低了一点（0.1%）。土地比重增加得最多的是资本主义大农户，即 175—499 英亩和 500—999 英亩的这两类。最小的两类农户全部土地的比重增加得比较少。中间那一类（100—174 英亩）几乎处于停滞状态（+0.4%）。

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关于耕地数量的材料：

农户类别	农户的耕地数量 (单位千英亩)		耕地所占的 百分比		增加或 减少
	1900年	1910年	1900年	1910年	
20 英亩以下的	6 440	7 992	1.6	1.7	+0.1
20— 49 英亩	33 001	36 596	8.0	7.6	-0.4
50— 99 英亩	67 345	71 155	16.2	14.9	-1.3
100—174 英亩	118 391	128 854	28.6	26.9	-1.7
175—499 英亩	135 530	161 775	32.7	33.8	+1.1
500—999 英亩	29 474	40 817	7.1	8.5	+1.4
1 000 英亩以上的	24 317	31 263	5.9	6.5	+0.6
总 计	414 498	478 452	100.0	100.0	—

只有耕地的数量而不是全部土地的数量，才能在一定程度上大致地表明农户的规模，同时也有许多例外情况，这些例外情况我们已经讲过；以后还要讲到。这里我们看到，在全部土地方面的比重大大降低了的大地产，在耕地方面的比重却增加了。属于资本主义的两类农户都有所增加，其中以 500—999 英亩的这一类增加得最多。降低得最多的是中等农户（-1.7%）。其次，除了 20 英亩以下的这个最小的一类农户稍微有些增加（+0.1%）外，其他两类小农户都降低了。

这里我们预先指出，在最小的（20 英亩以下的）这一类农户中还包括 3 英亩以下的农户，可是美国的统计没有登记所有这些农户，只登记了其中能够年产 250 美元以上的产品的那些农户。因此，这些最小的农户（3 英亩以下的）的特点就是：与紧挨着它们的土地面积较大的那一类相比，它们的生产规模比较大，资本主义性质比较强。下面就是说明这点的 1900 年的材料，可惜 1910 年的相应的材料我们没有；

每 个 农 户 平 均 有:

类 别	耕 地	总 产 值	雇 佣 劳 动 费	农 具 和 机 器 价 值	牲 畜 总 值
(1900年)	(单 位 英 亩)	(单 位)	美 元	美 元	美 元
3 英亩以下的	1.7	592	77	53	867
3—10 英 亩	5.6	203	18	42	101
10—20 英 亩	12.6	236	16	41	116
20—50 英 亩	26.2	324	18	54	172

且不說 3 英亩以下的农户，就是 3—10 英亩的农户在某些方面(雇用工人的費用，农具和机器的价值)也比 10—20 英亩的农户“大”[⊖]。所以，我們完全有根据把 20 英亩以下的农户耕地比重的提高，算作高度發达的資本主义小(按土地面积)农户耕地面积比重的提高。

总之，根据 1900 年和 1910 年全美国大农户和小农户的耕地分配情况的材料，可以得出十分肯定的和不容怀疑的結論：大农户加强了，中小农户削弱了。既然可以根据关于农户类别(按土地面积划分)的材料来判断农業的資本主义性質或非資本主义性質，那末，美国的例子就向我們表明了近 10 年来資本主义大农户增加

⊖ 这里有一份 1900 年的材料，說明了在按照土地数量划分的各类农户中有多少是收入多的农户，即产值在 2 500 美元以上的农户。材料如下：这种收入多的农户在 3 英亩以下的农户中占 5.2%，在 3—10 英亩的农户中占 0.6%，在 10—20 英亩的农户中占 0.4%，在 20—50 英亩的农户中占 0.3%，在 50—100 英亩的农户中占 0.6%，在 100—175 英亩的农户中占 1.4%，在 175—260 英亩的农户中占 5.2%，在 260—500 英亩的农户中占 12.7%，在 500—1 000 英亩的农户中占 24.3%，在 1 000 英亩以上的农户中占 39.5%。我們看到，收入多的农户在 20 英亩以下的各类中所占的百分比都超过了它在 20—50 英亩这一类中所占的百分比。

和小农户被排挤是一个普遍的规律。

关于每一类中农户和耕地究竟增加了多少的材料，更加明显地说明了这个结论：

农户类别	农户增加的百分比	耕地增加的百分比
	(1900—1910年)	
20英亩以下的	+24.5%	+24.1%
20—49英亩	+12.5%	+10.9%
50—99英亩	+5.3%	+5.7%
100—174英亩	+6.6%	+8.8%
175—499英亩	+12.7%	+19.4%
500—999英亩	+22.2%	+38.5%
1000英亩以上的	+6.3%	+28.6%
总 计	+10.9%	+15.4%

耕地增加的百分比最高的是后边最高的两类。最低的是中间的一类 and 紧挨着它的那一类小农户（50—99英亩）。在最低的两类中，耕地增加的百分比小于农户增加的百分比。

9. 續上。关于农户价值的材料

美国的统计与欧洲的统计不同，它把每个农户和每类农户的个别部分（如土地、建筑物、农具、牲畜）的价值和整个农户的价值都分别作了计算。这种材料也许没有关于土地数量的材料那么准确，但是一般说来它是同样可靠的，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上把农业的一般资本主义情况都估计到了。

为了对前面所说的作一补充，现在我们来考察一下关于包括全部农业财产在内的全部农户价值的材料，以及关于农具和机器

价值的材料。我們所以从农户的許多部分中挑出农具和机器来考察,是因为这两部分直接說明了农業的經營情况和怎样經營的;它的集約程度是高还是低,它所采用的先进技术是多还是少。下面就是关于美国全国的这种材料:

农 戶 类 别	全部农户财产价值所占的百分比		增加或减少	农具和机器价值所占的百分比		增加或减少
	1900年	1910年		1900年	1910年	
20 英亩以下的 ……	3.8	3.7	-0.1	3.8	3.7	-0.1
20—49 英亩 ……	7.9	7.3	-0.6	9.1	8.5	-0.6
50—99 英亩 ……	16.7	14.6	-2.1	19.3	17.7	-1.6
100—174 英亩 ……	28.0	27.1	-0.9	29.3	28.9	-0.4
175—499 英亩 ……	30.5	33.3	+2.8	27.1	30.2	+3.1
500—999 英亩 ……	5.9	7.1	+1.2	5.1	6.3	+1.2
1 000 英亩以上的 ……	7.3	6.9	-0.4	6.2	4.7	-1.5
总 計 ……	100.0	100.0	—	100.0	100.0	—

絕對数字向我們表明,全部农户财产价值在 1900—1910 年間增加了一倍多,由 2 044 000 万美元增加到 4 099 100 万美元,增加了 100.5%。农产品价格的上涨和地租的增加使得工人阶级的亿万万美元落入了一切土地占有者的腰包。在这里,小农户和大农户的盈亏情况怎样呢?上面的数字已經作了答复。这些数字表明,大地产衰落了(記得大地产的全部土地由占 23.6% 下降到占 19%,即下降了 4.6%),中小农户遭到了资本主义大农户(175—999 英亩)的排挤。我們把全部中小农户加在一起,就会看到,它們在全部财产价值中所占的比重由 56.4% 下降到 52.7%。我們再把全部大农户同大地产加在一起,就会看到,它們的比重則由 43.7% 增加到 47.3%。小农户和大农户在农具和机器价值中所占

的比重上的变化也同这完全一样。

至于大地产，我们在这个材料中也看到了前面我们曾经指出过的那种现象。大地产的衰落，只限于南部和西部。这一方面是奴隶主大地产的衰落，另一方面是原始占领的和原始粗放经营的大地产的衰落。在人烟稠密和工业发达的北部，大地产却在发展着：它的数目、它的土地、它的耕地、它在全部农户财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1900年占2.5%；1910年占2.8%），以及它在全部农具和机器总值中所占的比重，都在增加。

而且，大地产作用加强的现象，不仅一般地出现于北部，尤其显著的是在北部的两个根本没有垦殖现象的集约区域——新英格兰和大西洋中部各州。对于这两个区域需要比较详细地谈一谈，因为一方面，它们的农户平均面积特别小而且日益缩小，这就使吉姆美尔先生和其他许多人产生了误解，另一方面，正是这两个高度集约化的区域对于欧洲那些人烟稠密的文明古国来说是最典型的区域。

从1900年到1910年，这两个区域的农户、土地、耕地的数量都在减少。在新英格兰，只有20英亩以下的这一类最小的农户和大地产才有所增加，前者增加了22.4%，其耕地增加了15.5%；后者增加了16.3%，其耕地增加了26.8%。在大西洋中部各州，最小的农户户数增加了7.7%，其耕地增加了2.5%；175—499英亩的农户户数增加了1%；500—999英亩的农户的耕地增加了3.8%。在这两个区域里，最小的农户和大地产在全部农户财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以及在农具和机器总值中所占的比重都有所增长。下面是关于这两个区域的比较明显比较完备的材料：

1900—1910 年农戶財產价值及农具和机器价值增长的百分比

农 戶 类 别	新 英 格 兰		大 西 洋 中 部 各 州	
	全部农戶 財產价值 的 增 长	农具和机 器价值的 增 长	全部农戶 財產价值 的 增 长	农具和机 器价值的 增 长
20 英亩以下的 ……	60.9	48.9	45.8	42.9
20— 49 英亩 ……	31.4	30.3	28.3	37.0
50— 99 英亩 ……	27.5	31.2	23.8	39.9
100—174 英亩 ……	30.3	38.5	24.9	43.8
175—499 英亩 ……	33.0	44.6	29.4	54.7
500—999 英亩 ……	53.7	53.7	31.5	50.8
1 000 英亩以上的 ……	102.7	60.5	74.4	65.2
总 計 ……	35.6	39.0	28.1	44.1

从上表可以看出，在这两个区域中，正是大地产增长得最显著，在经济上获利最多，在技术上进步最快。这里最大的资本主义农户排挤着其余较小的农户。全部财产价值以及农具和机器价值增长得最少的不是中等农户就是小农户（但是不包括最小的农户）。这就是说，中小农户最落后。

在这两个区域里，最小的农户（20 英亩以下的）的增长超过了中等农户，仅仅次于大地产。这个现象的原因我们已知，就是在这两个集约化的区域里，那些农户面积最小而产量却最高的高度资本主义的作物（如蔬菜、水果、花卉等），占农业产值的 31%—33%。这两个区域的粮食只占农业产值的 8%—30%，而干草和牧草竟占 31%—42%。原因是这里的牛奶业很发达，它的特点也是农户面积低于平均数，而产值和雇佣劳动费则高于平均数。

在高度集约化的区域里，农户的平均耕地在减少，因为这个平均数是由大地产和最小的农户的总和得出的，这两类户数的增加都超过了中等农户。而最小的农户户数的增加又超过了大地产。

但是资本主义的发展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在原有的技术基础上扩大农户面积，另一种是在特别小的或最小的土地面积上建立特种商业性作物的新农户，这种作物的特点是可以在土地面积很小的条件下大大扩大生产规模和充分使用雇佣劳动。

结果大地产和最大的农户大大加强了，最小的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农户发展了，而中小农户则受到了排挤。

下面我们就会看到，农业中的资本主义既有如此矛盾的——表面看来是矛盾的——表现，那又怎么能用统计数字把这些表现的一般情况表示出来的。

10. 通常用的经济研究方法的缺点。

马克思论农业的特征

按照农户占有的或耕种的土地面积来划分农户，这是美国1910年的统计和欧洲绝大多数国家的统计所采用的唯一的分类方法。一般地说，这种方法的必要和正确，除了有国库上的和官厅行政上的理由而外，还有一定的科学上的理由，这是无可争辩的。然而它有显著的缺点，因为它根本没有考虑到农业集约化的过程，即以牲畜、机器、改良种子和改良耕作方法等方式投入每个单位耕地面积上的资本的增长。而且，除了极少数还存在着原始农业和纯粹粗放农业的区域和国家而外，这个过程到处都有，它正是资本主义国家最主要的特点。所以，按照土地数量来划分农户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会使一般关于农业发展的概念，特别是关于农业中资本主义发展的概念变得过于简单粗浅。

许多代表极其流行的资产阶级观点的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

發表了很多冗長的言論，說什麼農業和工業的條件不同呀，農業具有特殊性呀等等，人們一讀到這些議論，總是想說：先生們！你們最大的罪過就在於你們不僅支持而且還散布這些關於農業進化的簡單粗淺的觀點！請回憶一下馬克思的“資本論”吧。首先，你們會發現這部著作中指出了土地占有制的各種各樣的形式：封建的，民族的，村社的（我們再加上原始占領的），國家的等等，它們都是資本一出現在歷史舞台上就碰到的形式。資本使這些形式服從於自己，而且按照自己的願望改造它們。正是為了了解和估計這個過程，並且用統計數字來表現這個過程，就必須善於根據這個過程的不同形式而改變問題的提法和研究的方法。資本主義使之服從於自己的，有俄國的村社份地土地占有制，有農奴制國家和民主國家的占領的土地占有制或通過自由地、無償地分配土地來調整的土地占有制（如西伯利亞和美國的“遙遠的西部”），有美國南部的奴隸占有制的土地占有制，有“真正俄國”省份的半封建的土地占有制。資本主義在所有這些條件下發展和勝利的過程是一樣的，但是形式各不相同。要了解這個過程，準確地研究這個過程，就不能老是千篇一律地、市儈式地空談什麼“勞動”農業，或者用老一套的辦法，只把土地數量拿來比較。

其次，你們會發現馬克思對於資本主義地租的起源及其同歷史上存在過的各種地租如實物地租、勞役地租（徭役租及其殘余）、貨幣地租（代役租等）等的關係所作的分析。然而在資產階級的、小資產階級的和民粹主義的經濟學家或統計學家中間，又有誰曾經稍微認真地考慮過，怎樣根據馬克思的這些理論指示來研究資本主義從美國南部奴隸占有制經濟中或從俄國中部徭役制經濟中產生的過程呢？

最后,你们会发现,马克思在分析地租的整个过程中曾经不断地指出农业的各种各样的条件,这些条件不仅有由于土地的质量和位置不同而产生的,也有由于对土地投资的数量不同而产生的。把资本用在土地上,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改进农业技术,实行农业集约化,向更高的耕作制度过渡,改良农具和机器,更多地使用农具、机器、人造肥料和雇佣劳动等等。单靠计算土地数量是不能表示出所有这些复杂的、形形色色的过程的,而农业中资本主义发展的整个过程正是由所有这些过程构成的。

俄国地方自治局的统计学家们,特别是革命前的“过去美好”时代的统计学家们受到人们的尊敬,就是因为他们对于自己研究的对象不是采取墨守成规的态度,不是单从国库的或官厅行政的利益出发,而且还有一定的科学的兴趣。他们注意到单凭土地数量划分农户的缺点,并且采用其他一些分类方法,如根据播种面积、耕畜头数、雇佣劳动的使用等,恐怕要比其他国家的统计学家都早些。可惜我国地方自治局的统计,可以说一向是农奴制的愚昧无知、官僚主义的因循守旧和一切死沉沉的文牘主义的沙漠中的一块绿洲,它的工作是分散的、没有系统的,因此它既不能为俄国的经济科学也不能为欧洲的经济科学创造出牢固的成果。

我们要指出,对现代农业调查所收集来的材料进行分类的问题决不像骤然看来那样,是一个十分狭隘的技术问题,十分狭隘的专门问题。这种材料的特点是关于每一个农户的资料异常丰富完备。然而由于人们的无能,在综合分类的时候又不周密考虑,只是用老一套的办法,因此这种极其丰富的材料就完全被忽视了,被糟蹋了,往往成了对于研究农业进化的规律毫无用处的东西。根据这种材料,对于每一个农户可以正确无误地指出,它是不是资本主

义的农户，资本主义发展到什么程度，它是不是集约化的农户，集约化的程度如何等等；可是在综合这种关于千百万农户的材料时，正是那些最应该好好提出来加以确定和估计的极重要的差别、特征和标志被磨平了，于是经济学家所得到的就不是经过统计学有意义地编制出来的材料，而是老一套的毫无意义的一行行的数字，即统计上的“数字游戏”。

我们现在正在研究的美国 1910 年的调查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它说明极其丰富而完备的材料是怎样被编制者的因循守旧和对科学的无知弄得一钱不值，成了废物。同 1900 年的调查比起来，这次材料编制得坏得多，甚至连按照土地数量来划分农户的这种传统的方法也用得不彻底，因此我们不可能根据雇佣劳动和肥料的使用以及耕作制度的差别等来比较各类农户。

那我们只好求助于 1900 年的调查。据我们了解，这次调查是世界上唯一的范例，它不是使用一种而是使用三种不同的分类方法，整理了那些在一个国家内、一个时间内、按照一个纲领收集起来的包括 550 万以上农户的极其丰富的材料。

诚然，这里所用的三种分类方法，没有一种可以把农户类型和农户规模的一切重大特征都充分表示出来。但是正如我们所希望的，这些方法无比全面地表明了资本主义农业和农业中资本主义进化的情景，无比可靠地反映了实际情形，这是通常单用一种有缺点的、片面的分类方法远不能做到的。一旦有可能更全面地研究那些可以说是一切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存在的事实和倾向，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粹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的极大的错误和极深的偏见也就暴露无余了。

由于这个材料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我们应该特别详细地谈

談它,并且要比过去更多地引用一些統計表。我們完全知道,統計表会使正文变得累贅和增加閱讀的困难,所以我們在以上的敘述中竭力把統計表的引用降低到必不可少的最低限度。如果我們今后不得不多引用一点,希望讀者不要埋怨我們,因为分析这里所考察的問題不仅决定着現代农业进化的方向、形式、性質和規律这个主要問題的总的結論,而且决定着对一切經常被人引用、被人歪曲的現代农业統計的材料的估价。

“按土地划分”的第一种分类法提供了如下一幅說明 1900 年美国农业情况的圖表:

农 戶 类 别	在农户总数中所占的百分比	在全部土地中所占的百分比	每个农户平均有			
			耕地 (单位 英亩)	雇 佣 劳 费 (单 位 美 元)	产 值 [⊖] (单 位 美 元)	农 具 和 机 器 价 值
3 英亩以下的 ……	0.7	— [⊖]	1.7	77	592	53
3— 10 英亩 ……	4.0	0.2	5.6	18	203	42
10— 20 英亩 ……	7.1	0.7	12.6	16	236	41
20— 50 英亩 ……	21.9	4.9	26.2	18	324	54
50— 100 英亩 ……	23.8	11.7	49.3	33	503	106
100— 175 英亩 ……	24.8	22.9	83.2	60	721	155
175— 260 英亩 ……	8.5	12.3	129.0	109	1 054	211
260— 500 英亩 ……	6.6	15.4	191.4	166	1 354	263
500—1 000 英亩 ……	1.8	8.1	287.5	312	1 913	377
1 000 英亩以上的 ……	0.8	23.8	520.0	1 059	5 334	1 222
总 計 ……	100.0	100.0	72.3	—	656	133

可以肯定地說,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統計所提供的情况

⊖ 不到千分之一。

⊖ 不包括用于牲畜飼料的那些产品的价值。

都是完全一样的。只是在非本質的細节上可能有些差別。德国、奥地利、匈牙利、瑞士、丹麦等国最近的調查都証实了这一点。随着每类农户全部土地数量的增加，平均耕地、平均产值、农具和机器价值、牲畜价值（我們省略了这项数字）以及雇佣劳动費都增加了。（3英亩以下农户的各项数字和3—10英亩农户的一部分数字是小小的例外，其意义我們在前面已經講过了。）

看来情况也只能是这样。雇佣劳动費的增长好像确实証实了这样一件事实，即按照土地数量把农户分为大农户和小农户是同把它們分为資本主义农户和非資本主义农户完全一致的。通常的关于“小”农業的言論，十之八九就是根据类似的材料，在这种混淆不清的基础上产生的。

現在我們拿平均数字，不是每个农户而是每英亩土地（全部土地）的平均数字来看看：

全部土地平均每英亩有(单位美元)：

农 戶 类 別	雇 佣 劳 动 費	肥 料 費	牲 畜 总 值	农 具 和 机 器 价 值
3 英亩以下的	40.30	2.36	456.76	27.57
3— 10 英亩	2.95	0.60	16.32	6.71
10— 20 英亩	1.12	0.33	8.30	2.95
20— 50 英亩	0.55	0.20	5.21	1.65
50— 100 英亩	0.46	0.12	4.51	1.47
100— 175 英亩	0.45	0.07	4.09	1.14
175— 260 英亩	0.52	0.07	3.96	1.00
260— 500 英亩	0.48	0.04	3.61	0.77
500—1 000 英亩	0.47	0.03	3.16	0.57
1 000 英亩以上的	0.25	0.02	2.15	0.29

我們看到，从农户的低类到高类，表明农户集約程度的各种指

标逐步下降，只有极少的数字例外。

大概由此得出了如下的确定无疑的结论：农业中“小”生产的集约程度高于大生产；随着生产“规模”的缩小，农业的集约程度和生产率也逐渐提高；“因此”，农业中的资本主义生产只有靠原始的粗放经营来维持等等。

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用按照土地数量划分农户的方法（这不仅是通常所用的分类方法，而且几乎是唯一的分类方法）所能提供的情景与此十分相似，所能表明的情况也是农业集约化的各种指标从低类农户到高类农户逐渐下降，因此，在一切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和民粹主义的）著作中，随时随地看到的也正是这样的结论。例如，试回想一下赫赫有名的爱德华·大卫的名著“社会主义和农业”吧，这是一本在“也是社会主义的”词句掩盖下集资产阶级偏见和谎言之大成的著作。这部著作正是用这样的材料来论证“小”生产的“优越性”和“生命力”等等的。

特别容易使人得出这样的结论的是如下的情况：通常在我们所引用的这一类的材料中，有关于牲畜数量的材料，而关于雇佣劳动的材料，特别是关于雇佣劳动费总额这种具有概括性的材料，几乎任何国家都没有收集。然而，能够暴露出所有这些结论的错误的正是关于雇佣劳动的材料。事实上，如果说在农户规模缩小的情况下每个单位面积的牲畜价值（或者说全部牲畜数量）的增加证实了“小”农业的“优越性”的话，那也要知道，这种“优越性”是同农户规模缩小的情况下雇佣劳动费的增加分不开的！！而这种雇佣劳动费——请注意，这里始终是指用在每个单位面积上的即用在每一英亩、每一公顷、每一俄亩土地上的雇佣劳动费——的增加

正表明农戶的資本主义性質的增加！而农戶的資本主义性質是和通常極其流行的关于“小”生产的概念相抵触的，因为人們所理解的小生产是指不依靠雇佣劳动的那种生产。

似乎是一团矛盾。关于按照土地数量划分农戶类别的一般性材料向我們表明，“小”农戶是非資本主义的农戶，大农戶才是資本主义的农戶。然而同样的材料又向我們証明，农戶愈“小”，不仅它的集約程度愈高，而且每个单位面积的雇佣劳动費也愈多！

为了把問題弄清楚，我們要研究一下另一种分类方法。

11. 比較小农戶和大农戶的 更精确的方法

我們曾經指出，为了比較小农戶和大农戶，美国統計列出了不包括牲畜飼料在內的农戶产品的总值。单独看来，这种材料（恐怕只有美国的統計才有这种材料）自然沒有关于土地数量或牲畜数量的材料那么准确。但是整个看来，就其对几百万个农戶來說，特别是对于确定全国各类农戶之間的相互关系來說，决不能認為它沒有其他材料适用。無論如何，它說明生产規模，特别是商業生产規模，即出售的产品总額，要比其他任何材料直接得多。而一切关于农業进化和农業規律的議論中所談的也正是小生产和大生产。

不仅如此。在这种情况下所說的总是农業在資本主义制度下的进化，或者是农業在有了資本主义以后、在資本主义影响下的进化等。为了估計这种影响，首先必須竭力把农業中的自然經濟同商業經濟区分开来。大家知道，正是在农業中，自然經濟，即不是

为市场生产而是为经营者的家庭消费进行生产的经济才起着比较巨大的作用，也正是在农业中自然经济让位给商业性农业的过程进行得特别慢。如果不是机械地死搬硬套，而是经过思考地运用政治经济学上的各种已经确定了的理论原理，那就只能把关于大生产排挤小生产的规律用于商业性农业。未必有人会在理论上反驳这个论点。然而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有意无意地把那些证明自然农业转变为商业性农业的特征单独区分出来，加以探讨，并且尽可能地作出估计的，却非常非常少。按照农户产品（不包括牲畜饲料在内）的货币价值来分类，在满足这个极其重要的理论要求上，可以说是迈进了一大步。

我们注意到，当人们谈论关于工业中大生产排挤小生产这个无可辩驳的事实时，总是按照生产总额或雇佣工人数目来划分工业企业的。在工业中，由于工业的技术特点，问题简单得多。在农业中，由于各种关系极其错综复杂，确定生产规模、产品价值以及使用雇佣劳动的规模要困难得多。在确定使用雇佣劳动的规模时，首先必须计算全年的雇佣劳动数量，而不是调查的那一天现有的雇工人数，因为农业生产带有很大的“季节”性；其次，不仅要计算长工，而且要计算在农业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的短工。但是困难并不等于不可能。运用合理的、适合于农业技术特点的研究方法，其中包括运用按照产量、产值以及使用雇佣劳动的次数和规模等分类的方法的研究者，一定会一天天地多起来，从而打破一切障碍，冲破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偏见的密网，粉碎它们粉饰资产阶级现实的企图。可以大胆地保证，在使用合理的研究方法上的任何进步，都将进一步证实这样一个真理：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不仅在工业中，就是在农业中也是大生产排挤小生产。

下面就是美国 1900 年按照产值划分的各类农户的材料：

按照产值划分的农户类别	每个农户平均有：				
	农户数目 (在总数中所占的百分比)	土地数量	耕地 (单位 英亩)	雇佣劳动费 (单位 美元)	农具和 机器价值
0	0.9	1.8	33.4	24	54
1— 50 美元	2.9	1.2	18.2	4	24
50— 100 美元	5.3	2.1	20.0	4	28
100— 250 美元	21.8	10.1	29.2	7	42
250— 500 美元	27.9	18.1	48.2	18	78
500—1 000 美元	24.0	23.6	84.0	52	154
1 000—2 500 美元	14.5	23.2	150.5	158	283
2 500 美元以上的	2.7	19.9	322.3	786	781
总 计	100.0	100.0	72.3	—	133

用 0 表示产值的没有收入的农户，也许多半是刚刚申请到的垦殖地段，占有者还没有来得及盖好建筑物，备置牲畜，播下种子，得到收获。在像美国这个大规模地进行垦殖的国家里，关于业主要多少时间才能掌握农业的问题有特别大的意义。

如果把没有收入的农户撇开，我们看到的正与前面引用的按照农户土地数量分类所提供的情况完全一样。随着农户产值的增加，农户的平均耕地、雇佣劳动的平均费用、农具和机器的平均价值都在增加。总的说来，农户的收入愈多——指总收入即全部产品的价值——，它的土地也愈多。看来，这个新的分类方法根本没有提供任何新东西。

现在让我们不拿每个农户而拿每英亩土地的平均数字（牲畜价值、农具和机器价值、雇佣劳动费和肥料费）来看看：

按照产值划分的 农户类别	每英亩土地平均有(单位美元):			
	雇 佣 动 费	肥 料 费	牲 畜 总 值	农 具 和 机 器 价 值
0	0.08	0.01	2.97	0.19
1— 50 美元	0.06	0.01	1.78	0.38
50— 100 美元	0.08	0.03	2.01	0.48
100— 250 美元	0.11	0.05	2.46	0.62
250— 500 美元	0.19	0.07	3.00	0.82
500—1 000 美元	0.36	0.07	3.75	1.07
1 000—2 500 美元	0.67	0.08	4.63	1.21
2 500 美元以上的	0.72	0.06	3.98	0.72

在某些方面例外的有没有收入的农户，它总是处于一种完全特殊的地位；还有收入最多的农户，在我们所列举的表明集约程度的四个指标中，它有三个指标低于它邻近的那一类农户。一般说来，我们看到的是随着农户产值的增加，农业的集约程度也不断提高。

这种情况与我们在按照土地面积的分类的材料中所看到的完全相反。

由于分类的方法不同，同一个材料竟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

如果根据土地面积来判断农户规模，结论是随着农户规模的扩大，农业的集约程度在下降；如果根据农户产值来判断农户规模，结论是随着农户规模的扩大，农业的集约程度在提高。

两个结论哪一个正确呢？

如果土地没有耕种的话（不要忘记，美国统计学家们不是单单根据耕地分类，而是根据全部土地分类的；在这个国家里，耕地的百分比在各类农户中摇摆于19%—91%之间，在各个区域中则摇摆于27%—75%之间），土地的数量根本不能说明农户的规模；如果各个农户之间在土地的耕种方法上、在农业的集约程度上、在耕作制度上、在施肥的多少上、在机器的使用上、在畜牧业的性质

上以及其他方面，存在着很多重大差別的話，土地的数量根本不能正确地說明農戶的規模，這是很明顯的。

很明顯，一切資本主義國家，甚至資本主義剛剛觸動了農業的一切國家的情形正是這樣。

關於小農業“優越性”的錯誤見解為什麼能如此頑強地存在着，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這種偏見為什麼能同近幾十年來社會統計尤其是農業統計獲得的巨大進步如此容易地相安無事，現在我們看到這些問題的一個最深刻最普遍的原因了。當然，資產階級力圖抹殺現代資產階級社會階級矛盾的深刻性，資產階級的利益也要求永遠保持這些錯誤和偏見，一旦問題涉及到它的利益的時候，我們知道，即使最明顯的真理也會遭到反駁的。

不過我們在這裡只從理論上來分析一下，所謂小農業具有“優越性”這種錯誤觀點的根源是什麼。毫無疑問，最主要的根源就是人們對待過時的、單單按照土地數量或耕地數量來比較農戶的方法採取了不加批判和因循守舊的態度。

美國還有大量閑置的、無主的、無償地分發的土地，這是所有資本主義國家中的一個例外。在這裡，農業靠占用閑置土地、耕種從未耕種過的新土地還可以得到發展，也確實有了發展，這是一種最原始最粗放的畜牧業和農業的發展形式。資本主義歐洲各文明古國決沒有這樣的情形。在歐洲，農業的發展主要靠集約經營，不是靠擴大耕地的數量，而是靠提高耕作的質量，增加原有的土地上的投資。這才是資本主義農業發展的主要路綫。它也會逐漸地成為美國的主要路綫。正是這條主要路綫被那些只按照土地數量來比較農戶的人忽視了。

資本主義農業發展的主要路綫就是按土地面積計算仍然是小

规模的小经济，变成按生产的规模、畜牧业的发展、使用肥料的数量、采用机器的程度等计算的大经济。

所以说，按照土地数量来比较各类农户而得出的结论，也就是认为农业的集约程度随着农户规模的扩大而降低的结论，是绝对不正确的。正相反，唯一正确的结论是按照产值多少来比较各类农户而得出的结论：农业的集约程度随着农户规模的扩大而增加。

因为土地的数量只能间接地证明农户的规模，而且农业集约化进行得愈广泛，愈迅速，这种“证明”就愈不可靠。只有农户的产值能够直接地而不是间接地证明农户的规模，并且在任何情况下都能证明。当人们谈论小农业的时候，总是指从来都不靠雇佣劳动维持的那种农业。但是过渡到剥削雇佣工人，不仅决定于在旧的技术基础上扩大农户面积，——只有在粗放经济即原始经济的条件下才有这种情况，——而且决定于提高现有的技术，变旧技术为新技术，决定于增加对原有土地的投资，以便采用新机器、使用人造肥料、增加牲畜和改良牲畜品种等。

按照产值分类的方法把土地数量虽不同而生产规模真正相同的农户归并到一起了。在这种情况下，在小块土地上进行高度集约经营的农户就同在大块土地上进行比较粗放的经营的农户列入了一类。这两种农户无论就生产规模来说，或者就使用雇佣劳动的数量来说，都是真正的大农户。

相反，按照土地面积分类的方法把那些土地占有规模相类似的大农户和小农户都归并到一起了，把那些生产规模完全不同的农户，也就是以家庭劳动为主的农户同以雇佣劳动为主的农户归并到一起了。这就得出了根本不正确的、完全歪曲真实情况、但是非常受资产阶级欢迎的结论，即缓和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矛盾的

結論。这就得出了特別虛偽特別受資產階級歡迎的結論，即粉飾小農狀況的結論，為資本主義辯護的結論。

事實上，資本主義基本的和主要的趨勢就是大生產排擠小生產，無論在工業中或農業中都是如此。不過不能把這種排擠單單理解為立即剝奪。可能延長好多年甚至幾十年的小農的破產、經濟狀況的惡化也是排擠。這種惡化表現於小農的勞動過度、飲食惡劣和債務累累，表現於牲畜的飼料和對牲畜的一般照顧愈來愈壞，表現於對土地的護理、耕種、施肥等條件愈來愈糟和經濟技術停滯不前等方面。科學研究者要想不受人們的責難，不叫人們說他是通過粉飾遭受破產和備受壓制的小農的狀況來有意無意地討好於資產階級，那他首先就必須確切地斷定小農破產的那些極其複雜的特征，其次是揭示和探討這些特征，並且尽可能地估計它們普及的廣度和隨着時代所起的变化。然而，對於這個特別重要的方面，現時的經濟學家和統計學家注意得最不夠。

假定統計學家把 90 個小農同 10 個業主混在一起。前者沒有資本來改善自己的經濟，落在時代後面，逐漸遭到破產；而後者有足夠的資本，在同樣的小塊土地上進行大規模的生產，開辦使用僱傭勞動的農場。一般說來，這樣做一定會得出一幅粉飾所有 100 個小農狀況的圖畫。

美國 1910 年的調查正是提供了這樣一幅在客觀上有利於資產階級的粉飾小農狀況的圖畫，這首先是由於它放棄了 1900 年用過的把按照土地來分類同按照產值來分類加以比較的方法。我們只知道，肥料費用大大增加了，增加了 115%，即增加了一倍多，而僱傭勞動費只增加了 82%，農業總產值增加了 83%。進步是很大的。這是國民農業的進步。也許會有某一位經濟學家作出（如果還沒有作出的話）結論說：這是小“勞動”農業的進步，因為一般地

說，关于按照土地划分农户类别的材料向我们表明，“小”农业用于每英亩土地上的肥料费要多得多。

但是现在我们知道，这样的结论是捏造出来的，因为按照土地划分农户恰好把小农同资本家列入了一类。要知道前者正处于破产境地，起码也贫穷不堪，根本没有可能购买肥料；而后者虽然是小资本家，但毕竟是资本家，他们可以在小块土地上使用雇佣工人来从事改良的、集约化的、大规模的經營。

1900年和1910年的关于农户全部财产价值的材料表明，小农业普遍地遭到大农业的排挤。下面我们将看到，在这个期间，小块土地上的高度资本主义的作物获得了特别迅速的发展。根据按照产值多少划分的大农户和小农户的一般材料来看，随着农户规模的扩大，肥料费也在增加。既然如此，那就必然会得出如下的结论：1900—1910年在使用肥料方面的“进步”更加强了资本主义农业对小农业的优势，小农业受到了更厉害的排挤和压制。

12. 农业中的各种农户类型

前面我们谈到在小块土地上进行集约经营的资本主义大农户，这就会使人产生这样的疑问：可不可以认为农业集约化一定会使农户土地减少呢？换句话说，是不是有一些与现代农业技术本身有关的条件要求减少农户土地以提高农业的集约程度呢？

无论是一般的理论见解或者是实际例子都不能回答这个问题。这里所谈的是在现有的农业条件下技术的具体水平问题和某种经营制度所必需的资本的具体数量问题。在理论上，把任何数量的资本投入任何数量的土地都是可以设想的，自然，“这要取决于”现有的经济条件、技术条件和文化条件等等，全部问题正在于

这一个国家在这一个时期具有一些什么样的条件。实际例子所以不适用，是因为在现代农业经济这个各种倾向错综复杂、形形色色、互相矛盾的领域里，随时都可以找到一些实际例子来证实相反的观点。这里首先需要的，而且比任何地方都更加需要的，是把农业的整个发展过程描绘出来，对所有倾向加以估计，并且确定这些倾向的合力、这些倾向的总和与结果。

美国统计学家在 1900 年所使用的第三种分类方法，有助于回答上面提出的问题。这就是按照主要收入来源来分类。根据这个标志，即按主要的收入来源，全部农户可分为以下几类：(1)干草和谷物；(2)混合产品；(3)畜产品；(4)棉花；(5)蔬菜；(6)水果；(7)乳制品；(8)烟草；(9)大米；(10)食糖；(11)花卉；(12)温室产品；(13)芋；(14)咖啡。后面的七类(8—14)一共只占全部农户的 2.2%，由于所占比重太小，我们不准分别加以叙述。这几类农户(8—14)按其经济性质和作用来说是和前三类(5—7)完全相同的，因此把它们编为一个类型。

下面就是说明各种不同类型的农户的材料：

按主要收入来源划分的农户类别	在全部农户中占的百分比	每个农户平均有全部土地	每个农户平均有耕地	每英亩土地平均有(单位美元) 雇佣劳动费	肥料费	农具和机器价值	牲畜价值
干草和谷物……	23.0	159.3	111.1	0.47	0.04	1.04	3.17
混合产品……	18.5	106.8	46.5	0.35	0.08	0.94	2.73
畜产品……	27.3	226.9	86.1	0.29	0.02	0.66	4.45
棉花……	18.7	83.6	42.5	0.30	0.14	0.53	2.11
蔬菜……	2.7	65.1	33.8	1.62	0.59	2.12	3.74
水果……	1.4	74.8	41.6	2.46	0.30	2.34	3.35
乳制品……	6.2	121.9	63.2	0.86	0.09	1.66	5.58
全部农户总计…	100.0	146.6	72.3	0.43	0.07	0.90	3.66

我們看到，前两类农户（干草和谷物；混合产品）無論就农户的资本主义发展水平說来（它們的雇佣劳动費是 0.35- 0.47，最接近于全美国的平均数字 0.43），或者就农业的集約程度說来，都可以称为中等农户。它們集約化的全部指标——每英亩土地的肥料費，机器价值和牲畜价值——最接近于全国的一般平均数字。

这两类农户对于大多数农户來說無疑是特別典型的。干草和谷物，以及結合在一起的各种农产品——（“混合的”收入来源）——这在所有国家中都是农户的主要类型。要是有一份关于这两类农户的比較詳細的材料，例如把它們分为商業性較少的农户和商業性較多的农户等，那是極有意义的。但是我們看到，美国的統計在这方面刚刚迈了一步，接着就不是前进而是后退了。

下面的两类即畜产品和棉花向我們表明的是一种资本主义性質最少（它們的雇佣劳动費是 0.29 和 0.30，而平均数字是 0.43）和农业集約程度最低的农户典型。它們的农具价值和机器价值是最低的，比平均数字要低得多（0.66 和 0.53 比 0.90）。以畜产品为主要收入的那些农户，每英亩土地的牲畜数目自然要超过全国的平均数字（4.45 比 3.66），但这显然是一种粗放畜牧业，因为它的肥料費最少，农户平均面积最大（226.9 英亩），耕地所占比重最小（在 226.9 英亩土地中有 86.1 英亩耕地）。至于棉花农户，虽然它的肥料費超过了平均数字，但是它的其余两个农业集約化的指标（每英亩土地的牲畜价值和机器价值）都是最低的。

最后的三类农户——蔬菜、水果、乳制品农户，第一、是最小的农户（耕地是 33—63 英亩，而上述各类农户的耕地是 42—86 英亩，46—111 英亩）；第二、是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农户（雇佣劳动費最高，比平均雇佣劳动費要高 1—5 倍）；第三、是集約程度最高的农

戶。这里農業集約化的几个指标几乎都超过了平均水平：無論是肥料費，或者是机器价值和牲畜价值（只有水果农戶在这方面是一个小小的例外，它的牲畜价值低于平均水平，但是高于以干草和谷物为主要收入的那些农戶）。

我們現在来考察一下，这些資本主义高度發达的农戶在整个国家經濟中所占的比重究竟怎样。但是首先我們应当稍微詳細地談一談这些农戶的較高的集約性質。

我們来看看以蔬菜为主要收入的农戶。大家知道，在一切資本主义国家中，由于城市、工厂、工業区、火車站以及港口等的發展，就加强了对蔬菜的需要，提高了蔬菜的价格，为出卖而种植蔬菜的农戶也增多了。一个中等的“蔬菜”农戶的耕地数量，还不到一个以干草和谷物为主要收入的“普通”农戶的三分之一：前者有33.8英亩，后者有111.1英亩。这就是說，在現有的農業資本积累的情况下，現有的技术要求“蔬菜”农戶具有比較小的規模；換句話說，为了向農業投資并且获得不低于平均数的利潤，就需要在現有的技术情况下建立土地面积小于干草和谷物农戶的蔬菜农戶。

不仅如此。農業中資本主义的增长首先表現在自然農業向商業性農業的过渡上。这一点經常被人們忘記，因而必須再三強調。商業性農業的發展决不是通过資產階級經濟学家所想像的或預料的那条“簡單的”道路，决不是用扩大原有产品的生产的方法。不是的，商業性農業的發展經常是由生产某一些产品过渡到生产另一些产品。由生产干草和谷物过渡到生产蔬菜，正是这些通常的过渡中的一种。然而在我們所关心的农戶土地面积問題上和農業中資本主义增长問題上，这个过渡意味着什么呢？

这个过渡意味着111.1英亩的“大”农戶分裂为三个以上33.8

英亩的“小”农户。旧农户的产值是 760 美元，这是以干草和谷物为主要收入的农户的平均产值（牲畜饲料除外）。每个新农户的产值是 665 美元。这就是说，新农户一共是 $665 \times 3 = 1995$ 美元，超过了原有产值的一倍以上。

可见是在农户土地减少的情况下，大生产排挤着小生产。

旧农户的平均雇佣劳动费是 76 美元，新农户是 106 美元，几乎增加了一半，同时土地面积却减少了三分之二以上。每英亩土地的肥料费从 0.04 美元提高到 0.59 美元，几乎增加了 14 倍；农具和机器价值从 1.04 美元提高到 2.12 美元，增加了一倍多。

有人会像通常那样反驳我们，说什么这种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农户，即特种“商业性”作物的农户的数量和全部农户的数量比起来是微不足道的。但是我们要回答：第一、这种农户的数目、作用及其经济作用要比人们通常所想像的大得多；第二（也是主要的）、在资本主义国家中，正是这些作物比其他任何作物都增长得快。所以，在农业集约化的过程中，农户土地的减少往往不是意味着生产规模的缩小，而是意味着生产规模的扩大，不是意味着减轻对雇佣劳动的剥削，而是意味着加重对雇佣劳动的剥削。

下面是美国统计中关于这一方面的全国性的确切材料。现在我们来看看前面在第 5—14 项目中所列举的全部特种作物，或“商业性”作物，也就是：蔬菜、水果、乳制品、烟草、大米、食糖、花卉、温室产品、芋和咖啡。1900 年美国以这些产品为主要收入的农户占全部农户的 12.5%，就是说只占少数，只占 $\frac{1}{8}$ 。这些农户的土地占全部土地的 8.6%，即只占 $\frac{1}{12}$ 。现在我们再进一步，再看看美国农业总产值（牲畜饲料除外）的情况。上述各农户在全国农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是 16%，即几乎超过了土地所占比重的一倍。

这就是說，这些农户的劳动生产率和土地生产率几乎超过了平均水平的一倍。

我們再来看看美国农业的全部雇佣劳动费总数。在这个总数中，上述各农户占26.6%，超过了总数的 $\frac{1}{4}$ ；这个比重要比土地所占的比重大两倍多，比平均数字也要大两倍多。这就是說，这些农户的资本主义性质大大超过了平均水平。

这些农户在农具和机器总值中所占的比重是20.1%。而在肥料费总数中所占的比重是31.7%，即稍低于总数的三分之一，稍低于平均数的四倍。

于是我們看到一个对于全国都是确定無疑的事实，就是集約程度特別高的农户，土地特別少，所使用的雇佣劳动特別多，劳动生产率特別高；这些农户在本国农业中所起的经济作用与它們在全部农户中所占的比重比起来，要超过一倍以至两倍以上，更不用說与它們在全部土地中所占的比重相比了。

与农业中的其他作物和农户相比，这些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高度集約化的作物和农户的作用是日益减小呢，还是日益增大？

把最近两次調查加以比較，就会得出答案：它們的作用肯定地是在日益增大。我們先来看看种植各种作物的土地面积。从1900年到1910年，美国种植各种谷物的土地面积一共增加了3.5%；种植大豆、豌豆等作物的土地面积增加了26.6%；种植干草和牧草的土地面积增加了17.2%；种植棉花的土地面积增加了32%；种植蔬菜的土地面积增加了25.5%；种植甜菜、甘蔗等作物的土地面积增加了62.6%。

我們再来看看关于农产品生产量的材料。从1900年到1910年，各种谷物的总产量一共增加了1.7%；大豆增加了122.2%；干

草和牧草增加了 23%；甜菜增加了 395.7%；甘蔗增加了 48.5%；馬鈴薯增加了 42.4%；葡萄增加了 97.6%；1910 年的漿果和苹果等歉收，同时橙子和檸檬的产量却增加了两倍。

这样一来，这个看来难以置信但是無可怀疑的事实在整个美国农业中也得到了证实；不仅一般說来大生产在排挤小生产，而且这种排挤还通过以下的形式进行着：

通过土地面积比較“小”但是生产規模、集約程度和資本主义性質比較大的农户，排挤土地面积比較“大”但是生产規模、集約程度和資本主义性質比較小的农户的办法，大生产在排挤着小生产。

13. 农业中大生产排挤小生产 是怎样被忽视的

可能有人反駁我們說：既然小生产的受排挤“也”通过小农户实行經營集約化（和“資本化”）的形式进行着，那末可不可以認為按照土地数量分类的办法一般說来在某些場合也是适用的呢？如果适用，豈不是就有两个相反的趋向而不能得出一个总的結論了嗎？

为了回答这种反駁，需要把美国农业及其进化的全貌完整地展示出来。为此就需要把三种分类方法放在一起加以比較和对照，近年来在农业方面提供的社会統計材料最多的可以說就是这三种分类方法。

这样比較和对照是可能的。只是需要編制出一个表来，这个表驟然看来可能令人感到太抽象、太复杂，使讀者“望而却步”。其实只要稍微注意一下，“閱讀”、掌握和分析这个表并没有什么困难。

为了比較三种不同的分类，应该单单取出各类农户之间的百分比。相应的数字美国 1900 年的調查已經全部計算出来了。我們把每一种分类分为三个主要类别。按照土地数量我們分为：(1) 小农户 (100 英亩以下的)；(2) 中等农户 (100—175 英亩)；(3) 大农户 (175 英亩以上的)。按照产值我們分为：(1) 非資本主义的农户 (500 美元以下的)；(2) 中等农户 (500—1 000 美元)；(3) 資本主义的农户 (1 000 美元以上的)。按照主要收入来源我們分为：(1) 資本主义不發达的农户 (牲畜；棉花)；(2) 中等农户 (干草和谷物；混合产品)；(3) 資本主义高度發达的农户 (即前面第 12 节中在 5—14 項目内所列举的那些特种“商業性”作物)。

对于每一类别，我們首先列出农户的百分数，即这类农户在美国全部农户中所占的百分比。然后再列出土地的百分数，即这类农户在美国全部农户土地中所占的百分比。土地的数量可以作为农户粗放程度的指标 (可惜我們所掌握的只是全部土地的材料，而不是单纯耕地的材料，后一种材料要更准确些)。如果土地的百分比超过了农户的百分比，譬如 17.2% 的农户有 43.1% 的土地，那就是說，这是一些大农户，其规模超过了平均规模，要比它大一倍以上。如果土地的百分比低于农户的百分比，那就得出相反的結論。

其次，列出农户的集約程度的指标，即农具和机器价值以及肥料費总额。这里也是列出这一类农户的农具机器价值和肥料費在全国总额中所占的百分比。如果这一百分比大于土地的百分比，就得出集約程度超过了平均水平的結論等等。

最后，为了准确地确定农户的資本主义性質，就要用同样的方法列出这类农户在全国工資总额中所占的百分比；而为了确定生产的规模，就要列出这类农户在全国农业总产值中所占的百分比。

这样就编制成下面的一个表，下面我们就要说明和分析这个表。

三种分类的比较

(数字是表明在总数中所占的百分比；三个横栏的总数=100)

	按照农户的主要收入来源分类			按照农户的土地数量分类			按照农户产值分类				
	资本主义不发达的农户	中等农户	发达的农户	小农户	中等农户	大农户	非资本主义农户	中等农户	资本主义的农户		
农户数目	46.0	41.5	12.5	57.5	24.8	17.7	58.8	24.0	17.2	农户粗放程度的指标	
全部土地数量	52.9	38.5	8.6	17.5	22.9	59.6	33.3	23.6	43.1		
不变资本	农具和机器的价值	37.2	42.7	20.1	31.7	28.9	39.4	25.3	28.0	46.7	农户集约程度的指标
	肥料费	36.5	31.8	31.7	41.9	25.7	32.4	29.1	26.1	44.8	
可变资本	雇劳动费	35.2	38.2	26.6	22.3	23.5	54.2	11.3	19.6	69.1	农户资本主义性质的指标
生产规模	产值	45.0	39.0	16.0	33.5	27.3	39.2	22.1	25.6	52.3	

我们先看第一种按照农户的主要收入来源所作的分类。在这里，农户可以说是按照农业中的专业性来划分的，这和工业企业按照工业部门来划分有些相像。不过农业中的情况要复杂得多。

第一栏向我们表明，这是一类资本主义不发达的农户。这类农

戶几乎占全部农戶的一半——46%，它的土地占 52.9%，就是說，这类农戶大于平均規模（其中包括特別大的粗放經營的畜牧業农戶和小于平均規模的棉花农戶）。它的机器价值的百分比(37.2%)和肥料費的百分比(36.5%)都小于土地的百分比，这就是說，它的集約程度低于平均水平。这类农戶的資本主义性質(35.2%)和产值(45%)也是如此。因而它的劳动生产率也低于平均水平。

第二栏是中等农戶。正因为所有这三种分类中列入中間一类的是各方面都屬於“中等的”农戶，所以我們看到，每类中等农戶所有的百分比相互之間非常接近，差別比較小。

第三栏是資本主义高度發达的农戶。这一栏数字的意义我們在前面已經作了詳細的分析。应当指出的是，我們只有这一类型农戶的可以比較的确切的材料，有 1900 年的也有 1910 年的，这些材料証明，資本主义高度發达的作物的增长速度要比平均速度快。

这种比較快的增长在大多数国家历来的分类中是怎样反映出来的呢？下面的一栏，即按照土地数量划分的小农戶一类表明了这一点。

这类农戶的数目很大(占全部农戶的 57.5%)。而土地一共才占总数的 17.5%，就是說，这类农戶小于平均規模的三分之一。因此，这一类是“土地最少”、最“貧困的”农戶。但是接下去我們看到，这类农戶的农業集約程度(机器价值和肥料費)、农業的資本主义性質(雇佣劳动費)以及劳动生产率(产值)却高于平均水平；在 17.5% 的土地上有 22.3% 的雇佣劳动費和 41.9% 的肥料費。

問題在什么地方呢？很明显，問題在于有特別多的資本主义高度發达的农戶——参看前一个直栏——列入了按土地数量划分的“小”农戶。在这里，在大多数缺少土地和資本的真正小农中，加

进了少数富裕的、资本雄厚的业主，他们在小块土地上建立了生产规模巨大的资本主义性质的农户。这样的业主在美国占 12.5%（= 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农户的百分数）；这就是说，既然他们都列入了按土地划分的小农户这一类，那末这一类中就有（ $57.5 - 12.5 =$ ）45% 的户主既没有足够数量的土地也没有资本。事实上，必然有一部分、尽管是一小部分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农户列入了按土地划分的中等农户和大农户，因此 45% 这个数字还缩小了没有资本和缺少土地的农户的真正数目。

不难看出，把 12%、10% 或者更少一些的业主同 45%——最低限度是 45%——的农户列入一类，是多么厉害地粉饰了后者的状况，因为前者拥有超过平均数量的资本、农具、机器、肥料费和雇劳动费等，而后者的土地和资本都很缺乏。

对于这样划分出来的中等农户和大农户我们准备分别加以论述了。因为这会重复我们谈到小农户时说过的话，只是说法稍微有些改变而已。譬如，既然按土地分类的小农户的材料粉饰了小生产受压制的状况，那末，按同样标志分类的大农户的材料显然就低估了农业中大生产真正集中的情形。过一会我们就要用统计数字把低估这种集中的情况准确地表示出来。

于是就得出这样一个一般性的原理（可以把这个原理当作定理写出来，以说明一切资本主义国家按土地数量划分农户类别的情形）：

农业集约化发展得愈广泛、愈迅速，则按照土地数量分类的办法对于农业中小生产者即既少土地又缺资本的小农受压制的状况粉饰得愈厉害，对于日益发展的大生产和遭到破产的小生产之间真正尖锐的阶级矛盾缓和得愈厉害，对于资本集中于大生产和大

生产排挤小生产的事实 低估 得愈厉害。

最后一种(第三种)分类的办法,即按照产值分类的办法清楚地证实了这个原理。非资本主义的农户(既然指的是总收入,也可以说是收入少的农户)占 58.8%,比“小”农户的百分比(57.5%)还要稍微大一点。而这类农户的土地则要多得多,占 33.3% (“小”农户占 17.5%)。但是它在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比“小”农户小三分之一: 22.1% 比 33.5%!

问题在哪里呢? 问题就在于在这类农户中没有包括那些建立在小块土地上的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农户,这种农户人为地和虚假地提高了属于小农的那些资本如机器、肥料等的比重。

可见,农业中小生产备受压迫,横遭压制,因而陷于破产的情况要比根据有关小农户的材料所能想像到的厉害得多。

关于按照土地数量分类的小农户和大农户的材料根本没有估计到资本的作用。显然,忽视资本主义经济中的这样一件“小事”就会歪曲小生产的状况,虚伪地粉饰小生产的状况。因为“如果”没有资本即没有货币的权力,没有雇工同资本家的关系、农民同商人和债主的关系等等,那末小生产的状况“也许”还不坏吧!

所以农业中大农户的集中远远比不上农业中大生产即资本主义生产的集中: 17.7%的“大”农户只集中了 39.2%的产值(比平均数的一倍稍微多一点)。而 17.2%的资本主义农户则集中了 52.3%的产值,即超过了平均数两倍以上。

在这个无偿地分配大量闲置土地的美国,也就是在一向被马尼洛夫之流称为“劳动”农户国家的美国,原来全国有一半以上的农业生产集中在 $\frac{1}{6}$ 左右的资本主义农户手中。这些农户的雇佣劳动费,按户数计算要比平均数多三倍(17.2%的农户有 69.1%的

雇佣劳动费)，按土地计算要比平均数多一半（43.1%的土地有69.1%的雇佣劳动费）。

在另一端，有一半以上的农户，即将近 $\frac{3}{5}$ 的农户（58.8%）是非资本主义的农户。这些农户占有全部土地的三分之一（33.3%），但是这些土地的机器的装备（机器价值占25.3%）和肥料的使用（肥料费占29.1%）都低于平均水平，因而它的生产率比平均水平低三分之一。这些占有三分之一土地的、备受资本压迫的、为数众多的农户的产值（22.1%）还不到生产总额即总产值的四分之一。

因此我们在关于按照土地数量进行分类的意义这个问题上所得出的总的结论，就是不能够认为这种分类是毫无用处的。只是任何时候都不应当忘记，这种分类低估了大生产排挤小生产的事实，而且农业集约化发展得愈广泛、愈迅速，各个农户之间在投入同样单位面积上的资本差额愈大，这种分类对这一事实也就低估得愈厉害。在有了现代的研究方法（这些研究方法提供了关于每一个别农户的非常宝贵非常丰富的材料）的情况下，只要把两种分类方法结合起来就行了。例如，把按照土地数量分成的五类农户中的每一类，再按照使用雇佣劳动的多少分为三小类或两小类。如果不这样做的话，那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害怕对现实作过分露骨的描绘，不敢把大批小农备受压制、陷于赤贫、濒于破产、遭受剥夺的这幅极为鲜明的图画描绘出来；而“典型的”资本主义农户（按土地数量来说也是“小”农户，它们在大量贫困的农户中只占少数）又是如此“方便地”、“不知不觉地”粉饰着小农的状况。从科学的角度看来，没有一个人敢否认在现代农业中不仅土地起作用，而且资本也起作用。把农户一共分为10—15类，从统计技术或统计所耗费的劳动量的角度来看，或者是同德国1907年的统计按照土地

数量把农户分为 18+7 类比起来，决不能算是过多的。德国的这次统计把关于 5 736 082 个农户的极其丰富的材料按土地数量分成了这么多的类别，可以说是官僚主义的因循守旧、一钱不值的科学废物以及毫无意义的数字游戏的一个典型，因为没有丝毫合理的、为科学和生活所证实的根据可以认为把农户分成这么多的类别是一种典型的办法。

14. 小农被剥夺

小农被剥夺的问题对于一般理解和估价农业中的资本主义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然而最值得注意的是，现在浸透了资产阶级观点和偏见的政治经济学和统计学正是对于这个问题几乎根本没有加以研究，或者研究得极不认真。

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一般性材料都表明城市人口增长的过程是依靠农村人口流入城市进行的，都表明居民正由农村逃入城市。在美国，这个过程一往直前地进行着。城市人口在 1880 年占 29.5%，1890 年占 36.1%，1900 年占 40.5%，1910 年占 46.3%。在全国各个区域，城市人口的增长都比农村人口快：从 1900 年到 1910 年，在工业的北部，农村人口增加了 3.9%，城市人口增加了 29.8%；在过去奴隶占有制的南部，前者增加了 14.8%，后者增加了 41.4%；在移民的西部，前者增加了 49.7%，后者增加了 89.6%。

看来这个极其普遍的过程在进行农业调查时是一定研究过的。那就自然会引起这样一个在科学方面极为重要的问题：这些从农村逃出来的人是来自农村人口的哪些类别、哪些阶层，他们是在什么情况下逃出农村的。既然每十年要收集一次每个农业经济

单位和单位中的每头牲畜的极为详细的材料，那也就很容易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了迁入城市，有多少农户出卖了或出租了产业，都是什么样的农户；有多少家庭成员暂时地或永久地抛弃了农业，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抛弃农业的。但是并没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研究只是停留在官方的如下一种千篇一律的数字上：“从1900年到1910年，农村人口从59.5%下降到53.7%。”研究者好像并没有猜想到，在这些千篇一律的数字后面隐藏着多少穷困、压迫和破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对于居民逃出农村和小生产者遭到破产之间的十分明显的联系，往往连看都不愿意看一下。

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只好竭力把1910年调查中极有限的并且整理得最糟糕的关于小农被剥夺的材料汇集在一起。

我们手头有一份说明农户财产占有形式的材料，它首先列出了所有者的数目，这些所有者又分为农户的全部财产所有者和部分财产所有者；其次列出了交纳一部分产品的佃农人数和交纳货币地租的佃农人数。这个材料是按照地区而不是按照农户类别划分的。

我们拿1900年和1910年的总数看一看，首先就会得出如下的图表：

全部农业人口增加了	11.2%
全部农户增加了	10.9%
所有者的总数增加了	8.1%
农户全部财产所有者的总数增加了	4.8%

很明显，这幅图表说明了小农业日益遭受剥夺。农村人口比城市人口增加得慢。农户户主比农村人口增加得慢。所有者比农户户主增加得慢。农户全部财产所有者比一般所有者增加得慢。

所有者在全部农户户主中所占的百分比几十年来一直在减少。这个百分比如下：

1880年	—	74.0%
1890年	—	71.6%
1900年	—	64.7%
1910年	—	63.0%

而佃农的百分比却在相应地增加，并且分成制的农民要比付货币地租的佃农增加得快。分成制的农民在1880年占17.5%，后来占18.4%和22.2%，到1910年已经达到24%。

所有者所占比重的减少和佃农所占比重的增加，整个地说来，就是表示小农遭到破产，受到排挤，这从下面的材料可以看出来：

农户类别	有家畜的农户的百分比			有马的农户的百分比		
	1900年	1910年	±	1900年	1910年	±
所有者·····	96.7	96.1	-0.6	85.0	81.5	-3.5
佃 农·····	94.2	92.9	-1.3	67.9	60.7	-7.2

这个材料表明，所有者在两个年份内所处的经济地位都比较优越。佃农状况的恶化要比所有者严重。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个别区域的材料。

前面我们已经指出，南部的佃农最多，而且也增加得最快：从1900年的47%增加到1910年的49.6%。在这里，资本在半世纪以前就粉碎了奴隶制度，可是现在又以革新的形式即以分成租的形式把它恢复起来。

北部的佃农少得多，增加的速度也慢得多：1900年占26.2%，到1910年，只增加到26.5%。西部的佃农最少，而且只有这个区域的佃农才不是增加而是减少了：从1900年的16.6%减少到1910年的14%。在1910年的调查总结中写道：“在山区和太平洋沿岸区”（这两个区域合在一起就是“西部”），“佃农农户的百分比特别

小；毫無疑問，产生这种情况主要是由于这两个区域不久以前才有了移民，这里很多户主是垦殖地段的占有者”（即無偿地或只用很少費用获得空余的閑置土地的人），“是从政府那里得到土地的人”（第5卷第104頁）。

在这里，我們特別清楚地看到我們曾經屢次指出的美国拥有空余的閑置土地这个特点。一方面，这个特点說明了美国的资本主义为什么發展得特別广泛，特別迅速。一个大国的某些区域沒有土地私有制，不仅不排斥资本主义——我国的民粹主义者注意！——，反而会扩大资本主义的基础，加速资本主义的發展。另一方面，欧洲那些古老的人烟稠密的资本主义国家根本不知道的，这个特点，掩盖了美国那些人烟稠密和工业發达的区域内小农被剝夺的过程。

我們再看看北部。这里我們得到这样一幅圖表：

	1900年	1910年	增加或减少
全部农业人口(单位百万).....	22.2	23.1	+3.9%
全部农户数目(单位千).....	2 874	2 891	+0.6%
所有者的总数(单位千).....	2 088	2 091	+0.1%
农户全部财产所有者的总数(单位千)	1 794	1 749	-2.5%

这里我們看到，虽然占美国全部耕地60%的这个主要区域的生产日益增长着，但是所有者的人数同全部农户户主人数等相比，不只是在排挤下相对地减少了，而且簡直是绝对地减少了！

同时还有一点不應該忘記：在“北部”四个区域中的一个区域里，即在中部的西北区，至今还有分發垦殖地段的情况存在，从1901年到1910年的10年間，一共分發了5400万英亩土地。

资本主义剝夺小农业的趋势是非常强大有力的，以致美国的“北部”尽管分發了几千万英亩空余的閑置土地，但是这里土地所

有者的人数还是绝对地减少了。

在美国,只有下面两种情况在抑制着这一趋势:(1)在黑人受压制受屈辱的南部,还存在没有瓦解的奴隶主大地产;(2)西部人烟稀少。但是这两种情况显然都在为资本主义扩大明天的基础,为资本主义更迅速、更广泛的发展准备条件。矛盾的尖锐化和小生产的受排挤并没有消除,而是转到更广阔的场所去了。资本主义的火灾似乎被“阻止住”了,可是所花的代价是为它准备下新的、大量的、更厉害的燃料。

其次,在小农业被剥夺的问题上,我们还有一份说明有牲畜的农户数目的材料。下面是美国在这方面的一般情况:

有牲畜的农户的百分比	1900年	1910年	增加或减少
有一般家畜的.....	95.8	94.9	-0.9
有奶牛的.....	78.7	80.8	+2.1
有马匹的.....	79.0	73.8	-5.2

一般说来,这份材料表明,所有者在全部户主中所占的比重减少了。有奶牛的农户的百分比虽然增加了,但是有马匹的农户的百分比减少得更厉害。

下面我们来考察一下按照农户类别编制的有关这两种主要牲畜的材料。

农 户 类 别	有奶牛的农户的百分比		增加或减少
	1900年	1910年	
20 英亩以下的	49.5	52.9	+3.4
20— 49 英亩.....	65.9	71.2	+5.3
50— 99 英亩.....	84.1	87.1	+3.0
100—174 英亩.....	88.9	89.8	+0.9
175—499 英亩.....	92.6	93.5	+0.9
500—999 英亩.....	90.3	89.6	-0.7
1 000英亩以上的.....	82.9	86.0	+3.1
全 美 国.....	78.7	80.8	+2.1

我們看到，飼养奶牛的小农户增加得最多，其次是大地产，再其次是中等农户。只有 500—999 英亩这一类大农户中有奶牛的农户减少了。

一般看来，这里显然是小农业占了优势。然而应该注意，有奶牛在农业中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这表示生活福利的普遍提高和饮食条件的改善；另一方面——而且是在更多的情况下——这表示商业性农业和畜牧业的一个部门的发展；为了在城市和工业中心出卖而生产牛奶。前面我们看到，这种农户，即“牛奶”农户，被美国统计学家按照主要收入来源划为单独的一类。这类农户的特点是，它的耕地数量和全部土地数量都低于平均数，而它的每英亩土地的产量却超过平均数，每英亩土地所使用的雇佣劳动竟超过平均数的一倍。牛奶业小农户作用的增长很可能表示着——也确实表示着——上面描述的那种小块土地上的资本主义的牛奶农户的增加。为了比较起见，这里我们列出一份关于美国奶牛集中的材料：

区 域	每个农户的奶牛平均头数		增加头数
	1900年	1910年	
北 部.....	4.8	5.3	+0.5
南 部.....	2.3	2.4	+0.1
西 部.....	5.0	5.2	+0.2
总 計.....	3.8	4.0	+0.2

我們看到，奶牛最多的北部，这项财富增加得也最多。下面就是说明增加头数在各类农户之间分配情况的图表：

北部的农户类别	奶牛头数增加或减少的百分比 (1900—1910年)
20英亩以下的	- 4%(农户数目+10.0%)
20—49英亩	- 3%(农户数目--12.6%)
50—99英亩	+ 9%(农户数目-- 7.3%)
100—174英亩	+14%(农户数目+ 2.2%)
175—499英亩	+18%(农户数目+12.7%)
500—999英亩	+29%(农户数目+40.4%)
1000英亩以上的	+18%(农户数目+16.4%)
总 计	+14%(农户数目+ 0.6%)

有奶牛的小农户的户数比较快地增加并不妨碍奶牛比较快地集中于大农户。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说明拥有马匹的农户数目的材料。这是一份关于耕畜的材料，它所表明的一般经济情况，而不是商业性农业的一个特殊部门。

农户类别	拥有马匹的农户的百分比		减少的百分比
	1900年	1910年	
20英亩以下的	52.4	48.9	-3.5
20—49英亩	66.3	57.4	-8.9
50—99英亩	82.2	77.6	-4.6
100—174英亩	88.6	86.5	-2.1
175—499英亩	92.0	91.0	-1.0
500—999英亩	93.7	93.2	-0.5
1000英亩以上的	94.2	94.1	-0.1
全 美 国	79.0	73.8	-5.2

这里我们看到，农户愈小，无马农户就增加得愈多。除了20英亩以下的这类最小的农户（我们知道，这一类所包括的资本主义性质的农户要比与它邻近的那几类更多）以外，我们看到，无马农户随着类别的提高在迅速减少；但是在十年内，无马农户在各类中

都有增加，类别愈高，增加得愈少。可能在富裕的农户中，由于使用了蒸汽犁和别种机械动力，部分地补偿了耕畜的减少，但是对于大量穷困的农户，这种假设是不存在的。

最后，从下面关于抵押土地的农户的数字，也可以看到小农日益被剥夺的事实：

区 域	抵押土地的农户的百分比		
	1890年	1900年	1910年
北 部	40.3	40.9	41.9
南 部	5.7	17.2	23.5
西 部	23.1	21.7	28.6
全 美 国	28.2	31.0	33.6

在全国各个区域中，抵押土地的农户的百分比一直在增长，在人烟稠密、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的北部，这个百分比最高。美国的统计学家指出（见第5卷第159页），南部抵押土地的农户的增加大概是由于种植园的“瓦解”，种植园的许多地段卖给了黑人和白人农民，他们只能付出一部分地价，其余的变成了抵押借款。于是在奴隶占有制的南部就出现了一种独特的购买手续。我们看到，1910年美国黑人农户一共有920883个，占全部农户的14.5%。从1900年到1910年，白人农户只增加了9.5%，而黑人农户却增加了19.6%，比前者快一倍。自“战胜”奴隶主以来已经过去半个世纪，黑人力求从“种植园主”的压迫下解放出来的渴望依然十分强烈。

美国的统计学家在同一个地方写道：一般说来，农户把土地抵押出去并不是任何时候都出于穷困，有时候是想弄到资本来改良土壤等。这是无可争辩的。但是不应该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经常做的那样，用这个无可争辩的意见掩盖这样一个事实，就是只有少

数富裕的农户户主才能够用这种方式弄到资本来改良土壤，把资本用到生产方面，大多数的农户户主都是愈来愈陷于破产境地，通过抵押而落入财政资本的魔掌。

农户户主依附于财政资本这件事本来足以——而且也应该——引起研究者比较大的注意。但是问题的这一方面尽管很重要，至今仍然没有人加以研究。

而抵押土地的农户的增加無論在任何情况下都意味着资本实际上已經統治了这些农户。自然，除了正式經過公証人抵押的农户之外，还有不少农户债务累累，只不过这种债务是属于私人的，沒有那末严格地办理正式手續，或者是在調查时沒有統計而已。

15. 工業和农業进化情形的比較

美国統計所提供的材料，尽管存在着一些缺点，但它还是比其他国家的材料更有用处，它的特点是內容充实、收集方法一致。这样就有可能把1900年和1910年的工業和农業的統計材料加以比較，有可能把国民經济两个部門的經济結構及其进化的一般情况加以对比。资产阶级經济学中最流行的思想，就是工業和农業是对立的，吉姆美尔先生所重述的也是这一思想。現在我們要根据大量确切的材料来看一看这种說法有几分是对的。

我們先从工業和农業的經济单位的数目談起。

	經济单位的数目 (单位千)		經济单位增 加的百分比	人口(城市人口和 农村人口)增加的 百分比
	1900年	1910年		
工業……	207.5	268.5	+29.4%	+34.8%
农業……	5 737	6 361	+10.9%	+11.2%

农业中的经济单位要多得多、小得多，这就表现出农业的落后性和分散性。

农业中经济单位总数的增加比工业慢得多。美国有两种情况是其他先进国家所没有的，这两种情况特别有力地加强和加速着农业中经济单位的增加。第一种情况是：南部的奴隶主种植园至今还处在瓦解过程中，不断地有黑人以及白人农民从“种植园主”手里“贖买”一些小块土地；第二种情况是：美国至今还有大量空余的闲置土地，由政府分发给一切愿意要土地的人。尽管如此，农业经济单位的增加还是比工业慢得多。

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农业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还保存着自然经济的性质，许多不同的行业一个一个地脱离了农业，例如生产和修理各种农具和家具等行业原先是农民家庭工作范围以内的，现在则成了工业的单独的部门。另一方面，农业中存在着工业中所没有的垄断，即土地占有的垄断，而且这种垄断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无法消除的。即使土地私有制不存在——事实上美国大多数地区直到现在还没有土地私有制——，只要个别业主占有土地，就会产生垄断。在美国各主要的区域，全部土地都被占用了，农业经济单位的增加只有在现有的单位分裂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自由地建立新单位同时又保持原有的单位是不可能的。土地占有的垄断阻碍着和工业不同的农业的发展，也阻碍着农业中资本主义的发展。

对于投入工业各企业和农业各单位的资本数量我们无法准确地加以比较，因为土地价值中包括地租。我们只好把投入工业的资本和工业品总值拿来同全部农户财产总值和主要农产品总值加以比较。在这里，只有表明工农农业总值增长的百分数才是完全可

以比較的。

		單位百萬美元		增加的百分數
		1900年	1910年	
工 業	全部企業的資本……………	8 975	18 428	+105.3%
	全部企業產品總值……………	11 406	20 671	+ 81.2%
農 業	全部農戶財產總值……………	20 440	40 991	+100.5%
	全部谷類作物總產值……………	1 483	2 665	+ 79.8%
	全部谷類作物的收穫量(單位 百萬蒲式耳)……………	4 439	4 513	+ 1.7%

我們看到，無論是工業投資的總值，還是全部農戶財產的總值在1900年到1910年這10年中，都增加了一倍。最大的和基本的區別就是農業中主要產品即谷物的生產增長得很少，只增加了1.7%，而同時全國人口卻增加了21%。

農業的發展落后於工業，這是一切資本主義國家所固有的現象，是國民經濟各部門間的比例遭到破壞、發生危機和物價高漲的最深刻的原因之一。

資本使農業擺脫了封建制度，擺脫了中世紀和宗法制時期停滯不前的落后狀態，使農業加入了商業周轉，並且同自己一道進入了世界範圍的經濟發展。但是資本不僅沒有消除群眾所受到的壓制、剝削、貧困，反而製造了許多新的災難，並且在“現代的”基礎上恢復了一切舊的災難。資本主義不僅沒有消除工農業之間的矛盾，反而擴大了這種矛盾，使矛盾更加尖銳。主要在工商業範圍內形成的資本愈來愈沉重地壓迫着農業。

農產品產量增加得那末少(+1.7%)，而農產品價格卻增加得那末多(+79.8%)，這個事實一方面向我們清楚地表明了土地占有者向社會索取的地租和貢稅的作用。土地占有者依靠自己所處

的垄断地位，利用农业赶不上工业发展的这种落后性，把亿亿万万的美元装进了自己的腰包。全部农户财产的总值10年之中增加了205亿美元。在这个数目中，建筑物、耕畜和农具的总值只占50亿美元，而地价即资本化的地租10年之中就增加了150亿美元(+118.1%)。

另一方面，在这里我们特别明显地看到了小农和雇佣工人不同的阶级地位。当然，小农和雇佣工人都在“劳动”，都受到资本的剥削，尽管剥削的形式完全不同。但是，只有庸俗的资产阶级民主派才能根据这一点而把这两个不同的阶级混在一起，谈论什么小“劳动”农业。这样做也就是掩盖和抹杀现有的社会经济制度和这个制度的资产阶级性质，并且把小农为了生存必需进行劳动，必需进行个体劳动、体力劳动这个标志提到首要地位，其实这个标志是以前一切经济结构所固有的。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管小农是否愿意，是否察觉到，他都要成为一个商品生产者。问题的全部实质就在于这种变化。甚至在小农还没有剥削雇佣工人的时候，单是这种变化也总归要使他成为无产阶级的对抗者，成为小资产者的。小农出卖自己的产品，无产者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小农作为一个阶级不能不力求提高农产品的价格，他们这样做就无异于同大地占有者一道共同瓜分地租，同地主团结起来共同反对社会的其他阶层。小农就其阶级地位来看，随着商品生产的发展，必然要变成小地主。

在雇佣工人中常常有这样的情形：一部分雇佣工人同自己的业主联合起来反对整个的雇佣工人阶级。但这也只是阶级的一部分同自己的敌人联合起来反对本阶级。群众的福利不提高，群众同统治现社会的资本、同整个资本家阶级的对抗不尖锐化，决不能

設想作为一个階級的雇傭工人的狀況会得到改善。相反，作为一个階級的小農的狀況有所改善，正是小農和地主聯合在一起，共同向社會索取高額的地租，同全部或主要靠出賣勞動力過活的無產者和半無產者群眾處於對抗地位的結果，這却是完全可以設想的，而且這也是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典型現象。

下面我們把美國統計中的關於雇傭工人和小農的狀況、人數的材料作個對比：

	1900年	1910年	增加的百分數	
工業	雇傭工人人數(單位千)……	4 713	6 615	+40.4%
	雇傭工人的工資(單位 百萬美元)……	2 008	3 427	+70.6%
農	雇傭工人人數……	?	?	+47.1%(大約的 數字)
	雇傭工人的工資(單位 百萬美元)……	857	652	+82.3%
業	農戶戶主人數(單位千)……	5 737	6 361	+10.9%
	農戶的主要產品——糧食的 總值(單位百萬美元)……	1 483	2 665	+79.8%

產業工人吃了虧，因為他們的人數增加了整整 40%，而工資僅僅增加了 70.6%（說“僅僅”，是因為現在的糧食數量和過去差不多，等於過去數量的 101.7%，而它的價值竟等於過去價值的 179.8%！！）。

作為小地主的小農從無產階級那里占了便宜。小農的人數一共增加了 10.9%（即使單就小農戶戶主來說，也只不过是增加了 11.9%），他們的產量幾乎沒有增加（+1.7%），而農產品的總值却增長了 79.8%。

當然，商業資本和財政資本把地租的絕大部分攔為己有了，但是就小農和雇傭工人的相互關係來看，他們的階級地位仍然很像

小资产者和无产者的地位。

工业中雇佣工人的增长超过了全国人口的增长(前者增加了40%,而后者只增加了21%)。小生产者和小农日益遭受剥夺。居民日益无产阶级化[⊖]。

农户户主人数的增加,尤其是所有者人数的增加落后于全国人口的增加(10.9%比21%)。小农逐渐变成垄断者即小地主。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工农业中小生产和大生产之间的相互关系。工业方面的材料不是1900年和1910年的,而是1904年和1910年的。

我们把工业企业按照产量分为三个主要类别:生产总额在2万美元以下的算作小企业,2万至10万美元之间的算作中等企业,10万美元以上的算作大企业。农业的经济单位我们只能按照土地数量来分类。我们把有土地100英亩以下的农户算作小农户,有土地100至175英亩的农户算作中等农户,有土地175英亩以上的农户算作大农户。

经济单位类别		经济单位数目(单位千)				增加的百分数
		1900年	百分数	1910年	百分数	
工 业	小 企 业.....	144	66.6	180	67.2	+25. %
	中等企业.....	48	22.2	57	21.3	+18.7%
	大 企 业.....	24	11.2	31	11.5	+29.1%
	总 计.....	216	100.0	268	100.0	+24.2%
农 业	小 农 户.....	3 297	57.5	3 691	58.0	+11.9%
	中等农户.....	1 422	24.8	1 516	23.8	+ 6.6%
	大 农 户.....	1 018	17.7	1 154	18.2	+13.3%
	总 计.....	5 737	100.0	6 361	100.0	+10.9%

⊖ 农业中的雇佣工人人数,更确切些说他们的增长的百分比,是从下面的比例得出来的: $82.3 : 70.6 = x : 40.4$, 从而 $x = 47.1$ 。

原来二者的进化是很一致的。

無論在工業中或者在農業中，比重降低的正是中等經濟單位，它們的增加既慢于小型的，也慢于大型的。

無論在工業中或者在農業中，小型經濟單位的增加都慢于大型的。

各類經濟單位在經濟力量或經濟作用上發生了怎樣的變化呢？在工業方面我們有一份產品總值的材料，在農業方面我們有一份全部農戶財產總值的材料：

經濟單位類別		單 位 百 萬 美 元		增 加 的 百 分 數		
		1900年	百分數	1910年	百分數	百分數
工 業	小 企 業.....	927	6.3	1127	5.5	+ 21.5%
	中 等 企 業.....	2 129	14.4	2 544	12.3	+ 19.5%
	大 企 業.....	11 737	79.3	17 000	82.2	+ 44.8%
	總 計.....	14 793	100.0	20 671	100.0	+ 39.7%
農 業	小 農 戶.....	5 790	28.4	10 499	25.6	+ 81.3%
	中 等 農 戶.....	5 721	28.0	11 089	27.1	+ 93.8%
	大 農 戶.....	8 929	43.6	19 403	47.3	+117.3%
	總 計.....	20 440	100.0	40 991	100.0	+100.5%

这里二者的进化也是很一致的。

無論在工業中或者在農業中，中小型經濟單位的比重都在降低，只有大型的比重在增加。

換句話說，無論在工業中或者在農業中，大生產都在排擠小生產。

这里工農業之間的差別在于工業中小企業的比重比中等企業的比重增加得稍微多一些（前者+21.5%，后者+19.5%），而農業中的情形却相反。当然，这个差別并不大，根据这一点不能作出任

何概括性的結論。但是，事实畢竟是事实，近 10 年来，在世界上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业中的小生产确实比中等生产增加得快些，而农业中的情形却相反。这个事实表明，资产阶级经济学者说什么工业绝对地、無例外地証实了大生产排挤小生产这个规律而农业却推翻了这个规律，这种流行的論断是毫無根据的。

在美国农业中，不仅进行着大生产排挤小生产的过程，而且这个过程要比在工业中进行得更有规律，更有規則。

在这里不應該忘記我們在前面所証明的那个情况，即按照土地数量划分农户的分类方法 低估了 大生产排挤小生产的过程。

至于談到已經达到的集中程度，那末农业在这方面是非常落后的。在工业中，11% 的大企业掌握了全部生产的 $\frac{8}{10}$ 以上。小企业的作用則微不足道：占全部工业企业 $\frac{2}{3}$ 的小企业只占全部工业生产的 5.5%！相形之下，农业中的情况很分散：58% 的小农户占全部农户财产总值的 $\frac{1}{4}$ ，18% 的大农户占全部农户财产总值的将近一半(47%)。农业中经济单位的总数是工业中经济单位总数的 20 多倍。

这就証实了早已作出的結論：如果把农业进化同工业进化加以比較，农业中资本主义現在所处的阶段比較接近的是工場手工业，而不是大机器工业。在农业中手工劳动还占着优势，比較起来机器的使用是很不广泛的。但是上面引用的材料根本不能証明农业生产在現在的發展阶段上不能社会化。誰掌握着銀行，誰就直接掌握着美国 $\frac{1}{3}$ 的农户，也就間接統治着这些农户的全体群众。按照一个总的計劃，把占全部生产总额一半以上的百万农户的生产組織起来，这在現代各种经济結合和交通运输技术的发展情况下是絕對办得到的。

16. 总結和結論

美国 1900 年和 1910 年的农业調查是社会統計在农业方面的最新成就，是所有先进国家中最好的材料。它收集了数百万农户的材料，使我们有可能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农业进化作出准确实际的总结和結論来。特别是因为美国是个幅員最广大、关系最复杂、资本主义农业的色彩和形式最繁多的国家，所以我们能够根据这个材料来研究农业进化的規律。

这里我們看到，一方面，奴隶占有制的——在这种場合下也就是封建的——农业結構在向商業的和資本主义的农业結構过渡；另一方面，在这个最自由的、最先进的资产阶级国家中，資本主义的發展特別广泛，特別迅速。同时，在这个国家中还进行着極其广泛的建立在民主資本主义基础上的垦殖过程。

这里我們也看到，既有人烟稠密、工业極为發达、农业集約程度很高、同文明而又古老的資本主义西欧的大多数地区很相似的地区，也有进行原始粗放性的农业和畜牧业、同俄国的某些边区或西伯利亚的一部分地区很相似的地区。我們还看到形形色色的大小农户：既有过去奴隶占有制的南部和移民的西部的那种大地产和大种植园，又有資本主义高度發达的北部大西洋岸各州的那种大地产和大种植园；既有分成制黑人的小农户，又有資本主义的小农户（如工业的北部为市場生产牛奶或蔬菜的小农户，以及太平洋岸各州生产水果的小农户）；既有使用雇佣工人的“小麦工厂”，又有充滿了“自食其力”的天眞幻想的“独立”小农的垦殖地段。

各种关系極为复杂，既包括过去，又包括未来，既包括欧洲，

又包括俄国。在一些问题上把美国和俄国比较一下是特别有教益的，例如在这个问题上进行比较：如果全部土地不付贖金就转移到农民手中（这种可能的转移是进步的，但無疑是资本主义的），后果将怎样呢？

用美国的例子来研究农业中资本主义发展的一般规律和这些规律表现的不同形式是最方便的。这种研究所得出的一些结论可以概括为如下几个简短的原理。

与工业相比，农业中的手工劳动要比机器占有無比的优势。但是机器正在迅速地被采用，机器提高了农户的技术，使农户成为更大的、资本主义性质更多的农户。在现代农业中，是以资本主义的方式使用机器的。

农业中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和指标是雇佣劳动。雇佣劳动的发展也像机器使用的增长一样，在全国各个区域中，在农业的各个部门中都可以看到。雇佣工人人数的增长超过了农业人口和全国人口的增长。农业户主人数的增长落后于农业人口的增长。阶级矛盾愈来愈激烈，愈来愈尖锐。

农业中大生产日益排挤小生产。试比较 1900 年和 1910 年关于全部农户财产总值的材料，就可以充分证实这一点。

但是，由于美国的研究者在 1910 年只运用了按照土地数量划分农户的方法（差不多欧洲各国的研究者都是如此），就低估了这种排挤现象，粉饰了小农的状况。而且农业集约化发展得愈广泛、愈迅速，则上面指出的那种低估和粉饰的情形就愈厉害。

资本主义的发展不仅可以用加速粗放区域中按土地面积划分的大农户发展的办法，也可以用另一种办法，就是在集约化区域中在比较小的地段上建立生产规模比较大的、资本主义性质比较多

的农户的办法。

总之，大农户的生产集中实际上要更厉害，小生产受到的排挤实际上要更严重，决不是像按照土地面积划分的各类农户的普通材料所提供的那种情况。制订得比较认真、比较详细、比较科学的1900年的调查材料消除了这方面的任何怀疑。

小农业日益遭受剥夺。近几十年来，所有者在农户户主总数中所占的比重不断下降，而农户户主的增加又落后于全国人口的增加。在北部这个出产农产品最多、既没有奴隶制残余又没有进行大规模垦殖的主要区域里，农户全部财产所有者的人数在绝对地减少。近10年来，有一般牲畜的农户户主减少了；有产乳性畜的业主虽然有所增加，但是同时无马的农户，特别是无马的小农户的百分比增加得更多。

总的说来，把关于工业和农业的同一时间、同样性质的材料加以比较，我们就会看到：尽管农业极端落后，然而工农业的进化规律是很一致的，工农业中的小生产都受到排挤。

写于1915年

1917年第一次由“生活和知识”
出版社用单行本出版

按手稿刊印

給布哈林的小冊子“世界經濟 和帝國主義”寫的序言

布哈林這本書所談的問題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是用不着特別解釋的。在研究現代資本主義形式變化的這一經濟科學的領域中，帝國主義問題不但是最重要的問題之一，簡直可以說是重要的問題。任何一個不但關心經濟而且關心現代社會生活各个方面的人，研究一下作者根據最近材料大量搜集來的有關事實，都是絕對必要的。自然，如果不從經濟方面和政治方面充分說明帝國主義的實質，如果不以此為基礎，那就談不上具體地歷史地估計當前的戰爭。這樣也就無法了解近十年來的經濟史和外交史，在這種情況下，要談什麼對戰爭提出正確的看法，那是非常可笑的。但是，如果以為從外交“文獻”或當前的政治事件中找出一個國家的統治階級稱心如意的個別事實，就算對戰爭作了具體的歷史的估計，那末，根據在這個問題上特別突出地反映出整個現代科學要求的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看，對於這種方法的“科學”意義只能付之一笑。例如，普列漢諾夫先生就完全放棄了馬克思主義，他不分析帝國主義的基本特徵和趨勢，即現代高度發達的、成熟的和衰敗的資本主義的經濟關係的體系，而只是收集了幾件普利什凱維奇分子和米留可夫所喜歡的事實。這樣一來，帝國主義這個概念的科學意義就被貶低了，成了一種謾罵剛剛提到的那兩個帝國主義

者的直接竞争者、对手和敌人的术语，而这两个帝国主义者同自己的对手和敌人完全是站在同一种阶级基础上的！在讲过的话可以忘记、原则性可以丧失、世界观可以抛弃、决议和庄严的诺言可以扔到一边的今天，发生这种事情是不足为奇的。

布哈林这本书的科学意义特别在于：他考察了世界经济中有关帝国主义的基本事实，他把帝国主义看成一个整体，看成极其发达的资本主义的一定的发展阶段。过去有过一个比较“和平的”资本主义时期，那时候资本主义在欧洲各个先进国家完全战胜了封建主义，而且能够最（比较地说）平稳地、顺利地发展，它“和平地”扩张到还没有被占领的广大地区，扩张到没有完全卷入资本主义漩涡的国家。当然，在这个时期（大约是1871—1914年）“和平的”资本主义所建立的生活条件，无论在军事的或一般阶级的意义上来讲，距离真正的“和平”都是非常非常之远的。对于各先进国家十分之九的居民，对于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亿万居民来说，这个时期不是“和平”，而是压迫、苦难和灾祸，也许，这种灾祸看来由于“永无尽头”，而显得更加可怕。这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它已经由一个有更多的激荡、跳躍、灾难和冲突的时代代替了，这时对于人民群众来说，典型的現象与其说是“灾祸永无尽头”，不如说是“到了尽头还是灾祸”。

同时，这种代替正是由于一般资本主义和商品生产的最深刻最根本的趋势的直接发展、扩大和继续而产生的，注意到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交换的发展，大生产的发展，这是几百年来全世界范围内的基本趋势。当交换和大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大约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交换就造成了经济关系的国际化和资本的国际化的，大生产已经达到了十分庞大的规模，自由竞争开始由垄断取而

代之。典型的現象已經不是“自由”競爭的（在國內和各國之間）企業，而是企業主的壟斷同盟——托拉斯。世界的典型的“統治者”已經是財政資本，財政資本在國內和國際上特別流動靈活，特別錯綜複雜；它特別不固定，脫離直接生產，特別容易集中，而且早已集中，於是幾百個億萬富豪和百萬富豪便直接掌握了整個世界的命運。

如果抽象地從理論上來談問題，那就會得出考茨基已經得出的結論（雖然方式稍微不同，但是也放棄了馬克思主義）：這些資本大亨在世界上聯合成一個統一的全世界的托拉斯，用國際聯合起來的財政資本代替各國單獨的財政資本的競爭和鬥爭，這樣的日子已經不很遠了。但是，這個結論非常抽象、簡單、不正確，它與19世紀90年代我們的“司徒盧威派”和“經濟派”得出的結論是一樣的，當時他們根據資本主義的進步性，根據俄國資本主義的必然發生和必然取得最後勝利，時而得出辯護性的結論（崇拜資本主義，同資本主義妥協，以歌頌代替鬥爭），時而得出非政治性的結論（即否認政治，或者否認政治的重要性，否認一般政治動蕩的可能性等等，特別是“經濟派”的錯誤），甚至有時得出簡直是“罷工主義”的結論（主張“總罷工”，特別崇拜罷工運動，甚至忘記或者忽視運動的其他形式，想直接從資本主義“跳向”純粹的罷工，只用罷工來戰勝資本主義）。有種種跡象表明，資本主義要比半小市民的自由競爭的“天堂”進步，在先進國家里帝國主義必然產生並且最後戰勝“和平的”資本主義；這一無可爭辯的事實，就是在今天也會使人產生許許多多和形形色色的政治和非政治的錯誤和不幸。

考茨基顯然是同馬克思主義決裂了，但他並不是否認或者忘記了政治，不是“跳”過了許多不同的（特別是在帝國主義時代）政

治冲突、动荡和改革，不是替帝国主义辩护，而是幻想“和平的”资本主义。“和平的”资本主义已经被不和平的、黠武的、灾难深重的帝国主义代替了，这是考茨基不得不承认的，因为他在1909年的一部专门的著作⁴里已经承认了这一点。在这部著作里，他是最后一次以马克思主义者得出了完整的结论。但是，既然不能简单地、直接地、笨拙地幻想从帝国主义回到“和平的”资本主义，那末，能不能使这种实质上是小资产阶级的幻想具有对于“和平的”“超帝国主义”的天真想法的形式呢？如果把各民族（确切些说，各国单独的）帝国主义的国际联合叫作超帝国主义，而这种联合“似乎能够”消除使小资产者特别不愉快、特别惊惶不安的冲突，如战争、政治动荡等等，那末，为什么不用这种比较和平的、冲突比较小的、灾难比较轻的“超帝国主义”的天真幻想，来避开现在已经到来的、冲突极其激烈的、灾难深重的帝国主义时代呢？能不能幻想这个时代也许很快就会过去，也许紧接着会出现一个比较和平的、不需要“激烈”策略的“超帝国主义”时代，从而摆脱在欧洲已经到来的帝国主义时代所不断提出的“激烈的”任务呢？考茨基正是这样说的：“不管怎样，资本主义的这一（超帝国主义的）新阶段是可以设想的”，至于“能不能实现，现在还没有充分根据来解决这一问题”（1915年4月30日“新时代”《Neue Zeit》⁵第144页）。

这种逃避已经到来的帝国主义、幻想进入还不知道能不能实现的“超帝国主义”的想法，没有一点马克思主义的气味。这种理论承认马克思主义适用于“资本主义的新阶段”，但是这个新阶段能不能实现，连杜撰这个新阶段的人也不敢担保，而对于现在已经到来的阶段，马克思主义却被一种小资产阶级的、极其反动的、企图缓和矛盾的想法所代替。考茨基曾经许下诺言，要在未来的、紧

張的、災難深重的時代當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他在 1909 年寫文章談這個未來的時代時，就不得不預料到和十分明確地承認這個時代即將到來。現在，這個時期已經到來了，這是絕對沒有疑問的，可是考茨基又是只許下諾言，要在未來的、還不知道能不能實現的超帝國主義時代當一個馬克思主義者！總之，可以盡量許願要在另一個時代當馬克思主義者，就是不在今天，不在當前的條件下，不在這個時代當馬克思主義者！賒賬的馬克思主義，許願的馬克思主義，明天的馬克思主義，其實是一種緩和今天矛盾的小資產階級的機會主義理論——而且不僅僅是理論。這同“現代”很流行的輸出的國際主義很相像，當時那些激烈的——啊，非常激烈的！——國際主義者和馬克思主義者同情國際主義的任何表現，……只要是敵人陣營里的，什麼地方的都行，就是不同情自己家裡的和自己同盟者的；同情民主……只要民主僅僅是“同盟者”的諾言；同情民族的“民族自決”，只是不同情本民族（它以自己有這樣的同情者為榮）所附屬的那些民族的民族自決……一句話，這是第一千零一種的偽善。

然而，能不能反對抽象地“設想”帝國主義之後的資本主義新階段即超帝國主義呢？不能。抽象地設想這種階段是可以的。不過這在實際上就是機會主義者，他為了幻想將來的不緊急的任務，而否認了當前的緊急的任務。從理論上講，這就是為了這些幻想而不依據實際的發展，隨意地脫離了實際的發展。毫無疑問，現時正在朝着一個唯一的、世界性的、囊括一切企業、一切國家的托拉斯的方向發展。但是，這種發展是在這樣的條件，這樣的速度，這樣的矛盾、衝突和動蕩——決不只是經濟的，還有政治、民族的等等——之下進行的，在還沒有出現一個世界托拉斯，即各民族財政

資本的“超帝国主义的”世界联盟以前，帝国主义必然要崩潰，資本主义一定会变成自己的对立物。

弗·伊林

1915年12月

第一次載于1927年1月21日

“真理报”第17号

按手稿刊印

机会主义和第二国际的破产⁶

第二国际真的不存在了吗？它的最有权威的代表，如考茨基和王德威尔得，都坚决否认这一点。因为除了断绝关系而外，并没有发生什么事情，一切都平安无事，——这就是他们的看法。

为了弄清真相，我们来看一看 1912 年巴塞尔代表大会的宣言，这个宣言所谈的恰恰是这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并且是由世界各国社会党通过的。应当指出，没有一个社会主义者敢从理论上来说否认对每次战争作出具体的历史的估计的必要。

现在，当战争已经大打起来了的时候，无论是公开的机会主义者，还是考茨基派，都不敢否认巴塞尔宣言，也不敢拿这个宣言提出的要求同各国社会党在战时的行为相对照。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宣言充分地揭露了公开的机会主义者和考茨基派的真面目。

宣言中既没有一个字谈到保卫祖国，也没有一个字谈到进攻战和防御战的差别，更没有一个字谈到德国和四协约国⁷的机会主义者和考茨基派⁸现在处处向世界吹擂的那些东西。其实宣言也

⁸ 这里所指的并不是考茨基在德国的那些信徒个人，而是指国际上典型的假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摇摆于机会主义和激进主义之间，实际上不过是机会主义的遮羞布而已。

不能談到这些东西，因为它所談的一切，是絕對用不着这些概念的。宣言十分具体地指出了許多經濟冲突和政治冲突，这些冲突制造这次战争已經有好几十年了，到了1912年就完全显露了出来，并且引起了1914年的战争。宣言提到俄奥两国因爭夺“巴尔干霸权”而引起的冲突、英法两国和德国之間（在所有这三个国家之間！）因“在小亚細亚实行征服政策”而引起的冲突、奥意两国因在阿尔巴尼亚“爭取統治权”而引起的冲突，等等。宣言把所有这些冲突都确定为在“資本主义帝国主义”基础上發生的冲突。可見，宣言十分明确地認為这次战争具有掠夺的、帝国主义的、反动的和奴役的性質，这种性質使得保衛祖国的思想成了理論上毫無意思的、实践上荒謬怪誕的东西。豺狼进行斗争，是为了吞食別人的“祖国”。宣言根据無可爭辯的历史事实作了必然的結論：这次战争“决不能用什么人民利益这种借口来辯护”；它是由于“資本家要获取利潤，各国王朝要实现其野心”而制造的。如果工人“自相残杀”起来，那簡直是一种“罪行”。宣言就是这样說的。

資本主义帝国主义时代是成熟的和衰敗的資本主义时代，这时資本主义正处于崩潰的前夜，已經成熟到要讓位給社会主义的地步了。1789—1871年这个时期是进步的資本主义的时代，当时摆在历史日程上的是：推翻封建制度、专制制度，摆脱外国奴役。在这个前提下，也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才談得上“保衛祖国”，即保衛祖国不受压迫。这种看法現在也适用于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的战争，可是要把这种看法应用于帝国主义列强之間的战争，应用于誰能更多地掠夺巴尔干国家和小亚細亚等等的战争，那是荒謬的。因此，那些主张在这次战争中“保衛祖国”的“社会主义者”，像小偷躲避他偷过东西的地方那样来迴避巴塞尔宣言，是不足为奇

的。因为这个宣言証明，他們是社会沙文主义者，即口头上的社会主义者，事实上的沙文主义者，他們帮助“本国的”资产阶级去掠夺別的国家，奴役別的民族。这就是“沙文主义”这个概念的主要內容。他們即使在“自己”祖国的所做所为是为了征服別人祖国的时候，还是主张保衛“自己的”祖国。

把这次战争看作是民族解放战争时所得出的是一种策略，把这次战争看作是帝国主义战争时所得出的則是另一种策略。宣言明确地指出了这另一种策略。战争“将引起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我們必須“利用”这种危机，利用的目的不是为了緩和危机，不是为了保衛祖国，相反地，而是为了“激發”群众，为了“加速資本統治的崩潰”。历史条件还没有成熟的事情，是不能够加速的。宣言認為：社会革命是可能的，因为它的先决条件已經成熟，正是由于战争它才会到来。宣言援引巴黎公社和俄国1905年革命的例子，即援引群众罢工和国内战争的例子說，“統治阶级”害怕“無产阶级革命”。有人像考茨基那样，硬說社会主义对这次战争的态度没有被闡明，这是胡說八道。这个問題在巴塞尔大会上不仅討論过，而且已經作了决定，在这次大会上通过了革命無产阶级群众斗争的策略。

有人竟完全避开巴塞尔宣言或避开其中最重要的部分，而援引个别領袖的言論或个别党的決議，这种伪善态度是極其令人憤慨的，因为第一、这些言論是在巴塞尔大会以前發表的；第二、这些決議并不是由世界各国党共同通过的決議；第三、这都是針對各种可能的战争，而不是針對当前这场战争說的。問題的实質在于欧洲各大强国間的民族战争时代已經由它們之間的帝国主义战争的时代代替了，巴塞尔宣言最先正式承認了这个事实。

如果認為巴塞爾宣言是一種空洞叫喊、官樣文章、虛聲恫吓，那就錯了。宣言所揭露的那些人正是要這樣來提問題的。但這是不對的。這個宣言無非是整個第二國際時代所進行的巨大宣傳工作的結果，無非是社會主義者用各種語言向群眾發表的數十萬演說、文章和呼聲書的總結。宣言只是重復了蓋得·茹爾在1899年所寫過的東西，當時他抨擊了社會主義者參加內閣應付戰爭的政策，他談過“資本主義海盜”引起的戰爭（《En garde!》^①第175頁）；宣言只是重復了1909年考茨基在他的“取得政權的道路”一書中所寫過的東西，他在這本書里認為“和平”時代已經結束，戰爭和革命的时代已經開始。把巴塞爾宣言看作空話或錯誤，那就是把近25年來的全部社會主義工作都看作空話或錯誤。有人指出通過宣言而不實行宣言是矛盾的，機會主義者和考茨基派對於這種指責所以這樣不能忍受，是因為這個事實揭穿了第二國際工作中極其深刻的矛盾。1871—1914年這個時期的相對“和平的”性質給機會主義提供了養料，它起初只是一種情緒，後來成了一种流派，最後竟成了工人官僚和小資產階級同路人的一个集團或階層。這些分子所以能夠操縱工人運動，只是因為他們口頭上承認革命目的和革命策略。他們所以能夠取得群眾的信賴，只是因為他們發誓說，他們的全部“和平”工作都是為無產階級革命作準備的。這個矛盾好像是一個膿包，它總歸要破裂的，結果也真的破裂了。現在全部問題就在於是否要像考茨基之流所做的那樣，為了維持“統一”（與膿毒維持“統一”）把這塊膿再擠進有機體中去，還是為了促進工人運動這一有機體的完全健康，必須儘快地和細心地把這塊膿排除

^① “守衛去！”。——編者注

掉，虽然动这番手术要忍受一时的剧痛的。

那些投票赞成军费开支、参加内阁并在 1914—1915 年間捍衛护国思想的人背叛了社会主义，这是显而易见的。只有伪君子才能否認这个事实。对于这个事实必須說明一下。

二

如果把全部問題看成个别人物的問題，那是荒謬的。考茨基問道(《Neue Zeit》[⊖]1915年5月28日)：既然是普列汉諾夫和盖得等等这样一些人物，試問，这同机会主义有什么相干呢？阿克雪里罗得代表四協約国的机会主义者回答說(《Die Krise der Sozialdemokratie》[⊖]，1915年苏黎世版，第21頁)：既然是考茨基等等这样一些人物，試問，这同机会主义有什么相干呢？这都是在演滑稽剧。为了說明整个运动的危机，必須考察：第一、当前政策的經濟意义；第二、作为这种政策基础的思想；第三、这种政策同社会主义各个派別历史的联系。

1914—1915年战争期間护国主义的經濟实質是什么呢？各大强国的資產階級进行战争的目的是为了瓜分世界和剝削世界，是为了压迫各族人民。一群为数不多的工人官僚、工人貴族和小資產階級的同路人可以从資產階級的巨額利潤中分一点油水。社会沙文主义和机会主义的階級背景是一样的，都是少数享有特权的工人同“本国的”民族資產階級联合起来反对工人階級群众，資產階級的走狗同資產階級联合起来反对受資產階級剝削的階級。

⊖ “新时代”。——編者注

⊖ “社会民主党的危机”。——編者注

机会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的政治内容也是一样的，都是主张阶级合作，放弃无产阶级专政，放弃革命行动，无条件地承认资产阶级法制，不相信无产阶级而相信资产阶级。社会沙文主义是英国自由派工人政策、米勒兰主义和伯恩斯坦主义的直接继续和完成。

在1889—1914年这一整个时代，工人运动中的两个基本趋向，即革命的社会主义同机会主义的社会主义之间经常进行斗争。如今在各个国家里，在对待战争的问题上也存在着两个主要派别。我们暂且撇开资产阶级和机会主义者所使用的那种以个别人物为口实的手法，只谈一谈许多国家的派别情况。我们现在就拿欧洲的德国、英国、俄国、意大利、荷兰、瑞典、保加利亚、瑞士、比利时和法国这10个国家来说吧。在前8个国家中，机会主义派和革命派的划分是同社会沙文主义派和国际主义派的划分相适应的。在德国社会沙文主义的据点是“社会主义月刊”（《Sozialistische Monatshefte》）⁸和列金之流；在英国是费边社分子⁹和工党¹⁰（英国独立工党——I. L. P.¹¹始终同他们结成联盟，支持他们的机关报，但是它在这个联盟中始终不如社会沙文主义派占优势，而在英国社会党——B. S. P.¹²内，国际主义派却占 $\frac{3}{7}$ ）；在俄国这一派的代表是“我们的曙光”杂志¹³（现在是“我们的事业”杂志）、“组织委员会”¹⁴以及齐赫泽领导的杜马党团；在意大利是以比索拉蒂为首的改良主义者；在荷兰是特鲁尔斯特拉的党；在瑞典是布兰亭领导的党内多数派；在保加利亚是“宽广派”的党；在瑞士是格雷利希之流。在所有这些国家中，正是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对社会沙文主义发出了相当激烈的抗议。只有法国和比利时这两个国家例外，这里虽然也有国际主义派，但是力量很弱。

社会沙文主义就是已经完成了的机会主义。它已成熟到与本

国资产阶级和总参谋部实行公开的、往往是卑鄙的联盟的地步。正是这种联盟使它获得了巨大的力量，拥有独占合法刊物和欺騙群众的垄断权。所以，如果到现在还把机会主义看作一种党内现象，那是很荒謬的。如果打算同大衛、列金、海德門、普列汉諾夫、維伯等一起去执行巴塞尔決議，那也是很荒謬的。同社会沙文主义者講統一，就是同剝削其他民族的“本国”民族资产阶级講統一，就是使国际无产阶级分裂。这当然不是說，同机会主义者的决裂在任何地方都能立刻办到，而只是說这种决裂在历史上已經成熟，它对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来說是必要的和不可避免的。历史已由“和平的”资本主义进到了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它已經为这种决裂作好了准备。Volentem ducunt fata, nolentem trahunt[⊖]。

三

资产阶级的聪明的代表人物清楚地了解这一点。因此他們極力称赞現在以“护国派”（即帝国主义掠夺政策的维护者）为首的社会党。因此各国政府不是賞賜給社会沙文主义首領們以閣員的位置（在法英两国），就是讓他們享有合法地自由存在的特权（在德俄两国）。因此，在社会民主党最强大而且已經变成民族主义自由派的反革命工党的事实最为明显的德国，檢察署竟把社会民主党內“少数”与“多数”的斗争看作“阶级仇恨激發”的表現！因此，聪明的机会主义者極力設法使那些在1914—1915年間曾对资产阶级帮过大忙的旧党保持原先“統一”的局面。1915年4月，有一位德国

⊖ 願从者天引之，不願从者天强之。——編者注

社会民主党員在反动的杂志“普魯士年鑒”(《Preussische Jahrbücher》)¹⁵上用“莫尼托尔”笔名發表了一篇文章，他以值得感謝的坦率精神表明了世界各国聪明的机会主义者的观点。莫尼托尔認為，要是社会民主党繼續向右走的話，那对資產階級是很危險的：“它应当保持具有社会主义理想的工人政党的性質，因为它一旦放弃了这一点，馬上就会出现一个新的政党来接受原先旧的政党所背弃的綱領，并把这个綱領表述得更加激进。”(“普魯士年鑒”1915年第4期第50—51頁)

莫尼托尔說得真中肯。英国自由党人和法国激进党人一向要求的，正是用响亮的革命詞句欺騙群众，使他們相信劳合-乔治、桑巴、列諾得尔、列金和考茨基之流，相信这些在掠夺战争中鼓吹“保衛祖国”的人。

但是，莫尼托尔所代表的只是一种露骨的、粗魯的、厚顏無耻的机会主义。而其他机会主义者的行动却是隱蔽的、巧妙的、“誠实的”。恩格斯有一次曾經說过：“誠实的”机会主义者对工人階級是最危險的……¹⁶ 举个例子來說吧：

考茨基在“新时代”杂志(1915年11月26日)上写道：“反对多数的情緒正在增长；群众怀有反对心理。”“战后(只是战后嗎？——尼·列·)，階級矛盾必将尖銳，这会使激进主义在群众中占上風。”“战后(只是战后嗎？——尼·列·)激进派分子势必紛紛脫党，而加入从事反国会的(??应当說：国会以外的)群众活动的党，这对我們是一个威胁。”“由此可見，我們的党正分裂为两个彼此毫不相干的極端相反的营垒。”为挽救統一起見，考茨基竭力劝告国会中的多数，要他們允許少数分子在国会里發表一些激进演說。这就是說，考茨基想利用在国会內發表的一些激进演說，使

革命群众同机会主义者调和起来，然而这些机会主义者是与革命“毫不相干的”，他们早就操纵了工会，现在他们依靠同资产阶级和政府的紧密联盟又掌握了党内的领导权。考茨基的这种做法与莫尼托尔的“纲领”在实质上有什么差别呢？除了一些糟蹋马克思主义的甜蜜词句而外，没有任何差别。

考茨基分子烏尔木在1915年3月18日的国会党团会议上“警告”党团不要“把弦子拉得太紧；工人群众反对党团多数的情绪正在增长；必须保持马克思主义的”（?!大概是印错了，应读作“莫尼托尔主义的”）“中派”立场（《Klassenkampf gegen den Krieg! Material zum 《Fall Liebknecht》》. Als Manuskript gedruckt[⊖]. 第67页）。由此可见，还在1915年3月就有人代表全体考茨基分子（即所谓“中派”）承认了群众怀有革命情绪的事实！然而过了八个半月以后，考茨基却又主张使那些想和机会主义的、反革命的党进行斗争的群众同机会主义者“调和起来”，而且是利用一些响亮的革命词句提出来的！！

战争所以往往是有益的，是因为它能揭破脓包和排除俗例。

让我们把英国的费边社分子同德国的考茨基分子比较一下。请看一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恩格斯在1893年1月18日谈到费边社分子时所写的一段话：……“这伙野心家有足够的判断力来理解社会变革的不可避免性，但是无论如何不愿意把这番艰巨工作托付给还没有成熟的无产阶级单独去做……他们的基本原则就是害怕革命”……（“与左尔格通信集”第390页¹⁷）。

而在1893年11月11日，恩格斯又写道：“这些妄自尊大的资

⊖ “用阶级斗争反对战争：关于‘李卜克内西案件’的材料”。非卖品。——编者注

产者对無产階級装出一副大發慈悲的样子，說要从上面来解放它，只是它要明白，它这样無知無識的群众不能自己解放自己，要沒有他們这批聪明的律师、著作家和悲天憫人的老太婆大發慈悲，它是什么也达不到的”……(同上第 401 頁)¹⁸。

在理論上，考茨基瞧不起費边社分子，正像慈善君子瞧不起穷光蛋一样。因为他是發誓信仰“馬克思主义”的。但是，他們之間在实践上有什么差別呢？他們都在巴塞尔宣言上签过字，并且又都像威廉二世对待比利时中立那样来对待这个宣言。而馬克思則不然，他畢生斥責了那些力圖扑灭工人革命精神的人。

考茨基拿“超帝国主义”的新理論来反对革命的馬克思主义者。他所理解的这种理論就是：排除“各国財政資本之間的斗爭”，并由“国际財政資本共同剝削世界的制度”来代替(“新时代”杂志，1915年4月30日)。同时他又补充說：“我們还没有充分的根据来断定資本主义的这个新阶段能不能实现。”总之，这个“新阶段”的發明者仅以对这个“新阶段”的假定为根据，却不敢直接声明它“可以实现”，这样，他就在現時，在已經开始了的危机、战争和階級矛盾空前尖銳化的“阶段”上，背弃了他自己的革命声明，背弃了無产階級的革命任务和革命策略！难道这不是最可恶的費边主义嗎？

俄国考茨基派的首領阿克雪里罗得認为“無产階級解放运动国际化問題的重心是日常实际工作的国际化”，譬如說“劳保法和保險法应当成为工人国际活动和組織工作的对象。”(見阿克雪里罗得所著“社会民主党的危机”一書 1915年苏黎世版第 39—40 頁)十分明显，不但列金、大衛、維伯夫妇，就是劳合-乔治本人、納烏曼、布利安和米留可夫等人也会完全贊成这样的“国际主义”的。

阿克雪里罗得現在也和 在 1912 年那样，談到非常遙远的将来时，談到未来的国际“將發動（在战争發生时反对政府）和掀起革命風暴”时，是甘願發表一些最革命的言論的。請看，我們是多么勇敢呀！但是，一談到現在要支持和扩大群众中已經开始的革命騷动时，阿克雪里罗得便回答道，“要是我們直接处于社会革命前夜，像俄国 1901 年大学生游行示威（它預示着反专制制度的决战即将到来）时的情况那样”，那末这种革命群众發動的策略“也許还有某些根据”。可是，此刻这一切全是“空想”、“巴枯宁主义”等等，这同科尔布、大衛、休特古姆和列金等人完全是一副嘴脸。

可爱的阿克雪里罗得忘記了一点，就是在 1901 年，在俄国誰也不知道而且也不可能知道：第一次“决战”会在四年以后——不要忘記，是在四年以后——到来，而且还是“不解決問題的”战斗。虽然如此，当时只有我們革命的馬克思主义者做得对，我們嘲笑了、号召立刻实行冲击的克里切夫斯基和馬尔丁諾夫之流。我們只是劝工人到处驅逐机会主义者，尽力援助、加剧、扩大游行示威以及其他群众性的革命行动。欧洲現在的情况同这很相似：如果号召“立刻”实行冲击，那是荒謬的。但是，以社会民主党人自詡的人，不劝工人同机会主义者决裂，不尽力巩固、加深、扩大和加剧正在發展的革命运动和游行示威，那是可耻的。革命永远不会完全現成地从天上掉下来，而且在革命騷动开始时，誰也不知道它是否会导致并且在什么时候导致“真正的”、“不折不扣的”革命。考茨基和阿克雪里罗得奉送給工人的是一种陈旧的、腐朽的反革命意見。他們叫群众期待将来的国际一定是个革命的国际，而現在只应当保持、掩护和粉飾列金、大衛、王德威尔得和海德門之流的反革命分子的統治。与列金之流保持“統一”是准备“将来的”革命国际

的最好办法，这难道还不明显么？

德国机会主义者的首領 大衛 在回答我党中央委员会 1914 年 11 月 1 日發表的宣言时說，“力求把世界战争变为国内战争，那就是胆大妄为”（見《Die Sozialdemokratie und der Weltkrieg》——“社会民主党和世界大战”一書 1915 年版第 172 頁）。这个宣言中有这样一段話：

“既然战争已經成为事实，那就不管这一轉变在某个时候会遇到多么大的困难，社会主义者是决不会放弃在这方面进行系統的、坚持不懈的准备工作的。”[⊖]

（大衛也引証了这一段話，見該書第 171 頁。）在大衛那本書問世的前一个月，我党發表了几个決議，其中把“系統的准备工作”解释如下：1. 反对軍費开支；2. 打破国内和平；3. 建立秘密組織；4. 贊助战壕联欢的表示；5. 支持一切革命的群众行动[⊖]。

大衛簡直和阿克雪里罗得一样勇敢：他在 1912 年并不認為在战争發生时仿效巴黎公社，就是“胆大妄为”。

普列汉諾夫这个协約国社会沙文主义者的典型代表人物关于革命策略的言論和大衛一样，他把这种策略叫作“愚蠢的梦想”。但是，讓我們听听 科尔布 这个露骨的机会主义者的言論吧，他写道：“实行李卜克內西周围那些人的策略，就会使德国民族内部的斗争达到沸点。”（見《Die Sozialdemokratie am Scheidewege》——“处在十字路口上的社会民主党”一書第 50 頁）

但是，什么是达到沸点的斗争呢？豈不是国内战争嗎？

我們党中央的策略大体上是与齐美尔瓦耳得左派¹⁹的策略一

⊖ 見“列宁全集”第 4 版第 21 卷第 18 頁。——編者注

⊖ 同上，第 139—140 頁。——編者注

致的，如果这个策略真像大衛、普列汉諾夫、阿克雪里罗得、考茨基等人所說的那樣，是“胆大妄为”、“空想”、“冒险”、“巴枯宁主义”等等，那它就根本不能引起“民族内部的斗争”，更不必說引起达到沸点的斗争了。無政府主义的空話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沒有引起过民族内部的斗争。而事实却表明：正是在1915年，由于战争引起了危机，各国群众的革命騷动日益增长：在俄国發生了罢工和政治示威运动，在意大利和英国發生了罢工运动，在德国發生了飢民游行和政治示威。难道这不是革命的群众行动已經开始的表現嗎？

支持、發展、扩大和加剧群众的革命行动，建立秘密的組織（沒有这种組織，甚至在“自由的”国家里也無法向人民群众說明真相），——这就是社会民主党在这次战争中的整个实际綱領。其他一切，不管用什么样的机会主义理論或和平主义理論来粉飾，都是謊言或空話[⊖]。

当人們向我們說这个“俄国策略”（大衛的說法）不适于欧洲的时候，我們总是用事实来回答的。10月30日在柏林，該市妇女同志代表团来到党主席团前声明說：“現在，我們有巨大的組織机构，要散布秘密的小册子和传单，要举行‘未經許可的會議’，比在反社会党人的法令施行期間容易得多了。”“办法和手段并不少，显然，只是不願意干。”（“伯尔尼哨兵报”——《Berner Tagwacht》²¹ 1915年第271号）

⊖ 我党中央的女代表們在1915年3月伯尔尼国际妇女代表大会上，曾經指出建立秘密組織的絕對必要性。这一点被否定了。英国的女代表們譏笑这个建議，而贊美英国的“自由”。但是，几个月以后，我們却收到了一些开了天窗的英文报，例如“工人領袖报”（《Labour Leader》）²⁰，后来又得到消息說，在那里發生了警察搜查和沒收小册子，以及逮捕那些在英国談論和平而且只是談論和平的同志并判处苛刑的事情！

难道是俄国的“宗派主义者”等把这些坏同志引入歧途的吗？难道代表真正群众的不是这些同志，而是列金和考茨基吗？是那个在1915年1月27日作报告时大罵过建立秘密組織这种“無政府主义”思想的列金吗；是那个已經成了反革命分子，在11月26日，即在柏林举行上万人游行示威的 四 天以前說街头游行示威是“冒险”行动的考茨基吗！！

空話已經听够了，像考茨基之流那样糟蹋“馬克思主义”的事情已經看够了！在第二国际存在了25年之后，在巴塞尔宣言發表之后，工人們再不会相信空話了。机会主义已經衰敗了，它最終地轉到資產階級营垒，变成社会沙文主义了：它在精神上和政治上都已同社会民主党决裂了。它在組織上也会同社会民主党决裂的。工人已經在要求發行“不受检查的”刊物和举行“未經許可的”會議了，就是說，他們要求成立地下組織来支持群众的革命运动。只有这样“以战争反战争”才是社会民主党的行动，而不是空話。这种行动尽管会遇到种种的困难，尽管会有暫时的失敗，錯誤，迷誤和間断，但是，它一定会把人类引向胜利的無产階級革命。

載于1916年1月“先驅”杂志第1期

署名：尼·列寧

1929年第一次用俄文刊于“列寧全集”
第2版和第3版第19卷

根据德文杂志譯成俄文刊印

关于召开社会主义者第二次 代表会议的決議草案²²

同一些国家的許多代表协商以后，常务局（国际社会主义者委员会——I. S. K.²³的）决定：

召开拥护齐美尔瓦尔得決議的社会主义者第二次代表会议。
会议議程：

- (1) 制止战争；
- (2) 成立反对战争和民族主义的社会主义者国际联盟；
- (3) 采取实际措施，进行組織、宣传工作，对各国政府进行斗争；
- (4) 进一步闡明齐美尔瓦尔得決議。

会议召开日期定于1916年4月15日。

公布这个决定（公布时召开日期改为3月15日）。

号召一切拥护齐美尔瓦尔得決議的社会主义者的組織，对会议議程上的一切問題和決議草案²⁴进行討論（辯論）。草案（由两三位代表签名）載于《Berner Tagwacht》[⊖]。

写于1916年1月23日和26日
（2月5日和8日）之間

第一次刊印

按手稿刊印

⊖ “伯尔尼哨兵报”。——編者注

給 1916 年 4 月 24 日代表會議

代表團的提議²⁵

1. 只准許拥护齐美尔瓦尔得代表會議決議的政治团体、工会組織的代表或个别人物参加會議。

2. 对那些有正式党派或工会組織参加 I. S. K.[⊙] 的国家，只准許这些組織指定的代表参加。

3. 对那些正式党派或工会組織未参加 I. S. K. 的国家，只准許下列各組織和团体的代表参加：

(甲) 在該国根据齐美尔瓦尔得決議的精神作过口头發言和書面發言的；

(乙) 以自己的行动支持 I. S. K. 的。

4. 只在例外的情况下，才准許个人代表参加，并且仅仅給予發言权。

5. 关于代表資格有效与否的爭論，由代表會議选出的委员会根据听取的理由和对情况的估計作出最后決定。該委员会由九人組成，其中包括四个 I. S. K. 委員。

6. 投票程序由代表會議确定。

[参加过齐美尔瓦尔得代表會議的同志有权 (法文本是《le

⊙ Internationale Sozialistische Kommission —— 国际社会主义者委员会。

—— 編者注

droit》) 參加第二次代表會議, 並且有發言權。這一補充不必公布, 已記入會議記錄。]

用德文寫于 1916 年 1 月 23 日和 26 日
(2 月 5 日和 8 日) 之間

載于 1916 年 2 月 29 日“伯爾尼國際
社會主義者委員會。公報”第 3 號

第一次用俄文刊印

根據手稿譯成俄文刊印

在伯尔尼国际群众大会²⁶上的演說

(1916年2月8日)

同志們！欧战逞狂肆虐已經一年零六个月了。战争每拖长一月，每拖长一天，工人群众就更加清楚地知道齐美尔瓦尔得宣言²⁷說的是真理：“保衛祖国”之类的詞句不过是資本家騙人的話。現在人們一天比一天看得更清楚，这是資本家、大強盜的战争，他們所爭的不过是誰能分到更多的脏物，掠奪更多的国家，蹂躪和奴役更多的民族。

这些話听起来似乎不足信，特别是对于瑞士的同志們，然而这些话都是确实的，就在我們俄国，不但血腥的沙皇政府，不但資本家，而且有一部分所謂的或过去的社会主义者，也說俄国进行的是“自衛战争”，也說俄国反对的不过是德国的侵略。其实全世界都知道，沙皇政府压迫俄国境内其他民族的一亿多人民，已經有好几十年，俄国对中国、波斯、阿尔明尼亚和加里西亚实行掠奪政策，也已經有好几十年了。無論是俄国、德国或其他任何一个強国，都沒有权利談什么“自衛战争”；一切強国所进行的都是帝国主义的、資本主义的战争，都是强盜性的战争和压迫弱小民族及其他民族的战争，都是保証資本家利潤的战争，使資本能够以群众遭受的駭人听聞的痛苦和無产階級流出的鮮血換得亿亿万万純金的收入。

4年以前，在1912年11月，当战争日益逼近这一形势已經很

明显的时候，全世界社会主义者的代表在巴塞尔召开了国际社会党人代表大会。那时对于将来的战争是列强之间的、大强盗之间的战争，战争的罪过应当由各强国的政府和资本家阶级承当，已经是无可怀疑的了。全世界的社会主义政党一致通过的巴塞尔宣言，公开说出了这个真理。巴塞尔宣言没有一句话提到“自卫战争”，提到“保卫祖国”。它一无例外地抨击各强国的政府和资产阶级。它公开说，战争是滔天的罪行，工人认为相互射击就是犯罪，战争的惨祸和工人对这种惨祸的愤怒，必然会引起无产阶级革命。

后来战争真正爆发了，大家都看到，巴塞尔宣言对这次战争性质的估计是正确的。但是，社会主义组织和工人组织不是一致地拥护巴塞尔决议，而是发生了分裂。现在我们都看到，世界各国的社会主义组织和工人组织是怎样分成两大阵营的。一小部分人，就是那些领袖、干事、官僚，背叛了社会主义，站到各国政府那一边去了。另一部分人，包括自觉的工人群众，继续聚集力量，为反对战争、实现无产阶级革命而奋斗。

后一部分人的观点也反映在齐美尔瓦尔德宣言里。

在我们俄国，战争一开始，杜马中的工人代表就进行了反对战争和沙皇君主制的坚决的革命斗争。彼得罗夫斯基、巴达也夫、穆拉诺夫、沙果夫、萨莫依洛夫这五个工人代表广泛发出了反对战争的革命号召，努力进行了革命鼓动。沙皇政府下令逮捕了这五个代表，法庭判处他们终身流放西伯利亚。这些俄国工人阶级的领袖已经在西伯利亚受了好几个月的折磨，但是他们的事業并没有被摧毁，全俄自觉的工人正循着同样的方向继续干着他们的工作。

同志們！你們在这里听到了各国代表的关于工人如何进行反战革命斗争的演说。我只想给你们举一个最富强的国家即美国的例子。这个国家的资本家现在由于欧战而得到巨大的利润。他们也鼓动战争。他们说，美国也应当准备参战，应当向人民榨取几亿金元来进行新的军备、无穷无尽的军备。美国的一部分社会主义者也响应这种骗人的、罪恶的号召。但是我要把美国社会主义者的最有声望的领袖，美国社会党的共和国总统候选人尤金·德布兹同志写的一段话念给你们听一听。

在1915年9月11日的美国“向理智呼吁报”(《Appeal to Reason》)²⁸上，他说道：“我不是资本家的士兵，而是无产阶级的革命者，我不是财阀的正规军的士兵，而是人民的非正规军的战士。我决拒绝为资本家阶级的利益作战。我反对任何战争，但是有一种战争我是衷心拥护的，那就是为了社会革命而进行的世界战争。如果统治阶级迫不及待地需要战争，那末我决心参加这种战争。”

美国工人热爱的领袖、美国的倍倍尔——尤金·德布兹同志就是这样向美国工人讲的。

同志們，这又向我们表明，世界各国的工人阶级真正在集聚力量。人民在战争中所受的灾难和痛苦是难以设想的，但是我们不应当、也没有任何理由对将来悲观失望。

在战争中阵亡的和由于战争而丧生的几百万人并不是白白地牺牲的。千百万人在忍饥挨饿，千百万人在战壕中牺牲性命，他们不但在受苦受难，而且也在聚集力量，思索大战的真正原因，锻炼自己的意志，他们对革命有了愈来愈清楚的認識。在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里，群众的不满愈来愈增长，風潮、罢工、游行示威和抗議战争的运动愈来愈激烈。对于我们这就是保证，保证反对资本主义

的無产階級革命一定会在欧战以后到来。

載于 1916 年 2 月 9 日

“伯尔尼哨兵报”第 33 号

1929 年第一次用俄文刊于“列宁全集”

第 2 版和第 3 版第 19 卷

根据“伯尔尼哨兵报”原文(德文)

譯成俄文刊印

論法国反对派的任务

(給薩發罗夫同志的信)

1916年2月10日

亲爱的同志！关于你被法国驅逐出境，甚至沙文主义报纸“战斗报”(《La Bataille》)²⁹也提出了抗議，然而这家报纸并不想說明事情真相，指出你是因为同情反对派而被驅逐出境的。你这次被驅逐，再一次提醒我要注意法国反对派的状况和任务这个难以解决的問題。

我在齐美尔瓦尔得代表會議上見到布尔德朗和梅尔黑姆，听过他們的报告，在报纸上看到过他們的活動情况。在我看来，他們对無产階級事業的忠誠，是不容有絲毫怀疑的。然而很明显，他們的策略是錯誤的。他們两人最害怕分裂。凡是可能造成法国社会党或工会分裂、第二国际分裂的，凡是可能促成第三国际建立的任何一步驟也不要采取，任何一句話也不要講，——这就是布尔德朗和梅尔黑姆的口号。

然而，全世界的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的分裂已經成为事实。工人階級对于战争有两种不可調和的策略和政策。閉眼不看这个事实是可笑的。企圖把不可調和的东西調和起来，那就是使自己的全部工作無能为力。在德国，連李卜克內西的同志 Otto Rühle³⁰議員也公开承認德国党的分裂是不可避免的，因为現在党内多数

派、正式的“上層分子”已經站到資產階級那邊去了。所謂“中派”或“泥潭派”(le marais)的代表考茨基和“前進報”(《Vorwärts》)³⁰，對呂勒和分裂的異議，只不過是假心假意，無論如何不能說這是“善意”的。考茨基和“前進報”不能反駁甚至不想反駁這一事實，即德國黨內多數派實際上正在實行資產階級的政策。同這種多數派講團結，對工人階級是有害的。實行這種團結，就是使工人階級服從“本”國資產階級，就是使國際工人階級分裂。其實呂勒說得對：德國存在着兩個黨。一個是正式的黨，它實行資產階級政策。另一個是少數派，它秘密印發傳單和組織遊行示威，等等。全世界的情況也是這樣，像德國的考茨基、法國的龍格、俄國的馬爾托夫和托洛茨基這些軟弱無能的外交家或“泥潭派”都使工人運動受到極大的損害，因為他們主張虛假的團結，從而妨礙了已經成熟的、迫切需要的各國反對派的聯合，妨礙了第三國際的建立。在英國，連《Labour Leader》^①這樣穩健的報紙也登載了 Russel Williams^②的信件，指出必須同工會“領袖”和“出賣”工人階級利益的“工黨”(Labour Party)分裂。而“獨立工黨”(Independent Labour Party)的許多黨員也在報刊上聲明贊同 Russel Williams 的意見。在俄國，現在甚至連“調解人”托洛茨基也不得不承認同“愛國主義者”，也就是說同認為工人應當加入軍事工業委員會的“組織委員會”(組委會)這伙人實行分裂，是不可避免的。只是由於死愛面子，托洛茨基才仍舊擁護同齊赫澤杜馬黨團實行“團結”，而杜馬黨團却是“愛國主義者”和“組委會”的最忠實的朋友，是他們的掩護者和

① 奧托·呂勒。——編者注

② “工人領袖報”。——編者注

③ 威爾斯·羅素。——編者注

辯護士。

甚至在美国，实际上也完全分裂了。因为那里有一部分社会党人贊成扩充军队、“准备”（《preparadness》）和“战争”。而另一部分人，包括最有威望的工人领袖，社会党共和国总统候选人尤金·德布茲(Debs)，却在鼓吹国内战争，反对民族战争！

請看一下布尔德朗和梅尔黑姆自己的行动吧！他們口头上反对分裂。可是，請讀一讀布尔德朗提交法国社会党³¹代表大会的決議案吧！在这項決議案中竟要求社会党人退出內閣！！決議案公然《désapprouve》и С. А. Р. и Г. Р. (С. А. Р. = Com. Adm. Perm., Г. Р. = Groupe Parlem.)[⊖]!!! 显而易见，通过这項決議，無論社会党或工团分子都会分裂，因为列諾得尔、桑巴、Jouhaux et C[⊖]是决不能容忍这样做的。

Bourderon 和 Meerheim[⊖] 也有齐美尔瓦尔得代表會議多数派那样的錯誤、弱点和畏惧心理。一方面，多数派在自己的宣言中間接号召进行革命斗争，但是害怕直接說出这一点。一方面，他們写道，各国資本家在撒謊，大談其在这次战争中“保衛祖国”。另一方面，多数派又害怕說出反正每个有头脑的工人都会說出的一目了然的真相，即撒謊的不仅有資本家，而且还有列諾得尔、桑巴、龙格、Hyndmann、Kautsky、Plechanoff et C[⊖]!! 現在，齐美尔瓦尔得代表會議多数派又要同王德威尔得、胡斯曼、列諾得尔这伙人妥协了。这对工人阶级是有害的。“齐美尔瓦尔得左派”做得对，

⊖ “否認”行政常务委员会和議會党团。——編者注

⊖ 茹奧及其同伙。——編者注

⊖ 布尔德朗和梅尔黑姆。——編者注

⊖ 海德門、考茨基、普列汉諾夫及其同伙。——編者注

他們把這個真相公開地告訴了工人。

請看，les socialistes-chauvins^① 多么虛偽；他們在法國，夸奖德國的《minorité》^②，在德國又夸奖法國的！！

要是法國反對派直接地、大胆地、公開地向全世界聲明：我們只同德國反對派，只同呂勒及其同志團結一致，那該有多么巨大的意義！！只和那些大胆地同公開的和暗藏的社會沙文主義（socialisme chauvin），即這次戰爭中一切“祖國保衛者”決裂的人團結一致！！我們並不怕同那些把保護殖民地譽為“保衛祖國”的法國“愛國主義者”分裂，而且我們號召各國社會黨人同工團分子實行這種分裂！！我們向 Otto Rühle 和李卜克內西，向他們和僅僅是他們的同志伸出了手，我們痛斥法國、德國的《majorité》^③ 和《le marais》^④。我們宣布在這次戰爭中痛斥“保衛祖國”這類謊言的，鼓吹和準備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全世界社會主義者的偉大國際聯盟！

這個號召有巨大的意義，它會把偽君子驅散，把國際範圍內的騙局揭穿，並大大促使全世界真正忠於國際主義的工人互相接近。

在法國，無政府主義者的言論常常造成許多危害。可是，現在無政府愛國主義者、無政府主義-chauvins，如克魯泡特金、Grave、Cornelissen^⑤ 以及 de la 《Bataille Chauviniste》^⑥ 的其他騎士等，却會幫助很多很多工人認清無政府主義者的言論。打倒社會愛國

① 社會沙文主義者。——編者注

② “少數派”。——編者注

③ “多數派”。——編者注

④ “泥潭派”。——編者注

⑤ 格拉弗、柯爾涅利遜。——編者注

⑥ “沙文主義戰鬥”。——編者注

主義者和社会-chauvins! 同时也“打倒無政府爱国主义者”和無政府-chauvins! 这种呼吁一定会在法国工人心中得到反应。不要像無政府主義者那样空談革命, 而应当进行长期的、認真的、頑强的、坚决的和系統的工作, 处处在工人中間建立秘密組織, 散發自由的即秘密的書报杂志, 准备反对本国政府的群众运动。这才是各国工人階級所需要的!

認为“法国人不能”經常进行秘密工作, 那是不对的。不对! 法国人很快学会了隱蔽在战壕里。他們也会很快学会在新的条件下进行秘密工作和不断准备群众的革命运动。我相信法国的革命無产階級。他們也一定会把法国反对派推向前进。

祝你好

你的 列 寧

P. S. ⊕ 建議法国同志們将此信譯文(全部譯文)用单頁出版。³²

1916 年用法文印成单頁

1924 年第一次用俄文載於

“無产階級革命”杂志第 4 期

(总第 27 期)

接手稿刊印

⊕ Postscriptum —— 附言。 —— 編者注

組織委員會和齊赫澤黨團 有沒有自己的路綫？

組委會分子在自己的文集³³里，更明確地是在自己給國際社會主義者委員會的報告里（公報第2號，1915年11月27日用德文出版）³⁴，硬要讀者相信齊赫澤黨團³⁵和組織委員會有自己的路綫，並且這個路綫完全是國際主義的，與“我們的事業”雜誌的路綫不一致。這真是彌天大謊。第一、自組織委員會組成以後（1912年8月），許多年來，我們看見齊赫澤黨團和組織委員會同“我們的曙光”派在一切主要問題上，從政治上來說都是完全一致的，政治上的合作也是極為密切的，而且只有我們的曙光派才在群眾中進行了系統的工作（如辦取消派的日報等）。要證明這麼親密的“朋友”有什麼重大的分歧，不能光講空話，必須擺出重要的事實。而這樣的事實却一個也沒有。第二、在1912—1914年這幾年間，齊赫澤黨團和組織委員會給“我們的曙光”雜誌當走狗，有系統地替它的政策辯護，這是彼得堡和其他地區的工人都很清楚的，而且他們一次也沒有影響過“我們的曙光”雜誌和“光綫報”³⁶等改變它們的政策。

在與群眾有關的政策上，如反“罷工熱”，選舉最大的工會（五金工人等）和最重要的保險機關（全俄保險會）的領導人等，“我們的曙光”派，而且只有“我們的曙光”派才是獨立行動的，組織委員

会和齐赫澤党团不过是給它帮忙，全心全意为它服务。第三、在一年半的战争中，沒有一件事实能够証明齐赫澤党团和組織委员会同“我們的曙光”杂志几年来形成的这种关系有所改变。可是，相反的事实倒是有的，甚至在可以公开的事实（这类事实多半是不应当公开的）中也有这样的事实。一件是：無論組織委员会或齐赫澤党团都沒有在俄国發表过任何反对“我們的事業”杂志的政策の言論，而要真正改变“我們的事業”杂志的政策，那就不仅需要言論，而且需要进行长期的、胜利的斗争，因为它是一个靠自由派来养活的、在政治上有影响的組織。而組織委员会和齐赫澤党团不过是政治裝飾品。一件是：完全执行“我們的事業”杂志的政策の“晨报”和“工人晨报”³⁷，甚至公开強調自己在政治上同齐赫澤党团相近，并且代表整个八月联盟發言。一件是：齐赫澤党团为“工人晨报”募捐。一件是：整个齐赫澤党团开始給薩馬拉社会沙文主义的报纸“我們的呼声报”撰稿（見第 17 号）。一件是：齐赫澤党团最著名的人物契恒凱里在“护国派”或社会沙文主义者的刊物“現代世界”杂志³⁸上，即普列汉諾夫和阿列克辛斯基先生的杂志上所發表的原則性声明，同普列汉諾夫、“我們的事業”杂志、考茨基、阿克雪里罗得是完全一致的。我們早就引用过契恒凱里的这个声明，而組委会分子在自己的文集里，托洛茨基在“我們的言論报”³⁹上，虽然替齐赫澤党团辯护和吹嘘，却没有替这个声明辯护。第四、那些代表整个齐赫澤党团和整个組織委员会的露骨的政治言論，証实了我們的看法。現在我們来看看組織委员会的文集所轉載的最重要的言論：齐赫澤之流的宣言和組織委员会的传单。这两个文件的观点是一样的，立場也是一样的。因为組織委员会是反对我們党的“八月联盟”的最高领导机关，又因为組織委员会出

版的是秘密传单，也就是說，可以比齊赫澤在杜馬里講得自由一些、露骨一些，所以，我們要分析的正是这个传单。

很有意思的是这个传单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报纸——伯尔尼的社会民主党的报纸上已經引起了爭論。这个报纸的一个撰稿人把这个传单叫作“爱国主义的传单”。組織委員會国外書記处生了气，刊載了一篇反駁文章，說連“我們国外書記处也犯了这种爱国主义的罪”，并且把传单的全部德文譯文交給該报編輯部，請它評判。应当指出，这个編輯部分明是袒護組織委員會，替它吹噓的。而这个袒護組織委員會的編輯部又是怎样說的呢？

編輯部說(第 250 号)：“我們已經讀过組織委員會的传单了，应当承認：原文無疑会引起誤解，使人觉得全文含有一种可能为写传单的人所反对的意思。”

为什么組委會分子請該报編輯部評判，而又把該报編輯部的这个評論轉載在自己的文集里呢？因为这是組織委員會的朋友的評論，这些朋友曾經公开表示不替組織委員會辯护！評論写得彬彬有礼、有一种外交上的客气味道，这特別清楚地表明編輯部想給阿克雪里羅得和馬尔托夫講几句“好听的話”。原来，最“好听的話”是这样的：“可能(仅仅是“可能”而已)組織委員會所說的不是它所想說的；但是它所說的‘無疑会引起誤解’”！！

我們懇請讀者看看“崩得小报”(第 9 号)轉載的組織委員會的传单。凡是仔細讀过这份传单的人，都会看出几个简单明了的事实：(1)传单对于这次战争中各种护国主义的做法，沒有在原則上駁斥一个字；(2)传单里絕對沒有任何东西是“护国派”或“社会沙文主义者”原則上不能接受的；(3)传单里有許多詞句和“护国主义”論調完全相同：“無产階級对于即将到来的毀灭，不能漠不关

心”(这和“工人晨报”第2号上的对于“拯救国家于毁灭”，“不应当漠不关心”，几乎一字不差)；“無产階級对本国的自衛有切身的关系”；“全民革命”应当把国家“从外来的毁灭中”拯救出来，等等。誰要是真正敌視社会沙文主义，就不应当說这种空話，而应当說，地主、沙皇、資产階級在撒謊，把保持大俄罗斯人对波兰的压迫并强制地留在俄国版圖內叫作自衛；——他們想用拯救“国家”于毁灭的詞句来掩飾“挽救”大国特权的企圖，使無产階級放弃反对国际資产階級的任务。一方面認為交战国的無产階級在这次掠夺性的帝国主义战争必須建立国际团結，而同时又講“拯救”这些国家之一“于毁灭”，这就是口是心非，这就是把自己所說的話变成最空洞的、虛伪的詞句。因为这就是使無产階級的策略取决于当前該国的軍事状况，既然如此，那末法国社会沙文主义者帮助“拯救”奥地利和土耳其“免于毁灭”也是对的了。

組織委员会国外書記处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报纸(伯尔尼的报纸)上还有一个詭辯，这个詭辯十分無耻，十分笨拙，是专门为了爭取德国人“捏造的”，所以組委会分子也很懂事地沒有拿到俄国讀者面前来重复。

他們用一种义憤填膺的語气向德国人写道：“如果向無产階級指出革命是拯救国家于灭亡的唯一手段，就是爱国主义”，那末我們就是这样的爱国主义者，“我們倒很希望第二国际在每个社会主义政党里，都有更多的‘爱国主义者’；我們相信李卜克內西、罗莎·卢森堡、梅尔黑姆如果能看到周围有更多的‘爱国主义者’对德国和法国的工人散發这样的传单，将会非常滿意”。

这也是騙子手法，五个書記知道得很清楚，在走向社会主义革命的法国和德国，一点資产階級革命性的影子也沒有，一点力求

进行革命以战胜敌人的资产阶级社会运动的影子也没有。而在俄国，恰恰因为俄国正在走向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样的运动明明是存在的。五个書記用可笑的詭辯欺騙德國人：在俄国，組織委員會和齊赫澤之流不可能是革命沙文主义者，因为在欧洲，把革命性同沙文主义結合起来，那簡直是荒唐！

是的，在欧洲这是荒唐的。而在俄国却是事实。你們可以責备“号召派”⁴⁰是很糟糕的资产阶级革命者，但是他們按自己的方式把沙文主义同革命性結合起来了，这是你們不能否認的。俄国民粹主义者的七月會議⁴¹、“我們的事業”杂志和“工人晨报”在这方面完全站在“号召派”的立場上，他們也把沙文主义同革命性結合起来了。

齊赫澤黨團在自己的宣言里（組織委員會文集第141—143頁）也采取了同樣的立場。齊赫澤也講过一些关于“毀灭的危險”这种沙文主义的空話，如果說，他承認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質，贊成“不割地的和平”、“整个国际無产阶级的共同任务”、“为和平而斗争”等等，那末，“工人晨报”也是这样講的，俄国民粹主义者一小资产阶级也承認这一点。在組織委員會那本文集的第146頁上，可以看到小资产阶级的民粹主义者也承認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質，主张“不割地的和平”，認為社会主义者（民粹主义者同“工人晨报”一样，也想冒充社会主义者）必須“尽快地恢复社会主义組織的国际团结，以便終止战争”等。小资产阶级民粹主义者所講的这些空話，是用来掩飾自己直接提出的“民族防御”的口号的，而齊赫澤和組織委員會同“工人晨报”一样，則把这个口号叫作“拯救国家于毁灭”！！

結果，無論齊赫澤或組織委員會都講了許多毫不負責任的、对

号召派和我們的事業派的实际政策毫無妨碍的革命詞句，而关于这种政策却一言不發。对于参加軍事工業委员会⁴²，他們总是用各种方式加以支持。

先生們，少講一些革命的空話吧，对今天的实际政策講得更清楚一些，更直接一些，更老实一些吧。你們答应作革命者，現在你們却帮助沙文主义者、資產階級、沙皇政府，你們不是直接主张工人参加軍事工業委员会，就是用沉默来庇护参加者，不同他們进行斗争。

馬尔托夫可以随便耍花样。托洛茨基可以大喊我們鬧宗派，以此（屠格涅夫的……主人公的旧藥方⁴³！）来掩飾自己的当然是非派別性的“指望”；齐赫澤党团某某人会“同意”托洛茨基的意見。他还發誓說自己是左派，主张国际主义等等。事实总是事实。不但在組織委员会和齐赫澤党团之間，就是在这两个机构和“工人晨报”或“号召报”之間，在政治上也沒有絲毫重大的差別。

因此，他們实际上勾結在一起，同非党工人和民粹主义者一起，反对我們党，拥护要工人参加軍事工業委员会的資產階級的政策。“国外書記处的書記們”在口头上声明和發誓，說他們“不同意”，其实这不过是一句空話，並沒有触动群众的实际政策，正像休特古姆、列金、大衛等人發誓說他們“贊成和平”、“反对战争”一样，这并不能使他們肃清他們的沙文主义。

載于1916年2月18日

“社会民主党人报”第50号

按“社会民主党人报”原文刊印

論俄国当前的口号：不割地的 和平和波兰的独立

“和平主义和抽象的和平宣传，是愚弄工人阶级的形式之一……在今天，宣传和平时而不同时号召群众采取革命行动，这只能散播幻想，使无产阶级相信资产阶级的仁慈，使它成为交战国秘密外交的玩具。”我们党的伯尔尼决议就是这样写的（见“社会民主党人报”⁴⁴第40号和“社会主义与战争”）[⊖]。

有许多人（在俄国侨民中间，而不是在俄国工人中间）反对我们对和平问题的提法，他们从来没有花一点功夫去分析一下这些道理。正是由于我国事件的转变，今天这些在理论上无可反駁的道理才在实践上得到了特别清楚的证实。

大家知道，在思想上受到组织委员会支持的彼得堡合法取消派的报纸“工人晨报”，在创刊号上就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的“护国”立场。它刊载了彼得堡和莫斯科社会沙文主义者的两个“护国”宣言。顺便指出，在这两个宣言里，表现了“不割地的和平”的思想，而“工人晨报”第2号还特别在前面提出这个口号，并加上着重号，称它为“保证国家走出绝境的方针”。他们说，有人说我们是沙文主义者，这是何等的诽谤呵！我们完全承认“不割地的和平”

⊖ 见“列宁全集”第4版21卷第141页和第286页。——编者注

这个最“民主”的、甚至是“真正社会主义的”口号！

毫無疑問，暴君尼古拉的忠臣現在提出这样的口号，对于尼古拉自然是很有利的。沙皇政府依靠地主和資本家，派兵去掠夺和奴役加里西亚（更不必說瓜分土耳其的条約了）。同样掠夺成性的德帝国主义者，派兵打退了俄国强盜，不仅把他們赶出了加里西亚，而且赶出了“俄国的波兰”。（为了两个集团的利益，成千上万的俄国和德国的工人和农民死在戰場上。）这样，“不割地的和平”这个口号便成了沙皇政府“秘密外交的”奇妙“玩具”：他們說，我們被欺侮了，被掠夺了，波兰从我們这里被夺走了，我們反对兼并！

充当沙皇政府走狗这个角色，多么合乎“工人晨报”的社会沙文主义者的“胃口”，这从“工人晨报”創刊号上的“波兰侨民”这篇文章中看得特別清楚。我們在这篇文章中讀到：“由于过去几个月的战争，在波兰广大人民的意識中产生了迫切要求独立的願望。”当然，在战前这种願望是沒有的！！“在波兰广大阶层的民主派的社会意識中，要求波兰民族独立的群众（显然印錯了，应当是：主张，思想等）胜利了”……“在俄国民主派的面前，不断地、十分清楚地提出了波兰的問題”……“俄国自由派”拒絕對“波兰独立”的难题作簡單的答复……

当然啦！暴君尼古拉、赫沃斯托夫、切尔諾科夫、米留可夫之流現在完全贊成波兰独立，衷心地贊成波兰独立，因为这个口号实际上等于打败从俄国夺走波兰的德国的口号。請注意，“斯托雷平工党”⁴⁵的創立者在战前完全反对民族自决的口号，反对波兰有分离的自由，为了达到替沙皇压迫波兰辯护这一高尚的目的，还出版了机会主义者謝姆柯夫斯基的著作。而今天当波兰从俄国手里被夺走了的时候，他們又贊成波兰的“独立”了（从德国独立出

去，这一点他們却审慎地避而不談……）。

社会沙文主义者先生們，你們騙不了俄国的有觉悟的工人！你們在1915年提出波兰独立和不割地的和平这个“十月党人的”口号⁴⁶，实际上是向沙皇政府献媚，沙皇政府正是在今天，在1916年2月，才需要用“不割地的和平”（把兴登堡赶出波兰）和波兰的独立（不依附于威廉，而依附于尼古拉二世）这样一些好听的話来掩飾它进行的战争。

沒有忘記自己綱領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談的就不同。他要說：俄国民主派——首先是而且主要是指的大俄罗斯的民主派，因为只有这个民主派才在俄国始終享有語言的自由——無疑占了便宜，因为俄国現在沒有压迫波兰，沒有把波兰强制地留在自己的版圖內。俄国無产階級無疑处于有利的地位，因为它現在沒有压迫任何一个它昨天还帮助压迫过的民族。德国民主派無疑吃了亏，因为只要德国無产階級还在容忍德国压迫波兰，它就仍然处于一种比奴隶还坏的地位，处于帮助奴役其他民族的打手地位。占了便宜的無疑地只是德国的容克和資產者。

由此可以得出結論說：当今天在俄国有人提出“不割地的和平”和“波兰独立”的口号时，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应当揭穿这是沙皇政府在欺騙人民。因为在当前的情况下，提出这两个口号就是企圖繼續打仗，并且为这种企圖辯护。我們应当說：决不为了波兰去打仗！俄国人民不願再作波兰的压迫者！

怎样帮助波兰从德国压迫下解放出来呢？难道我們不應該帮助嗎？当然應該，但是，只不應該用沙皇俄国或資產階級俄国甚至資產階級共和的俄国进行的帝国主义战争来帮助，而應該用德国革命的無产階級的支持来帮助，用那些同休特古姆分子、考茨基

之流的反革命工党作斗争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员的支持来帮助。不很久以前，考茨基特别清楚地证明了自己的反革命性：1915年11月26日，他把街头的示威游行叫作“冒险”（就像司徒卢威在1905年1月9日前说俄国没有革命的人民一样）。而1915年11月30日在柏林示威的女工就有一万人之多！

无论是谁，只要他不是像休特古姆、普列汉诺夫、考茨基那样虚伪地，而是真诚地想承认民族自由，承认民族自决权，那就应当反对为了压迫波兰而打仗，并且主张现在受俄国压迫的乌克兰、芬兰等民族有从俄国分离出去的自由。无论是谁，只要他不愿意实际上作一个社会沙文主义者，那就应当完全支持各国社会主义政党内那些直接地、积极地立即为本国无产阶级革命而工作的人。

不要“不割地的和平”，要把和平给茅屋，把战争给宫廷，把和平给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把战争给资产阶级！

载于1916年2月29日

“社会民主党人报”第51号

按“社会民主党人报”原文刊印

威廉·科尔布和 格奥尔基·普列汉诺夫

德国公开的机会主义者威廉·科尔布的小册子“处在十字路口上的社会民主党”（1915年卡尔斯卢厄版）正好是在普列汉诺夫的文集“战争”出版之后问世的。考茨基分子鲁道夫·希法亭在《Neue Zeit》^①上对科尔布的回答十分软弱，对于主要问题默不作声，只是哭哭啼啼，抱怨科尔布真实地说出了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统一不过是一种“纯形式上的”统一。

谁想认真思索一下第二国际破产的意义，我们劝他去比较一下科尔布和普列汉诺夫的思想立场。他们两个人（同考茨基一样）在基本问题上是一致的：反对和讥笑借这次战争的机会采取革命行动的思想；他们两个人都用普列汉诺夫分子爱用的字眼“失败主义”来责备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普列汉诺夫把借这次战争的机会进行革命的思想叫作“可笑的空想”，申斥“革命的高调”。科尔布乱骂“革命的空谈”、“革命的幻想”、“激进派（Radikalinski）—歇斯底里病患者”、“宗派主义”等等。科尔布和普列汉诺夫在主要问题上是一致的，他们两个人都反对革命。至于科尔布完全反对革命，而普列汉诺夫和考茨基“完全赞成”革命，这不过是色彩上、文字上的差别；实际上普列汉诺夫和考茨基都是科尔布的走狗。

① “新时代”。——编者注

科尔布倒老实一些，这不是說他为人，而是从政治上来看，也就是說，他的立場很徹底，他用不着虛偽。所以他不怕承認真實情況，他說，在他看来，整个国际的罪过就在于有“革命幻想的精神”，發表过对战争的“威胁”言論（拿革命来威胁，普列汉諾夫和科尔布先生！）。科尔布說得对，在資本主义国家摇摇欲墜、“它的存在成了問題”、欧洲各国的社会民主党起来保衛它的时候，还“从原則上来否定”資本主义社会，那是多么的荒謬。对客观革命形势的这番招認是真实的。

科尔布写道：“結果（李卜克內西拥护者的策略的結果）将是德国民族的內部斗争达到沸点，从而在政治上軍事上削弱德国民族”……使“三国協約的帝国主义”得到好处和取得胜利！！机会主义分子所以大發雷霆，反对“失敗主义”，关键就在这里！！

这才真正是整个問題的關鍵。“达到沸点的內部斗争”，也就是国内战争。科尔布說左派的策略会造成这种結果，这說得对；这种策略就是“在軍事上削弱”德国，即希望并促使德国失敗，就是失敗主义，这也对。科尔布只有——只有！——一点不对，就是他不願看到左派这种策略的国际性。在所有交战的国家里，“达到沸点的內部斗争”、帝国主义資產阶级的“軍事力量的削弱”和帝国主义战争的（因此，由此，借此）变为国内战争都是可能的。这才是問題的整个關鍵，我們感謝科尔布的有益的願望、招認和說明，因为一个最徹底的、老实的、公开的革命的敌人这样講，对于向工人揭露普列汉諾夫分子和考茨基分子丑惡的虛偽和可耻的毫無气节是特別有益的。

載于 1916 年 2 月 29 日

“社会民主党人报”第 51 号

按“社会民主党人报”原文刊印

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

(提 綱)

1. 帝国主义、社会主义和 被压迫民族的解放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在各先进国家里，资本的发展已超出了民族国家的范围，使垄断代替了竞争，创造了实现社会主义的一切客观前提。所以，在西欧和美国，现在摆在日程上的是无产阶级为打倒资本主义政府、为剥夺资产阶级而进行革命斗争。帝国主义把群众推向这种斗争，因为它使阶级矛盾大大加剧，使群众的处境无论在经济方面或政治方面都日趋恶化。在经济方面，是托拉斯和物价昂贵；在政治方面，是军国主义的增长、战争的频繁、反动势力的加强以及民族压迫和对殖民地掠夺的加强和扩大。社会主义取得胜利以后，必须实行充分的民主，因此，不但要使各民族完全平等，而且要实现被压迫民族的自决权，也就是政治上的自由分离权。无论在目前、在革命时期或革命胜利以后，社会主义政党如果不用自己的全部行动来证明自己一定要解放被奴役的民族，并且在自由联盟——没有分离自由，自由联盟便是骗人的鬼话——的基础上同它们建立关系，那就是背叛社会主义。

当然，民主制也是一种国家形式，它必然会随着国家的消逝而

消逝，但是，这只有在彻底胜利和巩固了的社会主义过渡到完全的共产主义的时候才能实现。

2. 社会主义革命和争取民主制的斗争

社会主义革命不是一次行动，不是一条战线上的一次战斗，而是充满了剧烈的阶级冲突的整个时代，是在一切战线上，也就是说，在经济和政治的一切问题上的一系列的战斗，这些战斗只有采取剥夺资产阶级的手段才能完成。如果认为争取民主的斗争会使无产阶级脱离社会主义革命，或者挡住、遮住社会主义革命等等，那是根本错误的。恰恰相反，正像不实行充分的民主，社会主义就不能胜利一样，无产阶级不进行全面的彻底的争取民主的革命斗争，就不能造成对资产阶级的胜利。

如果从民主纲领中删去一条，比方说，删去民族自决这一条，借口这一条在帝国主义时代似乎“不能实现”，或者说是一种“梦想”，那同样是错误的。民族自决权在资本主义范围内不能实现的论断，可以从绝对的经济意义上来理解，也可以从相对的政治意义上来理解。

在第一种场合，这个论断在理论上是根本错误的。第一、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如劳动货币或危机的消灭等等，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是不能实现的，如果认为民族自决也不能实现，那是完全不对的。第二、即使只举1905年挪威和瑞典分离的例子，就足以驳倒认为民族自决在这个意义上“不能实现”的论断。第三、如果德国和英国在今天或明天改变一下政治上和战略上的相互关系，则波兰、印度等新国家的形成是完全“能实现的”，否认这一点是可笑的。第

四、財政資本竭力向外扩张，“自由”收买和贿赂最自由的民主共和国的政府以及任何一国、甚至“独立”国的被选出来的官吏。財政資本的統治，也和一般資本的統治一样，并不是政治民主方面的任何改革所能消灭的；而民族自决則完全是属于政治民主方面的。但是財政資本的这种統治，絲毫不能消除政治民主这一階級压迫和階級斗争的更自由、更广泛和更显明的形式的作用。因此，从經濟意义上來說，关于任何一种政治民主要求在資本主义制度下都“不能实现”的一切論断，归結起来，就是在理論上对資本主义同一般政治民主的一般关系和基本关系作了不正确的断定。

在第二种場合，这种論断是不全面和不确切的。因为不单是民族自决权，就是一切根本的政治民主要求，在帝国主义时代也只是不完全地、残缺地而且是以罕見的例外形式（如1905年挪威和瑞典的分离）“实现”的。一切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提出的立即解放殖民地的要求，在資本主义制度下，不經過多次革命也是“不能实现”的。然而，社会民主党并不因此而拒絕为实现这一切要求立即进行最坚决的斗争，因为拒絕这种斗争只有利于资产階級和反动势力；恰恰相反，必須革命地而不是改良地提出并且实现这一切要求；不要局限于资产階級合法的範圍，而要打破这个範圍；不要满足于国会中的發言和口头上的抗議，而要使群众積極地行动起来，扩大和加剧爭取实现任何根本的民主要求的斗争，直到無产階級向资产階級直接进行冲击，也就是說，直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剝夺资产階級。社会主义革命不但可以因大罢工、游行示威、飢民騷动、軍隊起义或殖民地暴动而爆發，并且也可以因德雷福斯案件⁴⁷和薩比林事件⁴⁸之类的任何政治危机，或者因在被压迫民族的分离問題上举行的全民投票等等而爆發。

在帝国主义时代，民族压迫的加剧并不会使社会民主党放弃为争取民族分离自由而进行的“乌托邦的”（像资产阶级所说的那样）斗争，相反地，会使社会民主党加紧利用就在这种基础上发生的冲突，作为群众行动和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发动的导火线。

3. 自决权的意义和它对联邦制的关系

民族自决权从政治意义上来讲，只是一种独立权，即在政治上同压迫民族自由分离的权利。具体说来，这种政治民主要求，就是有鼓动分离的完全自由，就是分离的民族有通过全民投票来解决分离问题的完全自由。因此，这种要求并不等于分离、分散、成立小国家的要求，它只是反对一切民族压迫的彻底表现。一个国家的民主制度同分离的完全自由愈接近，在实际上要求分离的愿望也就愈少，因为无论从经济发展或群众利益来看，大国家的好处是不容置疑的，而且这些好处会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日益增多，承认自决并不等于承认联邦制这个原则。可以坚决反对这个原则而拥护民主集中制，但是，与其存在民族不平等，不如建立联邦制，因为这是实行充分的民主集中制的唯一道路。主张集中制的马克思正是从这种观点出发的，他甚至宁愿爱尔兰和英国结成联邦，而不愿爱尔兰受英国人的暴力支配⁴⁹。

社会主义的目的不只是为了要消灭人类分为许多小国家的现象和各民族间的任何隔离状态，不只是为了要使各民族互相亲近，而且要使各民族融为一体。正因为要达到这个目的，我们一方面应当向群众说明伦纳和鲍威尔的所谓“民族文化自治”⁵⁰这个主张的反动性；另一方面应当要求解放被压迫民族，不是说一些泛泛的、曖昧

的言詞，不是唱一些內容空洞的高調，不是把這個問題“擱到”社会主义的时候再解决，而是明确地規定政綱，并且在政綱中特別估計到压迫民族的社会党人的虛伪和胆怯。正如人类只有經過被压迫階級专政的过渡时期才能达到階級的消灭一样，人类只有經過一切被压迫民族完全解放的过渡时期，即他們有分离自由的过渡时期，才能达到各民族的必然融合。

4. 無产階級对民族自决問題的革命提法

不仅民族自决这个要求，就是我們最低民主綱領中的一切条文，早在 17 和 18 世紀就已經由小資產階級提出来了。而小資產階級到現在还是烏托邦式地提出这一切条文，因為他們看不見民主制度下的階級斗争和这种斗争的加强，而相信“和平的”资本主义。那种欺騙人民的并且为考茨基分子所拥护的在帝国主义时代建立各平等民族和平联盟的烏托邦就是这样的。同这种庸俗的机会主义的烏托邦相反，社会民主党党綱应当提出帝国主义时代基本的、極其重要的和必然發生的問題：民族已經分成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

压迫民族的無产階級不能只用籠統的、千篇一律的、为一切和平主义的資產者所重复的空談去反对兼并和贊成民族平等。对帝国主义資產階級感到特別“不愉快的”問題，即以民族压迫为基础的国界問題，無产階級不能默不作声。無产階級不能不反对把被压迫民族强制地留在某国疆界以內，这也就是說，要为自决权而斗争。無产階級应当要求受“它的”民族压迫的殖民地和民族有政治分离的自由。不这样，無产階級的国际主义就仍然是一句空話，要

想在被壓迫民族的工人和壓迫民族的工人之間達到相互信任或階級團結是不可能的；那些改良派和考茨基派的民族自決的擁護者的假面具就仍然不能被揭穿，他們是閉口不談被“他們本”民族壓迫並被強制地留在“他們本”國內的民族的。

另一方面，被壓迫民族的社會主義者必須特別堅持和實現被壓迫民族的工人和壓迫民族的工人的無條件的（包括組織上的）大團結。否則在資產階級各種詭計、背叛和欺騙下，就不能捍衛住無產階級的獨立政策和它同其他國家無產階級的階級團結。因為被壓迫民族的資產階級經常把民族解放的口號變成欺騙工人的手段；在對內政策上，它利用這些口號去同統治民族的資產階級實行反動的妥協（如在奧地利和俄國的波蘭人同反動勢力勾結起來，壓迫猶太人和烏克蘭人）；在對外政策上，它竭力同相互競爭的帝國主義強國之一相勾結，來實現自己的掠奪目的（如巴爾干小國的政策等等）。

爭取民族自由、反對一個帝國主義強國的鬥爭，在某種情況下可能被另一“大”國利用來達到同一帝國主義的目的，這種情況也很少能使社會民主黨拒絕承認民族自決權，正像資產階級屢次利用共和主義口號來達到政治欺騙和財政掠奪的目的（如拉丁族各國），並不能使社會民主黨人拒絕實行共和主義一樣[⊖]。

⊖ 不用說，如果認為從民族自決權中似乎會得出“保衛祖國”的結論，因而否認民族自決權，那是很可笑的。社會沙文主義者在1914—1916年常常拿每個民主的要求（如民主的共和主義）和反對民族壓迫的主張，為“保衛祖國”辯護，這也是不值一駁的。馬克思主義從某些戰爭中，例如，從歐洲的法國大革命或加里波第戰爭中，得出了承認保衛祖國的結論，可是從1914—1916年的帝國主義戰爭中，又得出了否認保衛祖國的結論；這些結論都是從分析每次戰爭的具體歷史特點，而決不是從什麼“一般原則”和綱領中的某一條文得出來的。

5. 民族問題中的馬克思主义和蒲魯东主义

同小資产階級民主派相反，馬克思認為一切民主要求，毫無例外，都不是絕對的东西，而是資产階級領導的人民群众反对封建制度的历史表現。这些要求中的每一个要求都能成为并且在某种情況下已經成了資产階級欺騙工人的工具。在这方面，把政治民主要求之一，即民族自决拿来同其余的要求相对立，这在理論上是根本不对的。在实际行动中，無产階級只有使自己的爭取一切民主要求（包括建立共和国的要求）的斗争服从自己的推翻資产階級的革命斗争，才能保持自己的独立。

另一方面，同那些借口“为了社会革命”而“否認”民族問題的蒲魯东分子相反，馬克思鑒于各先进国家無产階級的階級斗争利益大于一切，始終把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能自由的⁵¹这个国际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則放在第一位。正是从德国工人革命运动的利益出發，馬克思在1848年要求德国民主派一胜利就宣布和实现受德国人压迫的各民族的自由⁵²。正是从英国工人的革命斗争着想，馬克思在1869年要求爱尔兰同英国分离，他并且补充說：“即使分离以后建立联邦也好”⁵³。馬克思只是由于提出了这样的要求，才真正用国际主义精神教育了英国工人。只有这样，他才能用解决这个历史任务的革命方法来抵制机会主义者，抵制直到今天已經过了半个世紀还没有实现爱尔兰的“改良”的資产階級改良主义。只有这样，馬克思才能駁斥資本辯护人的論調，他們大叫什么小民族的分离自由是烏托邦的、不能实现的，不但經濟集中而且政治集中都是进步的；而馬克思却不是以帝国主义者的理解

来坚持这种集中的进步性的，他坚持各民族不是在暴力的基础上，而是在各国無产者自由联盟的基础上的亲近。只有这样，馬克思才能也在解决民族問題方面，拿群众的革命行动来抵制那种口头承認而且往往是假装承認民族平等和民族自决的态度。1914—1916年的帝国主义战争以及由它所揭露的机会主义者和考茨基分子伪善的奥吉亚斯的牛圈^①，明显地証实了馬克思这种政策的正确性，这种政策应当成为各先进国家的榜样，因为現在每个先进国家都在压迫其他民族^②。

6. 三类国家对民族自决的态度

在这方面，应当分成三类主要国家：

第一、西欧的先进資本主义国家和美国。资产階級进步的民族运动在这里早已結束。这些“大”民族都在压迫殖民地的和本国的其他民族。这些統治民族的無产階級的任务，正像 19 世紀英国無产階級对爱尔兰的任务一样^③。

① 奥吉亚斯的牛圈这个典故，出自希腊神話。据說，希腊奥吉亚斯王有很多牛圈，从不打扫，醜陋不堪。此处指極其卑鄙醜陋的虚伪态度。——譯者注

② 有些人常常借口馬克思对某些民族（如 1848 年的捷克人）的民族运动持否定态度，来否認根据馬克思主义观点承認民族自决的必要性，例如，最近德国的沙文主义者連奇在“鐘声”杂志（«Die Glocke»）⁵⁴ 第 8、9 两期上就是这样的。但这是不对的，因为 1848 年無論从历史上或政治上来說，都有根据把民族分为“反动的”民族和革命民主的民族。馬克思反对前者而拥护后者，这是对的⁵⁵。自决权是一种民主要求，它自然应当服从一般的民主利益。在 1848 年和以后的年代，这些一般利益首先就是同沙皇制度作斗争。

③ 在某些沒有参加 1914—1916 年战争的小国中，如荷兰和瑞士，资产階級竭力利用“民族自决”的口号为参加帝国主义战争进行辯护。这就是促使这些国家

第二、欧洲东部的国家：奥地利，巴尔干国家，尤其是俄国。这里在20世纪资产阶级的民主民族运动才特别发展了起来，民族斗争才特别尖锐了起来。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如果不坚持民族自决权，无论在完成本国资产阶级民主改革方面或帮助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方面的任务都是不能完成的。在这里特别困难和特别重要的任务，就是把压迫民族的工人和被压迫民族的工人的阶级斗争融合起来。

第三、中国，波斯，土耳其等半殖民地国家和一切殖民地，总共达10亿人口。这里资产阶级民主运动一部分刚刚开始，一部分远未结束。社会主义者不但应当要求无条件地、无代价地立即解放殖民地，——这个要求在政治上的表现只能是承认自决权；社会主义者还应当最坚决地支持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的民族解放运动中最革命分子，帮助他们举行起义，如果情况许可，还应当帮助他们进行革命战争，反对压迫他们的帝国主义列强；

7. 社会沙文主义和民族自决

帝国主义时代和1914—1916年的战争，特别提出了在各先进国家反对沙文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任务。在社会沙文主义者中间，

的社会民主党否认自决的原因之一。有人用不正确的理由来拥护资产阶级的正确政策：否认在帝国主义战争中“保卫祖国”。结果在理论上歪曲了马克思主义，而在实践中表现了一种小民族的狭隘性，忘记了被“大国”民族奴役的各民族的亿万居民。果特同志在他的“帝国主义、战争和社会民主党”这本出色的小册子中，不正确地否认了民族自决的原则，但是他正确地运用了这个原则，因为他要求荷属印度立即实行“政治的和民族的独立”，并且揭露了拒绝提出这个要求和为这个要求而斗争的荷兰机会主义者。

也就是說，在那些把“保衛祖國”這個概念应用于反動的帝國主義戰爭并以此粉飾這場戰爭的機會主義者和考茨基分子中間，在民族自決問題上有兩種主要色彩。

一方面，我們看到，相當露骨的資產階級奴仆借口帝國主義和政治集中的進步性而贊成兼併，否認那種所謂烏托邦的、夢想的、小資產階級的等等民族自決權。屬於這類人的，在德國有庫諾夫、帕爾烏斯和極端機會主義者；在英國有一部分費邊社分子和工聯領袖；在俄國有機會主義者謝姆柯夫斯基、李普曼、尤爾凱維奇等。

另一方面，我們看到，考茨基分子，其中也包括王德威爾得、列諾得爾及英法等國的許多和平主義者，他們主張同前一类人講統一，并在實際上完全附和他們，而擁護自決權純粹是口頭上的和虛假的，因為他們認為要求政治分離自由是“過分的”（《Zu viel verlangt》，見 Kautsky 在 1915 年 5 月 21 日《Neue Zeit》[⊙]上所用的字眼），他們沒有堅持的正是壓迫民族的社會主義者必須採取革命的策略；相反地，却抹殺他們的革命義務，為他們的機會主義辯護，使他們易于欺騙人民，對於把沒有充分權利的民族強制地留在本國版圖內的國家的疆界問題，等等，却迴避不談。

這兩類人都是機會主義者，他們出賣了馬克思主義，喪失了理解馬克思用愛爾蘭的例子說明的那種策略的理論上的意義和實踐上的迫切性的任何能力。

至于特地講到兼併，這個問題由于戰爭而来得特別迫切了。但是，什麼是兼併呢？不難相信，反對兼併的抗議，或者歸結于承認民族自決，或者是基于維持 status quo（現狀）和敵視一切暴力、

⊙ 考茨基在“新時代”上。——編者注

甚至革命暴力的和平主义的言詞。这种言詞根本是虛伪的，同馬克思主义不相容的。

8. 無产階級在最近将来的具体任务

社会主义革命可能在最近的将来爆發。在这种情况下，無产階級所面临的刻不容緩的任务，就是夺取政权、剝夺銀行和实行其他专政措施。資产階級，特别是費边社分子和考茨基分子类型的知識分子，在这种时机一定会千方百計地打乱和阻止革命，硬要革命接受狹隘的民主目的。如果說，在無产者开始冲击資产階級政权基础的情况下，一切純民主要求在某种意义上都会起着阻碍革命的作用，那末，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宣布和实现一切被压迫民族的自由(也就是它們的自决权)是非常迫切需要的，正如 1848 年德国的或 1905 年俄国的資产階級民主革命为获得胜利而迫切需要它一样。

然而，爆發社会主义革命，也許还要經過五年、十年或者更多的時間。此刻提到日程上来的是，用这种精神对群众进行革命教育，使社会沙文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無法留在工人政党内，使他們不能取得 1914—1916 年那样的胜利。社会主义者应当向群众說明：英国社会主义者不要求各殖民地和爱尔兰有分离的自由；德国社会主义者不要求殖民地、亚尔薩斯人、丹麦人和波兰人有分离的自由，不把直接的革命宣传和群众的革命行动也推广到反对民族压迫的斗争方面去，不利用薩比林这样的事件在压迫民族的無产階級中間进行广泛的秘密宣传，举行游行示威和組織群众的革命發动；俄国社会主义者不要求芬兰、波兰、乌克兰等有分离的自由；

如此等等。社会主义者还应当向群众说明，这样的社会主义者的行动，就是沙文主义者的行动，就是沾满了帝国主义保皇派和帝国主义资产阶级血污的走狗的行动。

9. 俄国社会民主党和波兰社会民主党 以及第二国际对自决的态度

俄国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和波兰社会民主党人在自决问题上的意见分歧，早在 1903 年的代表大会上就表现出来了。这次代表大会通过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纲；尽管波兰社会民主党代表团提出抗议，这次代表大会还是把承认民族自决权的第 9 条列到党纲里去了。此后波兰社会民主党人从来没有以党的名义重新提议把第 9 条从我们党纲中删掉，或提议用另外一条来代替这一条。

在俄国，被压迫民族的人口达一亿以上，至少占全国人口的 57%，这些民族多半住在边疆地区，其中一部分民族的文化程度比大俄罗斯人高。在俄国，政治制度的特点就是具有特别野蛮的中世纪性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还没有完成。因此，为了完成自己的民主任务和社会主义任务，俄国社会民主党绝对必须承认受沙皇制度压迫的民族有同俄国自由分离的权利。1912 年 1 月重新恢复的我们的党，在 1913 年通过了一项决议⁵⁶，这项决议肯定了自决权；并且正是根据上述具体意义作了说明。1914—1916 年，不论在资产阶级或机会主义社会主义者（鲁巴诺维奇、普列汉诺夫和“我们的事业”杂志等等）中间，大俄罗斯沙文主义都曾猖獗一时，这就更加促使我们坚持这个要求，并且认为否认这个要求实际上就是支持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和沙皇政府。我们党声明，它对这种反对自

决权的言行决不負任何責任。

波兰社会民主党对民族問題立場的最新說法（波兰社会民主党在齐美尔瓦尔得代表會議上的宣言）包含下列一些思想：

这个宣言痛斥德国政府和其他国家政府把“波兰地区”看作将要到来的賠償賭博中的抵押品，“使波兰人民不能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波兰社会民主党坚决严正地提出抗議，反对把完整的国家重新分成几部分”……它責斥那些讓霍亨索倫王朝担当……“解放被压迫民族的事業”的社会主义者。它深信只有参加这一即将到来的革命国际無产階級的斗争，爭取社会主义的斗争，“才能打碎民族压迫的枷鎖和消灭异国統治的一切形式，保証波兰人民能够在各民族的联盟中作为平等的一員获得全面的自由發展”。宣言認為战争“对波兰人”是“双重的自相残杀的战争”（1915年9月27日“国际社会主义者委员会公报”第2号第15頁；俄譯本見“国际和战争”文集第97頁）。

这些論点實質上同承認民族自决权并没有什么区别，不过它的政治措詞比第二国际大多数的綱領和決議更含糊不清。用确切的政治措詞表达这些思想和确定它們是适用于資本主义制度还是只适用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一切企圖，必将更清楚地表明波兰社会民主党人否認民族自决是錯誤的。

1896年国际社会主义者倫敦代表大会承認民族自决的決議，应当根据上述論点作一些补充，指出：（1）这一要求在帝国主义时代特別迫切；（2）一切政治民主要求（其中包括这一要求）都有政治条件和階級內容；（3）必須分清压迫民族的社会民主党人和被压迫民族的社会民主党人的具体任务；（4）机会主义者和考茨基分子承認自决是不徹底的，純粹是口头上的，因此从政治意义上来

說是虛偽的；(5)社会民主党人，尤其是大國民族（大俄羅斯人、英吉利人、美利堅人、德意志人、法蘭西人、意大利人、日本人等等）的社会民主党人，不堅持受“他們”民族壓迫的那些殖民地和民族有分離的自由，實際上就是附和沙文主義者；(6)必須使為爭取這一要求和一切根本的政治民主要求的鬥爭，服從於推翻資產階級政府和實現社會主義的直接的群眾革命鬥爭。

把某些小民族的观点，尤其是波兰社会民主党人（他們反对波兰資產階級用民族主義的口號去欺騙人民，結果却錯誤地否認自決）的观点搬到“國際”上來，是一個理論上的錯誤，是用蒲魯東主義代替馬克思主義，實際上也是不自覺地支持大國民族的最危險的沙文主義和機會主義。

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中央機關報

“社會民主黨人報”編輯部

附言：在剛剛出版的1916年3月3日的“新時代”上，考茨基公開向最卑鄙醜惡的德國沙文主義的代表奧斯特利茨伸出基督徒的和解之手，否認哈布斯堡王朝的奧地利有被壓迫民族的分離自由，而承認俄國的波蘭有這種自由，是為了向興登堡和威廉二世效犬馬之勞。這是考茨基主義自己揭穿自己的再好不過的事實！

寫於1916年1—2月

載於1916年4月

“先驅”雜誌第2期

1916年10月用俄文刊於

“社會民主黨人文集”第1卷

按“文集”原文刊印

国外組織委員會給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各支部的信

敬爱的同志們！在最近出版的波兰社会民主党反对派的机关报“工人报”⁵⁷第25号（战时出版的第2号）上，刊登了他們的會議（編委会會議）早在1915年6月就通过了的決議。

这些決議清楚地表明：波兰社会民主党这个組織（我們說的不是它的各个成員，其中有些人正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报刊中做着極其有益的工作），又在毫無主見地动摇起来了。

沒有一句話反对考茨基主义，沒有一句話明确而坚决地反对作为社会沙文主义的根源和支柱的机会主义！！这真实用意只是也只能是：准备再一次（像1914年7月3—16日在布魯塞尔⁵⁸那样）玩弄考茨基分子的“把戏”。

現在我們把主要的決議（第4节）全部引出来。下面就是它的原文：

P. S. D.⊖（反对派）的“工人报”第25号（1916年1月）。“1915年6月1—2日举行的編委会會議的決議”。

……第4. 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态度⊖。

⊖ 波兰社会民主党。——編者注

⊖ “工人报”的決議是克魯普斯卡婭从波兰文翻譯过来的。文中加着電号的仿体字是列宁对譯文作的补充和修正。——編者注

“在俄国的革命的波兰社会民主党人認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是一个由最坚决的革命的國際主义分子組成的集体，并使边区組織有权在将来調整对它的組織关系，在政治上支持它，同它采取一致的步調。

由于波兰社会民主党人和中央委员会在主要的和根本的(wytycznych[明确的?])政策条文上有共同的革命立場，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有責任和过去一样，对中央委员会策略中無疑的过火之处(wybujałości [“摆”苗助长，等等。])采取批判的态度。

中央委员会希望着重強調無产階級必須对沙皇政府的掠夺政策采取絕對敌視的态度，这是正确的，同时还提出使俄国失敗的口号，其根据是沙皇政府在歐洲起着特別反动的作用和俄国革命有特殊的意义；但是这样一来，中央委员会就与不容許把無产階級的希望和任务同战争的某种結局联系起来的國際主义的方法發生了矛盾，并且甚至会使德国社会爱国主义者有所借口。

中央委员会指出采取革命行动建立新國際的必要性，反对种种掩飾冲突、把支离破碎的旧國際重新粘起来的企圖，这些都是正确的，但是，它夸大了把自己同一切比較不坚定的、沒有 a priori ⊖ 就贊成它的观点的分子机械地隔离开的作用，忘記了(Przeocza)革命陣營(Obozu)的任务不应当是推开这些分子，而应当是把他們卷入反对社会爱国主义欺詐(騙局)(s załbierstwem)的斗争，用尖銳批評他們思想不坚定的办法，来促进他們激进化的过程。

至于組織委员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①，他們的會議(nara-

⊖ 預先，一开始。——編者注

① 此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是指組織委员会。列寧曾經說过：“俄國有两个社会民主党。我們的党(中央委员会)反对机会主义。第二个党(組織委员会)是机会主义的。”本段后面提到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是指的全党說的。——譯者注

da)認定,它在俄国的主要集团和代表性的刊物(ekspozytura literacka)所持的是社会爱国主义观点,其軟弱的国际主义派沒有力量和勇气同社会爱国主义者决裂,組織委員會中央采取和平主义的觀點;會議認為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对組織委員會的态度只能是批評它的立場,加速它的瓦解(rozklabu),并使組織委員會的那些團結在‘我們的言論报’这个刊物周围的国际主义分子脱离組織委員會,这个报纸为了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間养成(确立)国际主义的革命观点曾做过許多工作。

作为它(組織委員會)的成員之一的崩得就是如此,它的立場更是社会爱国主义、和平主义、亲俄主义、亲德主义各种成分的大杂燴。”

波兰社会民主党人在这里說:他們想同中央委員會“步調一致”。

我們認為,我們絕對有責任告訴中央委員會:中央委員會不应当,也不能够同波兰社会民主党“步調一致”。

为什么?

因为波兰社会民主党一再地,一千零一次地在我們党的根本問題上搖擺不定(或者說是玩花招,客觀上是一个东西)。毫無疑問,現在俄国社会民主运动的根本問題就是分裂問題。

我們在這個問題上是决不妥协的,因为俄国社会民主运动的全部經驗,尤其是1903—1909年,特別是1910—1914年,最主要的是1915—1916年,都使我們深信同組織委員會(或者說,同齐赫澤党团,反正一样)講統一,对工人运动是有害的,只会使工人运动受資產階級支配。

战争和“格沃茲迭夫主义”⁵⁹徹底証明了这一点。

而波兰社会民主党人正是在这个主要的、基本的、根本的問題

上，一再左右搖擺。

戰爭已使他們深信分裂是必要的，他們在布魯塞爾（1914年7月3—16日）的策略是錯誤的。但是，對這一點他們却只字不提。

相反地，他們在決議里加進了一句話。這句話好像是為了辯護和完成他們又“像在布魯塞爾”那樣投到組織委員會或者齊赫澤那方面去的行為而專門編造出來的。這句話是：

……“中央委員會夸大了機械地隔離開來的作用”……

關鍵就在這裡。其餘一切不過是空話而已。如果說，中央委員會“夸大了”分裂的必要性，那顯然波蘭社會民主黨明天或後天就有權利再一次投票贊成新的布魯塞爾—考茨基式的“統一”的決議。

這還是舊梯什科主義⁶⁰，在中央委員會和組織委員會中間玩弄的舊把戲，還是折衷式地（說得輕一點）利用搖擺者立場的舊玩意兒。

不論在一般場合，或在齊美爾瓦爾得左派里，我們決不反對同波蘭社會民主黨一起工作；我們並不替我們的決議當中的每一個字辯護；但是，在這兩個問題上：（1）在俄國應當分裂，（2）在歐洲不同考茨基主義妥協，我們是決不妥協的。我們認為我們有責任提醒所有的同志，波蘭的社會民主黨人是靠不住的，我們要求中央委員會不要再熱中於重複這種“布魯塞爾式”的實驗，不要相信進行和參加這些實驗的人。 致

同志的敬禮

國外組織委員會

寫於1916年2—3月

1937年第一次刊於
“列寧文集”第30卷

按手稿刊印

論“和平綱領”

社会民主党的“和平綱領”問題，是“齐美尔瓦尔得派”第二次国际代表會議⁶¹議程上最重要的問題之一。为了使讀者一下子就能了解这个問題的真正實質，我們引用一下第二国际最有权威的代表人物、各国社会沙文主义者的最有权威的捍衛者考茨基关于这个問題的声明。

“国际并不是战争时期适用的工具；它實質上是和平的工具…… 爭取和平的斗争，和平时期的階級斗争”（1914年11月27日《Neue Zeit》[⊖]）。“所有过去在第二国际范围内拟定的和平綱領，如哥本哈根、倫敦、維也納等綱領，都要求承認民族独立，这是十分公正的。这种要求应当成为我們在当前战争中的指南針”（1915年5月21日的同上杂志）。

这几句話十分清楚地表明了社会沙文主义者实行国际联合和妥协的“綱領”。誰都知道，休特古姆的朋友和拥护者在維也納开过会，他們同休特古姆完全一样，在“保衛祖国”的幌子下捍衛德国帝国主义。而法、英、俄三国的休特古姆分子也在倫敦开过会，他們也在同样的借口下捍衛“本”国的帝国主义。無論倫敦的或維也納的社会沙文主义英雄們的真正政策，都是替参加帝国主义大战

⊖ “新时代”。——編者注

辯護，替為了哪一國資產階級應該在對別國的掠奪中取得優先地位而使法國工人和德國工人進行的互相屠殺辯護。什麼我們“承認”“民族獨立”，或者換句話說，我們承認民族自決，反對兼併等等詞句，都是倫敦和維也納的英雄們用來掩飾這個真正政策，用來欺騙工人的！

像青天白日一樣清楚明白，這種“承認”是令人髮指的謊言，是最無恥的偽善，因為這是替參加戰爭辯護，而這次戰爭從雙方來說，都是為了奴役其他民族，而不是為了這些民族的獨立。現在有權威的考茨基，不但不去揭露、揭穿、痛斥這種偽善；反而加以推崇。在考茨基看來，叛變了社會主義的沙文主義者在竭力欺騙工人的時候所表現的一致，就是第二國際在和平問題上的“一致”和生命力的明証!!! 這種偽善本來是一國的、笨拙的、顯而易見的、觸目的、工人看得清清楚楚的，現在考茨基卻把它變成國際性的、巧妙的、隱蔽的、迷糊工人眼睛的偽善了。對工人運動來說，考茨基的政策比休特古姆的政策更有害百倍、危險百倍，考茨基的偽善也更惡劣百倍。

而且問題決不在於考茨基一個人，因為俄國的阿克雪里羅得、馬爾托夫、齊赫澤，法國的龍格、普雷斯曼，意大利的特雷維斯等人，實際上執行的也是這種政策。這種政策的客觀作用是在於，它在工人階級中間支持資產階級的謊話，在無產階級中間散布資產階級的思想。休特古姆或者普列漢諾夫不過是重複“本”國資本家的資產階級的謊話，這是很明顯的，但是考茨基推崇這種謊話，把它奉為“團結一致的”第二國際的“最高真理”，這就不那麼明顯了。資產階級正是需要工人把休特古姆和普列漢諾夫之流看成是有權威的、一致的、不過一時意見不合的“社會主義者”。資產階級正是

需要用一些关于和平的伪善詞句、沒有任何約束力量的空洞詞句來轉移戰爭時期工人對於革命鬥爭的注意，用“不割地的和平”、民主的和平等等希望來哄騙工人、安慰工人。

胡斯曼增加了仲裁法庭、外交政策的民主化等等，也不過是把考茨基的和平綱領弄得更通俗一點罷了。社會主義者的和平綱領的第一條和根本的一條，應該是揭穿考茨基和平綱領的偽善，指出它的作用在於加強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的影響。

讓我們回憶一下被考茨基分子歪曲了的社會主義學說的基本概念。戰爭就是通過暴力繼續執行交戰國的統治階級早在戰前就已經執行的那一政策。和約也是那一政策的繼續，它記下軍事行動所造成的敵對力量之間的一些變化。戰爭本身並不改變戰前政策發展的方向，只是加速這一發展。

1870—1871年的戰爭是爭取德國的解放和統一的資產階級進步政策（延續了幾十年）的繼續。拿破侖第三被擊敗和被推翻，加速了德國的解放。那個時代的社會主義者提出的不掠奪法國、同共和國簽訂光榮和約的和平綱領是考慮到進步資產階級的這一成就的，這個綱領是對民主資產階級的支持。

你們看，在1914—1916年帝國主義大戰的情況下，還妄想盲目地“重複”這個例子，那是多么滑稽可笑呵。這次戰爭繼續執行的是掠奪世界、爭奪殖民地以及其他等等的腐朽反動的資產階級的政策。這次戰爭是在資產階級關係的基礎上進行的，由於客觀環境的緣故，不可能導致任何民主的“進步”，只會加強和擴大各種壓迫、特別是民族壓迫，不管戰爭結局如何，結果總是這樣。

那次戰爭加速了德國向民主、向資產階級進步方面的發展；推翻了拿破侖第三，統一了德國。這次戰爭只是加速社會主義革命

的發展。當時民主的（資產階級的）和平綱領有它客觀的歷史基礎。而現在却沒有這樣的基礎，關於民主和平的空喊，都是資產階級的謊話，其客觀作用是拉工人離開爭取社會主義的革命鬥爭！當時社會主義者是用民主和平的綱領來支持當時深刻的、出現了幾十年的、民主資產階級性的群眾運動（推翻拿破侖第三，統一德國）。現在社會主義者是用以資產階級關係為基礎的民主和平的綱領來幫助也想拉無產階級離開社會主義革命的資產階級對人民進行欺騙。

正像“保衛祖國”的詞句是用欺騙的辦法向群眾灌輸民族解放戰爭的思想一樣，民主和平的詞句是用迂迴的辦法來偷運同樣的資產階級的謊話！

考茨基分子會這樣反駁：“那就是說，你們沒有任何和平綱領；那就是說，你們反對民主的要求。”他們以為粗心的人看不出在這種反駁後面隱藏着一種偷天換日的勾當，即以非當前的資產階級民主任務來偷換當前的社會主義任務。

我們回答考茨基分子說：“先生們，不對，我們贊成民主的要求，只有我們才不是偽善地為這種要求而鬥爭，因為客觀歷史情況不允許把社會主義革命撇在一邊而提出這種要求。考茨基之流用來幫助資產階級欺騙工人的那個“指南針”就是一個例子。

休特古姆和普列漢諾夫在“和平綱領”上是“一致的”：反對兼併！主張民族獨立！請注意，休特古姆分子說得有理：俄國對波蘭、芬蘭等等的關係是兼併關係。普列漢諾夫也說得有理：德國對亞爾薩斯—洛林、塞爾維亞、比利時等等的關係也是這種關係。不是兩個都有理嗎？於是考茨基就給德國的休特古姆和俄國的休特古姆“調解”!!!

但是，每个头脑清醒的工人一眼就会看出。考茨基和两个休特古姆都是伪君子。这是很清楚的。要作社会主义者，就不能迁就而要揭穿伪善的民主主义。怎样揭穿呢？很简单：压迫民族的代表人物，無論在战前或战时，都要求被他自己的“祖国”压迫的民族有分离的自由，只有这样“承認”民族独立才不是伪善的。

只有这种要求才符合馬克思主义。馬克思曾經从不列顛無产阶级的利益出發，提出过这种要求，他要求給爱尔兰自由，同时認为分离后可能建立联邦，也就是說，要求分离的自由，不是为了造成分散和孤立，而是为了建立更巩固更民主的联系。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只要有被压迫和压迫的民族存在，只要沒有那种能划分革命民主的民族和反动的民族的特殊情况（比如在19世紀40年代就有过这种情况），馬克思对爱尔兰的政策就应当是無产阶级政策的范例。而帝国主义正是这样一个時代：主要的和典型的是把民族划分为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而在欧洲根本不可能把民族划分为反动民族和革命民族。

远在1913年，我們党在关于民族問題的決議里就已經提出，社会民主党人必須在上述意义上使用自決的概念。1914—1916年的战争完全証明我們是对的。

拿發表在1916年3月3日“新时代”上的考茨基的最近一篇文章来看吧。他公然表示同意奥国的偏袒德国的有名的極端沙文主义者、維也納沙文主义“工人报”⁶²的編輯奧斯特利茨的意見，認为不应当“把民族独立和民族主权混为一談”。換句話說，“多民族的国家”里的被压迫民族有民族自治权就够了，不一定要替他們要求政治独立的平等权利。然而就在那篇文章里，考茨基肯定地說，不能証明“波兰人必須隸属于俄国”!!!

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說，虽然俄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但是为了討好兴登堡、休特古姆、奥斯特利茨之流，考茨基承認波兰有从俄国分离出去的自由，而关于波兰人从德国分离出去的自由，却閉口不談!!! 在同一篇文章里，考茨基說法国的社会主义者背弃了国际主义，因为他们想用战争来取得亚尔薩斯—洛林的自由。而关于德国的休特古姆之流背弃了国际主义，不肯要求亚尔薩斯—洛林有从德国分离出去的自由，考茨基却一声不响！

“多民族的国家”这个詞兒，可以用于英国，因为有爱尔兰，也可以用于德国，因为有波兰、亚尔薩斯等地！考茨基用这几个字公开替社会沙文主义辯护。考茨基把“反兼并的斗争”变成了……同沙文主义者“和平的綱領”，变成了惊人的伪善。就在那篇文章里，考茨基重复着犹太什克式的甜言蜜語：“在国界發生变动时，第二国际从来沒有放松征求有关居民的同意。”休特古姆之流要求亚尔薩斯人、比利时人“同意”和德国合并，奥斯特利茨之流要求波兰人和塞爾維亞人“同意”和奥地利合并，这难道还不明显嗎？

而俄国的考茨基分子馬尔托夫呢？他跑到格沃茲迭夫分子的“我們的呼声报”⁶³（薩馬拉）上去証明無可爭辯的真理，即还不能从民族自决这一点得出在帝国主义战争中要保衛祖國的結論。但是，如果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不要求被大俄罗斯人压迫的民族有分离的自由，就是背弃自决的原則，这一点馬尔托夫却一声不响，这就是伸手同阿列克辛斯基分子、格沃茲迭夫分子、波特列索夫分子、普列汉諾夫分子講和！关于这一点，馬尔托夫就是在秘密报刊上也默不作声！馬尔托夫与荷兰人果特爭辯，果特虽然不正确地否認了民族自决的原則，但是正确地运用了这一原則，他要求荷屬印度的政治独立，而且揭穿不同意这一点的荷兰机会主义者是

背叛社会主义。然而同馬尔托夫一起担任書記的謝姆柯夫斯基，在1912—1915年間 独自 在取消派的报刊上談这个問題，否認分离权，根本否認自决，馬尔托夫却不願与他爭辯！

馬尔托夫和考茨基同样伪善地“捍衛”自决，同样隐藏着要同沙文主义者 妥协 的願望，这难道还不明显嗎？

而托洛茨基呢？他拚命 主张 自决，但只是一句空話，因为他不要求被 某一 民族社会主义者的“祖国”压迫的民族有分离的自由；他对考茨基和考茨基分子的伪善 默不作声！

这种“反兼并的斗争”是欺騙工人，而不是 解释 社会民主党人的綱領；是 嘴上敷衍，而不是具体地指出国际主义者的职责；是向民族主义的偏見、民族主义的私利讓步（“我們”大家，資产者和社会沙文主义者，都会从“我們”祖国压迫别的民族得到“好处”！），而不是同民族主义斗争。

社会民主党的“和平綱領”首先应当揭穿資产階級、社会沙文主义者和考茨基分子的和平詞句的伪善性。这是首要的和基本的。否則，我們就是有意無意地作了 欺騙 群众的同謀者。我們的“和平綱領”要求民主派在这个問題上的主要的一条——反对兼并，能够真正实行，而不要流于空談，能够有利于国际主义的宣传，而不是有利于民族主义的欺騙。为此，必須向群众解释，只有每个民族的社会主义者都要求被自己民族压迫的民族有分离的自由，才是真心誠意地反对兼并，也就是說，才是真心誠意地承認自决。——应当提出拒絕偿还国債这个积极的口号，以吸引群众参加革命斗争，并且說明用革命手段爭取“民主的”和平的必要。

最后，我們的“和平綱領”应当說明帝国主义列强和帝国主义資产階級 不可能 給予民主的和平。民主的和平要寻找，要爭

取，——但不是倒退到非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或资本主义制度之下的平等民族的联合这种反动的空想里去寻找和争取，而是要前进到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里面去寻找和争取。在先进的帝国主义国家里，不经过在社会主义的旗帜下进行的革命战斗，任何一个根本的民主要求都不可能比较广泛而巩固地实现。

誰許諾各民族以“民主的”和平，而又不同时宣传社会主义革命，否認爭取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甚至在战争已经进行时还否認这种斗争，誰就是欺騙无产阶级。

载于1916年3月25日

“社会民主党人报”第52号

按“社会民主党人报”原文刊印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 向社会主义者第二次 代表会议提出的提案

(議程第 5、6、7 甲、7 乙、8 等項的提綱是：为結束战争而斗争，对和平問題、議會活动、群众斗争以及召集社会主义国际局會議的态度。)

(I. S. K. ⊕ 宣布由它召集第二次代表会议，邀请各組織討論这些問題并提出自己的提案。下列提綱是我党对这一邀请的答复。)

1. 一切战争都不过是用暴力手段来繼續推行各交战国及其統治階級在战前几年內、有时几十年內所实行的政策；結束任何战争的和約，也只能是計算和記載这次战争的进程和結果所达到的力量的实际变化。

2. 只要目前社会关系，即资产階級社会关系的基础还没有触动，帝国主义战争只能导致帝国主义和約，也就是說，只能巩固、扩大和加重財政資本对弱小民族和国家的压迫。这种財政資本不但在这次战争以前而且在战争过程中，已經有了特別巨大的增长。两个列强集团的资产階級和政府無論在战前或战时所实行的政策

⊕ Internationale Sozialistische Kommission —— 国际社会主义者委员会。

—— 編者注

的客觀內容，都使經濟壓迫、民族奴役和政治反動不斷地加強。因此，資產階級的社会制度既然保存未動，那末結束这次戰爭的和約，不管戰爭結局如何，都不能不使群众的經濟政治地位更加惡化。

如果認為帝国主义戰爭以後有締結民主和約的可能，那在理論上就是對於戰前和戰時實行的政策不去進行歷史的分析，而是作一些庸俗的空談；在實踐上就是欺騙人民群眾，模糊他們的政治意識，掩蓋和粉飾各統治階級準備未來的和約的實際政策，向群眾隱瞞一個主要的道理，即不經過一系列的革命，要實現民主和平是不可能的。

3. 社会主义者并不放棄爭取改良的鬥爭。比如，他們現在也应当在議會內投票贊成對群眾處境的任何改善，哪怕是不大的改善；贊成增加被破壞地區居民的撫恤金；贊成減輕民族壓迫等等。但是，如果鼓吹用改良來解決歷史和實際政治狀況革命式地提出的問題，那簡直是資產階級的欺騙手段。这次戰爭提到日程上來的，正是這樣的問題。這是帝国主义的根基本問題，即資本主义社会本身的存亡問題，也是按照各“大”強國的新的力量對比重新瓜分世界以延遲資本主义破產的問題。這些強國最近几十年来不但發展得異常迅速，而且——特別重要的是——發展得極不平衡。改變社会力量對比而不是只用空談來欺騙群眾的那種實際的政治活動，現在只能表現為下列兩種形式之一：或者是幫助“自己的”民族資產階級掠奪別國（並且把這種幫助叫作“保衛祖國”或“救國”）；或者是幫助無產階級進行社会主义革命，支持並且加強各交戰國群眾中開始產生的不滿情緒，贊助正在開始的罷工、遊行示威等等，擴大和加強這些暫時还很軟弱的群眾革命鬥爭，使它成為無產階級推翻資產階級的總進攻。

Удмуртия 2-го созыва



2-го созыва. Конференция

(Председатель на удмуртском языке: 1,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120, 121, 122, 123, 124, 125, 126, 127, 128, 129, 130, 131, 132, 133, 134, 135, 136, 137, 138, 139, 140, 141, 142, 143, 144, 145, 146, 147, 148, 149, 150, 151, 152, 153, 154, 155, 156, 157, 158, 159, 160, 161, 162, 163, 164, 165, 166, 167, 168, 169, 170, 171, 172, 173, 174, 175, 176, 177, 178, 179, 180, 181, 182, 183, 184, 185, 186, 187, 188, 189, 190, 191, 192, 193, 194, 195, 196, 197, 198, 199, 200, 201, 202, 203, 204, 205, 206, 207, 208, 209, 210, 211, 212, 213, 214, 215, 216, 217, 218, 219, 220, 221, 222, 223, 224, 225, 226, 227, 228, 229, 230, 231, 232, 233, 234, 235, 236, 237, 238, 239, 240, 241, 242, 243, 244, 245, 246, 247, 248, 249, 250, 251, 252, 253, 254, 255, 256, 257, 258, 259, 260, 261, 262, 263, 264, 265, 266, 267, 268, 269, 270, 271, 272, 273, 274, 275, 276, 277, 278, 279, 280, 281, 282, 283, 284, 285, 286, 287, 288, 289, 290, 291, 292, 293, 294, 295, 296, 297, 298, 299, 300, 301, 302, 303, 304, 305, 306, 307, 308, 309, 310, 311, 312, 313, 314, 315, 316, 317, 318, 319, 320, 321, 322, 323, 324, 325, 326, 327, 328, 329, 330, 331, 332, 333, 334, 335, 336, 337, 338, 339, 340, 341, 342, 343, 344, 345, 346, 347, 348, 349, 350, 351, 352, 353, 354, 355, 356, 357, 358, 359, 360, 361, 362, 363, 364, 365, 366, 367, 368, 369, 370, 371, 372, 373, 374, 375, 376, 377, 378, 379, 380, 381, 382, 383, 384, 385, 386, 387, 388, 389, 390, 391, 392, 393, 394, 395, 396, 397, 398, 399, 400, 401, 402, 403, 404, 405, 406, 407, 408, 409, 410, 411, 412, 413, 414, 415, 416, 417, 418, 419, 420, 421, 422, 423, 424, 425, 426, 427, 428, 429, 430, 431, 432, 433, 434, 435, 436, 437, 438, 439, 440, 441, 442, 443, 444, 445, 446, 447, 448, 449, 450, 451, 452, 453, 454, 455, 456, 457, 458, 459, 460, 461, 462, 463, 464, 465, 466, 467, 468, 469, 470, 471, 472, 473, 474, 475, 476, 477, 478, 479, 480, 481, 482, 483, 484, 485, 486, 487, 488, 489, 490, 491, 492, 493, 494, 495, 496, 497, 498, 499, 500, 501, 502, 503, 504, 505, 506, 507, 508, 509, 510, 511, 512, 513, 514, 515, 516, 517, 518, 519, 520, 521, 522, 523, 524, 525, 526, 527, 528, 529, 530, 531, 532, 533, 534, 535, 536, 537, 538, 539, 540, 541, 542, 543, 544, 545, 546, 547, 548, 549, 550, 551, 552, 553, 554, 555, 556, 557, 558, 559, 560, 561, 562, 563, 564, 565, 566, 567, 568, 569, 570, 571, 572, 573, 574, 575, 576, 577, 578, 579, 580, 581, 582, 583, 584, 585, 586, 587, 588, 589, 590, 591, 592, 593, 594, 595, 596, 597, 598, 599, 600, 601, 602, 603, 604, 605, 606, 607, 608, 609, 610, 611, 612, 613, 614, 615, 616, 617, 618, 619, 620, 621, 622, 623, 624, 625, 626, 627, 628, 629, 630, 631, 632, 633, 634, 635, 636, 637, 638, 639, 640, 641, 642, 643, 644, 645, 646, 647, 648, 649, 650, 651, 652, 653, 654, 655, 656, 657, 658, 659, 660, 661, 662, 663, 664, 665, 666, 667, 668, 669, 670, 671, 672, 673, 674, 675, 676, 677, 678, 679, 680, 681, 682, 683, 684, 685, 686, 687, 688, 689, 690, 691, 692, 693, 694, 695, 696, 697, 698, 699, 700, 701, 702, 703, 704, 705, 706, 707, 708, 709, 710, 711, 712, 713, 714, 715, 716, 717, 718, 719, 720, 721, 722, 723, 724, 725, 726, 727, 728, 729, 730, 731, 732, 733, 734, 735, 736, 737, 738, 739, 740, 741, 742, 743, 744, 745, 746, 747, 748, 749, 750, 751, 752, 753, 754, 755, 756, 757, 758, 759, 760, 761, 762, 763, 764, 765, 766, 767, 768, 769, 770, 771, 772, 773, 774, 775, 776, 777, 778, 779, 780, 781, 782, 783, 784, 785, 786, 787, 788, 789, 790, 791, 792, 793, 794, 795, 796, 797, 798, 799, 800, 801, 802, 803, 804, 805, 806, 807, 808, 809, 810, 811, 812, 813, 814, 815, 816, 817, 818, 819, 820, 821, 822, 823, 824, 825, 826, 827, 828, 829, 830, 831, 832, 833, 834, 835, 836, 837, 838, 839, 840, 841, 842, 843, 844, 845, 846, 847, 848, 849, 850, 851, 852, 853, 854, 855, 856, 857, 858, 859, 860, 861, 862, 863, 864, 865, 866, 867, 868, 869, 870, 871, 872, 873, 874, 875, 876, 877, 878, 879, 880, 881, 882, 883, 884, 885, 886, 887, 888, 889, 890, 891, 892, 893, 894, 895, 896, 897, 898, 899, 900, 901, 902, 903, 904, 905, 906, 907, 908, 909, 910, 911, 912, 913, 914, 915, 916, 917, 918, 919, 920, 921, 922, 923, 924, 925, 926, 927, 928, 929, 930, 931, 932, 933, 934, 935, 936, 937, 938, 939, 940, 941, 942, 943, 944, 945, 946, 947, 948, 949, 950, 951, 952, 953, 954, 955, 956, 957, 958, 959, 960, 961, 962, 963, 964, 965, 966, 967, 968, 969, 970, 971, 972, 973, 974, 975, 976, 977, 978, 979, 980, 981, 982, 983, 984, 985, 986, 987, 988, 989, 990, 991, 992, 993, 994, 995, 996, 997, 998, 999, 1000)

(И.С.К., одобренный в совете на 2-ой конференции, утвержденный государством и опубликованный в газете "Советская Удмуртия".)

1. Как вы знаете, в нашей стране в настоящее время, особенно в связи с переходом к социализму, в области культуры, искусства, литературы, науки, техники, искусства, спорта и т.д. происходят большие перемены. Мы должны уделить большое внимание развитию культуры и искусства, особенно в области литературы, искусства, спорта и т.д. Мы должны уделить большое внимание развитию культуры и искусства, особенно в области литературы, искусства, спорта и т.д.

2. Нам необходимо уделить большое внимание развитию культуры и искусства, особенно в области литературы, искусства, спорта и т.д. Мы должны уделить большое внимание развитию культуры и искусства, особенно в области литературы, искусства, спорта и т.д. Мы должны уделить большое внимание развитию культуры и искусства, особенно в области литературы, искусства, спорта и т.д.

1916年2—3月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向社会主义者第二次代表大会提出的提案”手稿第1页

(新版缩小的)



現在，一切社会沙文主义者都在欺騙人民，說什么資本主义强盜的某个集团实行“非正义的”进攻和某个集团进行“正义的”防御，用这一类假話来掩飾資本家在这次战争中繼續实行的实际政策，即帝国主义政策；同样地，空談什么“民主和約”，似乎現在資本家和外交家所准备的未来的和約，能够“輕而易举地”消除“非正义的”进攻和恢复“正义的”关系，而不会使那种帝国主义政策，即財政掠夺、殖民地搶劫、民族压迫、政治反动以及尽量加紧資本主义剝削等政策繼續实行、發展和巩固，这也完全是欺騙人民的。資本家和他們的外交家現在正需要这种資產阶级的“社会主义的”奴僕，需要这些奴僕用“民主和約”的空話来蒙蔽、愚弄和麻醉人民，用这种空話掩盖資產阶级的实际政策，使群众难以看出它的实質，引誘群众离开革命斗争。

4. 現在第二国际最著名的代表正在編制“民主”和平的綱領，这个綱領正是这种資產阶级的騙局和假面具。例如，第二国际最有威望和最有“理論修养”的正式代表人物胡斯曼在安亨（Arnheem）⁶⁴代表大会上，考茨基在《Neue Zeit》[⊖]上，都表述了这个綱領：在帝国主义政府締結和約以前，放弃革命斗争，暂时在口头上否認兼并和賠款，主张民族自决，使对外政策民主化，用仲裁法庭来解决各国之間的国际冲突，裁减軍备，建立“欧洲联邦”⁶⁵，等等。考茨基說倫敦代表會議（1915年2月）和維也納代表會議（1915年4月）一致承認这个綱領的主要条文：“民族独立”，并且用这个事实来証明在这个問題上“国际的意見一致”，这样，考茨基就極其明显地暴露了这个“和平綱領”的真实的政治意义。这样，考茨基就向

⊖ “新时代”。——編者注

全世界公开承認社会沙文主义者明目张胆地欺騙人民的行为是合法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假心假意地、毫不負責地和毫無用处地在口头上承認民族“独立”或民族自决，同时又在帝国主义战争中支持“本国”政府，虽然双方进行这场战争使弱小民族的“独立”不断地遭到破坏，而且是为了巩固和扩大对弱小民族的压迫进行的。

这个極其流行的“和平綱領”的客觀作用，就是使工人階級更加服从資產階級，其方法是使那些开始展开革命斗争的工人同沙文主义的領袖“調和起来”，抹杀社会主义危机的深重，以便回到社会主义政党战前那种使大多数領袖都轉到資產階級方面去的状况。这种“考茨基主义”政策之所以对無产階級的危害更大，是因为它被漂亮的言詞掩盖了起来，并且不仅在德国，甚至在世界各国都得到了推行。例如，在英国实行这种政策的是大多数领导人物，在法国有龙格、普雷斯曼等，在俄国有阿克雪里罗得、馬尔托夫、齐赫澤等。齐赫澤用“救国”的字眼来掩盖在这次战争中“保衛国家”的沙文主义思想，他一方面在口头上贊成齐美尔瓦尔得決議，另一方面在党团的正式声明中贊揚胡斯曼在安享大会上臭名远揚的演說，实际上無論在杜馬講壇上或在刊物上，他都不反对工人参加軍事工業委员会，并且繼續給贊成参加的報紙撰稿。在意大利則有特雷維斯实行这种政策，請看，1916年3月5日意大利社会党中央机关报“前进报”（《Avanti!》）⁶⁵威胁說，要揭破特雷維斯以及其他的“可能主义的改良派”，要揭露那些“用尽种种手段来阻撓党总部及奧迪諾·莫尔加利实行齐美尔瓦尔得联盟和成立新国际的人的行动”，如此等等。

5. 現在“和約問題”中的主要問題就是兼并問題。正是在這個問題上才能極其明显地看出目前盛行的社会主义者的虛伪态度以

及真正社会主义的宣传鼓动任务。

必須說明什么是兼并，社会主义者为什么和应当怎样反对兼并。不能認為凡是合并“別国”領土就是兼并，因为一般說来，社会主义者是同情鏟除国界和建立更大的国家的；不能認為凡是破坏 Status quo (现状) 就是兼并，因为这是極其反动的行为，而且是对历史科学的基本概念的嘲笑；也不能認為凡是軍事合并都是兼并，因为对大多数人民有利的暴力和战争，社会主义者是不能否認的。只有违反某塊領土上的居民的意志而合并这块土地，才能算是兼并，換句話說，兼并的概念和民族自決的概念是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

但是，正因为这次战争是两个交战的列强集团間的帝国主义战争，所以在这个战争的基础上就会产生而且已經产生这样一种現象，就是当敌国正在或者已經实行兼并的时候，资产阶级和社会沙文主义者就加紧“反对”兼并。很明显，这种“反对兼并”和这种在兼并問題上的“意見一致”，完全是虛伪的。很明显，法国那些拥护爭夺亚尔薩斯—洛林的战争的社会主义者，德国那些不要求亚尔薩斯—洛林、德屬波兰等地有同德国分离自由的社会主义者，俄国那些把沙皇政府重新奴役波兰的战争叫作“救国”、在“不割地的和平”的名义下要求将波兰归并俄国的社会主义者，如此等等，实际上都是兼并主义者。

为了使反对兼并的斗争不是虛伪的或流于空談，为了使这种斗争真正用国际主义精神教育群众，就必须使这个問題的提法能够使群众看清目前在兼并問題上流行的騙局，而不是掩盖这种騙局。各国社会主义者光在口头上承認民族平等，或者唱高調，对天發誓，說他反对兼并，这是不够的。他們还必须立即無条件地要求

被他們自己的“祖國”所壓迫的殖民地和民族有分離的自由。

缺少這個條件，無論齊美爾瓦爾得宣言所承認的民族自決或國際主義原則，頂多不過是死的條文。

6. 社會主義者的“和平綱領”也同他們的“為結束戰爭而鬥爭”的綱領一樣，其出發點應當是：揭露現在各國巧言惑眾的總長、和平主義的資產者、社會沙文主義者和考茨基分子向人民說的什麼“民主和平”、交戰國有愛好和平的意願等等謊言。要是不首先向群眾說明革命的必要性，不支持、促進和擴大各地開始展開的群眾革命鬥爭（不滿、抗議、戰壕聯歡、罷工、遊行示威，以及像在法國發生的從前綫寫信給親友，勸他們不要認購戰時公債等等），那任何“和平綱領”都是欺騙人民的、虛假的。

支持、擴大和加深爭取停戰的一切群眾運動，是社會主義者應盡的義務。可是，實際上只有像李卜克內西那樣的社會主義者在履行這個義務，他們在國會講壇上號召兵士放下武器，鼓吹革命，鼓吹變帝國主義戰爭為爭取社會主義的國內戰爭。

應當提出拒絕償還國債這個積極的口號，吸引群眾參加革命鬥爭，說明必須採用革命手段才有締結“民主”和約的可能。

齊美爾瓦爾得宣言固然暗示要實行革命，說工人應當為自己的而不是別人的事業犧牲一切，但這是不夠的。還必須明確地向群眾指出他們所要走的道路。使他們知道往哪里走，為什麼要往那里走。戰爭時期的群眾革命行動，在順利發展的情況下，只能使帝國主義戰爭變為爭取社會主義的國內戰爭，這是顯而易見的，對群眾隱瞞這一點是有害的。相反地，應當明確指出這一目的，不管在我們剛剛走上這條道路時，要達到這一目的是多么困難。只像齊美爾瓦爾得宣言上所說的那樣，說這次戰爭中“資本家說保衛祖

国，是在撒谎”，工人在革命斗争中不应当考虑本国的军事形势，那是不够的；还应当清楚地指出这里所暗示的东西；不仅资本家而且社会沙文主义者和考茨基分子都在撒谎，因为他们在这次帝国主义战争中运用了保卫祖国这个概念；指出不使“自己的”政府有失败的危险，在战争时期就不可能有革命行动；政府在反动战争中的一切失败都有助于革命，只有革命才能带来持久的民主的和平。最后，必须告诉群众，他们如果不亲自成立秘密组织和创办不受军事检查的报刊，即秘密报刊，就不可能大力支持正在展开的革命斗争，促进它的发展，批评它的个别步骤，纠正它的错误，逐步地扩大和加剧这一斗争。

7. 关于社会主义者的议会斗争(Aktion)问题，必须指出，齐美尔瓦尔得决议不但对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五个社会民主党的国家杜马代表表示同情，而且赞同他们的策略。既要承认群众的革命斗争，又要容许社会主义者在议会中完全合法的活动，那是不可能的。这只会引起工人们正当的不满，使他们离开社会民主党而走向反议会的无政府主义或工团主义。必须明确地大声疾呼地说：社会民主党人在议会中应当利用自己的地位，不但要在议会中说话，而且要在议会外面从各方面去协助工人的秘密组织和革命斗争，群众自己应当通过自己的秘密组织来审查自己领袖的这种活动。

8. 关于召集社会主义国际局会议的问题，应当说是一个基本的原则问题：各旧党同第二国际的统一是不是可能。国际工人运动沿着齐美尔瓦尔得决议所指出的道路每前进一步，都愈来愈清楚地证明齐美尔瓦尔得代表会议的大多数所持的立场是不彻底的，因为他们一方面把各旧党和第二国际的政策看成同工人运动中的资产阶级政策，即实现资产阶级利益而不是实现无产阶级利益的

政策一样的东西（属于这方面的，如齐美尔瓦尔得宣言上有这样的话：这次战争中，“资本家”说“保卫祖国”，是在撒谎，此外在国际社会主义者委员会（Internationale Sozialistische Kommission）1916年2月10日的通告⁶⁷内还有几项更明确的声明）；另一方面，国际社会主义者委员会害怕同社会主义国际局分裂，并且正式许诺：如果重新召集社会主义国际局会议，那国际社会主义者委员会便宣布解散⁶⁸。

我们肯定地说，这种许诺在齐美尔瓦尔得代表会议上不但没有进行表决，而且没有讨论过。

齐美尔瓦尔得代表会议召开以后半年来证明：按齐美尔瓦尔得代表会议的精神所进行的工作（我们指的不是空话，而是工作），实际上在全世界都同分裂的加深和扩大有关。在德国，反战秘密宣言的发行，是违背党的决议的，也就是说，是用分裂手段发行的。李卜克内西的最亲近的同志，国会议员 Otto Rühle^①公开声明：事实上已经有两个党，一个帮助资产阶级，一个同资产阶级作斗争。于是就有许多人，包括考茨基分子在内，曾为此骂过吕勒，但是谁也没有驳倒他。在法国，社会党党员布尔德朗坚决反对分裂，但是同时他又向自己的党提出诋毁党中央和议会党团（désapprouver Comm. Adm. Perm. et Gr. Parl.）的议案，如果通过这项议案就一定会马上引起分裂。在英国，I. L. P.^②党员 T. Russel Williams^③在稳健的报纸《Labour Leader》^④上公开承认分裂是不可避免的，

① 奥托·吕勒。——编者注

② Independent Labour Party——独立工党。——编者注

③ 威廉斯·罗素。——编者注

④ “工人领袖报”。——编者注

并且在许多地方工作人员的来信中得到拥护。美国的例子也许更有教益，因为在那里，甚至在中立国，在社会党内都产生了两个不可调和的敌对派别：一方面是所谓《Preparedness》（“准备”），即战争、军国主义和海上军国主义的拥护者，另一方面是像以前社会党的总统候选人尤金·德布兹这样的社会党人，他由于即将爆发战争而公开鼓吹进行争取社会主义的国内战争。

实际上，全世界已经发生分裂，已经暴露出工人阶级对待战争的两种绝不调和的政策。闭眼不看这个事实是不行的，这样只会迷惑工人群众，蒙蔽他们的意识，阻碍齐美尔瓦尔得派正式同情的群众的革命斗争，加强那些被国际社会主义者委员会在1916年2月10日的通告中公开责备过的领袖对群众的影响。该委员会责备他们说，他们把群众“引入迷途”，并且准备反对社会主义的“阴谋”（《Pakt》）。

各国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和考茨基分子想要恢复已经破了的产的社会主义国际局。社会主义者的任务就是向群众说明，同那些打着社会主义旗帜而实行资产阶级政策的人实行分裂是不可避免的。

写于1916年2—3月

载于1916年4月22日“伯尔尼国际社会主义者委员会。公报”第4号

1916年6月10日用俄文载于
“社会民主党人报”第54—55号

按手稿刊印

是分裂还是腐化？

“社会民主党人报”还在第 35 号上^①就针对德国社会民主党提出了这个问题，发挥了我们党中央关于战争宣言的基本思想。^②请看，事实怎样证实了这个结论。

显然，德国社会民主党已在腐化。卡·李卜克内西的亲密同志奥托·吕勒已经公开主张分裂，更不用说一贯同假心假意的考茨基分子作斗争的“德国国际社会主义者”(I. S. D)⁶⁹了。甚至《Vorwärts》^③也举不出任何一个严正的论据来回答他。事实上在德国存在着两个工人党。

在英国，甚至在稳健的和平主义的报纸《Labour Leader》^④（“独立工党”中央机关报）上也登载了威廉斯·罗素的主张，而且他已得到许多地方工作人员的支持。在英国进行国际工作并且颇有功绩的奥尔纳茨基⁷⁰同志，在调和派的巴黎“我们的言论报”上主张立刻实行分裂。不用说，在奥尔纳茨基同站在考茨基主义立场上的“共产党人”⁷¹撰稿人费·罗特施坦进行的论战中，我们是完全同意前者的。

① 见“列宁全集”第 4 版第 21 卷第 77—83 页。——编者注

② 同上，第 9—18 页。——编者注

③ “前进报”。——编者注

④ “工人领袖报”。——编者注

在法国，布尔德朗拚命反对分裂，可是……他向党代表大会提出的決議案，竟公然否認党中央和議會党团！这项決議一通过，党就会立刻分裂。

在美国，“社会党”形式上是統一的。实际上，这个党内的一部分人，如罗素等，鼓吹“准备”，主张战争，主张扩充军队和海军。另一部分人，如該党总统候选人尤金·德布茲，公开宣揚“一旦”帝国主义战争爆發，或者确切些說，随着这种战争的爆發，就要进行国内战争。

实际上目前世界上已存在两个党。事实上現在已有两个国际。要是齐美尔瓦尔得多数派害怕承認这一点，幻想同社会沙文主义者团结，并且声明自己有决心实行这种团结，那末，这种“善良的願望”实际上不过是一种願望、思想不徹底和畏縮不前的表現而已。意識落后于存在。

写于1916年2—4月

1931年第一次刊于

“列宁文集”第17卷

按手稿刊印

論德国的和非德国的沙文主义⁷²

大家知道，德国沙文主义者已把所謂社会民主工党，实际上現在已經成了民族主义自由派工党的大多数領袖和官吏控制在自己的影响之下了。非德国的沙文主义者，如波特列索夫、列維茨基这伙人也是如此，我們在下面就会談到。現在我們要談的是德国的沙文主义者，公正地說，考茨基也应当包括在內，尽管阿克雪里罗得在他的德文版的小册子中拚命地和極不正确地为考茨基辯护，說他是“国际主义者”。

德国沙文主义的标志之一，就是“社会主义者”，带引号的社会主义者，現在談那些不受他們本民族压迫的其他民族的独立了。無論是直接說出这一点，或者是替說出这一点的人辯护、辯白和掩盖，其中并沒有很大的差別。

例如，德国沙文主义者，也包括帕尔烏斯（他出版一种名叫“鐘声”的小型杂志，在这上面常写文章的有連奇、哈尼施和格隆瓦尔特等这帮德国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走狗），对受英国压迫的民族的独立問題就談得很多而且很喜欢談。德国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口头上是社会主义者，实际上是沙文主义者——和德国资产阶级的一切报刊現在也在尽力宣揚英国在殖民地的無耻的、暴力的、反动的統治。德国的各种报纸現在正在幸灾乐祸地、欢喜若狂地大談其印度的解放运动。

德國資產階級幸災樂禍的原因是不難理解的：它希望在印度煽起反英的不滿情緒和運動，從而改善自己的軍事地位。當然，抱這種希望是很愚蠢的，因為要從遙遠的地方用別的语言去影響一個人口眾多的、極其獨特的民族生活，這起不了多大的作用，實在起不了多大的作用。這種影響不是經常的，而是偶然的，只是戰爭時期才能發生的。所以，與其說德國帝國主義資產階級想影響印度，不如說它想借此聊以自慰，欺騙德國人民，轉移他們的視線，從國內轉向國外。

但是，這不禁產生一個一般理論性的問題：這種議論的虛偽性的根源是什麼呢？揭穿德國帝國主義者的假仁假義的正確有效的辦法是什麼呢？因為從理論上正確地回答虛偽性在哪裡的問題，始終有利於揭露偽善者，他們由於過分明顯的原因，想掩蓋、抹殺這種虛偽性，給它披上各種華麗的詞藻外衣，什麼詞藻都有，什麼話都講，甚至扯到國際主義上面去。連奇、休特古姆和謝德曼之流口頭上都以國際主義者自居，不幸的是，這班德國資產階級的代理人竟是所謂德國“社會民主”黨的黨員。斷定一個人，不是根據他的言論，而是根據他的行動。這是大家早就知道的。我們俄國有誰根據波特列索夫、列維茨基、布尔金這班先生的言論去斷定他們呢？當然，誰也沒有。

德國沙文主義者的虛偽性的根源在於：他們大叫大喊他們同情受他們軍事敵人——英國壓迫的民族的獨立，而對於受他們本民族壓迫的民族的獨立，却審慎地——有時甚至過於審慎——避而不談。

比如拿丹麥人來說吧。普魯士在合併什列斯維希時，像其他一切“大”國一樣，也佔據了一部分丹麥人居住的地方。這顯然是

侵犯丹麦人的权利，因为奥地利根据 1866 年 8 月 23—30 日签订的布拉格和约，把自己统治什列斯维希的“权利”让给了普鲁士，而和约中规定，关于什列斯维希北部的居民是否愿意并入丹麦的问题，应当通过自由投票来征求他们的意见，如果答复是肯定的，那就应当并入丹麦。可是普鲁士并没有这样做，而在 1878 年取消了这些对它十分“不愉快的”条件。

恩格斯对于大国民族的沙文主义，并不是漠不关心的，他曾经特别指出过普鲁士侵犯弱小民族权利的现象⁷³。然而，目前德国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在口头上承认民族自决，考茨基在口头上也承认这一点，在实际上却从来没有为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进行过彻底的坚决的民主宣传，因为问题涉及到“本”民族实行的民族压迫。“问题的症结”就在这里。关于沙文主义和揭露沙文主义的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

由于“俄国旗帜报”⁷⁴所持的态度常常和“普鲁士旗帜报”相同，这样就使我们在许多问题上尖锐化了。但是，问题并不只限于“俄国旗帜报”，因为我们的波特列索夫、列维茨基这班先生和连奇、考茨基之流一样，完全是本着同一种基本精神来议论的。例如，只要看一看取消派的“工人晨报”，就会发现这完全是“普鲁士的”，更确切些说，是国际沙文主义的议论的根据和方法。不管打着什么民族的招牌，不管用什么和平主义之类的词句掩饰起来，沙文主义仍然是沙文主义。

载于 1916 年 5 月 31 日“保险问题”

杂志第 5 期(总第 54 期)

按手稿刊印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⁷⁵

(通俗的論述)

序 言

这本小册子是1916年春天我在苏黎世写成的。在那里的
工作条件下，我当然感到英法文参考書相当缺乏，尤其是俄文参考書
十分缺乏的痛苦。但是，我还是利用了約·阿·霍布森的一本論
帝国主义的重要英文著作，我認为我已经給了它以应有的注意。

我写这本小册子的时候，是考虑到沙皇政府的检查的。因此，
我不但要極严格地限制自己只作純理論性的、特别是經濟上的分
析，而且我在叙述关于政治方面的几点必須談的意見时，也不得
不用極其謹慎的口吻，用暗示的方法，用沙皇政府迫使一切革命者提
笔写“合法”作品时不得不用的那种可恶的伊索寓言式的語言。

在目前这种自由的日子里，再讀到小册子里那些因顧虑到沙
皇政府的检查而不得不說得失去原意、好像被鉄鉗子钳住了似的
說得含含糊糊、干干巴巴的地方，真是感到十分难受。关于帝国
主义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社会沙文主义（口头上的社会主义，
实际上的沙文主义）是徹头徹尾地背叛社会主义、毫無保留地投靠
資产階級，工人运动的这种分裂是同帝国主义的客观条件相联系
的等等問題，当时我談的时候，都不得不用一种“奴隶的”語言，現

在只好請關心這些問題的讀者去讀我那部即將再版的1914—1917年的國外論文集。這裏要特別指出的是第119—120頁[⊖]上的一段文字：為了通過檢查，我在那裏不得不拿……日本做例子，來向讀者說明資本家以及投靠資本家的社會沙文主義者（考茨基同他們進行的鬥爭是很不徹底的）在兼併問題上怎樣無恥地撒謊，怎樣無恥地掩飾本國資本家的兼併政策。細心的讀者不難用俄國來代替日本，用芬蘭、波蘭、庫爾蘭、烏克蘭、希瓦、布哈拉、愛斯蘭和其他非大俄羅斯人居住的地區來代替朝鮮。

我希望我這本小冊子能夠有助於讀者理解帝國主義的經濟實質這個基本的經濟問題。如果不研究這個問題，就根本不會懂得如何去估計現在的戰爭和現在的政治。

作 者、

1917年4月26日彼得格勒

[⊖] 見本卷第290—291頁。——編者注

法文版和德文版序言⁷⁶

一

我在俄文版序言里說过，本書在 1916 年写的时候，是考虑到沙皇政府的检查的。現在我不可能把全文改写一遍，而且改写也許是不适当的，因为本書的主要任务，無論过去或現在，都是根据不容爭辯的資產階級綜合統計資料和各国資產階級学者的自白，來說明 20 世紀初期，第一次世界帝国主义大战前夜的全世界資本主义經濟在国际相互关系上的总的情形。

不改写对于各先进国家的許多共产党人甚至还有点益处，例如在今天的美国或法国，虽然不久以前这两个国家几乎所有的共产党员都被逮捕了，但是，共产党人看了这本沙皇政府書报检查局認為合法的書籍，就会知道，他們还是可以——而且必須——利用共产党人还有的那一点点公开活动的机会，來說明社会和平主义者的观点和对“世界民主”的幻想是多么虛伪。对这本在書报检查制度控制下写的書的一些最必要的补充，我将在这篇序言中写出来。

二

本書已經証明，1914—1918 年的战争，从交战的双方來說，都是帝国主义的战争（即侵略的、掠夺的、强盜的战争），都是为了瓜分世界、分割与重分殖民地和財政資本的“势力范围”等等而进行的战争。

因为，能够証明战争的真正社会性質，确切些說，証明战争的真正階級性質的，自然不是战争的外交史，而是对各交战国統治階級的客观地位的分析。为了說明这种客观地位，不应当引用一些例子和个别的材料（因为社会生活現象極端复杂，随时都可以找到任何数量的例子或个别的材料来証实任何一种意見），而一定要引用关于各交战国和全世界的經濟生活基础的綜合的材料。

我在說明 1876 年和 1914 年世界分割情形的圖表（第 6 章）以及說明 1890 年和 1913 年世界鐵路分割情形的圖表（第 7 章）中所引用的，正是这样一种絕對駁不倒的綜合材料。鐵路是資本主義工業的最主要的部門即煤炭和鋼鐵工業的總結，是世界貿易發展与資產階級民主文明的總結和最显著的指标。本書前几章已經說明了鐵路是怎样与大生产、壟断組織、辛迪加、卡特尔、托拉斯、銀行、財政寡头等等联系在一起的。鐵路网的分布，这种分布的不平衡，鐵路發展的不平衡，就是全世界現代壟断資本主義的總結。这种總結表明，在生产資料私有制还存在的这种經濟基础上，帝国主义战争是絕對不可避免的。

建筑鐵路似乎是一种簡單的、自然的、民主的、文化的、文明的事業。由于粉飾資本主義奴隸制而得到報酬的大学教授和小資產階級庸人，就有这样的看法。事实上，几根資本主義的干綫已經用千絲万縷的密网把这种事業与整个的生产資料私有制联系在一起了，已經把这种建筑事業变成压迫附屬国（殖民地加半殖民地）里占世界人口半数以上的十亿民众和“文明”国里資本的雇佣奴隶的工具。

以小業主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自由竞争，民主，——所有这些被資本家及其报刊用来欺騙工农的口号，都早已成为过去的

东西。资本主义已成为极少数“先进”国对地球上大多数居民施行殖民压迫和财政扼制的世界体系。瓜分这种“赃物”的是世界上两三个强大的全身武装的强盗(美、英、日)，他们把全世界卷入他们为瓜分自己的赃物而进行的战争。

三

君主制的德国强迫签订的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后来美、法“民主”共和国和“自由的”英国强迫签订的更加残忍卑鄙的凡尔赛和约，给人类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它们把帝国主义雇用的耍笔杆子的苦力，把那些虽然自称为和平主义者与社会主义者，但是歌颂“威尔逊主义”，硬说在帝国主义条件下可能达到和平与改良的反动市僧，完全揭穿了。

英德两个财政资本强盗集团争夺赃物的战争留下的几千万尸体和残废，以及后来签订的两个“和平条约”，空前迅速地唤醒了千千万万被资产阶级压迫、蹂躏、欺骗、愚弄的民众。大战破坏了整个世界，世界的革命危机就在这个基础上日益成熟，不管这个危机还会经过多么长久而艰苦的周折，但是结果一定是无产阶级革命爆发并且获得胜利。

第二国际 1912 年的巴塞尔宣言所估计的战争，正是 1914 年爆发的战争，而不是一般的战争（有各种各样的战争，也有革命的战争），——这个宣言已经成了揭露第二国际英雄们的全部可耻的破产和一切叛变行为的文献。

因此，我现在把这篇宣言转载在本版的附录里，并且再三请读者注意：宣言里有许多地方明确而直接地谈到即将到来的这次大战和无产阶级革命之间的联系，第二国际的英雄们总是拼命避开

这些地方，就像小偷避开他偷过东西的地方一样。

四

本書特別注意到批評“考茨基主義”這一國際上的思潮，它在世界各國的代表人物，是第二國際的“最著名的理論家”和領袖（在奧國是奧托·鮑威爾之流，在英國是拉姆賽·麥克唐納等人，在法國是阿爾伯·托馬等等，等等），以及一大批的社會黨人、改良主義者、和平主義者、資產階級民主派和神甫。

這個思潮，一方面是第二國際腐化解體的結果，另一方面是在整個生活環境的影響下被資產階級偏見和民主偏見所俘虜的小資產者思想的必然產物。

考茨基之流的這種觀點，正好完全背棄了考茨基自己幾十年來，特別是他和社會機會主義者（伯恩施坦、米勒蘭、海德門、龔帕斯等等）作鬥爭時所捍衛的那些革命的馬克思主義原理。因此，現在全世界的“考茨基主義者”都同極端的机会主義者（通過第二國際或黃色國際）和資產階級政府（通過有社會黨人參加的資產階級聯合政府）在實際政治上聯合起來，這決不是偶然的。

在全世界日益發展的整個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特別是共產主義運動，決不能不分析和揭露“考茨基主義”的理論錯誤。必須這樣做，尤其是因為和平主義和一般的“民主主義”在世界上還十分流行，這些思潮雖然一點也不想冒充馬克思主義，但是完全同考茨基之流一樣，也在掩飾帝國主義矛盾的深刻性和帝國主義產生革命危機的必然性。所以，無產階級的政黨必須同這些思潮作鬥爭，把受資產階級愚弄的小業主和程度不同地處在小資產階級生活條件下的千百萬勞動者，從資產階級那里爭取過來。

五

关于本書第8章“資本主义的寄生性和腐化”，我还要說几句话。我在本書正文中已經指出：在这个問題上，过去是“馬克思主义者”，而現在是考茨基的战友和“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⁷⁷的資產階級改良主义政策主要代表人之——希法亭，比英国公开的和平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霍布森还后退了一步。現在，整个工人运动的国际性的分裂已經完全暴露出来了（分裂为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这两个思潮之間的武装斗争和国内战争的事实也同样暴露出来了：在俄国，孟什維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帮助高尔察克和邓尼金反对布尔什維克；在德国，謝德曼分子和諾斯克之流同資產階級一起反对斯巴达克派⁷⁸；在芬兰、波兰以及匈牙利等国也是如此。这个有世界历史意义的現象的經濟基础是什么呢？

就是資本主义的寄生性和腐化，这是資本主义的最高历史阶段，即帝国主义阶段所特有的現象。本書証明了，資本主义現在已經把極少数几个特別富强的国家（其人口不到全球人口总数的十分之一，即使按最“慷慨”和最夸大的計算，也不到五分之一）划分出来，它們专靠“剪息票”来掠夺全世界。根据战前的价格和战前資產階級的統計，資本輸出的收入每年有80—100亿法郎。現在当然更多得多了。

有了这样巨量的超額利潤（因为这个利潤超出了资本家从“自己”国家的工人身上榨取的利潤），自然可以拿出一部分来收买工人領袖和上層工人貴族。“先进”国里的資本家，就是这样千方百计地、直接間接地、公开与秘密地收买他們。

这个按生活方式、工資数額和整个世界觀說来已經完全市儈

化的、資產階級化的工人或“工人貴族”階層是第二國際的主要支柱，而現在則是資產階級的主要社會（不是軍事）支柱。因為這是資產階級在工人運動中的真正走狗，是資本家階級在工人中間的代理人（labor lieutenants of the capitalist class），是改良主義和沙文主義的真正傳播者。在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國內戰爭中，他們中間必然有不少人是要站在資產階級方面，站在“凡爾賽派”方面來反對“巴黎公社活動家”的。

如果不懂得這個現象的經濟根源，如果不估計到這個現象的政治意義和社會意義，那末在解決共產主義運動和即將到來的社會革命的實際任務方面就會一步也不能前進。

帝國主義是無產階級社會革命的前夜。從1917年起，這一點已經在全世界範圍內得到了証實。

尼·列寧

1920年7月6日

在最近的 15 年或 20 年里，特别是西美战争（1898 年）和英布战争（1899—1902 年）之后，新旧两大陆出版的政治和经济著作中，用“帝国主义”这个概念来说明我们这个时代的，是愈来愈多了。1902 年，在伦敦和纽约出版了英国经济学家霍布森的“帝国主义”一书。虽然这位作者所持的观点是资产阶级社会改良主义与和平主义的观点，所站的立场实质上同过去的马克思主义者考茨基今天所站的立场一样，但是，他对帝国主义的基本政治经济特点，作了一个很好很详尽的说明。1910 年，在维也纳出版了奥国马克思主义者希法亭的“财政资本”（有俄译本，1912 年莫斯科版）。虽然作者在货币论的问题上犯了错误，并且有一种把马克思主义同机会主义调和起来的倾向，但是这本书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阶段”（希法亭这本书的副标题）作了一个极有价值的理论分析。实际上，近年来关于帝国主义问题的论述，特别是报刊上专门谈论这个问题的大量文章中所谈的，以及各种决议，如 1912 年秋的克姆尼次和巴塞尔两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所谈的，恐怕都没有超出这两位作者所叙述的，确切些说，所总结的那些论点的范围……

下面，我们就对帝国主义各个基本经济特点的联系和相互关系作一个尽量通俗简短的叙述。至于非经济方面的问题，尽管是值得谈的，我们也不谈了。参考书目录及其他注释，并不是所有的读者都感到兴趣的，所以放在书的最后面。

一、生产集中和垄断

资本主义最典型的特点之一，就是工业蓬勃发展，生产集中于愈来愈大的企业的过程进行得非常迅速。现代工业调查就是说明这一过程的最完备最确切的材料。

例如德国，每千个工业企业中，雇用工人 50 人以上的大企业在 1882 年有 3 个，1895 年有 6 个，1907 年有 9 个。这些企业的工人占工人总数的 22%、30%、37%。但是生产集中的程度要比工人集中的程度大得多，因为大企业的劳动生产率要高得多。关于蒸汽机和电动机的材料，可以证明这一点。如果拿德国所谓广义的工业，即包括商业与交通等在内的企业来说，则情况如下：在 3 265 623 个企业中，大企业有 30 588 个，只占总数的 0.9%。在 1 440 万工人中，它们的工人占 570 万，即占总数的 39.4%；在 880 万蒸汽马力中，它们占有 660 万马力，即占总数的 75.3%；在 150 万千瓦电力中，它们占有 120 万千瓦，即占总数的 77.2%。

不到百分之一的企业，占有总数 $\frac{3}{4}$ 以上的汽力与电力！而 297 万个小企业（雇用工人 5 人以下的），即占企业总数 91% 的企业，却只占有 7% 的汽力与电力！几万个巨大企业拥有一切，数百万个小企业一无所有。

德国在 1907 年雇用工人 1 000 人以上的企业，有 586 个。它们的工人几乎占总数的十分之一（138 万），它们的汽力与电力几乎占总数的三分之一（32%）^①。下面我们可以看到，货币资本和

^① 按“德国年鉴”（«Annalen des deutschen Reichs»）1911 年列宁版综合的数字。

銀行使这極少数最大企業的优势达到了真正压倒一切的地步，这就是說，几百万中小企業，甚至一部分大企業的“主人”，实际上处于完全受几百个富豪財政大王奴役的地位。

在另一个現代資本主义先进国家美国，生产的集中更为迅速。美国統計把狭义的工業特別划分出来，并且按全年产值的多少把这种企業分成几类。在1904年，产值在100万美元以上的大企業有1900个（占企業总数216180个的0.9%）；它們有140万工人（占工人总数550万的25.6%）；它們的产值有56亿美元（占产值总数148亿美元的38%）。5年之后，在1909年，相应的数目已如下述：3060个大企業（占企業总数268491个的1.1%），有200万工人（占工人总数660万的30.5%），它們的产值有90亿美元（占产值总数207亿美元的43.8%）[⊖]。

美国所有企業的全部生产，差不多有一半掌握在仅占企業总数百分之一的企業手里！而这3000个巨型企業，包括了258个工業部門。由此可見，生产集中發展到相当程度，可以說，就自然而然地直接走向壟断。因为几十个巨型企業彼此之間容易成立協定；另一方面，正因为企業規模宏大使竞争受到妨碍，从而产生壟断的傾向。这种竞争变为壟断，是现代資本主义經濟的最重要的現象之一，甚至是唯一的最重要的現象，所以我們必須詳細地研究一下。但是，我們首先应当消除一个可能产生的誤会。

美国統計上写着：在250个工業部門中有3000个巨型企業。似乎每个部門只有12个規模最大的企業。

事实上并非如此。并不是每个工業部門都有大企業；另一方

⊖ 見“美国1912年統計彙編”（《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第202頁。

面，資本主義發展到最高階段的時候，有一個極重要的特點，就是所謂聯合制，即把各種工業部門聯合成一個企業，其中有些部門依次對原料加工（如把礦石煉成生鐵，把生鐵煉成鋼，可能還用鋼製造各種成品），有些部門對另一些部門起輔助作用（對廢物或副產品加工；生產包裝用品等等）。

希法亭寫道：“第一、聯合制能把各種行情拉平，因而保證聯合企業有更穩定的利潤率。第二、能消除交易。第三、能使聯合企業改良技術，因而獲得比‘單純’企業（即沒有聯合的企業）更多的利潤。第四、使聯合企業的地位比‘單純’企業鞏固，加強它在嚴重蕭條（滯銷，危機）時期，即成品跌價比原料跌價厲害的時期的競爭力量。”^①

德國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海曼寫了一部專論德國鋼鐵工業中“混合”（即聯合）企業的著作，他說：“單純企業，由於原料價格高昂和成品價格低廉而逐漸衰敗”。結果是：“一方面只剩下幾個巨大的煤業公司，每年產煤數百萬噸，緊密地組成一個煤業辛迪加；其次，還有一些組成鋼業辛迪加的巨型煉鋼廠，也同煤業辛迪加緊密地結合在一起。這些大型企業每年出產 40 萬噸鋼（每噸等於 60 普特），採掘大量的礦石和煤炭，生產鋼制成品，雇有 10 000 個分住在工廠的各宿舍里的工人，有的還有自己私有的鐵路和港口。這種巨型企業是德國鋼鐵工業的典型代表。而且集中過程還在不斷地發展。個別企業愈來愈大；同一工業部門或各種不同工業部門的企業結合為巨型企業的愈來愈多，而且有柏林的五六個大銀行作它們的靠山和指揮者。德國礦業確切地証實了馬克思關於生產集中的學說是正確的，誠然，這裡指的是用保護關稅和運率來保

① 見“財政資本”俄譯本第 286—287 頁。

护工业的国家。德国矿业已经成熟到可以被剥夺的地步了”[⊖]。

这就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中的一个例外，一个诚实的人应该得出的结论。这里必须指出，他似乎因为德国工业受到高额保护关税的保护而把德国看得很特殊。这种保护关税是只能加速生产的集中和企业家的垄断同盟，如卡特尔、辛迪加等的形式。但是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自由贸易的英国，生产集中也引起了垄断，不过时间比较晚，形式也许有些不同。请看海尔曼·列维教授根据英国经济发展材料写的一本专论“垄断组织、卡特尔和托拉斯”的著作中的一段话：

“英国正是因为企业规模巨大和技术水平很高而发生一种垄断的趋向。一方面，由于生产的集中，企业必须耗费大量的资本；因此，在资本数量上对新企业的要求愈来愈高，这就阻碍了新企业的出现。另一方面（我们认为这一点更重要），每个新企业要想与生产集中所造成的那些巨型企业并驾齐驱，就必须生产大量的过剩产品，而这些产品只有在需求大大增加的时候才能有利地销售出去，否则这种产品过剩就会使价格跌到无论对新工厂或各垄断同盟都不利的程度”。英国与那些用保护关税促进卡特尔化的国家不同，在这里，企业家的垄断同盟，如卡特尔和托拉斯等，大多数是直到互相竞争的主要企业的数目缩减到“一两打”的时候才产生的。“生产集中引起大工业中垄断组织的产生，在这里表现得十分明显”[⊗]。

⊖ 见汉斯·吉德翁·海曼所著“德国大钢铁工业中的混合企业”（Hans Gideon Heymann: «Die gemischten Werke im deutschen Grossseisengewerbe»）1904年斯图加特版第256、278页。

⊗ 见海尔曼·列维所著“垄断组织、卡特尔和托拉斯”（Hermann Levy: «Monopole, Kartelle und Trusts»）1909年耶拿版第286、290、298页。

在 50 年前馬克思写“資本論”的时候，絕大多数經濟学家都認為自由竞争是一种“自然法則”。官方的学者曾經企圖用緘默抵制的办法来埋沒馬克思的著作，因为馬克思的著作对資本主义作了理論上和历史上的分析，証明自由竞争引起生产集中，而生产集中發展到一定阶段，就会引起垄断。現在，垄断已經成了事实。經濟学家們正在写一大堆的著作来叙述垄断的个别表现，而且还繼續不断地齐声宣告：“馬克思主义被推翻了。”但是，英国俗話說得好，“事实是頑强的东西”，不管你願意不願意，你总得重視这些事实。事实証明：个别資本主义国家之間的差別，例如保护关税或自由貿易，只能在垄断組織的形式上或产生的时期上引起一些不重要的差別，而生产集中引起垄断，是資本主义發展現阶段的一般的根本法則。

对于欧洲，我們可以相当精确地确定新資本主义完全代替旧資本主义的时間，那是在 20 世紀初。在最近出版的一本关于“垄断組織形成”史的綜合性著作中，我們讀到下面几段話：

“我們可以从 1860 年以前的时代里举出个别資本主义垄断組織的例子；在这些例子里，可以發現現在極常見的那些形式的萌芽；但是無論如何这时还是卡特尔的史前时期。現代垄断組織的真正开始，最早也不过是 19 世紀 60 年代的事。垄断組織發展史上第一个重大的时期，是从 19 世紀 70 年代各国工業衰落的时候开始，一直延长到 19 世紀 90 年代初期”。“如果从全欧范围来看，19 世紀 60 和 70 年代是自由竞争發展的頂点。当时，英国已經建成了它那种旧式資本主义的組織。在德国，这种組織已經同手工業和家庭工業进行坚决的斗争，开始建立自己生存的形式”。

“大轉变开始于 1873 年的破产时期，确切些說，开始于破产后

的萧条时期；这次萧条占据了欧洲经济史中的 22 年，只有在 80 年代初稍有间断，在 1889 年左右发生过异常蓬勃然而为时甚短的高涨”。“在 1889—1890 年短促的高涨期间，企业家纷纷组织卡特尔来利用当时的行情。轻率的政策拼命提高价格，比没有卡特尔时提高得更快更厉害，结果所有这些卡特尔差不多全都不光荣地埋葬在‘破产的坟墓’里了。后来又过了 5 年业务不振和价格低落的时期，但是这时在工业界占主要地位的已经不是从前那样的情绪了。一般人已经不把萧条看成是一件当然的事情，而认为它不过是有利的新行情到来之前的一段停顿时期而已。

于是卡特尔运动进到了第二个时期。卡特尔已经不是暂时的现象，而成了全部经济生活的一种基础。它占领了一个又一个的工业部门，而首先占领的是制造原料的部门。早在 19 世纪 90 年代初，焦炭辛迪加就已经成立，后来的煤业辛迪加就是以它为蓝本建立起来的，这时的卡特尔组织制度已经十分完善，实际上直到现在都没有超过它的。19 世纪末的蓬勃高涨和 1900—1903 年的危机，至少在矿业与钢铁工业方面，都是第一次完全在卡特尔制度下渡过的。当时一般人还觉得这是一种新现象，而现在社会上则普遍认为经济生活的各个巨大部分通常不受自由竞争的支配，是一种不言而喻的事情了”^①。

① 見特·弗格爾施坦所著“資本主義工業的財政組織和壟斷公司的形成”(Th. Vogelstein: «Die finanzielle Organisation der kapitalistischen Industrie und die Monopolbildungen»)一文，載于“社會經濟基礎匯刊”(«Grundriss der Sozialökonomik»), 1914 年杜賓根版第 6 冊。請參照同一作者所著“英美鋼鐵工業和紡織工業的組織形式”(«Organisationsformen der Eisenindustrie und Textilindustrie in England und Amerika») 1910 年萊比錫版第 1 卷。

总之，垄断組織發展史可以分为以下几个基本时期：（1）19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是自由竞争發展达到頂点的最高阶段。当时垄断組織还只有一点不甚明显的萌芽。（2）1873年危机之后，是卡特尔广泛發展的时期，但是卡特尔当时还只是一种例外，还不稳固，还只是一种暫时的現象。（3）在19世紀末的高涨和1900—1903年的危机时，卡特尔已經成了全部經濟生活的一种基础。資本主义变成了帝国主义。

各个卡特尔彼此商定銷售条件和支付期限，划分銷售地区，規定产品数量和价格，分配利潤給各个企業等等。

德国的卡特尔，在1896年約有250个，在1905年約有385个，参加的企業約有12 000个[⊖]。但是，大家都承認，这是縮小了的数字。从上面引用的1907年的德国工業統計材料可以看出来，单是这12 000个最巨大的企業，大概就集中了全国半数以上的汽力和电力。美国的托拉斯在1900年是185个，在1907年是250个。美国的統計把所有的工業企業分为三类：屬於个人的，屬於商号的，屬於公司的。最后这一类，在1904年占企業总数的23.6%，在1909年占25.9%，即四分之一以上。这些企業的工人，在1904年占工人总数的70.6%，在1909年占总数的75.6%，即占总数的四分之三；产值在1904年是109亿美元，在1909年是163亿美元，

⊖ 見里謝尔博士所著“德国大銀行及其因德国整个国民經濟發展而集中的情形”（Dr. Riesser: «Die deutschen Grossbanken und ihre Konzentration im Zusammenhange mit der Entwicklung der Gesamtwirtschaft in Deutschland»）1912年第4版第149頁；罗·利夫曼所著“卡特尔、托拉斯和国民經濟組織今后的發展”（R. Liefmann: «Kartelle und Trusts und die Weiterbildung der volkswirtschaftlichen Organisation»）1910年第2版第25頁。

即占生产总值的 73.7% 和 79%。

一个工业部门的生产总量，往往有十分之七八集中在卡特尔和托拉斯手中。莱茵—威斯特伐里亚煤业辛迪加在 1893 年成立时，已经集中了全区产煤总额的 86.7%，而在 1910 年，则已经达到 95.4%^①。这样造成的垄断，保证获得巨额的收入，并且造成规模极大的技术生产单位。美国著名的煤油托拉斯 (Standard Oil Company)，是 1900 年成立的。“它的资本是 15 000 万美元。当时发行了 1 亿美元的普通股票和 10 600 万美元的优先股票。优先股票自 1900 年起，至 1907 年止，每年获得的红利如下：48%、48%、45%、44%、36%、40%、40%、40%，共计 36 700 万美元。从 1882 年到 1907 年，实得 88 900 万美元的纯利，其中有 60 600 万美元分作红利，其余的作为后备资本”^②。“美国钢铁托拉斯 (United States Steel Corporation) 所有企业的职工，在 1907 年不下 210 180 人。德国矿业中最大的企业，即‘格耳晋基尔恒矿业公司’ (Gelsenkirchener Bergwerksgesellschaft)，在 1908 年有 46 048 个职工”^③。美国钢铁托拉斯在 1902 年就生产了 900 万吨钢^④。它所生产的钢

① 见弗里茨·克斯特涅尔博士所著“强迫加入组织。卡特尔与局外企业斗争情形的研究” (Dr. Fritz Kestner: «Der Organisationszwang. Eine Untersuchung über die Kämpfe zwischen Kartellen und Aussenseitern») 1912 年柏林版第 11 页。

② 见罗·利夫曼所著“从事参与和供给资金的公司。现代资本主义和证券交易情形的研究” (R. Liefmann: «Beteiligungs- und Finanzierungsgesellschaften. Eine Studie über den modernen Kapitalismus und das Effektenwesen») 1909 年耶拿第 1 版第 212 页。

③ 见前书第 218 页。

④ 见季·契尔施基博士所著“卡特尔与托拉斯” (Dr. S. Tschierschky: «Kartell und Trust») 1903 年哥丁根版第 13 页。

在 1901 年占美国产鋼总額的 66.3%，在 1908 年占 56.1%^①。它所采掘的矿石，在 1901 年占 43.9%，在 1908 年占 46.3%。

美国政府委员会关于托拉斯的报告中說：“它們比它們的競爭者优越，是因为它們企業的規模巨大，技术优良。烟草托拉斯从創立的时候起，就竭力在各地大量用机器来代替手工劳动。为了这个目的，它用巨款收購了一切与制造烟草多少有些关系的發明專利权。有許多發明起初是不适用的，必須由在托拉斯里工作的工程师加以改制。在 1906 年年底，托拉斯又設立了两个分公司，专门收买專利权。为了同一目的，托拉斯又建立了自己的鑄造厂、机器厂和修理厂。其中一个厂在勃魯克林，平均有 300 个工人，专门試驗制造紙烟、小雪茄、鼻烟以及包装的錫紙和烟盒等的各种發明；同时又把各种發明加以改进”^②。“其他的托拉斯，也雇有所謂 *develloping engineers*（改进技术的工程师），专门發明新的制造方法，試驗技术的改良。鋼業托拉斯对于有了提高技术或减少成本的發明的工程师或工人，都給以高额的奖金”^③。

德国的大工業，例如近几十年来蓬勃發展的化学工業，也是这样进行技术改良的。到 1908 年，生产集中的过程已經在这个工業中造成了两个主要“集团”。这两个“集团”的性質也同壟斷組織差

① 見特·弗格尔施坦所著“組織形式”(Th. Vogelstein: «Organisationsformen») 第 275 頁。

② 烟草制造公司監督委员会委員的報告書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er of Corporations on the Tobacco Industry) 1909 年华盛頓版第 266 頁。——引自保尔·塔费尔博士所著“北美托拉斯及其对于技术进步的影响”(Dr. Paul Tafel: «Die nordamerikanischen Trusts und ihre Wirkungen auf den Fortschritt der Technaik») 1913 年斯圖加特版第 48 頁。

③ 見前書第 49 頁。

不多。起初，这两个集团是由两对大工厂组成的“双边联盟”，各有资本2000万至2100万马克；一个集团是过去霍赫斯特城的迈斯迪拿工厂和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城的加塞尔工厂；另一个集团是路德维希港的染料和苏打工厂和过去爱北斐特城的拜也拉工厂。后来，一个集团在1905年，另一个集团在1908年，又各与另一个大工厂成立了协定。结果构成了两个“三角联盟”，各有资本四五千万马克，而且这两个“联盟”又开始“接近”，订立价格“条约”等等[⊖]。

竞争变为垄断。生产社会化的过程有了巨大的进展。特别是技术发明与改良的过程，也开始社会化了。

从前是各个老板自由竞争，他们是分散的，彼此毫不了解，都不知道生产的东西要在什么市场上销售，现在就完全不同了。生产集中已经到了这样的程度，可以对本国的，甚至像下面所说的，对一些国家以至全世界所有一切原料的来源（例如铁矿产地）作出大致的估计。现在不但进行这样的估计，而且这些来源完全操纵在一些大垄断同盟的手里。这些同盟对市场容量进行大致的估计，并且根据协定来“瓜分”这些市场。垄断熟练的劳动力；雇用最好的工程师；掌握交通的路线和工具，如美国的铁路，欧美两洲的轮船公司。资本主义进到帝国主义阶段，就使生产完全达到全面社会化的地步，它不顾资本家的愿望与意识，而把他们拖进一种从完全自由竞争过渡到完全社会化的新的社会制度。

生产社会化了，但是占有制仍然是私有性的。社会化了的生产资料仍旧是少数人的私有财产。表面上大家公认的自由竞争的

⊖ 见里谢尔所著前书第3版第547页及往下各页。据报纸报道（1916年6月），不久前又成立了一个把德国整个化学工业联合起来的大托拉斯。

一般架子依然存在，但是少数垄断者对其余居民的压迫更百倍地沉重、显著和令人难以忍受了。

德国经济学家克斯特涅尔写了一本专论“卡特尔与局外企业的斗争”的著作，所谓“局外企业”，就是未加入卡特尔的企业。他这本著作叫做“强迫加入组织”，其实，如果不掩饰资本主义，就应当叫做强迫服从垄断者同盟。只要看看垄断者同盟在为了“组织”而进行现代的、最新的、文明的斗争的时候，所采取的那些手段，也是很有益处的。这些手段就是：（1）剥夺原料（……“强迫加入卡特尔的最重要手段之一”）；（2）用“联盟”方法剥夺劳动力（即资本家与工会订立合同，使工会只接受卡特尔化企业的工作）；（3）剥夺运输工具；（4）剥夺销路；（5）与买主订约，使它们只同卡特尔发生买卖关系；（6）有步骤地降低价格（为了使“局外企业”，即不服从于垄断者的企业破产，耗费几百万金钱，来保证在某一时期内按低于成本的价格出售商品。在汽油工业中就有过一个例子：从40马克跌至22马克，即差不多跌了一半！）；（7）剥夺信贷；（8）宣布抵制。

现在已经不是小企业同大企业、技术落后的企业同技术先进的企业竞争了。现在已经是垄断者扼杀那些不服从垄断组织、不受垄断组织的压迫和支配的企业了。下面就是这种过程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意识中的反映。

克斯特涅尔写道：“甚至在纯粹经济性的活动方面，也发生了相当的转变，从先前那种商业活动转变为组织的、投机的活动。能够获得最大胜利的，不是最会根据自己技术和商业经验来判断购买者需要，寻找并且‘发现’潜在需求的商人，而是那些能够预先估计，或是预先嗅到组织上的发展，嗅到某些企业与银行可能发生某

种联系的投机天才(?!)……”

譯成人类普通的語言，这就是說：资本主义已經發展到很高的程度，結果是商品生产虽然依旧“占統治地位”，依旧是全部經濟的基础，但是实际上已經被破坏了，絕大部分利潤都被那些干財政勾当的“天才”拿去了。这种財政勾当和欺騙行为的基础就是生产社会化，但是达到这种社会化的人类所造成的巨大进步，却造福于……投机者。下面我們会看到，那些对資本帝国主义作市僧式的反动批評的人，怎样“根据这一点”而梦想开倒車，恢复“自由”、“和平”、“誠实”的競争。

克斯特涅尔說：“因卡特尔的組成而使价格长期上漲的現象，至今还只出現在最重要的生产資料，特別是在煤、鉄和鉀等部門，而在成品方面則从来沒有过。随之而来的收益的增加，同样也只出現在制造生产資料的工業部門。此外，还要指出：制造原料（而不是半成品）的工業不仅因組成卡特尔而获得高额的利潤，使那些制造半成品的工業部門受到損失，而且它对这些工業还处于相当的統治地位，这是自由競争时代未曾有过的。”[⊖]

我們加上着重号的那几个字，就是問題的实質，这一点是資產階級經濟学家很不願意而且很少承認的，而以考茨基为首的現在的机会主义拥护者对这一点則力圖支吾搪塞，迴避不談。統治的关系和由此而产生的強力，正是“资本主义發展最新阶段”的标本現象，正是万能的經濟壟斷組織的形成必然引起而且已經引起的結果。

我們再举一个說明卡特尔支配一切的例子。凡是可以把全部

⊖ 見克斯特涅尔所著前書第254頁。

或主要的原料来源抓在手里的地方，卡特尔就特别容易产生，垄断组织就特别容易形成。但是，如果以为在无法霸占原料来源的工业部门中不会产生垄断组织，那就错了。水泥工业的原料是到处都有的。但是在德国，就是这个工业也大大卡特尔化了。水泥厂都联合成各区辛迪加：如南德辛迪加，莱茵—威斯特伐里亚辛迪加等等。规定了垄断的价格：每一车箱水泥的售价是230—280馬克，而成本却只有180馬克！企业付出12%—16%的股息，而且不要忘记，现代的投机“天才”除分得股息之外，还能使大量的利润滚进自己的腰包。为了消灭这么有利的工业部门中的竞争，垄断者甚至使用各种诡计：散布谣言，说工业的情形很坏；匿名在报上登广告说，“资本家们，小心点！别在水泥事业上投资！”；并且收买“局外企业”（即没有参加辛迪加的企业），付给他们6万、8万以至15万馬克的“出让费”[⊖]。垄断组织用尽一切办法，从偿付一点“微薄的”出让费起，直到按美国方式“用”炸药对付竞争者为止，在一切地方为自己开辟道路。

所谓用卡特尔消灭危机，这完全是拼命替资本主义粉饰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谎话。其实恰巧相反，在几个工业部门中形成的垄断，使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所特有的混乱现象更加紧张，更加剧烈。作为一般资本主义特点的农业与工业的发展不相适应，现在更厉害了。卡特尔化程度最高的所谓重工业，尤其是煤铁工业的特权地位，使其他工业部门“更加缺乏计划性”，正如写了一本很好的论述“德国大银行与工业的关系”的著作的厄伊得尔斯所承认

⊖ 見耳·厄什韦葛所著“水泥”一文（《Zement》 von L. Eschwege），見“銀行”杂志（《Die Bank》）1909年第1期第115頁及往下各頁。

的那样[⊖]。

資本主义的無耻辯护人利夫曼說：“国民經济越發展，就越趋向于創立更帶冒险性的企業或国外的企業，越趋向于創立需要長時間才能發展的企業，或者創立那些只有地方意义的企業。”[⊗]冒險性的增大，归根到底是由于資本的大量增加，資本就好像决堤而出的洪水一样流向国外。同时，技术上异常迅速的發展，又使国民經济各个部門的不相适应、混乱和危机的因素日益增加。这个利夫曼又不得不承認說：“也許在不久的将来，人类又会碰到技术方面的一些影响到国民經济組織的大变革”……如电气，航空……“在發生这种根本性的經济变动的时候，通常而且照例会有很厉害的投机事業發展起来……”[⊘]

危机——有各种各样的危机，最常見的是經济危机，但不是只有經济危机——又大大加强了集中与壟断的趋向。我們知道，1900年的危机，是现代壟断組織史上的轉折点。关于这次危机的意义，厄伊得尔斯有一段很值得注意的論断：

“在1900年的危机时代，除了有各个主要工業部門的巨型企業以外，还有許多在今天說来組織上已經过时的所謂‘單純’企業”（即沒有联合起来的企業），“它們是在工業高涨时浮到浪头上来的。价格的低落，需求的减少，使这些‘單純’企業处于十分悲慘的境地，这种境地联合的巨型企業根本沒有遭遇过，或者仅仅在極

⊖ 見厄伊得尔斯所著“德国各大銀行与工業的关系，特别是与冶金工業的关系”（Jeidels: «Das Verhältnis der deutschen Grossbanken zur Industrie mit besonderer Berücksichtigung der Eisenindustrie»）1905年萊比錫版第271頁。

⊗ 見利夫曼所著“从事参与和供給資金的公同”第434頁。

⊘ 同上，第465—466頁。

短时期內受了些影响。結果，1900年的危机所引起的工業集中的高度，是1873年的危机远远比不上的。1873年的危机虽然起了一种淘汰作用，使好的企業保存下来，但是在当时的技术水平下，这种淘汰并没有使順利地渡过危机的企業获得垄断地位。长期地、高度地享有这种垄断地位的，是現在的鋼鐵工業和电气工業中的巨型企业，因为它们的技术很复杂，組織分布很广，資本雄厚；其次是机器制造业、冶金工業的某些部門和交通等方面的企業，不过垄断的程度比較小些”[⊖]。

垄断正是“資本主义發展最新阶段”的最高成就。但是，如果我們不注意到銀行的作用，那我們对于現代垄断的实力和意义的認識，就会是極不完备、極不充分、估計得太低的認識。

二、銀行和銀行的新作用

銀行原先的主要業務是在支付中起中介作用。这样，銀行就把不活动的貨幣資本，变为活动的即生利的資本，把所有的一切貨幣收入集合起来交給資本家階級支配。

随着銀行業的發展及其集中于少数几个机构，銀行就由簡單的中介人变成万能的垄断者，几乎所有的資本家和小業主的全部貨幣資本，以及本国和許多国家的大部分生产資料和原料来源都处在它們支配之下。無数簡單的中介人变为少数的垄断者，这个过程是資本主义轉变为資本帝国主义的几个基本过程之一，因此，我們首先應該把銀行業集中的情形研究一下。

⊖ 見厄伊得尔斯所著前書第108頁。

在 1907—1908 年度，德国所有資本在 100 万馬克以上的股份銀行，共有存款 70 亿馬克；到 1912—1913 年度，存款已經增加到 98 亿馬克。五年中增加了 40%，而且这新增加的 28 亿馬克的存款，其中有 275 000 万馬克落在 57 个資本在 1 000 万馬克以上的銀行手中。存款在大小銀行中的分配情形如下[⊖]：

各种銀行在存款总数中所占的百分比

	9 个柏林的大銀行	其余 48 个資本在 1000 万馬克以上的銀行	115 个有資本 100 万至 1000 万馬克的銀行	小銀行(資本不到 100 万馬克的)
1907—1908 年度……	47	32.5	16.5	4
1912—1913 年度……	49	36	12	3

小銀行被大銀行排挤，而大銀行当中仅仅 9 个銀行就差不多集中了所有存款的一半。但是，这里还有許多問題沒有談到，例如許多小銀行实际上成了大銀行的分行等等。关于这些以后再講。

据舒尔采-格弗尼茨計算，1913 年年底，存款总額約为 100 亿馬克，而柏林的 9 个大銀行就占了 51 亿馬克。这位作者不仅注意到存款，而且注意到全部銀行資本，他写道：“1909 年年底，柏林的 9 个大銀行及其附屬銀行，共拥有 113 亿馬克，約占德国銀行資本总数的 83%。‘德意志銀行’（《Deutsche Bank》）及其附屬銀行拥有約 30 亿馬克，与普魯士国有鐵路管理局同为旧大陆上資本积聚最多，而且分权程度最高的企業。”[⊖]

⊖ 見阿尔弗勒德·兰斯堡所著“五年来德国銀行的業務”（Alfred Lansburgh: 《Fünf Jahre d. Bankwesens》）一文，見“銀行”杂志（《Die Bank》）1913 年第 8 期第 728 頁。

⊖ 見舒尔采-格弗尼茨所著“德国信貸銀行”（Schulze-Gaevernitz: 《Die deutsche Kreditbank》）一文，見“社会經濟基礎叢刊”（《Grundriss der Sozialökonomik》）1915 年杜宾根版第 12 頁和第 137 頁。

我們特別着重指出“附屬”銀行，因為這是現代資本主義集中的最重要的特點之一。大企業，尤其是大銀行，不僅直接吞并小企業，並且通過“參與”小企業資本、購買或交換股票的方法，通過債務關係等等來“拉攏”小企業，征服它們，吸收它們加入“自己的”集團，用術語說就是加入自己的“康采恩”。利夫曼教授寫了一本500頁的專門描述現代的“從事參與和供給資金的公司”[⊙]的巨“著”，可惜這本書里只有許多往往沒有加過工的原始材料，加上一些十分低劣的“理論”推斷。關於這種“參與”制度究竟使集中達到了怎樣的地步，說得最清楚的是銀行“家”里謝爾那本論德國大銀行的著作。但是，在引用他的材料之前，我們先舉一個“參與”制的具体例子。

“德意志銀行”“集團”，是所有大銀行集團當中最大的集團之一，甚至是最大的一個集團。要弄清楚把這一集團所有的銀行聯繫在一起的幾根主要的干綫，必須分清第一級、第二級和第三級的“參與”，或者說是第一級、第二級和第三級的依賴（比較小的銀行對“德意志銀行”的依賴）。結果情形如下[⊙]：

“德意志銀行”所參與的銀行		
第一級依賴的	第二級依賴的	第三級依賴的
經常參與的……	17個銀行；其中有9個又參與34個銀行；其中有4個又參與7個銀行。	
暫時參與的……	5個銀行；	—
間或參與的……	8個銀行；其中有5個又參與14個銀行；其中有2個又參與2個銀行。	
總計……	30個銀行；其中有14個又參與48個銀行；其中有6個又參與9個銀行。	

⊙ 見羅·利夫曼所著“從事參與和供給資金的公司。現代資本主義和證券交易情形的研究”1909年耶拿第1版第212頁。

⊙ 見阿爾弗勒德·蘭斯堡所著“德國銀行業中的參與制”（Alfred Lansburgh: «Das Beteiligungssystem im deutschen Bankwesen»）一文，見“銀行”雜誌（«Die Bank»）1910年第1期第500頁。

在“間或”隶属于“德意志銀行”的 8 个“第一級依賴的”銀行中,有 3 个外国銀行:一个是奥国的(維也納“銀行同盟”——《Bankverein》),两个是俄国的(西伯利亚商業銀行和俄国对外貿易銀行)。直接和間接地、全部和局部地加入“德意志銀行”集团的,共有 87 个銀行,这个集团所支配的資本,包括自己的和別人的,共有二三十亿馬克。

一个銀行領導着这样的集团,同时又与五六个稍小一点的銀行成立协定来經營国家公債之类的特別巨大特別有利的財政業務,那末很明显,这个銀行已經由“中介人”变成極少数垄断者的联合組織了。

从我們簡略地摘引在下面的里謝尔的統計材料里,可以看出正是在 19 世紀末和 20 世紀初,德国銀行業的集中發展得十分迅速:

柏林 6 个大銀行所有的机构

年 份	在德国 的分行	儲蓄所和 兌換处	經常参与的 德国股份銀行	机构总数
1895年.....	16	14	1	42
1900年.....	21	40	8	80
1911年.....	104	276	63	450

我們看到,銀行的密网扩展得多么迅速,它布滿了全国,集中了所有的資本和貨幣收入,把千千万万个分散的經濟单位变成一个全国統一的資本主义經濟单位,后来更变成一个世界性的資本主义經濟单位。舒尔采—格弗尼茨在上述那段引文中代表現代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学所說的那个“分权”,实际上是指愈来愈多的从前比較“独立的”經濟单位,确切些說,是指局限于某一地方的經濟单位,隶属于一个統一的中心了。其实,这是集权,这是把巨型壘

断公司的作用、意义和势力加强了。

在比較老的資本主义国家中，这种“銀行网”更密。英国——包括爱尔兰在內——1910年所有銀行的分行，共有7151个。其中4个大銀行各有400个以上的分行（自447个至689个），另外还有4个大銀行各有二百多个分行，11个銀行各有一百多个分行。

法国三个最大的銀行Crédit Lyonnais, Comptoir National和 Société Générale^①的業務和分行网發展的情形如下^②：

	分行和支行数目			資 本 額 (单位百万法郎)	
	在外省各地	在巴黎	总 数	自己的	別人的
1870年………	47	17	64	200	427
1890年………	192	66	258	265	1 245
1909年………	1 033	196	1 229	887	4 363

为了說明現代大銀行的“联系”，里謝尔引用了“貼現公司”（《Disconto-Gesellschaft》）收發信件的統計数字，这个公司是德国和全世界的最大的銀行之一（它的資本在1914年已經达到3亿馬克）：

	信 件 数 目	
	收到的信件	發出的信件
1852年………	6 135	6 292
1870年………	85 800	87 513
1900年………	533 102	626 043

巴黎大銀行“里昂信貸公司”的全部报表，在1875年是28 536件，而在1912年已經增加到633 539件^③。

① “里昂信貸公司”、“全國貼現局”、“总公司”。——編者注

② 見欧根·考夫曼所著“法国銀行業”（Eugen Kaufmann: «Das französische Bankwesen»）1911年杜宾根版第356頁和第362頁。

③ 見讓·列斯居尔所著“法国儲蓄業”（Jean Lescure: «L'épargne en France»）1914年巴黎版第52頁。

这些简单的数字也许比长篇议论更能清楚地表明：随着资本的集中和银行营业额的增加，银行的作用根本改变了。许多分散的资本家合成了一个集体的资本家。银行替几个资本家办理活期存款，似乎只是执行着一种纯粹技术性的、纯粹辅助性的业务。而当这种业务的范围扩展到很大的时候，少数垄断者就支配着整个资本主义社会所有工商业的业务，就能通过银行的联系，通过活期存款及其他种种财政手续，先确切地了解各个资本家的业务状况，然后加以监督，用扩大或减少、便利或阻难信贷的办法来影响他们，最后做到完全决定他们的命运，决定他们的收入，夺去他们的资本，或者使他们可能迅速而大量地增加资本等等。

我们刚才谈到柏林“贴现公司”有3亿马克的资本。“贴现公司”的资本迅速增加的经过，也是柏林两个最大的银行——“德意志银行”和“贴现公司”争夺霸权的斗争中的一幕。在1870年，“德意志银行”还是个新银行，资本只有1500万马克；而“贴现公司”有3000万马克。在1908年，前者有资本2亿，后者有资本17000万。到1914年，前者的资本增加到25000万，后者因为同另一个第一流的大银行“沙福豪森联合银行”合并，资本就增到了3亿。在这种争夺霸权的斗争中，这两个银行间的“妥协”当然也愈来愈频繁，愈来愈巩固。这种发展的进程，使得那些决不肯用越出最温和最稳健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范围的观点来观察经济问题的银行专家，也不得不做出如下的结论。

德国的“银行”杂志谈到“贴现公司”资本增加到3亿马克时写道：“其他银行也会跟着走上这条道路的，现在在经济上统治着德国的300个人，将会慢慢减到50人、25人甚至更少一些。不要以为现代的集中运动仅仅集中银行业。各个银行间的紧密联系，自

然会使这些銀行所保护的工業家的辛迪加接近起来…… 总会有
一天，我們一觉醒来，会惊奇地發現我們面前尽是一些托拉斯，到
那时就必须以国家垄断来代替私人垄断。然而，实际上除了說我
們听凭事情自由地發展，并且用股票稍稍把它加速了一下，此外，
我們是没有什么可以責备自己的。”[⊖]

这就是资产階級政論家無可奈何的典型表現，而资产階級的
科学家与这种政論家不同的地方，只不过是更不老实，力圖掩飾事
物的本質，拿树木来遮盖森林而已。看見集中的結果而感覺“惊
奇”；“責备”資本主义德国的政府或資本主义的“社会”（“我們”）；
害怕股票会“加速”集中，例如德国的一个“卡特尔問題”专家契
尔施基就害怕美国托拉斯，“宁願”要德国的卡特尔，因为德国的
卡特尔“似乎不会像托拉斯那样过于迅速地促进技术和經濟的进
步”[⊗]，——这难道不是無可奈何的表現嗎？

但是事实还是事实。德国沒有托拉斯，“只有”卡特尔，但是
統治德国的不过是300个資本巨头。而且这些巨头的人数还在不
断地减少。在所有的資本主义国家中，虽然有各种不同的銀行法，
但是銀行总是大大地促进和加速資本的集中和垄断組織的形成。

半世紀以前馬克思就在“資本論”里写过：“銀行造成了社会
范围的公共簿記和生产資料公共分配制的形式，但只是形式而已”
（見俄譯本第3卷第2部第144頁⁷⁹）。我們所引用的說明銀行資
本的增长，說明大銀行的分支行数目及其报表数目的增加等等情
形的統計材料，都是具体地表明这种整个資本家階級的“公共簿

⊖ 見阿·兰斯堡所著“一个資本3亿的銀行”（A. Lansburgh: «Die Bank mit
den 300 Millionen»）一文，見“銀行”杂志1914年第1期第426頁。

⊗ 見季·契尔施基所著前書第128頁。

記”的，而且不仅是資本家階級的公共簿記，因为銀行所收集（虽然只是暫時收集）的是一切貨幣收入，其中也包括小業主、職員和少数上層工人的收入。从形式上看来，“生产資料公共分配制”就是从現代銀行生长出来的，这种銀行在法国有3个到6个，在德国6个到8个，它們支配着几十亿几十亿的資本。但是，从內容上看来，这种生产資料分配制决不是“公共”的，而是私有的，也就是說，是与在民众忍飢挨餓、农業發展远远落后于工業、“重工業”从其它工業部門收取貢稅的条件下活动的大資本（首先是最大的壟斷資本）的利益相适应的。

在資本主义經济社会化的过程中，儲金局和邮政机关也开始同銀行竞争，它們是一种比較“分权”的机构，也就是說，它們的勢力普及到更多的区域、更多的偏僻地方和更广大的居民群众中去了。下面是美国的一个委员会收集的比較銀行和儲金局存款增加情形的統計材料^①：

存款(单位 10 亿馬克)

	英 国		法 国		德 国		
	銀行存款	儲金局存款	銀行存款	儲金局存款	銀行存款	信貸公司存款	儲金局存款
1880年.....	8.4	1.6	?	0.9	0.5	0.4	2.6
1888年.....	12.4	2.0	1.5	2.1	1.1	0.4	4.5
1908年.....	23.2	4.2	3.7	4.2	7.1	2.2	13.9

儲金局为了支付4厘至4 1/4厘的存款利息，就必须給自己的資本找到“有利的”投資的地方，如从事票據、抵押等業務。銀行和儲金局之間的界限“逐漸消失”。例如波洪和爱尔福特兩城的商会，

^① 美国全国金融委员会(National Monetary Commission)的材料，見“銀行”杂志(《Die Bank》)1910年第1期第1200頁。

就要求“禁止”儲金局經營票據貼現之類的“純粹的”銀行業務；並且要求限制郵政機關經營“銀行”業務[⊖]。銀行大王好像是在擔心國家的壟斷會從意料不到的地方鑽出來站在他們旁邊。當然，這種擔心不過是一個辦公室的兩個科長之間的競爭而已。因為儲金局的億萬萬的資本，實際上終究還是由銀行資本巨頭們支配，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在資本主義社會里，國家的壟斷不過是提高和保證某個工業部門快要破產的百萬富翁的收入的一種手段罷了。

自由競爭占統治地位的舊資本主義被壟斷占統治地位的新資本主義所替代，還表現在交易所作用的降低上面。“銀行”雜誌寫道：“從前銀行需要交易所做流通中必要的中介人，當時銀行還不能把自己所發行的大部分有價證券發行到自己的顧客中間去，而現在交易所早已不是這樣的中介人了。”[⊗]

“‘任何銀行都是交易所’，——這是一句現代的名言。銀行愈大，銀行業愈集中，這句名言所包含的真理也愈多。”[⊘]德國教授舒爾采-格弗尼茨寫道：“從前，在70年代，少年氣盛的交易所”（這是對1873年交易所危機和創辦人的丑事⁸⁰等等所作的一種“微妙的”暗示）“開辟了德國工業化的新紀元，而現在銀行和工業已經能‘獨自應付’了。我國大銀行統治交易所……正表明德國是一個很有組織的工業國。如果說這樣就縮小了自動起作用的經濟法則的活動範圍，而大大擴大了通過銀行進行的有意識的調節範圍，那末少數領導人在國民經濟方面所負的責任，也就因此而大大加重

⊖ 見“銀行”雜誌1913年第811頁和第1022頁；1914年第713頁。

⊗ 見“銀行”雜誌1914年第1期第316頁。

⊘ 見奧斯卡爾·施提利赫博士所著“貨幣與銀行”(Dr. Oscar Stilleh: «Geld- und Bankwesen») 1907年柏林版第169頁。

了。”^①舒尔采-格弗尼茨是德国帝国主义的辯护人，是各国帝国主义者眼中的权威，他力圖抹杀这件“小事情”：通过銀行进行的这种“有意識的調节”，就是由極少数“很有組織的”垄断者来掠夺大众。资产阶級教授的任务不是暴露全部内幕，不是揭穿銀行垄断家的种种勾当，而是加以粉飾。

一位更有权威的經濟学家和銀行“家”里謝尔也有这样的說法，他是用一些言之無物的空話来迴避这些無可否認的事实，他說：“交易所从前有一种为全部經濟和有价值証券流通所絕對必需的性能；它当时不仅是它所匯集的那些經濟运动的一种最准确的尺度，而且几乎是那些經濟运动的一个自然的調节者，而現在这种性能已經逐漸消失了。”^②

換句話說，旧的資本主义，即絕對必須交易所作为它的調节者的自由竞争的資本主义，已經过去了。代替它的是一个新的資本主义，这个新的資本主义有一种过渡的，一种自由竞争和垄断混合在一起的鮮明的特征。人們自然要問，这个最新的資本主义究竟会“过渡”到哪里去呢，但是，资产阶級学者都不敢提出这个問題。

“在30年前，不屬於‘工人’体力劳动范围以內的經濟工作，十分之九都是由自由竞争的企業家来做的。而現在呢，这种經濟上的腦力工作十分之九都由 職員們 来担任了。在这一發展过程中处于领导地位的是銀行業。”^③舒尔采-格弗尼茨的这种供認，使人

① 見舒尔采-格弗尼茨所著“德国信貸銀行”(Schulze-Gaevernitz: «Die deutsche Kreditbank»)一文，見“社会經濟基础匯刊”(«Grundriss der Sozialökonomik») 1915年杜宾根版第101頁。

② 見里謝尔所著前書第4版第629頁。

③ 見舒尔采-格弗尼茨所著“德国信貸銀行”一文，見“社会經濟基础匯刊”1915年杜宾根版第151頁。

們一再想問：最新的資本主義，即帝國主義階段的資本主義，究竟是過渡到哪裡去的過渡呢？

在少數幾個由於集中而成為整個資本主義經濟領導者的銀行中間，成立壟斷協定、組織銀行托拉斯的傾向自然會愈來愈明顯，愈來愈強烈。美國現在已經不是 9 個，而是 2 個最大的銀行，巨萬富豪洛克菲勒和摩爾根的銀行支配着 110 億馬克的資本了[⊙]。我們上面指出的那個德國“沙福豪森聯合銀行”被“貼現公司”吞併的事實，引起了代表交易所利益的“法蘭克福報”⁸¹ 如下的一段評論：

“隨着銀行的日益集中，一般可以發放貸款的機構也減少了，這就使大工業更加依賴於少數銀行集團。由於工業同財政界有着緊密的聯繫，就使需要銀行資本的那些工業公司活動的自由受到了限制。因此，大工業看到銀行托拉斯化（聯合或變為托拉斯），產生了一種錯綜複雜的感覺；的確，我們已經多次看到各大銀行康采恩開始成立某種協定，某種限制競爭的協定。”[⊙]

這又是銀行業發展的最高成就——壟斷。

說到銀行和工業的密切聯繫，銀行的新作用表現得最明顯的恐怕正是在這一方面。銀行給某個企業兌換期票，給它辦理活期存款等等，如果把這種業務單獨地拿來看，一點也沒有減少這個企業主的獨立性，而且銀行也沒有越出平常的中介作用的範圍。可是，如果這些業務擴大、鞏固起來，如果銀行把大量資本“收集”在自己手裡，如果辦理這個企業的活期存款使銀行能夠更詳細、更充分地知道它這位顧客的經濟情形（事實上確實如此），那末結果就是工業資本家愈來愈厲害地完全依賴於銀行。

⊙ 見“銀行”雜誌 1912 年第 1 期第 435 頁。

⊙ 引自舒爾采-格弗尼茨所著前文，見“社會經濟基礎叢刊”第 155 頁。

同时，銀行与工商業大企業之間的所謂个人联合也發展起来，双方通过占有股票，銀行經理任工商業企業的監事(或董事)，或者相反地由工商業企業的經理任銀行的監事等办法，而日益溶合起来。德国經濟学家厄伊得尔斯搜集了关于这种形式的資本集中和企業集中的極为詳細的材料。柏林6个最大的銀行的經理代表这些銀行参加了344个工業公司，它們的董事参加了407个公司，一共参加了751个公司。由它們占两个監事或監事会会长位置的公司，共有289个。在这些工商業公司中，有各种各样的工業部門，有保險業，有交通運輸業，还有飯館、戏院、美术工業等等。另一方面，在这6个銀行的監事会中(在1910年)有51个最大的工業家，其中有“克虜伯”炮厂的經理，巨大輪船公司《Hapag》(Hamburg—Amerika)⊙的經理等等。从1895—1910年間，这6个銀行中的每一个銀行都参加了数百个(由281个至419个不等)工業公司發行股票和債券的工作⊙。

除了銀行和工業进行“个人联合”以外，各銀行和各公司又同政府进行“个人联合”。厄伊得尔斯写道：“他們自願把監事的位置讓給很有声望的人物和去职的政府官吏，这些人可以使公司在同政府交涉的时候得到不少的方便(!!)……”“在大銀行的監事会里，常有国会議員或柏林市議会的議員。”

可見，所謂巨大資本家垄断公司的形成和發展，是循着一切“自然的”和“超自然的”路径十分迅速地进行的。結果就有步驟地形成了現代資本主义社会中几百个財政大王之間的一定的分工：

“一方面，个别大工業家的活动范围日益扩大”(加入銀行董事

⊙ “哈帕格”(航路是汉堡—美洲)。——編者注

⊙ 見厄伊得尔斯所著前書和里謝尔所著前書。

会等等)，“各外省銀行經理專門負責主持某个工業區域，同时，大銀行領導人中間的專業化也大大加强起来。一般說来，这种專業化只有在整个銀行企業的規模很大，尤其是它同工業的联系很广的时候，才可能实行。这种分工是在两个方面进行的：一方面，由某个經理专职主持同整个工業界联系的事情；另一方面，每个經理都亲自監督几个或几組在行業上利益上彼此相近的企業……”(資本主义已經發展到可以有組織地監督各个企業的程度了)“……某个經理專門負責管理德国工業，或者只管德国西部的工業”(德国西部是德国工業最發達的區域)，“其他的經理則專門負責同外国政府和外国工業联系，收集工業家等等的个人的消息，管理交易所業務等等。此外，銀行的每个經理又往往專門管理某个地方或某个工業部門；有的主要是在几个电力公司监事会里工作，有的是在几个化学工厂、啤酒厂或制糖厂里工作，有的是在几个单独的企業中工作，同时又参加保险公司监事会…… 总之，在大銀行里，随着銀行業務的扩大和种类的增多，領導人的分工無疑也就更加細密，目的(和結果)是要提高他們的能力，使他們不仅懂得單純的銀行事務，而且要更有能力判断和更熟悉工業的一般問題以及各个工業部門的特殊問題，培养他們在銀行势力之下的工業範圍內活动的 ability。除了这些办法以外，銀行还竭力挑选熟悉工業的人物、企業家、过去的官吏，尤其是在鐵路和矿务机关中工作过的人，来加入监事会”等等。⊖

在法国銀行事業里，也有这类的机构，不过形式稍微有点不同。例如，法国 3 个最大的銀行之一“里昂信貸公司”，專門設了一

⊖ 見厄伊得爾斯所著前書第 157 頁。

个“财政消息收集部”(service des études financières)。在那里工作的经常有五十多个工程师、统计学家、经济学家和法学家等等。这个机构每年耗资六七十万法郎。它自己又分成8科：有一科专门收集关于工业企业的消息，另一科研究一般的统计，第三科研究铁路公司和轮船公司，第四科研究证券，第五科研究财务报告等等。①

结果，一方面是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日益溶合起来，或者用布哈林的很中肯的说法，日益混合生长了；另一方面是银行变成了真正的“万能的”机构。我们认为必须引用厄伊得尔斯对这个问题的正确的看法，他是对这个问题最有研究的作家：

“我们考察了整个工业联系，结果发现那些专门为工业工作的财政机构是万能的。大银行同其他形式的银行正相反，有时著作中提出一些要求，如说银行应当专门从事于某一方面的业务或某个工业部门的工作，才不致丧失自己的立脚点，而大银行的做法也同这些要求正相反，大银行总是力求把自己同工业企业的联系在生产地区和生产部门上弄得尽量复杂，力求消灭各个地方或各个工业部门因各个企业历史情况不同而发生的资本分配不均的现象。”“一种趋势是使银行同工业的联系成为普遍的现象，另一种趋势是使这种联系更加巩固和紧密；这两种趋势在六大银行中虽然没有完全实现，但是已经在同样的程度上大规模地实现了。”

工商界经常有人埋怨银行的“恐怖主义”。只要从下面这个例子看看大银行是怎样“发号施令”的，那末听到这样的怨言也就不会奇怪了。1901年11月19日，柏林所谓D字银行(四个最大银行的名称都是以字母D开头的)之一，给“西北中德意志水泥辛迪加”

① 引自欧根·考夫曼所著论法国银行的文章，见“银行”杂志1909年第2期第851页及往下各页。

管理处写了这样一封信：“茲閱貴处本月 18 日在某报上登載的通知，我們应当認為貴辛迪加定于本月 30 日召开的全体大会，可能通过一些改革貴企業而为敝行所不能接受的決議。因此，我們感到十分遺憾，不得不停發貴辛迪加所享有的貸款……如此次大会并不通过敝行不能接受的決議，并对将来也不通过这种決議提出相当的保証，敝行仍願开始談判貸給貴辛迪加以新貸款的問題。”[⊙]

其实，这也就是小資本在埋怨大資本的压迫，不过这里列入“小”資本的，是整整的一个辛迪加罢了！大小資本之間的旧斗争，又在一个新的、高得無比的發展阶段上恢复起来了。当然，拥有亿万巨資的銀行企業，也能用从前远不能相比的办法来推动技术的进步。例如銀行設立專門的技术研究会等，研究的結果当然只能由“友好的”工業企業来享用。这一类机构有“电气铁道問題研究会”、“中央科学技术研究局”等等。

大銀行的領袖們自己不会看不到这里所形成的是国民經济的一些新条件，但是他們在这些条件面前只好表示束手無策。

厄伊得尔斯写道：“凡是在最近几年来考察过大銀行經理和監事人选变更情形的人，都不能不看出，权力逐漸轉到了一些認為積極干預一般工業的發展是大銀行必要的、愈来愈迫切的任务的人物手中，同时，这些人和旧式銀行經理之間又因此而發生一些事务关系上的，往往是个人关系上的意見分歧。實質上問題是在这里：銀行是一种信用机关，它会不会因为干預工業生产过程而受到損失呢；它会不会因为从事这种同信貸中介作用毫不相干的業務，从事这种会使它比从前更受工業行情的盲目支配的業務，而牺牲掉

⊙ 見奧斯卡尔·施提利赫博士所著“貨幣与銀行”1907年柏林版第148頁。

自己的穩固的原則和可靠的利潤呢。許多舊式的銀行領導人都這樣說。但是大部分新進的領導人却認為積極干預工業是不可避免的，正像隨着現代大工業的出現必然會產生大銀行和最新式的工業銀行企業一樣。雙方的意見只有一點相同，就是大家都認為大銀行的新業務既沒有什麼固定的原則，也沒有什麼具體的目的。”[⊖]

舊資本主義已經過時了。新資本主義是向某方面發展的一種過渡。要想尋找“固定的原則和具體的目的”來“調和”壟斷和自由競爭，當然是絕對辦不到的事情。這位實際工作者的自白的口吻，決不像資本主義的辯護人如舒爾采-格弗尼茨、利夫曼之流的“理論家”那樣，這些人是用官場的口吻來頌揚美妙的“有組織的”資本主義的。

大銀行的“新業務”究竟是什麼時候完全確立起來的呢，——關於這個重要的問題，我們可以从厄伊得爾斯那里找到相當確切的答復：

“現在工業企業間的聯系有新的內容、新的形式、新的機構，就是既集權而又分權的大銀行。這種聯系成為國民經濟的有代表性的現象，未必早於 1890 年；但是在某種意義上來說，甚至可以把這個起點移到 1897 年，因為在那個時候，各種企業都實行了大“合併”，為了適應銀行的工業政策而第一次造成了新式的分權組織。也許還可以把這個起點移到更晚一些的時候，因為只有 1900 年的危機才大大加速了工業和銀行業的集中過程，鞏固了這個過程，並第一次把銀行和工業的聯系變成大銀行的真正壟斷，使這種聯系比從前更加緊密鞏固。”[⊗]

⊖ 見厄伊得爾斯所著前書第 183—184 頁。

⊗ 同上書，第 181 頁。

总之，20世紀是旧資本主义进到新資本主义，一般資本統治进到財政資本的統治的轉折点。

三、財政資本和財政寡头

希法亭写道：“工業資本愈来愈不屬於运用工業資本的工業家。工業家只有通过銀行才能支配資本，对于工業家來說，銀行就是这种資本的所有者。另一方面，銀行也只好把自己資本愈来愈多地投到工業中去。因此，銀行一天天地变成工業資本家了。实际上变成了工業資本的这种銀行資本，即貨幣形式的資本，我叫它作財政資本。”“財政資本就是由銀行支配而由工業家运用的資本。”^①

这个定义是不完全的，因为有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它沒有指出来，那就是生产集中和資本集中已經發展到很高的程度，势必造成垄断，而且已經造成了垄断。但是，就希法亭的整个叙述來說，尤其是在他提出这个定义以前的那两章里，是着重地指出了資本主义垄断組織的作用的。

生产集中；由集中而产生垄断組織；銀行和工業溶合或混合生长，——这便是財政資本产生的历史和財政資本这一概念的内容。

現在我們应当来叙述一下，在商品生产和私有制的一般环境里，資本家垄断組織的“經營”必然会变为財政寡头的統治。应当指出，德国（而且不只是德国）資產階級科学界的代表人物，如里謝尔、舒尔采-格弗尼茨、利夫曼等人，完全是帝国主义和財政資本的辯护人。对于寡头制形式的“内幕”，寡头所采用的手段，寡头所获

① 見希法亭所著“財政資本”1912年莫斯科版第338—339頁。

得的“正当和不正当”收入的龐大，寡头和国会的联系等等，他們不但不去揭露，反而加以掩盖和粉飾。他們避开这些“棘手的问题”，只講一些堂皇而含糊的詞句，号召銀行經理們拿出“責任心”，贊揚普魯士官員們的“尽职精神”，板起面孔研究那些根本無關紧要的“監督”法和“条規”草案中的細微末节，玩弄理論的把戏等等，例如利夫曼教授居然写出了这样一个“科学的”定义：“……**商業是收集財富、保管財富、供应財富的一种業務活动**……”[⊖]（着重号和黑体字是利夫曼教授自己加的）这样說来，商業在不知道交换为何物的原始时代就已經有了，而且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也会存在下去！

但是，表明財政寡头駭人听聞的統治的駭人听聞的事实是太触目惊心了，所以在所有資本主义的国家里，無論是美国、法国或德国，都出現了这样一些著作，这些著作虽然抱着資產阶级的观点，但畢竟还是对財政寡头制作了一种近乎真实的描述和批評，当然是市僧式的批評。

首先要談的是前面已經講了一点的“参与制”。可以說德国經濟学家海曼是最先注意到这个制度的實質的人，现在就請看他对这个問題的敘述吧：

“领导人控制着总公司（直譯是“母亲公司”）；总公司又統治着依赖于它的公司（“女兒公司”）；后者又統治着‘孙女公司’等等。于是，拥有的資本并不太多，就可以統治巨大的生产部門。事实上，往往拥有 50% 的股本就能够控制整个股份公司。所以，一个领导人只要拥有 100 万資本，就能控制各‘孙女公司’的 800 万資本。要是这样‘交錯’下去，那末拥有 100 万資本就能控制 1 600 万、

⊖ 見罗·利夫曼所著前書第 476 頁。

3 200 万以至于更多的资本了。”^①

其实經驗証明，只要占有 40% 的股票就能操縱股份公司的業務^②，因为总有一部分分散的小股东实际上完全不可能参加股东大会。所謂股票占有权的“民主化”，虽然资产阶级的詭辯家和机会主义的“所謂社会民主党人”希望（或者硬要别人也希望）它会造或“资本的民主化”，加强小生产的作用和意义等等，可是实际上它不过是加强财政寡头实力的一种手段而已。因此，在比較先进的或比較老的和比較“老練的”资本主义国家里，法律是准許發行小額股票的。德国法律不許發行 1 000 馬克以下的股票，所以德国财政大王看見英国法律准許發行 1 英鎊（等于 20 个馬克，約合 10 个卢布）的股票，就羨慕不已。1900 年 6 月 7 日，德国最大的工業家和“财政大王”之一西門子，在德国国会中說：“1 英鎊的股票是不列顛帝国主义的基础。”^③ 这个商人对于帝国主义的理解，同号称俄国馬克思主义創始人的那位很不光采的作家⁸² 比起来，显然要深刻得多，“馬克思主义”得多，他不像那位作家那样，把帝国主义看成是某个民族的劣根性……

但是“参与制”不仅使垄断者的势力大大地增加，而且还使他們可以为所欲为地干一些見不得人的醜聞勾当，盘剝大众，因为“母亲公司”的領導人在形式上、在法律上是不替“女兒公司”負責的，“女兒公司”算是“独立的”，但是他們可以通过“女兒公司”“做出”种种的事情。下面是我們从德国“銀行”杂志 1914 年 5 月号上

① 見汉斯·吉德翁·海曼所著“德国大鋼鐵工業中的混合企業”1904 年斯圖加特版第 268—269 頁。

② 見利夫曼所著前書第 1 版第 258 頁。

③ 見舒尔采-格弗尼茨所著前文，見“社会經濟基础匯刊”第 5 卷第 2 期第 110 頁。

抄下来的例子：

“加塞尔城的‘弹簧钢铁股份公司’在几年以前算是德国最赚钱的企业之一。后来因为经营不善，股息从15%跌到0%。原来董事会没有得到股东的同意，就出借了600万马克给自己的一个‘女儿公司’——‘哈西亚’，而‘哈西亚’公司名义上的资本只有几十万马克。这笔几乎比‘母亲公司’的股本大2倍的借款，根本没有记在该公司的资产负债表上；在法律上，这样隐瞒帐目是完全合法的，而且可以隐瞒整整的两年，因为这样做并不违反任何一条商业法。监事会主席虽然以负责人的资格在这些假资产负债表上签了字，但他仍旧是加塞尔商会的会长。股东们知道这笔借给‘哈西亚’公司的款子，是远在这笔借款已被证明是个错误……”（错误这两个字，作者应当加上引号）“……知道底细的人都开始把‘弹簧钢铁股份公司’的股票卖出去而使股票价格几乎下跌了100%以后……”

……在股份公司里极常见的这种在资产负债表上玩弄平衡把戏的典型例子，说明为什么股份公司董事会干起冒险勾当来心里要比私人企业家轻松得多。最新的编制资产负债表的办法，不但使董事们能够把所干的冒险勾当瞒过普通的股东，而且使主要的当事人在冒险失败的时候，能够及时地把股票卖出去，以便推卸责任，而私人企业家却要用自己的性命来替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情负责……

许多股份公司的资产负债表，就跟中古时代有名的褪迹纸本一样，要先把上面写的字迹擦掉，才能发现下面的字迹，看出原稿的真实内容。”（褪迹纸本是涂掉原来的主要的字迹重新写上新内容的一种羊皮纸稿本。）

“最简单、因而也是最常用的一种把资产负债表弄得令人看不

懂的办法，是成立‘女兒公司’或合并‘女兒公司’，把一个統一的企業分成几部分。从各种合法的或非法的目的看来，这种办法的好处是十分明显的，所以現在不采用这种办法的大公司簡直成了个别的例外。”^①

作者在最大的垄断公司中举出了著名的“电气总公司”(即 A. E. G., 这个公司我們以后还要講到)，作为最大規模地使用这种办法的例子。据 1912 年的計算，这个公司参与了 175—200 个公司，当然就統治了这些公司，总共掌握了大約 15 亿馬克的資本^②。

好心的——有維護和掩飾資本主义的好心的——教授和官員們用来吸引一般人注意的办法，例如拟訂种种监督条例、公布資產負債表、制定一定的資產負債表格式、設立監察机构等等，在这里根本不能起任何作用。因为私有制是神聖的，誰也不能禁止股票的买卖、交換和典押等等。

“参与制”在俄国大銀行里發展到怎样的程度，我們可以根据叶·阿加德提供的材料来判断。阿加德在“道胜銀行”工作了 15 年，他在 1914 年 5 月出版了一本書，書名不十分确切，叫做“大銀行与世界市場”^③。作者把俄国大銀行分为两大类：(甲)“参与制”

① 見耳·厄什韦葛所著“女兒公司”(L. Eschwege: «Tochtergesellschaften»)一文，見“銀行”杂志 1914 年第 1 期第 545 頁。

② 見庫尔特·海尼希所著“电气托拉斯之路”(Kurt Heinig: «Der Weg des Elektrotrusts»)一文，見“新时代”杂志(«Neue Zeit») 1912 年第 30 卷第 2 期第 484 頁。

③ 見叶·阿加德所著“大銀行与世界市場。从大銀行对俄国国民經济和德俄两国关系的影响来看大銀行在世界市場上的政治和經济作用”(E. Agahd: «Grossbanken und Weltmarkt. Die wirtschaftliche und politische Bedeutung der Grossbanken im Weltmarkt unter Berücksichtigung ihres Einflusses auf Russlands Volkswirtschaft und die deutsch-russischen Beziehungen») 1914 年柏林版。

下的銀行；(乙)“独立的”銀行。他所謂的“独立”，是憑主觀的理解，指它不依賴于外国銀行。作者又把第一类分为三种：(1)德国参与的；(2)英国参与的；(3)法国参与的，——这是指由哪一国的国外最大的銀行“参与”和統治的。作者把銀行資本分为“生产性”的投資(投入工商業的)和“投机性”的投資(投入交易所和財政業務的)，他本着他那种小資產階級改良主义的观点，認為在保存資本主义的条件下，可以把第一种投資和第二种投資分开，而把第二种投資消灭掉。

作者提供的材料如下：

各銀行的資產(根据1913年10—11月的表报計算)

(单位100万卢布)

俄 国 銀 行 种 类	所 投 的 資 本		
	生产性的	投机性的	总 計
甲类(1) 4个銀行：西伯利亚商業銀行，俄罗斯銀行，国际銀行，貼現銀行……	413.7	859.1	1 272.8
甲类(2) 2个銀行：工商銀行，俄英銀行……	239.3	169.1	408.4
甲类(3) 5个銀行：道胜銀行，聖彼得堡私人銀行，亞速海頓河銀行，莫斯科联合銀行，俄法商業銀行……	711.8	661.2	1 373.0
(11个銀行) 共 計……	1 364.8	1 689.4	3 054.2
乙 类 8个銀行：莫斯科商人銀行，伏尔加河—卡馬河銀行，容克股份銀行，聖彼得堡商業銀行(从前的弗斐堡銀行)，莫斯科銀行(从前的列布申斯基銀行)，莫斯科貼現銀行，莫斯科商業銀行，莫斯科私人銀行……	504.2	391.1	895.3
(19个銀行) 共 計……	1 869.0	2 080.5	3 949.5

从这些材料看来，在約达40亿卢布的大銀行“活动”資本当

中,有 $\frac{3}{4}$ 以上,即三十多亿卢布属于实际上是作为外国银行的“女兒公司”的那些銀行;而在这些外国銀行中占主要地位的是巴黎的銀行(著名的三大銀行:巴黎联合銀行,巴黎荷兰銀行,总公司)和柏林的銀行(特别是德意志銀行和貼現公司)。俄国两个最大的銀行“俄罗斯銀行”(“俄罗斯对外貿易銀行”)和“国际銀行”(“聖彼得堡国际商業銀行”),在1906--1912年間,把資本由4400万卢布增加到9800万卢布,把准备金由1500万增加到3900万卢布,“其中 $\frac{3}{4}$ 用的是德国的資本”;前一个銀行属于柏林“德意志銀行”的“康采恩”,后一个銀行属于柏林“貼現公司”的“康采恩”。善良的阿加德对于柏林銀行握有大部分股票,而使俄国股东軟弱無力,感到十分憤慨。自然,輸出資本的国家总是获得最多的利益:例如柏林的“德意志銀行”,在柏林發行了西伯利亚商業銀行的股票,把这些股票放在自己的柜子里,放了一年之后,以193%的价格,即几乎以两倍的价格售出,“賺了”約600万卢布的利潤,这就是希法亭所說的“創業利潤”。

据該書作者計算,彼得堡各最大銀行的全部“实力”等于823500万卢布,几乎达到825000万之多;同时作者又把各个外国銀行的“参与”,确切些說,各个外国銀行的統治計算如下:法国銀行占55%,英国銀行占10%,德国銀行占35%。据作者計算,在这823500万活动資本当中,有368700万,即40%以上属于各辛迪加,即“煤炭公司”、“五金公司”、石油業辛迪加、冶金業辛迪加、水泥業辛迪加。可見,由于資本家垄断組織的形成而造成的銀行資本和工業資本的溶合,在俄国也有了长足的进展。

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而又享有实际垄断权的財政資本,由于創辦企業、發行有价証券、經營国家公債等等而获得大量的愈来愈多

的利潤，巩固了財政寡头的統治，替垄断者向整个社会征收貢稅。下面是希法亭从美国托拉斯的“經營”情况的無数实例中举出的一个例子：1887年加韦麦尔把15个小公司合并成一个糖業托拉斯，資本总額为650万美元。这个托拉斯的資本正像美国人所說的那樣，是“滲了水”的，竟估定为5000万美元。这样“过高地估計資本額”是因为預計到将来的垄断利潤，正像美国的鋼業托拉斯因为預計到将来的垄断利潤，就購買了很多很多的鉄矿山一样。后来，这个糖業托拉斯果然規定了垄断价格，获得了巨額的收入，竟能为“滲水”七倍的資本支付10%的股息，也就是为創辦托拉斯时实际收到的資本支付将近70%的股息！到1909年，这个托拉斯的資本已經达到9000万美元。在22年內，資本增加了十几倍。

法国的“財政寡头”的統治（“反对法国財政寡头”，是里季斯一本名著的名字，1908年出了第5版），只不过形式稍微有点不同而已。4个最大的銀行在發行有价証券方面所享有的，不是相对的垄断权，而是“絕对的垄断权”。事实上这是“几个大銀行的托拉斯”。垄断权保証它們能从發行有价証券获得垄断利潤。在出借外債时，借債的国家所得到的通常不超过总数的90%；其余的10%被銀行和其他中介人拿去了。銀行从發行4亿法郎的中俄公債中得到8%的利潤，从8亿法郎的俄国公債（1904年）中得到10%的利潤，从6250万法郎的摩洛哥公債（1904年）中得到18.75%的利潤。資本主义的發展是从小規模的高利貸資本开始，而以大規模的高利貸資本結束。里季斯說：“法兰西人是欧洲的高利貸債主。”各种經濟生活条件都由于資本主义的这种蛻化而發生了深刻的变化。在人口增加迟緩、工商業和海运等等停頓的情况下，“国

家”却能够靠借出高利貸来發財。“50个人每人拿出800万法郎的資本，就能够支配4个銀行所有的20亿法郎”。我們談过的那个“参与”制，也造成了同样的結果。最大銀行之一的“总公司”(Société Générale)为“女兒公司”“埃及方糖厂”發行了64 000张債券。發行的行市是150%，也就是銀行在每一个卢布上賺了50个戈比。后来發現这个“女兒公司”的股息是虛假的，这样就使“大众”損失了9 000万至1亿法郎；而“‘总公司’的經理之一，就是‘方糖厂’的董事”。难怪这位作者不得不做出結論說：“法兰西共和国是財政寡头专制国”；“財政寡头統治一切，既控制着報紙，又控制着政府。”[⊖]

發行有价証券，是財政資本的主要業務之一。这种業務的特別高的利潤，对于財政寡头制的發展和巩固起着極重大的作用。德国的“銀行”杂志写道：“在發行外国公債的时候担任中介人，获得的利潤是十分高的，在国内从事任何投机倒把的勾当也不能获得同它相近的利潤。”[⊖]

“沒有哪一種銀行業務能够获得像發行事業那么高的利潤。”据“德国經濟学家”杂志的統計，發行工業企業証券每年平均的利潤率如下：

1895年——38.6%	1898年——67.7%
1896年——36.1%	1899年——66.9%
1897年——66.7%	1900年——55.2%

“在1891—1900年的10年間，靠發行德国工業証券‘賺’的錢

⊖ 見里季斯所著“反对法国財政寡头”(Lysis: «Contre l'oligarchie financière en France») 1908年巴黎第5版第11、12、26、39、40、48等頁。

⊖ 見“銀行”杂志1913年第7期第630頁。

有10亿以上”[⊖]。

在工业高涨的时期，财政资本获得大得无比的利润，而在小企业和不稳固的企业纷纷倒闭的衰落时期，大银行就“参与”贱价收买这些企业，或从事有利可图的“整理”和“改组”这些企业的业务。在“整理”这些亏本的企业时，“把股份资本降低，也就是按照比较小的资本额来分配收入，以后就按照这个资本额来计算收入了。如果收入降低到零，就吸收新的资本，这种新资本同收入比较少的旧资本结合起来，也将获得相当多的收入。”希法亭又补充道：“而且，所有这些整理和改组的事業，对于银行有双重的意义：第一、这是一种有利可图的業務；第二、这是迫使经济窘迫的公司依赖于银行的好机会。”[⊗]

请看下面的例子。多特蒙特城的矿业“联合”股份公司，是在1872年创办的。发行的股票约4000万马克，而在第一年获得12%的股息时，股票市价就涨到170%。财政资本尝到了甜头，赚了2800万的小利。在创办这个公司的时候，起主要作用的还是那个把资本很顺利地增加到3亿马克的德国最大的银行“贴现公司”。后来“联合”股份公司的股息降低到零了。股东们只好赞成“勾销”资本，也就是损失一部分资本，以免全部资本损失。经过多次“整理”，在30年中，“联合”股份公司的账簿上消失了七千三百多万马克。“现在，这个公司原先的股东们手里的股票，只剩下票面价值的5%了”[⊘]，而银行在每一次“整理”中总是“赚钱”的。

⊖ 见施提利赫所著前书第143页；并见威·桑巴特所著“19世纪的德国国民经济”（W. Sombart: «Die deutsche Volkswirtschaft im 19. Jahrhundert»）1909年第2版第526页，附录（8）。

⊗ 见“财政资本”第172页。

⊘ 见施提利赫所著前书第138页，以及利夫曼所著前书第51页。

用發展得很快的大城市近郊的土地来做投机生意，也是財政資本的一种特別有利的業務。在這方面，銀行的壟斷同地租的壟斷、也同交通運輸業的壟斷結合起來了。因為地價的上漲，以及土地能不能分成小塊有利地賣出去等等，首先要看同城市中心的交通是否方便，而這些交通運輸業又操縱在那些通過參與制和擔任經理職務同這些銀行聯系的各大公司手里。結果就形成了被“銀行”雜誌的撰稿人、專門研究土地買賣和典押等業務的德國作家耳·厄什韋葛稱做“泥潭”的局面：城郊土地的投机狂，建築公司的倒閉（如柏林的“波斯瓦—克諾爾公司”的倒閉，這個公司靠了“最大最可靠的”“德意志銀行”（Deutsche Bank）的幫助，抓到了1億馬克的巨款，這個銀行當然是通過“參與”制暗地里在背後活動，結果銀行“不過”損失1200萬馬克了事），從空架子的建築公司那里一無所得的小業主和工人們的破產，以及同“廉潔的”柏林警察局和行政機關勾結起來行騙，霸占發給土地證和市議會建築准許證的工作等等[⊖]。

“美國的風氣”本來是歐洲的教授和好心的資產者們假惺惺地憎惡的，而在財政資本時代，它簡直成了各國各大城市流行的風氣了。

1914年初，在柏林傳說要組織一個“運輸業托拉斯”，由柏林的3個運輸企業（城市電氣鐵路公司，電車公司和公共馬車公司）組成一個“同益”公司。“銀行”雜誌寫道：“當公共馬車公司的大部分股票轉到其他兩個運輸公司手里的消息傳出時，我們就知道有這種打算了。……本來完全可以相信，抱着這種目的的人是希望

⊖ 見耳·厄什韋葛所著“泥潭”（L. Eschwege: «Der Sumpf»）一文，見“銀行”雜誌1913年第952頁，同上雜誌1912年第1期第223頁及往下各頁。

通过統一調整運輸業來節省一些費用，這樣對於大眾終究也是有好處的。但是，這個問題弄複雜了，因為站在這個新創的運輸托拉斯背後的是大銀行，它們可能任意利用自己所壟斷的交通運輸業去適應自己的土地買賣的利益。只要回想一下下面這件事情，就會相信這種推論是十分自然的：在創辦城市電氣鐵路公司的時候，鼓勵創辦該公司的那個大銀行的各種利益就已經滲透進來了。就是說，這個運輸企業的利益和土地買賣的利益互相交錯在一起了。因為這條鐵道的東綫要經過銀行的土地，當該路的建設已經有保證時，銀行就把它這些土地賣出去，使自己和幾個參與人獲得了巨額的利潤……”^①

壟斷既然已經形成，而且操縱着幾十億資本，它就絕對不可避免地要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个方面去，而不管政治制度或其他任何“細節”如何。在德國經濟著作中，通常都是阿諛地贊美自己普魯士官員的廉潔，而指責法國人的巴拿馬運河舞弊案件⁸³和美國人在政治上的賄賂風氣。但是實際上，甚至專論德國銀行業的資產階級著作中，也不得不經常談到遠遠越出單純銀行業務範圍的事情，例如，因為官員們轉到銀行去服務的事實愈來愈多，有人寫了一篇叫作“鑽進銀行的欲望”的文章，文章中說：“暗地里想在培廉街”（在柏林，“德意志銀行”設在那里）“鑽營一個肥缺的德國官員，他們的廉潔情形究竟怎樣呢？”^②“銀行”雜誌出版人阿爾弗勒德·蘭斯堡在1909年寫了“拜占庭主義的經濟意義”一文，曾談到威廉

① 見“運輸業托拉斯”（《Verkehrstrust》）一文，見“銀行”雜誌1914年第1期第89頁。

② 見“鑽進銀行的欲望”（《Der Zug zur Bank》）一文，見“銀行”雜誌1909年第1期第79頁。

二世到巴勒斯坦去的旅行，以及“此行的直接結果，即巴格達鐵道的建築”，作者認為“這一不幸的‘德意志進取精神的大事件’，對於德國受到‘包圍’一事”（所謂“包圍”是指愛德華七世力圖孤立德國，用帝國主義的反德同盟圈來包圍德國的政策）“應負的責任，比我們所犯的一切政治錯誤所應負的責任還要大”^①。我們已經提過的這個雜誌的撰稿人厄什韋葛，在1911年寫了一篇“財閥和官吏”的文章，揭露了一位德國官員費爾克爾的事情。費爾克爾本來是卡特勒問題委員會的委員，做事很努力，但是不久以後就在最大的卡特勒——鋼業辛迪加得到了一個肥缺。這類事件決不是偶然的，因此這位資產階級的作家不得不承認說，“德國憲法所保證的在經濟生活的許多方面的經濟自由，竟成了失去內容的空話”，在現有的財閥統治下，“即使有最普遍的政治自由，也不能保證我們不至變成不自由的人民”^②。

說到俄國，我們只舉一個例子。幾年以前，所有的報紙都登載過一個消息，說信貸局經理達威多夫辭去了政府的職務到一個大銀行里任職去了，按照合同，他在幾年里所得的薪俸將超過100萬盧布。這個信貸局是個“統一全國所有信貸機構的業務”的機關，它給了首都各銀行總數達8—10億盧布的津貼^③。

資本主義的一般特性，就是資本的所有權同資本對生產的投資權分離，貨幣資本同工業資本或生產資本分離，全靠貨幣資本的收入為生的食利者同企業家和其他一切直接參與運用資本的人分離。帝國主義或財政資本統治，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這時候，

① 見“銀行”雜誌第301頁。

② 見同上雜誌1912年第2期第825頁；1913年第2期第962頁。

③ 見叶·阿加德所著前書第202頁。

这种分离达到了极大的程度。财政资本处在一切其他形式的资本之上，这表明食利者和财政寡头占有统治地位，表明少数拥有财政“实力”的国家处在其余一切国家之上。至于这一过程已经到了怎样的程度，可以从发行证券，即发行各种有价证券的统计中看出来。

阿·奈马尔克在“国际统计研究所公报”^①上发表了关于全世界发行证券的最详尽最完备的对照性的材料，后来这些材料曾屡次被各经济著作分别地引用过。下面是四个十年中的总数：

每十年内发行证券的数目(单位 10 亿法郎)

1871—1880年.....	76.1
1881—1890年.....	64.5
1891—1900年.....	100.4
1901—1910年.....	197.8

在 19 世纪 70 年代，特别是由于进行普法战争以及德国在战后滥设投机公司而发行公债的缘故，全世界发行证券的总数增加了。大体说来，在 19 世纪最后三个十年里，增加的速度比较起来还不算太快，直到 20 世纪的头十年，才飞快地增加起来，10 年内差不多增加了 1 倍。可见 20 世纪初期是一个转变时代，不仅是我們已经说过的垄断组织(卡特尔、辛迪加、托拉斯)增长上的转变时代，而且是财政资本增长上的转变时代。

据奈马尔克计算，1910 年全世界有价证券的总数大约是 8 150 亿法郎。他又减去了大致上的重复数字，把这个数目缩小到 5 750—6 000 亿法郎。下面是这个数目在各国分布的情形(这里

① “国际统计研究所公报”(«Bulletin de l'institut international de statistique»)1912 年海牙版第 19 卷第 2 册。——统计表第 2 栏，即关于各个小国家的材料，大体上是按 1902 年的标准增加了 20%。

引用的总数是 6 000 亿)：

1910年有价証券数目表(单位10亿法郎)

英国.....	142	} 479	荷兰.....	12.5
美国.....	132		比利时.....	7.5
法国.....	110		西班牙.....	7.5
德国.....	95		瑞士.....	6.25
俄国.....	31		丹麦.....	3.75
奥—匈.....	24		瑞典、挪威、罗马尼亚 等国.....	2.5
意大利.....	14			
日本.....	12		总 共	600.0

从这些数字一下子就可以看出，各拥有 1 000—1 500 亿法郎有价証券的四个最富的资本主义国家是多么突出。其中有两个是最老的、殖民地最多的(这一点我們以下就要說到)资本主义国家，就是英国和法国；其余两个是在發展速度上和生产中资本主义垄断組織的广泛程度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就是美国和德国。这四个国家一共有 4 790 亿法郎，約占全世界財政資本的 80%。世界上其他各国，差不多都是这样或那样地成了这四个国家、这四个国际銀行家、这四个世界財政資本的“台柱”的債務人和进貢者了。

現在，我們应当特別研究一下資本輸出在財政資本的依賴和联系的国际网的形成中所起的作用。

四、資本輸出

自由竞争占完全的統治地位的旧资本主义的特征是商品輸出。垄断占統治地位的現代资本主义的特征是資本輸出。

资本主义是发展到最高阶段的商品生产，这时候劳动力也成了商品。国内交换，尤其是国际交换的发展，是资本主义的鲜明的特征。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各个企业、各个工业部门和各个国家的发展必然是不平衡的，跃进的。英国成为资本主义国家比其他各国都早，到19世纪中叶时，英国就实行自由贸易，企图成为“世界工厂”，由它供给各国成品，这些国家则供给它原料作为交换。但是英国的这种垄断地位，在19世纪最后的25年已经被破坏了，因为当时有一些国家实行“保护”关税以自衛，发展成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了。到20世纪开始时，已经形成了另一种垄断：第一、所有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都有了资本家的垄断同盟；第二、少数积累了大量资本的最富的国家已经处于垄断地位。在先进的国家里出现了大量的“过剩资本”。

假如资本主义能推进现在到处都远远落在工业后面的农业的发展，假如资本主义能提高在今天这种技术惊人进步的情况下仍然到处是半飢半飽、乞丐不如的人民大众的生活水平，那当然不会有什么过剩资本了。用小资产阶级观点来批评资本主义的人，就常常讲这种“道理”。但是这样一来，资本主义就不成其为资本主义了，因为发展的不平衡和大众的半飢半飽的生活水平，是这种生产方式的根本的、必然的条件和前提。只要资本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过剩的资本就不会用来提高本国民众的生活水平，因为这样会降低资本家的利润；他们只会把资本输到国外去，输到落后的国家去，以提高利润。在这些落后的国家里，利润通常都是很高的，因为那里资本少，地价比较低。工资低，原料也便宜。其所以有输出资本的可能，是因为许多落后的国家已经卷入世界资本主义的流通范围，主要的铁路线已经建成或已经开始兴建，发展工业的起碼

条件已有保証等等。其所以有輸出資本的必要，是因为資本主义在少数国家中已經“成熟过度了”，“获利的”投資場所已經不够了（在农業不發达和群众貧困的条件下）。

下面是三个主要国家国外投資的大概数目[⊖]：

国外投資(单位 10 亿法郎)				
年 份	英 国	法 国	德 国	
1862 年.....	3.6	—	—	
1872 年.....	15	10(1869年)	—	
1882 年.....	22	15(1880年)	?	
1893 年.....	42	20(1890年)	?	
1902 年.....	62	27—37	12.5	
1914 年.....	75—100	60	44.0	

由此可見，資本輸出是在 20 世紀初期才飞快地發展起来的。在大战前夜，三个主要国家的国外投資已經达到 1 750—2 000 亿

⊖ 霍布森所著“帝国主义”(Hobson: «Imperialism») 1902 年倫敦版第 58 頁；里謝尔所著前書第 395 頁和 404 頁；普·阿倫特(P. Arndt)的文章，見“世界經濟文匯”(«Weltwirtschaftliches Archiv») 1916 年版第 7 卷第 35 頁；奈馬尔克(Neymarck)的文章，見公報(Bulletin)；希法亭所著“財政資本”第 492 頁；勞合-乔治(Lloyd-George) 1915 年 5 月 4 日在英国下議院的演說，見 1915 年 5 月 5 日的“每日電訊”(«Daily Telegraph»)；貝·哈尔姆斯所著“世界經濟問題”(B. Harms: «Probleme der Weltwirtschaft») 1912 年耶拿版第 235 等頁；济格蒙德·施尔德尔博士所著“世界經濟發展趨勢”(Dr. Siegmund Schilder: «Entwicklungstendenzen der Weltwirtschaft») 1912 年柏林版第 1 卷第 150 頁；乔治·派施所著“大不列顛的投資及其他”(George Paish: «Great Britain's Capital Investments etc.») 一文，見“皇家統計学会杂志”(«Journal of the 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 第 74 卷 1910 至 1911 年号第 167 頁及往下各頁；若尔日·迪烏里奇所著“隨着德国經濟發展而来的德国銀行在国外的擴展”(Georges Diouritch: «L'Expansion des banques allemandes à l'étranger, ses rapports avec le développement économique de l'Allemagne») 1909 年巴黎版第 84 頁。

法郎。按最低的利率 5 厘計算，这笔巨款的收入每年会有 80—100 亿法郎。这就是帝国主义压迫和剝削世界上大多数民族和国家的坚实基础，这就是少数最富国家的资本主义寄生性的坚实基础！

这种国外投資在各国之間究竟怎样分配的，究竟投在什么地方，对于这个問題，我們只能作一个大概的回答，这个大概的回答也足以說明現代帝国主义的某些一般的相互关系和联系了：

国外投資在世界各洲分布的大概情形(1910年左右)

(单位 10 亿馬克)

	英 国	法 国	德 国	总 数
欧洲·····	4	23	18	45
美洲·····	37	4	10	51
亚洲、非洲、澳洲·····	29	8	7	44
共 計·····	70	35	35	140

在英国占第一位的是它的殖民地領土，它在美洲也有广大的殖民地（例如加拿大），亚洲和其他各洲更不必說了。英国資本的大量輸出，同大量的殖民地領土有最密切的联系，关于殖民地对帝国主义的意义，我們以后还要講到。法国的情形不同。它的国外投資主要是在欧洲，首先是在俄国（不下 100 亿法郎），并且多半是借貸資本，国家公債，而不是对工業企业的投資。法国帝国主义与英国殖民帝国主义不同，可以叫作高利貸帝国主义。德国帝国主义又是另外一种，它的殖民地不多，它的国外投資比較平均地分布于欧美两洲。

資本輸出总要影响到輸入資本的国家的资本主义發展，大大促进那里的资本主义發展。虽然資本輸出会在某种程度上引起輸出国發展上的一些停滞，但是这种停滞只会换来扩大和加深资本主义在全世界的进一步的發展。

輸出資本的國家，幾乎總有可能獲得相當的“利益”，這種利益的性質也就暴露出財政資本和壟斷組織的時代的特性。例如柏林的“銀行”雜誌在1913年10月寫道：

“在國際的資本市場上，近來正在上演一幕很值得阿里斯托芬勁筆描寫的滑稽劇。很多外國國家，從西班牙到巴爾干，從俄國到阿根廷、巴西和中國，都在公開或秘密地向巨大的貨幣市場要求貸款，有時還要求得十分急迫。現在貨幣市場上的情形並不怎樣美妙，政治的前途也未可樂觀。但是，沒有一個貨幣市場敢於拒絕貸款，唯恐鄰國搶先同意了借款而一再獲得相當的報酬。在締結這種國際契約時，債權人幾乎總是占便宜的：商務條約上的讓步，開設煤站，建設港口，利益丰厚的租讓，定購大炮。”^①

財政資本造成了壟斷組織的時代。而壟斷組織則到處實行壟斷的原則：利用“聯系”來訂立有利的契約，取消了公開市場上的競爭。最普遍的現象，就是規定拿一部分借款來購買債權國的產品，尤其是軍用品、輪船等等，作為借款的條件。法國在最近20年來（1890—1910年）就常常採用這種手段。資本輸出成了鼓勵商品輸出的手段。在這種情形下，特別巨大的企業之間訂立契約，往往像施爾德爾“溫和地”描寫的那樣^②，“很像實行收買”。德國的克虜伯、法國的施奈德、英國的阿爾姆斯特朗格，就是這種同大銀行和政府有緊密聯系的公司的標本，在締結借款條約時，是不容易“瞞過”它們的。

法國貸款給俄國的時候，就在1905年9月16日締結的商務條約上把俄國“壓”了一下，取得了直到1917年為止的相當的讓

^① 見“銀行”雜誌1913年第2期第1024頁。

^② 見施爾德爾所著前書第346、350、371頁。

步；在1911年8月19日同日本締結商务条約时，也是如此。奥地利和塞爾維亞的关税战争从1906年开始，一直繼續到1911年，中間只有7个月的休战，这次关税战争部分地是由奥地利和法国在供应塞爾維亞軍用物資方面發生的竞争引起的。1912年1月，保尔·德沙尼尔在議會里說，法国各公司在1908—1911年間供給塞爾維亞的軍用品，价值达4500万法郎。

奥匈帝国駐沙保羅（巴西）領事在报告中說：“巴西建筑铁路，大部分用的是法比英德等国的資本；这些国家在办理同建筑铁路有关的財政業務时，获得了供給铁路建筑材料的特权。”

这样看来，財政資本的密网真正可以說是布滿了世界各国。在这方面起了很大作用的是設在殖民地的銀行及其分行。德国帝国主义者看見“老牌”殖民国家在这方面特別“順利”，真是羨慕不已。在1904年，英国有50个殖民地銀行和2279个分行（1910年有72个銀行和5449个分行），法国有20个殖民地銀行和136个分行，荷兰有16个殖民地銀行和68个分行，而德国“只有”13个殖民地銀行和70个分行^①。美国資本家也羨慕英德两国的資本家，他們在1915年訴苦說：“在南美洲，5个德国銀行有40个分行，5个英国銀行有70个分行……最近25年来，英德两国在阿根廷、巴西和烏拉圭投了約40亿美元的資本，結果支配了这3个国家全部商業的46%。”^②

① 見里謝尔所著前書第4版第375頁；并見迪烏里奇所著前書第283頁。

② 見“美国政治社会科学院年鑒”（《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1915年5月第59卷第301頁。在这卷第331頁上又写着：据著名的統計学家派施（Paish）在最近一期的財政杂志“統計学家”（《Statist》）上的計算，英德法比荷五国輸出的資本总数是400亿美元，等于2000亿法郎。

从假借的意义來說，輸出資本的国家已經把世界分完了。但是，財政資本又引起了直接的分割世界。

五、各个資本家同盟分割世界

資本家的垄断同盟，即卡特尔、辛迪加、托拉斯，首先分割国内市場，在不同程度上把本国的生产完全霸占在自己手里。但是在資本主义下，国内市場必然是同国外市場相联系的。資本主义早已造成了世界市場。所以随着資本輸出的增加，随着各种国外联系和殖民地联系的扩大，随着最大垄断同盟的“势力范围”的扩张，“自然”会引起这些垄断同盟之間达成国际协定，形成国际卡特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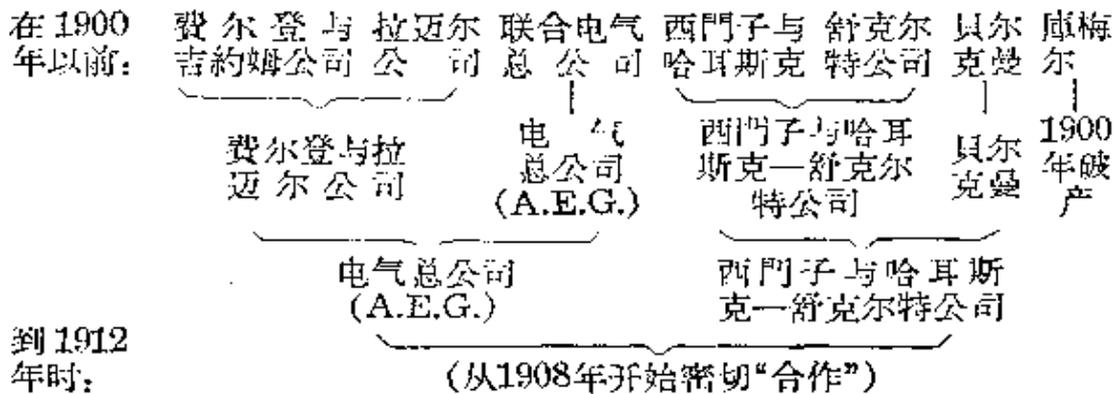
这是全世界資本集中和生产集中的新阶段，这一阶段的集中的程度是过去远不能相比的。我們来看看这种超級垄断是怎样發展起来的。

电气工業是最能代表最新的技术成就和 19 世紀末、20 世紀初的資本主义的一个工業部門。它在美国和德国这两个最先进的新兴資本主义国家里最發达。在德国，1900 年的危机特別有力地促进了这个部門的集中。当时已經同工業相当紧密地混合生长在一起的銀行，在这个危机时期大大地加速和加深了比較小的企業的灭亡和比較小的企業被大企業并吞的过程。厄伊得尔斯写道：“銀行拒絕援助的正是那些最需要帮助的企業，于是那些同銀行联系不够紧密的公司，起初虽有蓬勃的發展，后来却遭到了無法挽救的破产。”[⊖]

⊖ 見厄伊得尔斯所著前書第 232 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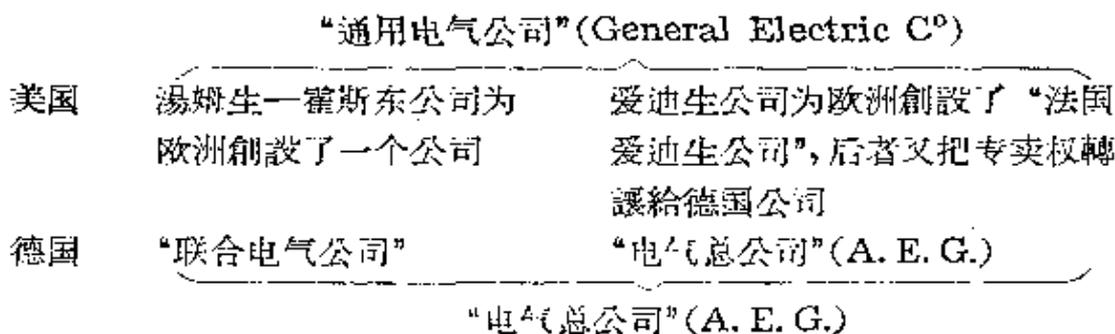
結果在1900年以后，集中有了长足的进展。在1900年以前，电气工业中有七八个“集团”，每个集团都是由几个公司组成的（总共有28家公司），每个集团背后有2—11个银行。到1908—1912年时，所有这些集团都合并成两个或一个集团了。这个过程如下：

电气工业中的集团



这样发展起来的著名的 A. E. G. (电气总公司) 统治着 175—200 个公司(通过“参与”制)，总共支配着约 15 亿 馬克的资本。单是它在国外的直接代表机构就有 34 个，其中有 12 个是股份公司，分设在十多个国家中。德国电气工业在国外的投资，远在 1904 年就有 23 300 万 馬克，其中有 6 200 万投在俄国。不用说，这个“电气总公司”是一个极大的“联合”企业，单是它的制造公司就有 16 个，制造各种各样的产品，从电缆和绝缘体起，到汽车和飞机为止。

但是，欧洲的集中也就是美国集中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其经过情形如下：



于是形成了两个电气“强国”。海尼希在他的“电气托拉斯之路”一文中写道：“世界上没有一个完全不依赖它们的电气公司。”关于这两个“托拉斯”企业的周轉額和規模，下列数字能使我們得到一个很不完全的概念：

	商品周轉 (单位100万馬克)	職員人数	純 利 (单位100万馬克)
美国的“通用电气公司”			
(G.E.C.)……………	1907年: 252	28 000	35.4
	1910年: 293	32 000	45.6
德国的“电气总公司”			
(A.E.G.)……………	1907年: 213	30 700	14.5
	1911年: 362	60 800	21.7

后来在 1907 年，美国的托拉斯和德国的托拉斯締結了分割世界的条約。竞争从此停止了。美国的“通用电气公司”(G.E.C.)“获得了”美国和加拿大；德国的“电气总公司”(A.E.G.)“分得了”德国、奥国、俄国、荷兰、丹麦、瑞士、土耳其和巴尔干。又締結了特殊的(当然是秘密的)关于“女兒公司”的条約，这些“女兒公司”正在渗入新的工业部門和还没有正式分割的“新的”国家。此外还规定了互相交换發明和实验成績。①

要同这个实际上是統一的，支配着几十亿資本的，有遍布世界各地的“分支机构”、代表机关、代办处及联系网等等的世界性托拉斯竞争，自然是十分困难的。但是，这两个强大的托拉斯分割世界的事实，当然不能排除重新分割世界的可能，如果实力对比由于不平衡發展、战争、破产等等而发生变化，那时是有这种可能的。

煤油工业就是企圖实行这种重新分割，为重新分割而斗争的

① 見里謝尔所著前書；迪烏里奇所著前書第 239 頁；庫尔特·海尼希所著前文。

一个很值得注意的例子。

厄伊得尔斯在 1905 年写道：“世界的煤油市場現在还是由美国洛克菲勒的‘煤油托拉斯’（《Standard Oil C-y》）和俄国巴庫油田的主人路特希尔德与諾貝尔这两个大財政集团分割着。这两个集团有密切的联系，但是几年以来，它們的垄断地位一直受到五大敌人的威胁”[⊖]；（1）美国石油源的枯竭；（2）巴庫的曼塔舍夫公司的竞争；（3）奥国的石油源；（4）羅馬尼亚的石油源；（5）海外的石油源，特别是荷屬殖民地的石油源（極富足的“賽米尔”公司和“协尔”公司，也是同英国資本有联系的）。后面三个地区的企業是同最大的“德意志銀行”所领导的那些德国大銀行有联系的。这些銀行为了拥有“自己的”据点而有計劃地独自發展煤油工業，例如在羅馬尼亚。羅馬尼亚的煤油工業中，1907 年有外国資本 18 500 万法郎，其中德国資本占 7 400 万。[⊗]

斗争开始了，这个斗争在經濟著作中叫做“瓜分世界”的斗争。一方面，洛克菲勒的“煤油托拉斯”想夺取一切，就在荷兰境內办了一个“女兒公司”，又收买荷屬印度的石油源，想以此来打击自己的主要敌人，也就是打击英荷合資創办的“协尔”托拉斯。另一方面，“德意志銀行”和其他柏林銀行又力求把羅馬尼亚“保持”在“自己”手里，使羅馬尼亚同俄国联合起来反对洛克菲勒。但是，洛克菲勒拥有大得多的資本，又拥有运输煤油和供应煤油給消費者的出色的組織。斗争的結果應該是“德意志銀行”完全失敗，在 1907 年它果然完全失敗了，这时“德意志銀行”只有两条出路：或者是甘願損失数百万并且放弃自己的“煤油利益”，或者是屈服。結果“德

⊖ 見厄伊得尔斯所著前書第 193 頁。

⊗ 見迪烏里奇所著前書第 245 頁。

意志銀行”选择了后一条出路，同“煤油托拉斯”訂立了对自己很不利的条約。按照这个条約，“德意志銀行”必須“不做任何損害美国利益的事情”，但是同时又規定，一旦德国通过了由政府垄断煤油的法律，这个条約就失效了。

于是一幕“煤油滑稽剧”开始了。德国一个財政大王、“德意志銀行”的經理馮·格文涅尔，通过自己的私人秘書什塔烏斯进行主张煤油垄断的宣传。这个最大的柏林銀行的整个龐大机构及其一切广泛的“联系”都开动起来了，报刊上充滿了反对美国托拉斯“压制”的“爱国主义的”叫囂。1911年3月15日，德国国会几乎是一致地通过了請求政府制定煤油垄断法案的決議。政府欣然接受了这个“大众欢迎的”主张。于是，“德意志銀行”欺騙它的美国对手、用国家垄断来恢复自己業務的这一場賭博，好像是已經贏了。德国煤油大王已經做着获得不亚于俄国糖厂主人的大量利潤的美梦……但是，第一、德国各大銀行在分贓上發生了爭吵，“貼現公司”揭露了“德意志銀行”貪圖私利的企圖；第二、政府不敢同洛克菲勒斗争，因为德国是否能不通过洛克菲勒而获得煤油还很成問題（羅馬尼亞的生产率不大）；第三、在1913年，正赶上德国要拨款10亿来准备战争。垄断的法案搁下来了。斗争的結果是洛克菲勒的“煤油托拉斯”暂时获得了胜利。

柏林的“銀行”杂志談到这点时写道，德国只有实行电力垄断，变水力为廉价的电力，才能同“煤油托拉斯”斗争。这个杂志接着又說：但是，“电力垄断只有在生产者需要的时候才会实现；也就是說，只有在下一次电力工業大危机逼近，各私营电力工業‘康采恩’現在在各地設立的已經从市政府和国家等方面获得了某些部分垄断权的那些成本高昂的巨型电站不能获利的时候，才会实现。

到那时候就只好使用水力；但是也不能由政府出錢来把水力变成廉价的电力，还是要交给‘受政府监督的私人垄断组织’去经营，因为私营工业已经订立了许多契约，有了获得巨量报酬的保证……以前钾的垄断是如此，现在煤油的垄断是如此，将来电力的垄断也是如此。我们那些给美妙的原则迷住了的国家社会主义者，现在总应当了解到：德国的垄断组织，从来没有抱定过想使消费者获得利益或者给政府一部分企业利润的目的，也没有达到过这样的结果，垄断不过是由国家出錢来挽救快要破产的私营工业的一种手段罢了。”^①

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不得不作出这种宝贵的供认。在这里，我们很清楚地看到，财政资本时代的私人垄断和国家垄断是怎样交错在一起的，实际上这两种垄断都不过是最大的垄断者瓜分世界的帝国主义斗争中的个别环节而已。

商航运业的大大集中，也引起了瓜分世界的结果。德国形成了两个最大的公司，即“汉堡—美洲定期轮船公司”和“北德路易船公司”，各有资本2亿马克（股票和债券）和价值18500—18900万马克的轮船。另一方面，美国在1903年1月1日成立了所谓摩尔根托拉斯，叫做“国际海上贸易公司”，联合了美英两国的9个轮船公司，拥有资本12000万美元（48000万马克）。早在1903年，德国资本大王们和这个美英合资的托拉斯就为了瓜分利润，缔结了分割世界的条约。德国的公司不再在运输业上同英美两国竞争了。条约明确地规定了哪些海港“属于”谁，并且设立了一个共同的监察委员会等等。条约的期限定为20年，同时规定了

^① 见“银行”杂志1912年第1期第1036页，1912年第2期第629页，1913年第1期第388页。

一个附带条件：一旦發生战争，該約即告失效[⊖]。

国际鋼軌卡特尔形成的历史，也是很值得注意的。早在1884年工業極為衰落的时候，英比德三国的鋼軌制造厂就作过組織这种卡特尔的第一次嘗試。締結協議的各国工厂同意不在英比德三国的国内市場上竞争，把国外市場按下面的比例分割了：英国得66%，德国得27%，比利时得7%。印度完全归英国。对于一个沒有参加締結協議的英国公司，它們就合力进攻，从出售总额中拿出相当部分来补偿进攻的耗費。但是到了1886年，有两个英国公司退出了同盟，这个同盟也就瓦解了。值得注意的是在后来几次工業兴盛的时期中，始終沒有达成这样的協議。

1904年初，德国成立了鋼業辛迪加。1904年11月，国际鋼軌卡特尔又按下面的比例恢复起来了：英国得53.5%；德国得28.83%；比利时得17.67%。后来法国也加入了，它在第一、第二、第三年中所获得的份額是在总数100%以外占有4.8%、5.8%、6.4%，也就是在等于104.8%、105.8%、106.4%的总数中占有4.8%、5.8%、6.4%。1905年，又有美国的“鋼業托拉斯”（“鋼業公司”）加入，随后奥国和西班牙也加入了。弗格尔施坦在1910年写道：“現在，地球已經分完了，于是大消費者，尤其是国营鐵道，因为世界已經被分完，人家又不顧及它們的利益，它們就可以像仙人一样到天宮里去隱居了。”[⊗]

此外还要提一提1909年成立的国际鋅業辛迪加，它把生产量在德比法西英等国的五个工厂集团之間作了明确的分配；还有国际火藥托拉斯，用利夫曼的話來說，“它是德国所有炸藥厂的最新

⊖ 見里謝尔所著前書第125頁。

⊗ 見弗格尔施坦所著“組織形式”第100頁。

式的密切的同盟，后来这些制造厂与法美两国用同样的方法組織起来的炸藥厂一起，可說是共同分割了整个世界”[⊖]。

据利夫曼統計，德国所参加的国际卡特尔，在1897年大約有40个，到1910年就已經將近100个了。

有些資產階級作家（考茨基現在也附和他們的意見，他完全背叛了他所采取的，例如他在1909年所采取的那种馬克思主义的立場）認為：国际卡特尔是資本国际化的最明显的表現之一，給人們一种在資本主义制度下各民族間可能达到和平的希望。这种意見在理論上是絕頂荒謬的，而在实践上是一种詭辯，是一种用欺騙的方法替最恶劣的机会主义辯护的手段。国际卡特尔表明了現在資本家的垄断組織已經發展到怎样的程度，各个資本家同盟究竟为了什么而互相斗爭。后面这一点最重要，只有它才能向我們說明当前事件的历史經濟意义，因为斗爭的形式可能变更，而且确实由于各种比較次要的和暫时的原因而經常变更，但是，斗爭的本質、斗爭的階級內容在階級存在的时候是始終不会改变的。例如德国資產階級（考茨基在理論上已經轉到德国資產階級那边去了，这点我們以后还要說到）为了自己的利益，自然要掩飾現代經濟斗爭的內容（分割世界），而強調这个斗爭的这种或那种形式。考茨基也犯了同样的錯誤。这里所說的当然不是德国資產階級，而是全世界的資產階級。資本家分割世界，并不是因為他們的心腸特別毒辣，而是因為現在的集中已經發展到这种地步，使他們不得不走上这条获利的道路；而且他們分割世界，是“按資本”、“按實力”来分割的，在商品生产和資本主义制度下也只有按这种标准来

⊖ 見利夫曼所著“卡特尔与托拉斯”第2版第161頁。

分割。實力是隨經濟政治的發展而變更的；要了解當前的事件，必須知道哪些問題的解決是取決於實力的變更，至於這些變更究竟是“純粹”經濟上的變更，還是經濟範圍以外的（例如軍事的）變更，却是次要的問題，絲毫也不能改變對於資本主義最新階段的根本觀點。拿資本家同盟互相鬥爭與妥協的形式（今天是和平的，明天不是和平的，後天又不是和平的）問題來偷換鬥爭與妥協的內容問題，就等於墮落成詭辯家。

現代資本主義時代表明各個資本家同盟在從經濟上分割世界的基礎上形成了一定的關係，同時隨之而來的是各個政治同盟、各個國家在從領土上分割世界、爭奪殖民地、“爭奪經濟領土”的基礎上也形成了一定的關係。

六、列強分割世界

地理學家阿·蘇潘在“歐洲殖民地領土的擴張”[○]一書中，對19世紀末殖民地的擴張情形，做了如下的簡短的總結：

屬於歐洲殖民列強（包括美國在內）的土地面積
在各地所占的百分比

	1876年	1900年	增減數
在非洲的……	10.8%	90.4%	+79.6%
在玻里尼西亞的……	56.8%	98.9%	+42.1%
在亞洲的……	51.5%	56.6%	+ 5.1%
在澳洲的……	100.0%	100.0%	—
在美洲的……	27.5%	27.2%	- 0.3%

蘇潘總結起來說：“所以，分割非洲和玻里尼西亞，是這個時期

○ 見阿·蘇潘所著“歐洲殖民地領土的擴張”（A. Supan: «Die territoriale Entwicklung der europäischen Kolonien»）1906年版第254頁。

的特点。”因为在亚洲和美洲，未被占据的土地，即不属于任何国家的领土已经没有了，所以我们必须扩大苏潘的结论，应该说，世界分割完毕是这个时期的特点。所谓完毕，并不是说不可能重新分割了，——恰巧相反，重新分割是可能的、不可避免的——而是说在资本主义各国的殖民政策之下，我们这个行星上无主的土地都被占完了。世界是第一次被分完了，所以将来只有重新分割，也就是从一个“主人”转归另一个“主人”，而不是从无主的变为“有主的”。

所以，我们是处在一个全世界殖民政策的特殊时代，这个殖民政策同“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阶段”，即财政资本有极为密切的联系。因此，我们首先必须详细研究实际的材料，才能尽量确切地说明这个时代和先前各个时代有什么不同，现在的情况究竟怎样。这里，首先就发生了两个事实问题：殖民政策的加强、争夺殖民地的斗争的尖锐化是不是恰好在财政资本时代才出现的呢？在这方面，现在世界分割的情形究竟怎样呢？

美国作家莫利斯在他写的殖民史中[⊙]，把有关英法德三国在19世纪各个时期的殖民地领土面积的材料综合起来了。现在把他所得出的总数摘录如下：

年 份	殖 民 地 領 土 面 积					
	英 国	法 国	德 国	英 国	法 国	德 国
	面 积 (单位百万 平方哩)	人 口 (单位 百万)	面 积 (单位百万 平方哩)	人 口 (单位 百万)	面 积 (单位百万 平方哩)	人 口 (单位 百万)
1815—1830年	?	126.4	0.02	0.5	—	—
1860年	2.5	145.1	0.2	3.4	—	—
1880年	7.7	267.9	0.7	7.5	—	—
1899年	9.3	309.0	3.7	56.4	1.0	14.7

⊙ 見亨利·克·莫利斯所著“殖民史”(Henry C. Morris: «The history of colonization») 1900年紐約版第2卷第88頁；第1卷第419頁；第2卷第304頁。

英国特别加紧夺取殖民地是在 1860—1880 年这个时期，而且在 19 世纪最后的 20 年间还在相当猛烈地夺取殖民地。法德两国加紧夺取殖民地也正是在这 20 年。我们在上面已经看到，垄断前的资本主义，即自由竞争占统治的资本主义，达到极点的时期是在 19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现在我们又知道，正是在这个时期以后，开始了夺取殖民地的大“高潮”，分割世界领土的斗争达到了极其尖锐的程度。所以资本主义进到垄断阶段，进到财政资本阶段，无疑是同分割世界的斗争的尖锐化联系着的。

霍布森在论帝国主义的著作中，把 1884—1900 年这个时期划为欧洲主要国家加紧“扩张”（领土扩张）的时代。据他计算，在这个时期中，英国夺得了 370 万平方哩的领土连同 5 700 万人口；法国夺得了 360 万平方哩的领土连同 3 650 万人口；德国夺得了 100 万平方哩的领土连同 1 470 万人口；比利时夺得了 90 万平方哩的领土连同 3 000 万人口；葡萄牙夺得了 80 万平方哩的领土连同 900 万人口。在 19 世纪末，特别是自 19 世纪 80 年代以来，各资本主义国家拼命争夺殖民地，是外交史和对外政策史上有目共睹的事实。

在 18 世纪 40—60 年代英国自由竞争最兴盛的时期，英国当权的资产阶级政治家是反对殖民政策的，他们认为解放殖民地，使殖民地完全脱离英国，是一件不可避免而且有益的事情。姆·伯尔在 1898 年发表的“论现代英国帝国主义”一文^①中指出，在 1852 年的时候，像迪斯累里这样一个一般说来很倾向于帝国主义的英国政府要人，尚且说过：“殖民地是吊在我们脖子上的石磨。”而到 19 世纪末，成为英国当代要人的，已经是公开宣传帝国主义、最无耻地实行帝国主义政策的谢西尔·罗德斯和约瑟夫·张伯伦了！

^① 见“新时代”杂志 1898 年第 16 卷第 1 期第 302 页。

值得注意的是，英国这些当权的资产阶级政治家早在当时就清楚地知道现代帝国主义的所谓纯粹经济的根源和社会政治根源之间的联系了。张伯伦曾经特别指出当时英国在世界市场上所遇到的德美比方面的竞争，而鼓吹帝国主义是“真正明智而经济的政策”。资本家当时说，挽救的办法是实行垄断，于是他们就创办卡特尔、辛迪加和托拉斯。资产阶级的政治领袖也随声附和地说，挽救的办法是实行垄断，于是他们就急急忙忙地去夺取世界上尚未分割的土地。据谢西尔·罗德斯的密友新闻记者斯特德说，1895年罗德斯曾经同他谈到自己的帝国主义思想，罗德斯说：“我昨天在伦敦东头（工人区）参加了一个失业工人的集会。我在那里听到充满了‘面包，面包！’的呼声的粗野的发言。回家时，我把看到的情形思考了一番，结果我比以前更相信帝国主义的重要了……我的神圣的主张是解决社会问题，就是说，为了使联合王国4000万人民避免残酷的内战，我们这些殖民主义政治家应当占领新的领土，来安置过剩的人口，取得推销我国工厂和矿山出产的商品的新区域。我常常说，帝国就是饭碗问题。要是你不希望发生内战，你就应当成为帝国主义者。”^①

这就是百万富翁、财政大王、英布战争的罪魁谢西尔·罗德斯在1895年讲的话。他替帝国主义辩护的言论不过有些笨拙、无耻，实质上同马斯洛夫、休特古姆、波特列索夫、大卫先生以及俄国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等等的“理论”并没有什么不同。谢西尔·罗德斯是一个比较老实一点的社会沙文主义者……

为了对世界领土的分割情况和近几十年来这方面的变化作一个尽可能确切的叙述，我们要利用苏潘在上述那部谈论世界列强

^① 见“新时代”杂志1898年第16卷第1期第304页。

殖民地領土問題的著作中提供的統計。蘇潘選的是1876年和1900年。我們現在選擇1876年(這一年選得很恰當，因為這個時候正是西歐資本主義壟斷前的階段整個地說來已經發展完畢的時期)和1914年，並且用許布納爾的“地理統計表”上的比較新的數字來代替蘇潘的數字。蘇潘只列出了關於殖民地的數字，我們認為要描繪出世界分割情形的全貌，最好是把關於非殖民地國家和半殖民地的簡略數字也補充進去。我們把波斯、中國和土耳其列入半殖民地，其中第一個國家差不多完全變成了殖民地，第二第三兩個國家正在變成殖民地。

結果情形如下：

列強的殖民地領土

(面積單位100萬平方公里，人口單位100萬居民)

	殖 民 地				宗 主 國		總 計	
	1876年		1914年		1914年		1914年	
	面積	人口	面積	人口	面積	人口	面積	人口
英國.....	22.5	251.9	33.5	393.5	0.3	46.5	33.8	440.0
俄國.....	17.0	13.9	17.4	33.2	5.4	136.2	22.8	169.4
法國.....	0.9	6.0	10.6	55.5	0.5	39.6	11.1	95.1
德國.....	—	—	2.9	12.3	0.5	64.9	3.4	77.2
美國.....	—	—	0.3	9.7	9.4	97.0	9.7	106.7
日本.....	—	—	0.3	19.2	0.4	53.0	0.7	72.2
六大強國計共	40.4	273.8	65.0	523.4	16.5	437.2	81.5	960.6
其他強國(比利時、荷蘭等)的殖民地.....							9.9	45.3
半殖民地(波斯、中國、土耳其).....							14.5	361.2
其他各國.....							28.0	289.9
全 球.....							133.9	1657.0

从这里可以看得很清楚，在 19 世紀和 20 世紀之交，世界是分割“完畢”了。1876 年以后，殖民地領土有極大的扩张，6 个最大的强国的殖民地領土增加了一半以上，由 4 000 万平方公里增加到 6 500 万平方公里，增加了 2 500 万平方公里，比各宗主国的面积(1 650 万)还要多一半。其中有 3 个强国在 1876 年根本没有殖民地，另一个强国法国，当时也差不多一点也没有。到 1914 年，这 4 个强国已經获得了面积 1 410 万平方公里，即大致等于欧洲面积一倍半的殖民地領土，这些領土上的人口差不多有 1 亿。殖民地領土的扩张是非常不平衡的。例如拿面积和人口都相差不远的法德日三国来比較，就可以看出，法国的殖民地(按面积來說)几乎等于德日两国殖民地領土总和的 3 倍。不过在我們所談的这个时代的初期，法国財政資本的数量大概也要比德日两国的总和多几倍。除开純粹的經濟条件而外，地理和其他条件也在这些經濟条件的基础上影响到殖民地領土的大小。近几十年来，在大工業、交換和財政資本的影响下，世界各国的均等化，各国經濟与生活条件的平均化虽然进展得很快，但差别还是不小的。在上述六个国家中，我們看到，一方面有进步非常快的新兴資本主义国家(美德日)；另一方面有近来的进步比前面那几国慢得多的資本主义發达的老牌国家(法英)；另外还有一个經濟上最落后的国家(俄国)，这个国家的現代資本主义帝国主义可以說是被資本主义以前的关系的特別稠密的网子籠罩着的。

除了大国的殖民地領土以外，我們还列进了小国的小塊殖民地。可以說，到了可能發生而且一定会發生的殖民地“重新分割”的时候，这些小塊殖民地就是分割的最近目标。这些小国能够保持自己的殖民地，主要是因为大国之間存在着利益上的矛盾、冲突

等等，妨碍了它們达成分脏的協議。至于“半殖民地”国家，它們是自然界和社会各方面常見的过渡形式的例子。财政資本是一支巨大的力量，可以說是在經濟关系和国际关系上起决定作用的巨大力量，甚至能够支配而且实际上已經支配了一些政治上完全独立的国家；这种例子我們馬上就要講到。不过，对于财政資本最“方便”最有利的当然是这样的支配，就是使从屬的国家和民族丧失政治上的独立。在这一点上，半殖民地国家是典型的“中間”形式。在财政資本时代，在世界上其他地方已經瓜分完畢的时候，爭夺这些半独立国的斗爭当然会特別尖銳起来。

殖民政策和帝国主义在資本主义現代阶段以前，甚至在資本主义以前就已經有过了。以奴隶制为基础的羅馬推行过殖民政策，实行过帝国主义。但是，“一般地”談論帝国主义而忘記或忽視了各种社会經濟形态的根本区别，这样的議論必然会变成最空洞的廢話或怪誕不經的吹嘘，像把“大羅馬和大不列顛”拿来相提并論那样[⊖]。就是过去資本主义各个阶段上的資本主义殖民政策同财政資本的殖民政策也是根本不同的。

現代資本主义的主要特点是最大企業家垄断同盟的統治。一旦所有原料的来源都掌握在某些人的手里，这种垄断同盟就巩固無比了。我們已經知道，各資本家国际同盟怎样拚命地剝夺敌方进行竞争的一切可能，怎样拚命地收买鉄矿山或石油产地等等。只有占領殖民地，才能充分保障垄断組織在同竞争者的斗爭中战

⊖ 見克·普·柳卡斯所著“大羅馬和大不列顛”(C. P. Lucas: «Greater Rome and Greater Britain») 1912年牛津版，或見克罗美尔所著“古代帝国主义和現代帝国主义”(Earl of Cromer: «Ancient and modern imperialism») 1910年倫敦版。

胜各种意外的危险，直到使敌方用国家垄断法来实行自衛的企图也不能实现。资本主义愈发达，原料愈缺乏，竞争和追逐全世界原料来源的斗争愈紧张，那末占据殖民地的斗争也就愈激烈。

施尔德尔说：“我们可以作出一个也许会使某些人感到荒诞无稽的论断，就是说，城市和工业人口的增加，在最近的将来与其说会遇到食品缺乏的障碍，不如说会遇到工业原料缺乏的障碍。”例如日益昂贵的木材，例如皮革和纺织工业原料，都是愈来愈缺乏。“工业家同盟企图在整个世界经济范围内造成农业和工业的平衡；1904年几个主要工业国家纺织业工厂主同盟所成立的国际同盟就是一个例子；后来在1910年，欧洲纺织业工厂主同盟也仿照这个例子，成立了一个同盟。”^①

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者，尤其是他们中间的现在的考茨基派，当然企图把这种事实的意义贬低，硬说“可以”不用“代价很大而且很危险的”殖民政策就能在自由的市场上取得原料，硬说“简单地”改善一下一般农业的条件就“可能”大大增加原料的供应。但是，这种说法成了替帝国主义辩护、替帝国主义粉饰的议论，因为它的出发点是忽视现代资本主义的主要特点，也就是忽视垄断。自由市场一天天地成为过去的事情，垄断性的辛迪加和托拉斯一天天地缩小自由市场，而“简单地”改善一下农业条件就是改善民众的生活状况，提高工资，减少利润。试问，除了在甜蜜的改良派的幻想里，哪里还有能够关怀民众的生活而不夺取殖民地的托拉斯呢？

财政资本不仅重视已经发现的原料产地，而且重视可能发现的产地，因为现代技术的发展真是异常迅速，今天无用的土地，要

^① 见施尔德尔所著前书第38—42页。

是明天發明了新的方法(为了这个目的,大銀行可以派大批工程师和农艺师等等去进行专门的研究),或是投入了大量的資本,就会变成有用的土地。矿藏的勘探,新的制造方法和利用各种原料的方法等等,也是如此。因此,財政資本必然企圖扩大經濟領域,甚至企圖扩大一般的領域。托拉斯估計到将来(不是現在)“可能获得的”利潤,估計到将来垄断的結果,因此在估計資本的时候把自己的財產多估一两倍;同样,財政資本也估計到可能的原料产地,惟恐在爭夺世界上尚未分割的最后几塊土地或重新分割已經分割了的一些土地的疯狂斗争中落后于他人,因此总想不择手段地尽量夺取更多的土地,不管这块土地好坏如何,也不管它在什么地方。

英国資本家用尽一切办法在自己的殖民地埃及發展棉花生产(1904年埃及的230万公頃耕地中,有60万公頃,即四分之一以上是种植棉花的),俄国資本家用尽一切办法在自己的殖民地土尔克斯坦發展棉花生产,因为这样就能更容易地打败外国的竞争者,更容易地垄断原料来源,輕而易举地成立一个更經濟更有利的紡織業托拉斯以实行“联合”生产,一手包办棉花生产和加工的各个过程。

資本输出的厚利也同样地促进了对殖民地的掠夺,因为在殖民地市場上更容易(有时甚至只有在殖民地市場上才可能)用垄断的手段排除竞争者,保証自己供应貨物的权利,巩固相当的“联系”等等。

在財政資本的基础上生长起来的非經濟的上層建筑,即財政資本的政策和思想体系,加强了夺取殖民地的趋向。希法亭說得很对:“財政資本所希望的不是自由,而是統治。”有一个法国資

产階級作家好像是在發揮和补充前面說到的謝西尔·罗德斯的意見[⊖]，他写道，現代殖民政策的产生，除了經濟的原因，还有社会的原因：“由于生活愈来愈复杂和困难，不仅使工人群众感到痛苦，而且使中等階級感到痛苦，因此在一切古老的文明国家中都积下了‘一种危及社会安宁的急躁、憤怒和憎恨的情緒；脱离了一定階級常軌的力量必須找到应用的場所，应当讓它到国外去發泄，以免在国内發生剧变’。”[⊗]

談到資本帝国主义时代的殖民政策时必须指出，財政資本和同它相适应的国际政策，即归根到底是列强为了在經濟上政治上分割世界而斗争的国际政策，造成了許多过渡的国家依賴形式。这个时代的标本国家形式不仅有两种基本国家，即殖民地占有国和殖民地，而且有各种各样的附屬国，它們在政治上、形式上是独立的，其实在財政和外交方面却处处依賴于他国。上面我們已經說过一种过渡形式——半殖民地。而阿根廷又是另一种形式的标本。

舒尔采-格弗尼茨在一本論不列颠帝国主义的著作中写道：“南美洲，特别是阿根廷，在財政上完全依賴于倫敦，几乎可以說是英国的商業殖民地。”[⊘] 施尔德尔根据奥匈帝国駐布宜諾斯艾利斯

⊖ 見本卷第 249 頁。——編者注

⊗ 見瓦尔所著“法国在殖民地”(Wahl: «La France aux colonies»), 摘自昂利·留西耶所著“大洋洲的分割”(Henri Russier: «Le Partage de l'Océanie») 1905 年巴黎版第 165 頁。

⊘ 見舒尔采-格弗尼茨所著“不列颠帝国主义与 20 世紀初期的英国自由貿易”(Schulze-Gaevernitz: «Britischer Imperialismus und englischer Freihandel zu Beginn des 20-ten Jahrhunderts») 1906 年萊比錫版第 318 頁，并見薩尔托里烏斯·馮·瓦尔特紹森所著“国外投資的国民經濟制度”(Sartorius v. Waltershausen: «Das volkswirtschaftliche System der Kapitalanlage im Auslande») 1907 年柏林版第 46 頁。

的領事 1909 年的報告，確定英國在阿根廷的投資有 875 000 萬法郎。不難設想，英國財政資本及其忠實“友人”（外交）由於這筆投資，同阿根廷的資產階級及其整個經濟政治生活上的領導人物有了多么鞏固的聯繫。

葡萄牙又是政治上獨立而財政上外交上不獨立的另一種稍有不同的形式的例子。葡萄牙是個獨立自主的國家，但事實上從爭奪西班牙王位繼承權的戰爭（1701—1714 年）起，這二百多年來始終是處在英國的保護之下。英國為了鞏固它在反對西班牙和法國的鬥爭中的障地，因而保護葡萄牙和葡屬殖民地領土。英國以此換得了商業上的利益，換得了向葡萄牙和葡屬殖民地輸出商品、尤其是輸出資本的優惠條件，換得了利用葡萄牙的港灣、島嶼、海底電纜等等的便利[⊙]。這種關係在各大國和小國之間一向是有的，但是在資本帝國主義時代這種關係已經成為普遍的制度，成為“分割世界”的體系中的一部分，成為全世界財政資本活動中的一些環節了。

在結束討論世界分割問題的這一章的時候，我們還要指出以下一點。不但西美戰爭以後的美國著作和英布戰爭以後的英國著作，在 19 世紀末和 20 世紀初十分公開而明確地提出了分割世界的問題，不但最“忌妒”“不列顛帝國主義”的德國著作有系統地估計了這個事實，而且在法國資產階級著作中也是相當明確而廣泛地——當然是在資產階級觀點想得到的範圍內——提出了這個問題。讓我們來引證歷史學家德里奧的一段話，他在“19 世紀末的政治問題和社會問題”一書的“論列強與分割世界”一章里寫道：

⊙ 見施爾德爾所著前書第 1 卷第 160—161 頁。

“近年来地球上所有可以自由占据的土地，除了中国以外，都被欧洲和北美的列强占据了。在这个基础上已经发生了许多冲突和势力变动，这些冲突和变动预示着最近的将来会有更可怕的爆发。大家都得急急忙忙地干，因为凡是沒有及时争得一份的国家就会永远得不到它应得的一份，就会不能参加那一定是下一世纪（即20世纪）主要事实之一的大规模剥削世界的事業。所以近来全欧和美国充满了扩张殖民地、实行‘帝国主义’的狂热，而‘帝国主义’就是19世纪末最显著的特点。”然后，作者又补充说：“在这样分割世界的情况下，在这种疯狂追逐地球上的宝藏和巨大市场的角斗中，这个世纪即19世纪建立起来的各个帝国之间的势力对比，是与建立这些帝国的民族在欧洲所占的地位完全不相称的。在欧洲占优势的强国，欧洲命运的主宰者，并不是在全世界也占有同样的优势。既然殖民地领土的广大和占据尚未查明的财富的希望，显然会反过来影响欧洲列强势力的对比，那末殖民地问题（也可以说是“帝国主义”）这个已经改变了欧洲境内政治局面的问题，一定还会日甚一日地改变这个局面。”[⊖]

七、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特殊阶段

现在我們应当作出相当的总结，把以上在帝国主义问题上所谈的一切归纳起来。帝国主义是作为一般资本主义基本特性的发展和直接的继续而成长起来的。但是，资本主义只有发展到一定的很高的阶段，才变成了资本帝国主义，这时候，资本主义的某些

⊖ 見德里奧所著“政治問題和社会問題”（J.-E. Driault: «Problèmes Politiques et sociaux»）1907年巴黎版第299頁。

基本特性已經变成了与自己相反的东西，而且由資本主义进入更高级的社会經濟形态的那个过渡时期的特点已經在各个方面形成和暴露出来了。在这一过程中，經濟方面的基本現象就是資本主义的自由竞争为資本主义的垄断所代替。自由竞争是資本主义和一般商品生产的基本特性；垄断是同自由竞争正相反的东西，但是自由竞争分明已經变成垄断，造成大生产，排挤小生产，又用最大的生产来代替大生产，使生产和資本集中达到了很高的程度，以至产生了并且还在产生着卡特尔、辛迪加和托拉斯等垄断組織，以及同这些垄断組織溶合起来的十来个支配着亿万資金的銀行的銀行資本。同时，从自由竞争中生长起来的垄断并不消灭竞争，而是駕凌于竞争之上，与之并存，因而产生許多特別尖銳特別剧烈的矛盾、摩擦和冲突。垄断是从資本主义进入更高级的制度的过渡。

如果要給帝国主义下一个尽量簡短的定义，那就应当說，帝国主义是資本主义的垄断阶段。这样的定义包括了最主要的内容，因为一方面，財政資本是与工業家垄断同盟的資本溶合起来的少数垄断性的最大銀行的銀行資本，另一方面，世界的分割，就是由無阻碍地扩张到未被任何一个資本主义强国占据的地區的殖民政策，过渡到对已經分完了的世界領土进行独占的殖民政策。

太簡短的定义虽然很方便，因为它概括了主要的内容，但是如果你要从定义特別明显地看出它所說明的那个現象的各个極重要的特点，那就显得这个定义很不够了。因此，一方面要記住，所有一般的定义都只有有条件的、相对的意义，永远也不能包括現象的全部發展上各方面的联系，同时也應該給帝国主义下这样一个定义，其中要包括帝国主义的如下五个主要特征：(1)生产和資本的积聚已經發展到这样高的程度，以致造成了在經濟生活中起决定

作用的垄断组织；（2）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已融为一体，在这个“财政资本”的基础上形成了财政寡头；（3）与商品输出不同的资本输出已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4）分割世界的资本家的国际垄断同盟已经形成；（5）最大资本主义列强已把世界上的领土瓜分完毕。帝国主义是发展到这样一个阶段的资本主义，在这个阶段上，垄断组织和财政资本的统治业已确立，资本输出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国际托拉斯已开始分割世界，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已把全球领土瓜分完毕。

下面我们就要谈到，如果我们不仅注意到帝国主义的纯粹经济上的主要现象（上述定义只包括了这些现象），而且注意到资本主义的现阶段在整个资本主义发展中所占的历史地位，或者注意到帝国主义同工人运动中两个主要派别的关系，那末我们就可以而且应当给帝国主义另外下一个定义。现在必须指出，照上面那个意思理解起来，帝国主义无疑是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一个特殊阶段。为了使读者对于帝国主义有一个尽量确切的概念，我们故意尽量多引用一些不得不承认近代资本主义经济中万分确凿的事实的那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发表的意见。为了同一目的，我们又引用了一些详细的统计材料，来说明银行资本等已经发展到怎样的程度，量转变成质究竟表现在什么地方，发达的资本主义转变成帝国主义究竟表现在什么地方。不用说，自然界和社会里的一切界限当然都是有条件的、变动的，如果还去争论帝国主义究竟是哪一年或哪一个十年“最终”确立的，那就太荒唐了。

但是在帝国主义的定义问题上进行争论，首先是同所谓第二国际时代，即1889—1914年这25年的主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考茨基进行争论，却是必要的。在1915年，甚至早在1914年11

月，考茨基就十分坚决地反对我們給帝国主义下的那个定义中的基本思想，他說不应当把帝国主义了解为經濟發展的一个“时期”或阶段，而应当了解为一种政策，即財政資本所“爱好”的一种政策；不应当把帝国主义和“現代資本主义”“看作一个东西”；如果把帝国主义了解为“現代資本主义的一切現象”（卡特尔，保护关税制，財政資本家的統治，殖民政策），那末帝国主义是資本主义所必需的問題就成了“最平板無味的同义語的反复”，因为这样一来，“帝国主义就自然而然地成了資本主义迫切需要的东西”等等。为了最确切地表述考茨基的意見，我們引用他給帝国主义所下的定义，这个定义是直接反对我們所發揮的那些思想的實質的（因为考茨基早已知道，多年来宣传这些思想的德国馬克思主义者的队伍中一部分人所提出的反駁，正是馬克思主义的一个派別所提出的反駁）。

考茨基的定义說：

“帝国主义是工業資本主义高度發展的产物。帝国主义就是每个工業資本主义民族力圖愈来愈多地吞并或征服 农业（着重号是考茨基加的）区域，而不管那里居住的是什么民族。”[⊖]

这个定义是根本要不得的。因为它片面地、武断地单单強調了一个民族問題（虽然這個問題就其本身以及它对帝国主义的关系來說，是極其重要的），武断地、錯誤地 把這個問題 单单 同兼并其他民族的那些国家的工業資本联系起来，又同样武断地、錯誤地 強調了兼并农业区域这一点。

帝国主义就是力圖兼并，——这是考茨基的定义在政治方面

⊖ 見“新时代”杂志 1914 年（第 32 卷）第 2 期（1914 年 9 月 11 日出版）第 909 頁；參照同一杂志 1915 年第 2 期第 107 頁及往下各頁。

的含义。这是对的，但是極不充分，因为帝国主义在政治方面总是力圖施用暴力和实行反动的。不过我們在这里要注意的是考茨基本人納入他的定义中的經濟方面的含义。在这一方面，考茨基定义的錯誤是十分明显的。帝国主义的特点，恰好不是工業資本而是財政資本。所以在法国恰好是財政資本特別迅速的發展（这时工業資本在衰退着）从19世紀80年代开始引起了特別加紧地推行兼并政策（殖民政策），这并不是偶然的。帝国主义的特点恰好不只是力圖兼并农業区域，它甚至还力圖兼并工業極發达的区域（德国对比利时的野心，法国对洛林的野心），因为第一、地球已經瓜分完了，在重新分割的时候，对任何一块土地都是想伸手要的；第二、帝国主义的一个重要的特点是几个大国都想爭夺霸权，即爭夺領土，目的不完全是直接为了自己，主要还是为了削弱敌方，摧毀敌方的霸权（对德国來說，比利时是一个特別重要的反英据点；对英国來說，巴格达是一个特別重要的反德据点等等）。

考茨基特別着重地——并且屢次地——引用英国人的言論，認為英国人所确定的帝国主义这个名詞的純粹政治上的意义，同他考茨基的意思是相同的。我們現在举出英国人霍布森来，看看他在1902年出版的他的“帝国主义”一書中是怎样写的：

“新帝国主义和旧帝国主义不同的地方在于：第一、它已經不是表明一个日益强盛的帝国企圖称霸，而是表明几个帝国在扩大政治势力和获得商業利益的同样的欲望驅使之下互相竞争的理論和实践了；第二、財政利益或投資利益統治着商業利益。”[⊖]

由此可見，考茨基說他一般地引用英国人的言論，实际上是絕

⊖ 見霍布森所著“帝国主义”1902年倫敦版第324頁。

对錯誤的（除非說他引用那些庸俗的英国帝国主义者或帝国主义公开辯护人的言論）。由此可見，考茨基虽然妄自以为是在繼續維護馬克思主义，实际上他比社会自由主义者霍布森还退后了一步，因为霍布森还比較正确地估計到現代帝国主义的两个“具体历史”特点了（而考茨基的定义恰好是对历史具体性的嘲弄！）：（1）几个帝国主义的竞争；（2）財政資本家統治着商人。如果主要是說工業国兼并农業国，那就把商人抬上主要地位了。

考茨基的定义不仅是錯誤的和非馬克思主义的，而且还成了全面离开馬克思主义的理論和馬克思主义的实践的那一整套思想体系的基础；这一点我們以后还要講到。考茨基所掀起的那种字面上的爭論，即資本主义的最新阶段應該叫作帝国主义呢，还是叫作財政資本的阶段，是毫無意义的爭論。随便你怎样叫都是一样。关键在于考茨基把帝国主义的政策同它的經濟割裂开了，把“兼并”解释为財政資本所“爱好”的政策，而拿另一个似乎可能的、也是以財政資本为立足点的资产階級政策和它对立起来。照这样說来，經濟上的垄断是可以同政治上非垄断的、非强力的、非掠夺的行动方式并存的。照这样說来，世界領土的分割恰巧在財政資本时代进行完畢而成了各个資本主义强国現在互相竞争的特殊形式的基础，这样一种情况也是可以同非帝国主义的政策并存的。这样一来，就不是暴露資本主义現代阶段最根本的矛盾的深刻性，而是掩飾、緩和这些矛盾；就不是馬克思主义，而是资产階級改良主义。

考茨基同德国的一个帝国主义和兼并政策的辯护人庫諾夫爭論过。庫諾夫又笨拙又無耻地說：帝国主义是現代的資本主义；資本主义的發展是不可避免的，是进步的，所以帝国主义也是进步的；因此，必須跪在帝国主义面前歌功頌德！这种話就像民粹派在

1894--1895年攻擊俄國馬克思主義者的時候所畫的那幅諷刺畫，畫中說：如果馬克思主義者認為資本主義在俄國是不可避免的和進步的，那末他們就應該開起酒店來培植資本主義。考茨基反駁庫諾夫說：不對，帝國主義並不是現代的資本主義，而只是現代資本主義所採取的各種政策中的一種政策，我們可以而且應當反對這種政策，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兼併等等。

這種反駁看起來好像很有道理，實際上却等於更巧妙更隱蔽地（因此是更危險地）宣傳同帝國主義妥協，因為“反對”托拉斯和銀行的政策而不觸動托拉斯和銀行的經濟基礎，那就不過是資產階級的改良主義與和平主義，不過是一種善良而幼稚的願望而已。不是暴露矛盾有多麼深刻，而是迴避現有的矛盾，忘掉其中最重要的矛盾，——這就是考茨基的理論，它同馬克思主義毫無共同之點。這種“理論”當然只能用來替那種主張同庫諾夫保持統一的思想進行辯護。

考茨基寫道：“從純粹經濟的觀點看來，資本主義不是不可能再經歷一個新的階段，也就是把卡特勒政策應用到對外政策上的超帝國主義的階段”^①，全世界各帝國主義彼此聯合而不是互相鬥爭的階段，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停止戰爭的階段，“由實行國際聯合的財政資本共同剝削世界”的階段^②。

關於這個“超帝國主義的理論”，我們以後還要談到，以便詳細地說明這個理論背棄馬克思主義究竟到了怎樣徹底而無可挽回的地步。現在我們要按照本書的總的計劃來看一看有關這個問題的

① 見“新時代”雜誌1914年（第32卷）第2期（1914年9月11日出版）第921頁；參照同一雜誌1915年第2期第107頁及往下各頁。

② 見“新時代”雜誌1915年第1期（1915年4月30日出版）第144頁。

确切的經濟材料。“从純粹經濟的观点看来”，这个“超帝国主义”究竟是可能實現的呢，还是超等廢話呢？

如果把純粹經濟的观点看作“純粹”抽象的东西，那末唯一可能得出的結論是：發展的趋势是走向壟斷，因而也就是走向一个全世界的壟斷組織，走向一个全世界的托拉斯。这是不容爭辯的，不过也是毫無內容的，就好像說：“發展趋势”是走向在實驗室里制造食物。在这一点上說来，超帝国主义“論”和“超农業論”是一样的荒唐話。

如果說財政資本时代的“純粹經濟”条件，是指 20 世紀初的具体历史时代，那末对于“超帝国主义”这一死板抽象的概念（这个概念只有一个最反动的目的，就是使人不去注意現有矛盾的深刻性）的最好的回答，就是拿現代世界經濟的具体經濟现实来同它对立起来。而且考茨基关于超帝国主义的毫無內容的議論也鼓舞了那种十分錯誤的、助长帝国主义辯护人声势的思想，似乎財政資本的統治削弱了世界經濟内部的不平衡和矛盾，其实財政資本的統治是加剧了这种不平衡和矛盾。

尔·卡尔韦尔在他写的“世界經濟入門”^①这本小册子里，曾經把一切可以具体說明 19 世紀和 20 世紀之交世界經濟内部相互关系的最重要的純粹經濟的材料綜合起来。他把整个世界分为五个“主要的經濟区域”：（1）中欧区（除了英、俄以外的整个欧洲）；（2）不列顛区；（3）俄国区；（4）东亚区；（5）美国区。同时他把殖民地列入占有这些殖民地的国家的“区域”内，而把少数不屬於上述各区的国家，例如亚洲的波斯、阿富汗和阿拉伯，非洲的摩洛

① 見卡尔韦尔所著“世界經濟入門”（R. Calwer: «Einführung in die Weltwirtschaft»）1906 年柏林版。

哥和阿比西尼亚等等，“攔在一边”。

現在把他所列出的这些区域的經濟材料摘录如下：

世界上主要的經濟区域	面积	人口	交通		貿易	工業	
	(单位100万平方公里)	(单位100万)	鐵道 (单位1000公里)	商船 (单位100万吨)	进出口共計 (单位10亿馬克)	开采量 (单位100万吨)	棉紡織業 紗錠數目 (单位100万支)
中欧区	27.6 ⊖(23.6)	388 (146)	204	8	41	251 15	26
不列顛区	28.9 ⊖(28.6)	398 (355)	140	11	25	249 9	51
俄国区	22	131	63	1	3	16 3	7
东亚区	12	389	8	1	2	8 0.02	2
美国区	30	148	379	6	14	245 14	19

我們看到有 3 个是資本主义高度發达(交通,貿易和工業都十分發达)的区域,即中欧区、不列顛区和美国区。其中德、英、美三国是統治着世界的国家。它們相互間的帝国主义竞争和搏斗是非常尖銳的,因为德国的地区太小,殖民地又少,而“中欧区”的最后形成还有待于将来,現在正处于在殊死的斗争里逐渐形成的过程中。目前整个欧洲区的特征是政治上四分五裂。而不列顛区和美国区則刚好相反,有很高的政治集中,但是它們又有極大的差别:前者有广大的殖民地,后者的殖民地却十分少。在殖民地,資本主义刚刚开始發展。夺取南美的斗争一天比一天尖銳。

有 2 个是資本主义不發达的区域,即俄国区和东亚区。前者人口密度極小,后者極大;前者政治上很集中,后者不集中。瓜分中国还刚刚开始,日美等国瓜分中国的斗争一天比一天激烈。

請把考茨基关于“和平的”超帝国主义那种愚蠢可笑的胡說,

⊖ 括弧里是殖民地的面积和人口。

拿来同經濟政治条件極不相同，各国發展速度等等極不一致，各帝国主义国家間存在着疯狂斗争的实际情形比較一下吧。难道这种胡說不是吓坏了的市僧想逃避可怕的现实的反动企圖么？难道被考茨基当做“超帝国主义”的胚胎的国际卡特尔（正像“可以”把实验室里的藥片生产說成是超农業的胚胎一样），不就是向我们表明分割世界和重新分割世界，由和平分割轉为不和平分割，再由不和平分割轉为和平分割的一个例子么？难道从前同德国一起（例如在国际鋼軌辛迪加或国际商船托拉斯里）和平地分割过整个世界的美国和其他国家的財政資本，現在沒有在改变了的新的势力对比的基础上，用决不是和平的手段来重新分割世界嗎？

財政資本和托拉斯并不是削弱而是加强了世界經濟各个部分在發展速度上的差异。既然势力对比变更了，那末在資本主义制度下，除了用武力来解决矛盾，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呢？在鉄路的統計中，我們可以看到說明整个世界經濟中資本主义和財政資本發展速度不同的非常准确的材料[⊙]。在帝国主义發展的最近几十年中，鉄道长度变更的情形如下：

鉄道长度(单位 1000 公里)			
	1890 年	1913 年	增 加 数
欧洲.....	224	346	+ 122
美国.....	268	411	+ 143
一切殖民地.....	82	210	+ 128
亚美两洲的独立国 和半独立国.....	43	137	+ 94
	125	347	+ 222
共 計.....	617	1104	

⊙ 見“德国 1915 年統計年鉴”(Stat. Jahrbuch für das deutsche Reich, 1915) 和“1892 年的鉄道档案”(Archiv für Eisenbahnwesen)；关于 1890 年各国殖民地間鉄道分布方面的某些詳細情形，只能作一个大致的估計。

可見，鐵路發展得最快的是亞美兩洲的殖民地和獨立國（以及半獨立國）。大家知道，這是由四五个最大的資本主義國家的財政資本統治一切，支配一切。在亞美兩洲殖民地及其他國家建築 20 萬公里的新鐵路，就等於在收入有特別的保證、鋼鐵廠可以獲得厚利定貨等等特別有利的條件下，新投入四百多億馬克的資本。

資本主義在殖民地和海外各國發展得最快。在這些國家中出現了新興的帝國主義強國（日本）。全世界帝國主義之間的鬥爭緊張起來了。財政資本從特別有利的殖民地企業和海外企業得到的貢獻日益增加。在瓜分這種“贓物”的時候，往往有極大一部分落到那些生產力發展的速度並不是常常占第一位的國家手里。各大強國及其殖民地的鐵道總長度如下：

(單位 1 000 公里)			
	1890 年	1913 年	增 加 數
美國.....	268	413	+ 145
不列顛帝國.....	107	208	+ 101
俄國.....	32	78	+ 46
德國.....	43	68	+ 25
法國.....	41	63	+ 22
五大強國共計.....	491	830	+ 339

可見，有 80% 左右的鐵路集中在五个最大的強國手中。但是這些鐵路的所有權集中的程度，財政資本集中的程度，還遠甚于此，因為有這樣的情形，例如美俄及其他國家的鐵路的股票和債券有很大一部分屬於英法兩國的百萬富翁。

英國因為有廣大的殖民地，所以能把“自己的”鐵路網增加了 10 萬公里，比德國增加的多 3 倍。但是，誰都知道，這一時期德國

生产力的發展，特別是煤炭和鋼鐵生产的發展，比英国快得多，更不必說比法国和俄国了。1892年，德国出产生铁490万吨，英国出产680万吨；但是到1912年，已經是1760万吨比900万吨，德国远远地超过英国了[⊖]！試問，要在資本主义基础上消除生产力發展和資本积累同財政資本对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分割之間的不相适应的状况，除了用战争以外，还能有什么其他办法呢？

八、資本主义的寄生性和腐化

現在我們还要来研究一下帝国主义的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許多人在談論帝国主义問題的时候，对这方面多半都是估計不足的。馬克思主义者希法亭的缺点之一，就是他在这一点上比非馬克思主义者的霍布森还倒退了一步。我們在这里說的是帝国主义所特有的寄生性。

我們已經說过，帝国主义最深的經濟基础就是垄断。这是資本主义的垄断，也就是說，这种垄断是从資本主义产生出来而又处在資本主义、商品生产、竞争的一般环境里，同时又經常同这一般环境發生無法解决的矛盾。但是这种垄断也同其他任何垄断一样，必然要引起停滞和腐化的趋势。既然規定了（虽然只是暂时地）垄断价格，于是那些推动技术、因而也推动其他的一切进步和前进的动因，也就在相当程度上消失了；于是进而形成一种人为地

⊖ 还請參照埃德加·克勒芒德所著“不列颠帝国同德意志帝国之間的經濟关系”（Edgar Crammond: 《The Economic Relations of the British and German Empires》）一文，見“皇家統計学会杂志”（《Journal of the 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1914年7月号第777頁及往下各頁。

阻碍技术进步的經濟力量。例如美国有个欧文斯發明了一个能引起制瓶業革命的制瓶机。德国制瓶工厂主的卡特尔收买了欧文斯的专利权,可是把这个發明品攔起来迟迟不用。当然,在資本主义下,垄断决不能全面地很长久地排除世界市場上的竞争(这也是超帝国主义論荒謬的原因之一)。当然,用改良技术的办法可能降低生产成本和提高利潤,这种可能性是促进着各种变更的。但是垄断所特有的停滞和腐化的趋势还是繼續在發生作用,而且有时还会在个别工業部門、个别国家占上风。

垄断地占据特別广大、特別富饒或地理条件好的殖民地,也引起同样的結果。

其次,帝国主义就是貨幣資本大量积聚于少数国家;我們已經知道,这种資本是数目达到1 000—1 500亿法郎的有价証券。于是以“剪息票”为生、根本不参加任何企業、終日游手好閑的食利者階級,确切些說,食利者階層,就大大地增长起来。帝国主义最重要的經濟基础之一——資本輸出,更使食利者階層完全脫离了生产,使那些靠剝削几个海外国家和殖民地的劳动为生的国家处处都留下了寄生的痕迹。

霍布森写道:“在1893年,不列顛在国外的投資,約占联合王国財富总数的15%。”[⊖]我們要指出,到1915年,这个資本大約又增加了一倍半。霍布森又說:“对于工商業者來說意义很小的侵略性的帝国主义,加于納稅人的負担是很沉重的,……而对于寻找投資場所的資本家……”(在英語里,这个概念是用《инвестор》来表示的,意即“投資者”,食利者)“……它却是大量利潤的来源。据統

⊖ 見霍布森所著前書第59頁和第60頁。

計學家吉芬計算，1899年大不列顛從全部對外貿易和殖民地貿易（包括輸入和輸出）所得到的利潤是1 800萬英鎊（約合17 000萬盧布），這是按8億英鎊周轉總額的2.5%計算出來的。”不管這個數目多麼大，它仍然不能說明侵略性的大不列顛帝國主義。能夠說明的是9 000萬至1億英鎊的“投”資的收入，也就是食利者階層的收入。

在世界上“商業”最發達的國家，食利者的收入竟比對外貿易的收入高4倍！這就是帝國主義和帝國主義寄生性的實質。

因此，“食利國”（Rentnerstaat）或放債國這一名詞，就成了論帝國主義的經濟著作中通用的名詞。世界分為極少數放債國和極大多數債務國。舒爾采-格弗尼茨寫道：“在國外投資中占第一位的，是對政治上依賴的國家或同盟的國家的投資；英國貸款給埃及、日本、中國和南美。在必要時，英國的海軍就充當法院的差人。英國的政治力量保護着英國，防止債務人造反。”^①薩爾托里烏斯·馮·瓦爾特紹森在他所著的“國外投資的國民經濟制度”一書中，把荷蘭當做“食利國”的標本，並且說現在的英法也成了這樣的國家^②。施爾德爾認為英國、法國、德國、比利時和瑞士這五個工業國家，是“很明顯的債權國”。他沒有把荷蘭算進去，就是因為荷蘭的“工業不太發達”^③。而美國僅僅是美洲的債權人。

舒爾采-格弗尼茨寫道：“英國逐漸由工業國變成放債國了。雖然工業生產和工業品出口有了絕對的增加，但是利息、股息和發

① 見舒爾采-格弗尼茨所著“不列顛帝國主義”第320等頁。

② 見薩爾托里烏斯·馮·瓦爾特紹森所著“國外投資的國民經濟制度”1907年柏林版第4冊。

③ 見施爾德爾所著前書第393頁。

行証券、担任中介、进行投机等方面的收入，在全部国民經济中的相对意义愈来愈大了。依我看来，这个事实正是帝国主义高涨的經济基础。債权人和債務人之間的关系，要比卖主和买主之間的关系更巩固些。”[⊙]关于德国的情形，柏林的“銀行”杂志出版人阿·兰斯堡 1911 年在他的“德国是食利国”一文中写了如下一段話：“德国人喜欢譏笑法国显露出来的那种变为食利者的傾向。但是他們忘記了，如果說到资产階級，那末德国的情形同法国是愈来愈相像了。”[⊙]

食利国是寄生腐化的资本主义的国家，这种情形不能不反映到这种国家的一切社会政治条件上面来，尤其是反映到工人运动中的两个基本派別上面来。为了尽量把这一点說清楚，我們且引用霍布森的一段話。他是一个最“可靠的”証人，因为誰也不会疑心他偏祖“馬克思主义的正統思想”；同时他又是个英国人，很了解这个殖民地最广大、財政資本最雄厚、帝国主义經驗最丰富的国家的情形。

霍布森在英布战争的印象还很鮮明的时候，描述了帝国主义同“財政資本家”利益的联系，以及“財政資本家”从承包業務和供給商品获得的利潤增加的情形，他說：“指揮这一明显的寄生政策的是資本家；但是同一动机也影响到了工人中間的特殊階層。在很多城市中，所有最重要的工業部門都要依靠政府的定貨；冶金工業和造船業中心的帝国主义，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依賴着这种情况。”这位作者認為，有两种情况削弱了各老大帝国的力量：（1）“經济寄生性”；（2）用附屬国的人民編制軍隊。“第一种情况是經

⊙ 見舒尔采-格弗尼茨所著前書第 122 頁。

⊙ 見“銀行”杂志 1911 年第 1 期第 10—11 頁。

济寄生主义的習气，这种習气使得統治国利用各个外省、各个殖民地、各个附屬国来达到本国統治階級發財的目的，来收买本国下層階級，使他們安分守己。”我們要补充一句：为了在經濟上有可能进行任何形式的收买，就必须有垄断式的高額利潤。

关于第二种情况，霍布森写道：“帝国主义的盲目症的最奇怪的表征之一，就是英法等帝国主义国家所表現的那种漠不关心的态度。在这方面最严重的是英国。我們征服印度帝国的大部分战役都是我們用土人編成的軍隊进行的；在印度和近来在埃及的大量常备軍都是由英国人担任指揮；我們征服非洲的各次战争，除了征服南非的以外，几乎都是由土人替我們进行的。”

瓜分中国的前景，使霍布森得出了这样一种經濟上的估計：“到那时，西欧大部分地区的面貌和性質，都会像現在西欧的一部分地区，如英国南部、里符耶腊以及意大利和瑞士那些游人最盛、富人最多的地方一样，也就是說，产生了少数从远东取得股息和年金的富豪貴族，連同一批人数稍多的職員和商人，为数更多的家僕以及在运输業和成品最后加工工業中工作的工人。主要的工業部門就会消失，而大批食品 and 大批半成品都是由亞非两洲源源進貢。”“这就是更广大的西欧各国同盟或欧洲列强联邦可能开辟的前途，这个联邦不仅不会推进世界文明的事業，反而有造成西方寄生主义的極大的危險：产生出几个工業先进的国家，这些国家的上層階級从亞非两洲取得巨額的貢款，并且利用这种貢款来豢养大批馴服的職員和僕役，这些職員和僕役不再生产大量农業品和工業品，而是替个人服役，或者在新式財政貴族監督下从事次要的工業劳动。讓那些漠視这种理論、”（應該說：前途）“認為这个理論不值得研究的人去思考一下現在已經处于这种状态的英国南部各区

的經濟条件和社会条件吧。讓他們想一想，一旦中国屈服于这种財政資本家、‘投資人’及其政治方面和工商業方面的職員的經濟控制，使他們能从这个世界上从未有过的極大的富源地带汲取利潤，并且用之于欧洲，这种制度又会扩张到怎样巨大的程度。当然，情况是極为复杂的，世上各种势力的变动很难預料，所以也就不能預先肯定只有这一个方向的某种前途一定会实现。但是，現在支配着西欧帝国主义的那些势力，确实是向着这一个方向走的。如果这些势力不会遇到什么抵抗，不会被引上另一个方向，那末这些势力就会正是朝着完成这一过程的方向努力。”[⊖]

作者說得完全对。假如帝国主义的势力不会遇到抵抗，它一定会走向这种結局。这里对于“欧洲联邦”在現代帝国主义情况下的意义，是估計得正确的。我們要补充的只有一点，就是在大多数国家工人运动内部暂时获得胜利的机会主义者，也是一貫地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的。帝国主义就是意味着分割世界而不只是剝削中国一个国家，就是意味着少数最富的国家享有垄断式的高額利潤，所以，它們在經濟上就有可能去收买無产階級的上層分子，这样也就培养、促成和巩固了机会主义。不过不要把一般地反抗帝国主义同时也反抗机会主义的那些力量忘掉，这些力量，社会自由主义者霍布森自然是看不到的。

德国机会主义者格尔哈特·希尔德布兰德过去因为拥护帝国主义而被开除出党，現在倒可以充当德国所謂“社会民主”党的領袖，他給霍布森的言論作了一个很好的补充，宣传必須組織“西欧联邦”（俄国除外），以便“共同”行动……反对非洲黑人、反对“大伊

⊖ 見霍布森所著前書第 103、205、144、335、386 等頁。

斯兰运动”，以便維持“强大的陆海軍”反对“日华联盟”[⊖]等等。

舒尔采-格弗尼茨所描繪的“不列顛帝国主义”，也說明了同样的寄生主义的特征。从 1865—1898 年，英国的国民收入大約增加了 1 倍，而这一时期来自“国外”的收入却增加了 8 倍。如果說帝国主义的“功劳”是“教育黑人去劳动”（不强迫是行不通的……），那末帝国主义的“危险”，就是“欧洲将把体力劳动，起初把农业劳动和矿业劳动，然后把比較重的工业劳动，推給黑种人去干，自己則安心地过食利者的生活，也許这样就为紅种人和黑种人的經濟上的解放以及后来的政治上的解放准备了条件”。

在英国，有愈来愈多的土地脱离农业生产，成了专供富人运动作乐的場所。一般人談到苏格兰这个最贵族化的、专门用来打猎和作其他运动的地方，都說它是“专靠遗产和卡内基先生”（美国亿万富翁）“生活的”。英国每年单是花在賽馬和猎狐上面的費用，就有 1 400 万英鎊（約合 13 000 万卢布）。英国食利者約有 100 万人。从事生产的人口的百分比日益下降：

英 国 人 口	主要工业部門 中的工人人数	工人在人口总数 中所占的百分比
(单位 100 万)		
1851 年……17.9	4.1	23%
1901 年……32.5	4.9	15%

研究“20 世紀初的不列顛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学者談到英国工人阶级的时候，不得不經常提起工人“上層分子”和“真正無产阶级下層分子”之間的区别。上層分子中間有大批参加合作社、工

⊖ 見格爾哈特·希爾德布蘭德所著“工业統治地位和工业社会主义的动摇”（Gerhard Hildebrand: «Die Erschütterung der Industriegewalt und des Industriesozialismus»）1910 年版第 229 頁及往下各頁。

会、体育团体和许许多多教派的分子。选举法对这个阶层是平等看待的。英国的选举法“还有许多限制，以排除真正的无产阶级下层分子”¹¹为了粉饰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人们通常只讲到在无产阶级中占少数上层分子，例如说：“失业问题主要是伦敦和政治家们很少重视的那些无产阶级下层分子的问题”[⊖]……其实应该说，资产阶级政客和“社会主义”机会主义者很少重视的那些无产阶级下层分子。

从帝国主义国家移往国外的人口逐渐减少，从工资比较低的、比较落后的国家移入帝国主义国家的人口（招来的工人和移民）却逐渐增加，这也是与上述种种现象有关的帝国主义特点之一。据霍布森说，英国移往国外的人口从1884年起开始减少：1884年有242 000人，而1900年只有169 000人。德国移往国外的人口，在1881—1890年的10年中达到了最高峰，有1 453 000人，但是在后来的20年里，又减少到544 000以至341 000人了。同时，从奥、意、俄等国移入德国的工人却增加了。根据1907年的人口调查，德国有1 342 294个外国人，其中产业工人占440 800人，农业工人占257 329人[⊗]。法国的矿业工人“大部分”是外国人：波兰人、意大利人和西班牙人[⊘]。在美国，从东欧南欧移入的侨民做工资最低的工作，而升为监工和做工资最高的工作的，大部分都是美国工人[⊙]。帝国主义还有在工人中间造成特权阶层并且使他们脱离广

⊖ 见舒尔采-格弗尼茨所著“不列颠帝国主义”第301页。

⊗ 见“德国统计年鉴”（《Statistik des Deutschen Reichs》）第211卷。

⊘ 见亨盖尔所著“法国的投资”（Henger: 《Die Kapitalsanlage der Franzosen》）1913年斯图加特版。

⊙ 见古尔维奇所著“移民与劳动”（Hourvich: 《Immigration and Labour》）1913年纽约版。

大無产階級群众的趋向。

必須指出：在英国，帝国主义分裂工人，加强工人中間的机会主义，使工人运动暂时趋向腐朽，这种趋向在很久以前，在 19 世紀末和 20 世紀初就已經表現出来了。因为英国从 19 世紀中叶起，就具备了帝国主义的两大特点：占有巨量殖民地領土，在世界市場上占垄断地位。馬克思和恩格斯曾經在几十年中不断地注意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和英国資本主义的帝国主义特点之間的联系。例如，恩格斯在 1858 年 10 月 7 日給馬克思的信中說：“英国無产階級实际上日益資產階級化了，因而这一所有民族中最資產階級化的民族，除了資產階級，似乎最后还要有資產階級化的贵族和資產階級化的無产階級。自然，对一个剝削全世界的民族說来，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合理的。”⁸⁴大約 25 年以后，恩格斯又在 1881 年 8 月 11 日写的信里說到了“最坏的英国工联，它們甘願受那些被資產階級收买或至少是領取資產階級酬金的人領導”⁸⁵。后来，恩格斯在 1882 年 9 月 12 日給考茨基的信中說：“你問我：英国工人对殖民政策的看法究竟怎样？他們对于这个政策的看法也同他們对一般政策的看法一样。这里并沒有什么工人政党，只有一些保守派的和自由派的激进党人，而工人也就安然同他們共享英国的殖民地垄断权和英国在世界市場上的垄断权。”^①（恩格斯在 1892 年給“英国工人階級状况”一書第 2 版所写的序言中，也叙述了同样的看法。）

这里已經把原因和后果明白地指出来了。原因是：（1）这个

① 見“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Briefwechsel von Marx und Engels》）第 2 卷第 290 頁；第 4 卷第 453 頁。見考茨基所著“社会主义与殖民政策”（K. Kautsky: 《Sozialismus und Kolonialpolitik》）1907 年柏林版第 79 頁；这本書是考茨基在很早很早以前，当他还是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写的。

国家剝削全世界；(2)它在世界市場上占垄断地位；(3)它拥有殖民地垄断权。結果是：(1)英国部分無产階級已經資產階級化了；(2)英国部分無产階級甘願受那些被資產階級收买或至少是領取資產階級酬金的人領導。在二十世紀初，帝国主义已經結束了極少数国家分割世界的过程，其中每个国家現在都剝削(指吸取超額利潤)“全世界”的一部分，每一部分都要比英国在1858年所剝削的小一点；每一个国家都由于托拉斯、卡特尔、財政資本以及債權人对債务人的关系等等而在世界市場上占垄断地位；每个国家都在相当程度上拥有殖民地垄断权(我們已經說过，世界上7500万平方公里的全部殖民地領土中，有6500万平方公里，即86%集中在6个强国手里；有6100万平方公里，即81%，集中在3个强国手里)。

現在局势的特点就是形成了以下这些政治經濟条件：帝国主义已經从萌芽状态發展成为統治的体系，資本家的垄断組織在国民經濟和政治中占了首要地位，世界已經分割完畢；另一方面，現在已經不是英国独占垄断权，而是少数帝国主义强国爭夺垄断权了，这一点是整个20世紀初期的特点。所有这些政治經濟条件，都不能不使机会主义同工人运动的共同的、根本的利益更加不可調和起来。現在机会主义已經不能像在19世紀后半期的英国那样了，它已經不能在某一个国家里，在几十年的长期內取得完全的胜利了，但是它在許多国家里已經完全成熟，已經成熟过度，已經腐朽，以至于变为社会沙文主义而同資產階級的政策完全溶合为一了[⊖]。

⊖ 波特列索夫、契恒凱里、馬斯洛夫諸先生所代表的俄国社会沙文主义，無論是它的公开形式，或是它的暗藏形式(以齐赫澤、斯柯別列夫、阿克雪里罗得、馬尔托夫等为代表)，也都是从变种的俄国机会主义即取消主义生长起来的。

九、对帝国主义的批評

这里所說的对帝国主义的批評是指广义的批評，就是指社会各階級由于各自的一般思想体系而采取的对待帝国主义政策的態度。

一方面，巨量的財政資本集中在少数人手里，造成非常广泛而稠密的联系和关系网，这个密网不仅控制了大批中小的資本家和業主，而且控制了最小的資本家和業主；另一方面，一国財政資本家集团与其他各国財政資本家集团，为分割世界和統治其他国家而进行着尖銳的斗争，——結果就使所有的有产階級全都轉到帝国主义方面去了。“普遍”迷恋于帝国主义的前途，疯狂地捍衛帝国主义，尽量粉飾帝国主义，——这就是当代的标志。帝国主义的思想体系也渗透到工人階級里面去了。工人階級和其他階級之間并没有隔着一道万里长城。如果說現在德国所謂“社会民主”党的領袖，被人們公正地称为“社会帝国主义者”，即口头上的社会主义者，实际上的帝国主义者，那末霍布森早在1902年，就已經指出英国机会主义的“費边社”里存在着“費边帝国主义者”了。

資產階級的学者和政論家，通常都是用比較隱蔽的方式替帝国主义辯护，掩盖帝国主义所占有的完全統治地位及其深厚的根源，竭力把細微末节放在主要地位，拚命用一些毫無意义的“改良”計劃，例如由警察監督托拉斯或銀行等等，来轉移人們对重要問題的注意。至于那些公开的、無耻的帝国主义者，敢于說改良帝国主义的基本特質是一种荒謬想法的帝国主义者，是很少發表意見的。

举个例來說吧。德国帝国主义者在“世界經濟文匯”中企圖考

察殖民地中的民族解放运动，当然特别是那些非德屬殖民地中的民族解放运动。他們指出印度的風潮和抗議运动，納塔爾（南非）的运动，荷屬印度的运动等等。其中有一人就一本报道亞非欧各个被异国統治的民族的代表于1910年6月28—30日举行的附屬民族种族代表會議情形的英文書籍，写了一篇評論，評論中对會議上的演說作了这样的估計：“他們說，必須同帝国主义斗争；統治国应当承認附屬民族的独立权；国际法庭应当监督各强国同弱小民族訂的条約的履行。除了發表这些幼稚的願望以外，代表會議并没有繼續前进。我看他們一点也不了解这个真理：帝国主义是同資本主义現在的形式有不可分割的联系的，因此(!)同帝国主义作直接的斗争是没有希望的，至多也不过是反对个别特別可恶的过火現象而已。”[⊖] 因为用改良主义的方法修改帝国主义的基础不过是一种欺騙，是一种“幼稚的願望”，因为被压迫民族的資產階級代表没有“繼續”前进，所以压迫民族的資產階級代表就“繼續”后退了，后退到在伪“科学”的掩盖下崇拜帝国主义的地步。这也是一种“邏輯”！

用改良主义的方法来改变帝国主义的基础能不能做到呢，是前进，使帝国主义所产生的种种矛盾更加尖銳、更加剧烈呢，还是后退，緩和这些矛盾呢，——这是对帝国主义的批評中的根本問題。由于帝国主义在政治上的特点是全面的反动，是財政寡头的压迫和自由竞争的消除而引起的民族压迫的加强，所以在20世紀初期，几乎在所有帝国主义的国家中都出现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小資產階級民主反对派。考茨基以及广大国际考茨基主义思潮同馬

⊖ 見“世界經濟文匯”(«Weltwirtschaftliches»)第2卷第193頁。

克思主义决裂的表现,就在于考茨基不仅沒有努力、沒有做到反对这个經济上根本反动的小資产階級改良主义的反对派,反而在实践上同它打成一片了。

1898年帝国主义性的美西战争,在美国引起了“反帝国主义者”的反对派,也就是最后一批代表資产階級民主派的人士的反对。他們把这次战争叫做“万恶”的战争,他們認為兼并异国領土是违背宪法的,認為美国对菲律宾土人領袖阿格維納尔多的行为是“沙文主义者的欺騙”(先向阿格維納尔多許諾給菲律宾自由,后来又派美国軍隊来把菲律宾占領了),并且引用了林肯的話:“白人管理自己是自治;白人管理自己又管理別人,就不是自治而是专制了。”[⊖]但是,既然这全部批評都不敢承認帝国主义同托拉斯——也就是同資本主义的基础——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不敢同大資本主义及其發展所造成的那支力量匯合在一起,那末这种批評也就不过是一种“幼稚的願望”而已。

霍布森批評帝国主义的时候所采取的基本立場,也是如此。霍布森否認“帝国主义的必然性”和主张必須“提高”人民的“消費力”(是在資本主义制度下!),比考茨基还要早。用小資产階級的观点批評帝国主义,批評銀行支配一切,批評財政寡头等等的,还有我們屢次引用过的阿加德、阿·兰斯堡、耳·厄什韦葛以及法国作家維克多·別拉尔,別拉尔是1900年出版的那本浅薄的“英国与帝国主义”一書的作者。所有这些人絲毫沒有冒充馬克思主义的企圖,他們是以自由竞争和民主制来反对帝国主义,譴責了势必引起冲突和战争的巴格达鐵道計劃,發表了維持和平的“幼稚願

⊖ 見日·帕士叶所著“美国帝国主义”(J. Patouillet: «L'impérialisme américain») 1904年第俄版第272頁。

望”等等，而那位研究国际証券發行情形的統計学家阿·奈馬尔克，在1912年計算到“国际”财富有几千亿法郎时，甚至叫了起来：“难道可以設想和平竟会受到破坏么？……有了这样巨大的财富，还会去冒险挑起战争么？”[⊖]

资产階級經濟学家这样天真，倒没有什么奇怪，而且也只有做出一副天真的样子，“煞有介事地”談論帝国主义制度下的和平，对他们才有利。可是考茨基在1914、1915、1916年也采取了这种资产階級改良主义的观点，認為在和平問題上，“大家”（帝国主义者，假社会主义者和社会和平主义者）的“意見都是一致的”，試問他还有一点馬克思主义的气味嗎？这不是分析和揭露帝国主义矛盾的深刻性，而是用改良主义的“幼稚願望”来推开这些矛盾，迴避这些矛盾。

下面是考茨基对帝国主义所作的經濟批評的典型例子。他举出1872和1912年英国对埃及輸出輸入的統計材料，發現这方面进出口的数量比英国进出口总额增加得慢。于是考茨基推論說：“我們并没有任何根据認為，不用武力占領埃及而单靠經濟因素的作用，英埃貿易就会增长得慢些。”“实现資本扩张的願望的”“最好办法，不是通过帝国主义强力，而是通过和平民主。”[⊗]

考茨基的这番議論被他的俄国跟班（也是俄国社会沙文主义者的掩护人）斯彼克塔托尔先生⁸⁶用各种各样的調子重弹过很多次。这番議論正是考茨基对帝国主义的批評的基础，所以我們必

⊖ 見“国际統計研究所公報”（«Bulletin de l'Institut International de Statistique»）第19卷第2册第225頁。

⊗ 見考茨基所著“民族国家、帝国主义国家和国家同盟”（Kautsky: «Nationalstaat, imperialistischer Staat und Staatenbund»）1915年紐倫堡版第72頁和第70頁。

須詳細地談一談。我們從引証希法亭的言論開始。因為考茨基曾經屢次，包括在1915年4月那次在內，認為他的結論是“所有社會主義的理論家一致同意的”。

希法亭寫道：“無產階級要做的事情，不是用已經成為過去的那個自由競爭時代的政策和仇視國家的政策來反對更進步的資本主義政策。無產階級給財政資本的經濟政策的答復，給帝國主義的答復，決不能是自由貿易，而只能是社會主義。無產階級政策的目的現在不可能是恢復自由競爭（這種理想現在已經變成反動的理想了），唯一的目的只能是通過消滅資本主義來完全消滅競爭。”[⊖]

考茨基背棄了馬克思主義，他在財政資本時代擁護“反動的理想”，擁護“和平的民主”和“單靠經濟因素的作用”，因為這個理想在客觀上是開倒車，是從壟斷資本主義倒退到非壟斷的資本主義，是一種改良主義的騙局。

如果不用武力占領，如果沒有帝國主義，沒有財政資本，那末英國同埃及（或者同其他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貿易就會“增長得”快些。這是什麼意思？這豈不是說，如果自由競爭沒有受到一般壟斷組織的限制，沒有受到財政資本的“聯系”或壓迫（這也是壟斷）的限制，沒有受到個別國家壟斷地占有殖民地的限制，那末資本主義就會發展得快些麼？

考茨基的議論不可能有別的意思，而他這個“意思”真是荒謬得很。就假定說，的確，如果沒有任何壟斷組織，自由競爭會使資本主義和商業發展得更快。但是，商業和資本主義發展得愈快，則產生壟斷的生產集中和資本集中的程度也就愈高。而且壟斷已經

⊖ 見“財政資本”第567頁。

产生了，恰好是从自由竞争中产生出来的！虽然垄断组织现在阻碍着发展，但是这也不能成为拥护自由竞争的理由，因为自由竞争产生出垄断以后，自由竞争就不可能存在了。

不管你怎样把考茨基的议论翻来复去，你只会找到反动思想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此外再找不到任何别的东西。

即使把这种议论修改一下，并且像斯彼克塔托尔那样说，现在英属殖民地同英国的贸易，要比英属殖民地同其他各国的贸易发展得慢些，——这也挽救不了考茨基。因为打击英国的也是垄断，也是帝国主义，不过是其他国家的（美国的、德国的）帝国主义。大家知道，卡特尔引起了一种新奇的保护关税制，它所保护的（恩格斯在“资本论”第3卷上就已经指出来了⁸⁷）恰好是那些能够出口的货物。其次，大家知道，有一种卡特尔和财政资本所特有的“按倾销价格输出”的制度，也就是英国人所说的“抛售”的制度：卡特尔在国内按垄断的高价出卖产品，而在国外却按贱几倍的价格倾销，来打倒自己的竞争者，把自己的生产扩大到最大限度等等。如果说德国对英属殖民地的贸易是比英国对英属殖民地的贸易发展得快些，那也只能证明德国帝国主义要比英国帝国主义更新鲜、更强大、更有组织、更高明，而决不能证明自由贸易的“优越”，因为这里并不是自由贸易同保护关税制或殖民地附属制斗争，而是一个帝国主义同另一个帝国主义斗争，一个垄断组织同另一个垄断组织斗争，一个财政资本同另一个财政资本斗争。同英帝国主义比起来，德帝国主义占有极大的优势，因此突破了殖民地的疆界和保护关税的城墙。如果由此得出一个拥护“自由贸易”与“和平民主”的“理由”，那就太庸俗了，就是忘掉帝国主义的根本特点和特性，就是用市僧的改良主义来代替马克思主义。

有趣的是，甚至資產階級經濟學家阿·蘭斯堡，雖然也同考茨基一樣對帝國主義作了市僧式的批評，但是他對貿易統計材料的研究，也要比考茨基更科學一些。他並不是隨便拿一個國家或者單拿一個殖民地來同其餘各國比較，而是比較帝國主義國家的兩種輸出：第一種是對財政上依賴於帝國主義國家、向帝國主義國家借款的國家的輸出；第二種是對財政上獨立的國家的輸出。結果如下：

		德國的輸出 (單位 100 萬馬克)		
		1889 年	1908 年	增加的百分數
輸出到財政 上依賴于德 國的国家	羅馬尼亞·····	48.2	70.8	+ 47%
	葡 萄 牙·····	19.0	32.8	+ 73%
	阿 根 廷·····	60.7	147.0	+143%
	巴 西·····	48.7	84.5	+ 73%
	智 利·····	28.3	52.4	+ 85%
	土 耳 其·····	29.9	64.0	+114%
	共 計 ·····	234.8	451.5	+ 92%
輸出到財政 上不依賴于 德國的国家	大不列顛·····	651.8	997.4	+ 53%
	法 蘭 西·····	210.2	437.9	+108%
	比 利 時·····	137.2	322.8	+135%
	瑞 士·····	177.4	401.1	+127%
	澳大利亞·····	21.2	64.5	+205%
	荷屬印度·····	8.8	40.7	+363%
	共 計 ·····	1 206.6	2 264.4	+ 87%

蘭斯堡並沒有總結，所以他也就很奇怪地沒有看到：如果這些數目字真能證明什麼，那也不過是證明他自己不對而已，因為對財政上依賴的國家的輸出，畢竟要比對財政上獨立的國家的輸出增加得快些，雖然快得並不多（我們把“如果”兩字加上着重號，是因為蘭斯堡的統計還是很不完全的）。

兰斯堡在考察輸出和借款的关系时写道：

“1890—1891年度，羅馬尼亚通过几个德国銀行締結了借債的条約。其实在几年以前，这些德国銀行就已經發放这笔貸款了。这笔貸款主要是用来向德国購買铁路材料的。1891年德国对羅馬尼亚的輸出是5500万馬克。下一年度就落到3940万馬克；以后时起时伏，到1900年一直落到2540万馬克。直到最近几年因为出借了两笔新貸款，才又达到了1891年的水平。

德国对葡萄牙的輸出，由于1888—1889年度的貸款而增加到2110万馬克（1890年）；在以后两年內又落到1620万馬克和740万馬克，直到1903年才又恢复原先的水平。

德国同阿根廷貿易的材料更为明显。由于1888年和1890年的两次貸款，德国对阿根廷的輸出在1889年达到了6070万馬克。两年后，輸出只有1860万馬克了，还不到过去的三分之一。直到1901年才又达到并且超过了1889年的水平，这是因为德国又貸給阿根廷几次国家借款和城市借款，供給建筑电力厂的資金，以及其他各种信貸的緣故。

德国对智利的輸出由于1889年的貸款，增加到4520万馬克（1892年），一年后又落到2250万馬克。1906年又通过德国几个大銀行締結了新的貸款条約，輸出又增加到8470万馬克（1907年），而到1908年又落到了5240万馬克。”^①

兰斯堡从这些事实中得出了一种滑稽的市僧式的格言：同貸款相联系的出口是很不穩固、很不平衡的；把資本輸出国外而不用来“自然地”“和諧地”發展祖国工業，是多么不好；办理外国貸款

① 見“銀行”杂志1909年第2期第819頁及往下各頁。

时，克虜伯工厂要付出几百万的賄款，代价是“太大”了等等。但是这些事实却明白地告訴我們：輸出的增加，恰好是同財政資本騙人的勾当相联系的，財政資本并不关心什么資產階級的格言，它要尽量多榨油水，最好能从一条牛身上剝下两张皮来：第一是貸款的利潤，第二还是这笔貸款的利潤，用这笔貸款来購買“克虜伯”工厂的产品或鋼業辛迪加的鐵路材料等等。

我們再說一遍，我們决不認為蘭斯堡的統計是完備的，但是我們必須引用，因为它比考茨基和斯彼克塔托爾的統計更科學些，因为蘭斯堡指出了看問題的正确方法。要議論財政資本在輸出等等方面的作用，就要善于單單特別強調輸出同財政資本家騙人的勾当的联系，輸出同卡特爾貨物的銷售等等的联系。隨便地拿一般殖民地同非殖民地比較，拿一个帝国主义同另一个帝国主义比較，拿一个半殖民地或殖民地（如埃及）同其余一切国家比較，那就正是迴避和掩飾問題的本質。

考茨基对帝国主义的理論批評，其所以同馬克思主义沒有絲毫共同之点，其所以只能用来进行同机会主义者和社會沙文主义者和平統一的宣传，就是因为这种批評迴避和掩飾了帝国主义最深刻的根本矛盾：壟斷同与之并存的自由竞争的矛盾，財政資本的巨大“業務”（以及巨額利潤）同自由市場上“誠实無欺的”買賣的矛盾，卡特爾、托拉斯同沒有卡特爾化的工業的矛盾等等。

考茨基胡謔出来的那个臭名昭彰的“超帝国主义”論，也具有完全相同的反动性質。請把考茨基在 1915 年关于這個問題的議論拿来同霍布森在 1902 年的議論比較一下。

考茨基說：“……現在的帝国主义的 policy 难道不会被一种新的超帝国主义的 policy 所排除嗎？这个新的超帝国主义的 policy 将以实

行国际联合的财政资本共同剥削全世界来代替各国财政资本的相互斗争。不管怎样，资本主义的这一新阶段是可以设想的。至于能不能实现，现在还没有充分根据来解决这一问题。”^①

霍布森说：“基督教在各自占有许多未开化的殖民地和依赖国的少数巨大联邦帝国里已经根深蒂固了，很多人觉得基督教正是现代趋势的最自然的發展道路，而且通过这种發展道路最有希望在巩固的国际帝国主义的基础上达到永久的和平。”

被考茨基叫作超帝国主义的，也就是早在13年前被霍布森叫作国际帝国主义的那个东西。考茨基除了用超字来代替国际二字，捏造出一个深奥的新词以外，他的“科学”见解的进步的地方，不过是企图把霍布森所描写的东西，其实是英国牧师所说的谎话，冒充为马克思主义。在英布战争以后，英国牧师这一高贵等级把主要力量用来安慰那些在南非战争中丧失了不少生命，并且为保证财政资本家有更高的利润而缴纳了更高的捐税的英国小市民和工人，这本来是很自然的。除了说帝国主义并不那么坏，说它很快就要变成能够保障永久和平的国际（或超）帝国主义，——哪里还有什么更好的安慰呢？不管英国的牧师或甜蜜的考茨基的意图如何善良，但是他那个“理论”的客观的即真正的社会意义只有一个，就是转移群众视线，使他们不去注意现代的尖锐矛盾和尖锐问题，而去注意将来所谓新的“超帝国主义”的虚假的前途，用这种极为反动的办法来安慰群众，使他们抱着在资本主义下可能达到永久和平的幻想。在考茨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里，除了欺骗群众以外，没有任何别的东西。

^① 见1915年4月30日“新时代”杂志第144页。

其实只要同那些人人皆知的不容爭辯的事实好好对比一下，就会知道考茨基硬要德国工人（和各国工人）相信的那种前途是多么虛假了。拿印度、印度支那和中国來說。誰都知道，这三个共有六七亿人口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国家，是受英法日美等几个帝国主义强国的財政資本剝削的。假定这些帝国主义国家組成了几个彼此敌对的联盟，几个以保持或扩张它們在上述亚洲国家中的領土、利益和“势力范围”为目的的联盟。这就会是“国际帝国主义”或“超帝国主义”的联盟。又假定所有帝国主义强国共同組成一个联盟来“和平”分割上述亚洲国家，那就会是“实行国际联合的財政資本”。这种联盟的实际例子，在20世紀的历史上已經有过了，列强共同对付中国就是一个例子。試問在保存着資本主义的条件下（考茨基正是以这样的条件为前提的），“可以設想”这种联盟不是暫时的联盟嗎？“可以設想”这种联盟会消灭各种各样的摩擦、冲突和斗争嗎？

只要清楚地提出这个問題，就不能不給以否定的回答。因为在資本主义下，分割势力范围、利益和殖民地等等，除了以分脏参与者的实力，也就是一般經濟、財政、軍事等等的实力为根据外，也不可能設想以其他的东西为根据。而这些分脏参与者的实力的变化又各不相同，因为在資本主义下，各个企業、各个托拉斯、各个工業部門、各个国家的發展不可能是平衡的。如果拿半世紀以前的德国的資本主义实力同当时英国的实力相比，那时德国还小得可怜；日本同俄国相比，也是如此。能不能“設想”一二十年之后，帝国主义列强的实力对比依然沒有变化呢？絕對不能。

所以，資本主义现实中的（不是英国牧师或德国“馬克思主义

者”考茨基的庸俗的市僧幻想中的)“国际帝国主义的”或“超帝国主义的”联盟,不管形式如何,不管是一个帝国主义联盟去反对另一个帝国主义联盟,还是一切帝国主义强国结成一个大同盟,都不可避免地只会是前后两次战争中间的“暂时休战”。和平的同盟准备着战争,同时也是在战争中成长起来的,这两者互相制约,在同一个基础上,即帝国主义联系、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的相互关系的基础上产生着和平斗争形式与不和平斗争形式彼此交替的情形。聪明绝顶的考茨基为了安慰工人,为了使他们跟投到资产阶级方面去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妥协,就把一条链子上的这一环节同另一环节割开,把今天一切强国为了“安慰”中国(请回忆一下镇压义和团起义的事件⁸⁸)而结成的和平的(和超帝国主义的,——甚至是超而又超的帝国主义的)联盟,同明天的、准备在后天又结成“和平的”总联盟来瓜分——譬如说——土耳其等等的那个不和平的冲突割开。考茨基不提帝国主义和平时期同帝国主义战争时期之间的活生生的联系,而把僵死的抽象概念讲给工人听,是为了使工人同他们那些僵死的领袖妥协。

美国人希尔在他的“欧洲国际关系发展中的外交史”一书序言中,把近代外交史分为以下三个时期:(1)革命时代;(2)立宪运动;(3)现代“商业帝国主义”时代[⊖]。另一个作家又把1870年以来的大不列颠“世界政策”史分为四个时期:(1)第一个亚洲时期(反对俄国在中亚细亚一带向印度扩张);(2)非洲时期(大约在1885—1902年),为了分割非洲而同法国斗争(1898年为了“法索

⊖ 见戴维·杰恩·希尔所著“欧洲国际关系发展中的外交史”(David Jayne Hill: «A History of the Diplomacy in 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f Europe»)第1卷第10页。

达”事件，几乎同法国开战)；(3)第二个亚洲时期(与日本締約反对俄国)；(4)“欧洲”时期，主要是反对德国[⊖]。早在1905年，銀行“家”里謝尔就指出了法国財政資本在意大利进行活动，为法意两国的政治联盟作了准备，同时指出了德英两国爭夺波斯的斗争以及所有欧洲各国的資本为了借債給中国而进行的斗争等等，他写道：“先头部队的政治冲突，是在財政的基础上开展起来的。”这就是“超帝国主义的”和平联盟与普通的帝国主义冲突有分不开的联系的生活的现实。

考茨基既然抹杀帝国主义的最深刻的矛盾，也就必然要發展成粉飾帝国主义，这种情形在他批評帝国主义的政治特性时也表現出来了。帝国主义是財政資本和垄断的时代，財政資本和垄断給各地带来的都是統治的趋向而不是自由的趋向。这种統治趋向的結果，就是在一切政治制度下都發生全面的反动，政治制度方面的矛盾也非常尖銳了。民族压迫和兼并的傾向，即破坏民族独立的傾向(因为兼并無非是破坏民族自决)也变本加厉了。希法亭很正确地指出了帝国主义与民族压迫加剧之間的联系，他写道：“在新發現的国家里，輸入到这里来的資本加深了各种矛盾，不断地引起那些有了民族觉悟的人民的愈来愈强烈的反抗，反对外来的敌人；这种反抗很容易發展成为一种反对外資的危险行动。旧的社会关系發生了根本的革命性的变化；各‘史外民族’数千年来的农村閉塞性日益被破坏；他們正被卷到資本主义的漩涡中去。而且資本主义本身也在慢慢地为被征服的民族提供解放的工具和手段。于是他們也就提出欧洲民族曾經認為是至高無上的目标：建

⊖ 見施尔德尔所著前書第178頁。

立统一的民族国家，作为争取经济自由和文化自由的工具。这种独立运动，使欧洲资本在被它剥削的那些最宝贵的、最有光辉前途的区域中受到威胁；因此，欧洲资本要维持自己的统治，只有不断地增加自己的兵力。”[⊖]

这里还要补充一点。帝国主义不仅要在新发现的国家，而且要在老牌国家实行兼并，加紧民族压迫，因而也使这些国家的反抗运动更加剧烈起来。考茨基表示反对帝国主义加紧政治反动的事实，然而他丝毫没有说明在帝国主义时代决不能同机会主义者统一这个十分迫切的问题。他表示反对兼并，然而他在反对的时候采取的却是最无伤于机会主义者，最容易被机会主义者接受的方式。他是直接对德国大众说话的，然而他又把最重要最有现实意义的事实，例如德国兼并亚尔萨斯—洛林的事实掩盖起来。为了评价考茨基的这种“思想的倾向”，我们来举一个例子。假定日本人指责美国人兼并菲律宾，试问会不会有很多人相信这是因为他根本反对兼并，而不是因为他自己想要兼并菲律宾呢？是不是应该承认，只有日本人起来反对日本兼并朝鲜，要求朝鲜有从日本分离的自由，才能认为这种“反对”兼并的斗争是真诚的，政治上可靠的呢？

考茨基对帝国主义的理论分析，以及他对帝国主义的经济上和政治上的批评，都浸透了一种同马克思主义绝不相容的掩饰和缓和帝国主义最根本矛盾的精神，都贯穿着一种尽力保持欧洲工人运动中正在陷于破裂的同机会主义者的统一的意图。

⊖ 见“财政资本”第487页。

十、帝国主义的历史地位

我們已經說过，帝国主义就其經濟本質來說，是壟斷的資本主義。這一點也就決定了帝國主義的歷史地位，因為在自由競爭的基礎上、而且正是從自由競爭成長起來的壟斷，是從資本主義制度進到更高級的社会經濟制度的過渡。必須特別指出最能夠說明我們研究的這個時代的四種主要的壟斷形式，或壟斷資本主義的四種主要表現。

第一、壟斷是從發展到極高階段的生产集中成長起來的。這就是資本家的各種壟斷同盟，如卡特爾、辛迪加和托拉斯。我們已經說过，這些壟斷同盟在現代經濟生活中起着極大的作用。到20世紀初，它們已經在各先進國家取得了完全的統治地位。固然，最先走上卡特爾道路的，是那些實行高額保護關稅制的國家（德國和美國），但是實行自由貿易的英國也表明了壟斷是由生产集中產生的這個基本事實，不過稍微遲一點罷了。

第二、壟斷引起了加緊對最主要的原料來源的掠奪，尤其是对資本主義社会主要的、卡特爾化程度最高的工業部門，如煤炭工業和鋼鐵工業所需的原料來源的掠奪。壟斷地占有主要的原料來源大大加強了大資本的權力，加劇了卡特爾化的工業和沒有卡特爾化的工業之間的矛盾。

第三、壟斷是從銀行成長起來的。銀行已經由平常的中介企業變成了財政資本的壟斷者。在任何一个最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中，都是由三五個最大的銀行實行工業資本同銀行資本的“個人聯合”，這幾個銀行把占全国資本和貨幣收入總數大部分的幾百億資

本集中在自己手里。财政寡头制给现在资产阶级社会所有一切经济和政治的机构罩上了一层依赖关系的密网，——这就是这种垄断的最明显的表现。

第四、垄断是从殖民政策成长起来的。财政资本实行殖民政策，除了无数“旧的”动机以外，又加上了争夺原料产地、强先输出资本、争夺“势力范围”（即能够成立有利的契约、取得租让、取得垄断利润等等的范围）以及争夺一般经济领土等等的动机。例如，在欧洲列强还只占据非洲十分之一的面积作为自己的殖民地的時候（那是远在1876年的情形），殖民政策还能用非垄断的方式，即所谓“自由占领”领土的方式去发展。但是，当非洲 $\frac{9}{10}$ 的面积已经被占领（到1900年的时候），全世界已经分割完畢的时候，就必然会到来一个垄断地占有殖民地，因而使分割世界和重分世界的斗争特别尖锐起来的时代。

垄断资本主义把所有资本主义的矛盾弄到了如何尖锐的程度，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只要指出物价高涨和卡特尔的压迫这两件事实就够了。这种矛盾的尖锐化，就是世界财政资本取得完全胜利以来的这一过渡的历史时期的最强大的推动力。

垄断制，寡头制，代替了自由趋向的统治趋向，极少数最富强的国家剥削愈来愈多的弱小国家，——这一切造成了帝国主义的一些特点，使人不得不把帝国主义看成是寄生的或腐朽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趋向之一，即形成为“食利国”或放债国的趋向愈来愈明显了，也就是这种国家的资产阶级愈来愈依靠输出资本和“剪息票”为生了。如果以为这一腐朽趋向排除了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可能，那就想错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在帝国主义时代，个别工业部门，个别资产阶级阶层，个别国家，各以或多或少的强度

时而表现着这种趋向，时而又表现着那种趋向。整个说来，现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迅速是从前远不能相比的，但是这种发展不仅一般地更不平衡了，而且不平衡也特别表现在资本最雄厚的国家（英国）的腐朽上面。

研究德国大银行问题的作家里谢尔谈到德国经济发展的速度时说：“德国前一个时期（1848—1870年）的进步并不太慢，但是同德国现代（1870—1905年）整个经济特别是银行发展的速度比起来，就好像拿旧时的邮车同现代的汽车相比一样，现代汽车行驶之快，对于不小心的行人和汽车上的乘客都是很危险的。”这个发展得异常迅速的财政资本，正因为发展得这样迅速，所以它也不反对更“心安理得地”占领殖民地，把那些应当夺取的殖民地 from 更富有的国家手里夺过来，当然不单是使用和平手段。美国近几十年来经济的发展比德国还要快，现代美国资本主义的寄生性也正因此而表现得特别明显。另一方面，就拿共和派的美国资产阶级同君主派的日本或德国的资产阶级来比较一下，也可以看出：在帝国主义时代，它们之间的极大的政治上的差别也大大缩小了，这倒不是因为这种差别根本不重要，而是因为所有这些资产阶级都带有明显的寄生性的特征。

许多工业部门中的某一部门、许多国家中的某一国家的资本家获得了高额垄断利润，在经济上就有可能去收买个别的工人阶层，而且可能暂时收买工人中间相当大的一个少数，把他们拉到某一部门或某一国家的资产阶级方面来反对其他一切的部门或国家。帝国主义国家因分割世界而紧张起来的对抗，更加强了这种趋向。于是形成了帝国主义同机会主义的联系，这种情形在英国表现得最早而且最鲜明，因为发展中的某些帝国主义特点在英国

出現比在其他各国早得多。有些作家，例如馬尔托夫，爱用一种“官方的乐观主义的”（同考茨基、胡斯曼一样）議論来迴避帝国主义同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相联系这个現在特別明显的事实，說什么假如正是先进的資本主义会加强机会主义，或者，假如正是待遇最好的工人会倾向于机会主义，那末反对資本主义的人們的事業就未免太無希望了。千万不要看錯了这种“乐观主义”的意义：这是对机会主义抱乐观的态度，这是用来掩飾机会主义的乐观态度。其实，机会主义特別迅速和特別討厭的發展，并不能保証机会主义取得巩固的胜利，也正像一个健康身体上的脓疮的迅速发展，只能加速脓疮潰裂而使身体恢复健康一样。在这方面最危险的，倒是那些不願意了解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如果不同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密切联系起来就是一句騙人的空話的人。

根据以上对帝国主义的經濟本質的叙述，可以說帝国主义是过渡的資本主义，說得更确切些，是垂死的資本主义。在这一点上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資產階級經濟学家叙述現代資本主义的时候常用的字眼，什么“互相錯綜”、“沒有孤立性”等等；又說什么銀行“就其任务和發展而言，都不是帶有單純私有經濟性質的企業，而是日益超出單純私有經濟調节范围的企業”。而講了上面這句話的那个里謝尔，同时又非常郑重地說，馬克思主义者关于“社会化”的“預言”并“沒有实现”！

“互相錯綜”是什么意思呢？这是只抓住了我們眼前發生的那个过程的最鮮明的一点。这說明观察者只看到一棵棵的树木而看不到森林。这証明观察者是盲目地复写外表的、偶然的、紛乱的現象。这也暴露出观察者被一大堆原始材料压倒了，完全不能了解其中的內容和意义。股票占有的关系，私有者的关系，是“偶然互

相錯綜在一起的”。但是隱藏在這種錯綜現象底下的，構成這種錯綜現象的基礎的，是變動着的社會生產關係。既然大企業規模已經擴張得十分龐大，並且以精確估計大量資料為根據來有計劃地取得數千萬人民所必需的全部原料的 $\frac{2}{3}$ ；甚至 $\frac{3}{4}$ ；既然運送這些原料到各個最便利的生產地點，有時甚至是彼此相距數千里的地點是有步驟地進行的；既然從原料加工一直到製成許許多種成品的各個工序是由一個中心指揮的；既然這些產品是按照一個總的計劃分配給數千萬數萬萬的消費者的（美德兩國的煤油都是由美國“煤油托拉斯”銷售的）；——那末，擺在我們面前的就顯然是生產的社會化，而決不是什麼簡單的“互相錯綜”；同時私有經濟關係和私有权關係顯然已經變成一種與內容不相適應的外殼。如果人為地拖延這個外殼的消滅的日子，那它就必然要腐化起來，也許它還能在腐化狀態中存留一個比較長久的時期（如果割治機會主義膿瘡的手術不幸竟拖延下去的話），但是終究是必然會被消滅的。

德國帝國主義的狂熱崇拜者舒爾采-格弗尼茨驚嘆道：

“如果領導德國銀行的責任歸根到底是落在十來個人身上，那末現在他們的活動對於國民生活說來，就比政府大多數部長的活動更重要了”（在這裡，把銀行家、部長、工業家和食利者“互相錯綜”的情形忘掉，當然比較有利……）“……如果把我們所看到的那些傾向的發展情形徹底想一番，那末結果就會是：一國的貨幣資本統一在銀行的手裡；銀行又互相聯合為卡特爾；一國尋找投資場所的資本都化為有價證券。到那時就會實現聖西門的天才預言：‘現在生產的無政府狀態是同經濟關係的發展缺乏統一的調節這個事實相適應的，這種狀態應當被有組織的生產所代替。到那時候，指揮生產的不會再是那些彼此隔離、互不依賴、不知道人們經濟要求

的企業家，而是相当的社会机构。有可能从更高的观点去观察广阔的社会經濟領域的中央管理委员会，将把这个社会經濟調節得有利于全社会，把生产資料交給适当的人运用，尤其是將設法使生产和消費經常处于协调的状态。現在有一种机关已經把某种組織經濟劳动的作用包括在自己的职务以內了，这种机关就是銀行。我們現在还远沒有实现聖西門的这些預言；但是我們已經在实现这一預言的道路上走着：这是和馬克思本人所設想的不同的馬克思主义，不过也只是形式上不同。”[⊖]

不用說，这是对馬克思的很不錯的“反駁”，从馬克思的精确科学分析倒退到聖西門的猜想上去了，虽然这个猜想是天才的猜想，但終究是猜想。

写于 1916 年 1—6 月

1917 年 4 月第一次在
彼得格勒印成单行本

按手稿刊印并根据单行本
原文作过校訂

⊖ 見“社会經濟基础匯刊”第 146 頁。

論尤尼烏斯的小冊子

一本社会民主党的論述战争問題的小冊子，沒有迁就卑鄙的容克的書报检查，終於在德国秘密地出版了！这位作者显然屬於社会民主党“左翼激进”派，署名尤尼烏斯⁸⁹（拉丁文的意思是：幼者），書名是“社会民主党的危机”。在附录里还刊印了“国际社会民主党的任务的提綱”，这个提綱已經提交伯尔尼 ИСК（国际社会主义者委员会）并刊載在該委员会公报的第3号上。这个提綱是“国际”派提出的。他們在1915年春天出了一期名叫“国际”的杂志（其中載有蔡特金、梅林、卢森堡、塔尔盖麦、敦克尔及什特列別尔等人的文章），在1915—1916年冬天召开了德国各个地区的社会民主党人的會議⁹⁰，通过了这个提綱。

正如作者在1916年1月2日的引言中所說的，这本小冊子写于1915年4月，在刊印时“未加任何修改”。一些“外部情况”的阻碍，使这本小冊子沒有能早日出版。这本小冊子与其說是闡明“社会民主党的危机”，不如說是分析战争，駁斥那些关于这次战争具有民族解放性質的奇談怪論，証明这场战争無論从德国或其他列强方面來說都是帝国主义战争，并且对这个正式党派的行为进行了革命的批評。尤尼烏斯这本写得非常生动的小冊子，在反对已經轉到資產階級和容克方面去的德国旧社会民主党的斗争中，毫無疑問，曾經起了而且还会起着巨大的作用，因此，我們衷心地

作者致賀。

對於熟悉 1914—1916 年在国外用俄文刊印的社會民主黨著作的俄國讀者來說，尤尼烏斯的小冊子並沒有提供什麼原則性的新東西。要是在讀這個小冊子的时候，把我們黨的中央委員會的宣言（1914 年 9—11 月）[⊖]、伯爾尼決議（1915 年 3 月）[⊗] 以及許多關於決議的評論，所敘述的論點，同這位德國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尤尼烏斯的論據對照一下，那就只會確定他的論點極不全面，並且犯了兩個錯誤。在進一步批評尤尼烏斯的缺點和錯誤的时候，我們必須着重指出，我們這樣做是為了進行馬克思主義者不可缺少的自我批評，是為了全面地檢查那些應當成為第三國際思想基礎的觀點。尤尼烏斯的小冊子，總的說來，是一部優秀的馬克思主義著作，很可能，它的缺點在一定程度上帶有偶然性。

尤尼烏斯的小冊子的主要缺點，在於對社會沙文主義（作者既沒有使用這個術語，也沒有使用社會愛國主義者這個不太確切的說法）同機會主義的聯繫只字未提，因此它比合法的（雖然出版以後立即遭到查禁的）“國際”雜誌簡直是后退了一步。作者完全正確地談到德國社會民主黨的“投降”和破產、它的“正式領袖”的“背叛”，但是並沒有再進一步。可是“國際”雜誌卻對“中派”即考茨基派進行了批評，並且對它的毫無氣節、出賣馬克思主義和向機會主義者獻媚的行為作了十分公正的嘲笑。而且這個雜誌已開始揭露機會主義者的真面目，例如，公布了一件極其重要的事實：1914 年 8 月 4 日機會主義者提出了威脅性的要求，聲明他們在任何情況下都堅決投票贊成軍費開支。無論是在尤尼烏斯的小冊子里，

⊖ 見“列寧全集”第 4 版第 21 卷第 9—18 頁。——編者注

⊗ 同上，第 137—142 頁。——編者注

或者是在这个提綱中，既沒有提到机会主义，也沒有提到考茨基主义！这在理論上是不正确的，因为不把“背叛”同机会主义这个有其悠久历史，即有第二国际全部历史的派別联系起来看，就無法說明背叛的原因。这在实践上和政治上都是錯誤的，因为不闡明公开的机会主义（列金、大衛等）和暗藏的机会主义（考茨基之流）这两个派別的意义和作用，那就既不能了解“社会民主党的危机”，也不能克服它。这和奥托·呂勒在1916年1月12日《Vorwärts》上[⊖]發表的一篇历史性的文章相比，是后退了一步。因为呂勒在那篇文章中直截了当地証明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分裂是不可避免的（“前进报”編輯部回答他的时候，只是重复了考茨基的甜蜜的、虛假的言詞，並沒有找到任何一个真正的論据来否認目前已有两个党，而且根本不能把它們調和起来）。这显然是不徹底的，因为在“国际”派的提綱第12条里已經直接提到，“各領導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的正式代表”已經“背叛”并且“轉到資產階級帝国主义政策的立場上”，因而必須成立“新”国际。显然，如果讓德国旧社会民主党或对列金、大衛之流抱調和态度的党加入“新”国际，那簡直是太可笑了。

至于“国际”派为什么后退了一步，我們不得而知。德国整个革命的馬克思主义的最大缺点，就是缺少一个團結一致的秘密組織来貫徹自己的路綫，并根据新的任务教育群众：这个組織無論对机会主义或考茨基主义都要采取明确的立場。这一点所以必要，是因为德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仅有的两个报纸，即“不来梅市民报”（《Bremer Bürger-Zeitung》⁹¹）和布朗施威克“人民之友报”

⊖ “前进报”。——編者注

(《Volksfreund》⁹²) 現在已經被搶走了，這兩家報紙轉到考茨基分子那邊去了。只有“德國國際社會主義者”(I. S. D.) 還始終堅持着自己的崗位，這是任何人都清楚的。

看來，“國際”派中的某些人又滾到無原則的考茨基主義的泥潭里去了。例如，什特列別爾竟在《Neue Zeit》[⊖] 上拍起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的馬屁來了！就在前幾天，即 1916 年 7 月 15 日，他在報紙上發表一篇“和平主義與社會民主黨”的文章，為考茨基的最卑鄙的和平主義進行辯護。至於尤尼烏斯，他是最堅決反對考茨基的“裁減軍備”、“取消秘密外交”等等空洞計劃的。可能在“國際”派中有兩派，革命派和傾向考茨基主義派。

尤尼烏斯的第一個錯誤論點表現在“國際”派的提綱第 5 條：“……在這猖狂的帝國主義的時代（紀元），不可能再有任何民族戰爭。民族利益只是欺騙的工具，驅使勞動人民群眾為其死敵——帝國主義效勞……”以這個論點結尾的第 5 條，一開頭就說明了這次戰爭是帝國主義戰爭。很可能，否認一般民族戰爭，不是疏忽大意，便是在強調這次戰爭是帝國主義戰爭而不是民族戰爭這個完全正確的思想時的偶然偏見。但是，既然也可能有相反的情形，既然各種社會民主黨人由於誤把這次戰爭當成民族戰爭而錯誤地否認任何民族戰爭，那就不能不談一談這個錯誤。

尤尼烏斯強調“帝國主義環境”在這次戰爭中有決定性的影響，他說塞爾維亞背後有俄國，“塞爾維亞民族主義背後有俄國帝國主義”，並且說荷蘭的參戰也是屬於帝國主義性質的，因為第一、它是保護自己的殖民地；第二、它是帝國主義聯盟的盟員之一，這

⊖ “新時代”。——編者注

样說是完全正确的。就这次战争來說，这是不容爭辯的。既然尤尼烏斯在这里特別強調指出：在他看来，最重要的是同“目前支配着社会民主党政策的”（第 81 頁）“民族战争的怪影”进行斗争，那就不能不認為他的論断既是正确的，又是完全恰当的。

他的錯誤只在于夸大了这个真理，脫离了馬克思主义的进行具体分析的要求，把对这次战争的估計搬到帝国主义时代可能發生的一切战争上去，忘記了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运动。为“再也不会有民族战争”这个論点辯护的唯一理由是：世界已經被一小撮“大”帝国主义强国瓜分完了，因此任何战争，即使起初是民族战争，以后也会由于触犯帝国主义列强或联盟之一的利益而轉化为帝国主义战争（尤尼烏斯的小册子第 81 頁）。

这个理由显然是不正确的。大家知道，馬克思主义辯証法的基本原理是：自然界和社会中的一切界限都是有条件的和可变动的，沒有任何一种現象不能在一定条件下轉化为自己的对立面。民族战争可以轉化为帝国主义战争，而帝国主义战争也可以轉化为民族战争。例如，法国大革命的战争起初是民族战争，而且也确实是这样的战争。这些战争都是革命的：保衛伟大的革命，反对反革命君主国的联盟。但是，当拿破侖建立了法兰西帝国，奴役欧洲許多早已形成的、有生存能力的民族大国的时候，法兰西的民族战争便成了帝国主义战争，而这种帝国主义战争又产生了反对拿破侖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战争。

只有詭辯家才会根据一种战争可以轉化为他种战争的理由，来抹杀帝国主义战争和民族战争之間的差別。辯証法曾不止一次地作过——在希腊哲学史上就有过这种情形——通向詭辯法的桥梁。但是，我們始終是辯証論者，我們同詭辯論作斗争时，所使用

的手段不是根本否認任何轉化的可能性，而是對某一事物及其環境和發展進行具體的分析。

至於說這次 1914—1916 年的帝國主義戰爭會轉化為民族戰爭，這在極大程度上是難以令人相信的，因為代表向前發展的階級是無產階級，它在客觀上力圖把這次帝國主義戰爭轉化為反對資產階級的國內戰爭，其次還因為兩個聯盟的力量相差並不很大，國際財政資本到處造成了反動的資產階級。但是，這種轉化也不能說是不可可能的；假如歐洲無產階級還要軟弱二十年之久，假如這次戰爭結果是拿破侖之流獲得勝利並且奴役許多有生存能力的民族國家，假如歐洲以外的帝國主義（首先是日本和美國的）也能維持二十年之久（例如，由於日美戰爭），而沒有轉入社會主義，那就可能在歐洲發生偉大的民族戰爭。這就會使歐洲後退幾十年。這是難以令人相信的，但這並不是不可可能的，因為把世界歷史設想成一帆風順的向前發展，不會有時向後作巨大的跳躍，那是不辯證的、不科學的，在理論上也是不正確的。

其次，在帝國主義時代，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民族戰爭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中國、土耳其、波斯），有將近 10 億人口，也就是說，占世界人口一半以上。在這裡，民族解放運動不是已經很強大，就是正在發展和成熟。任何戰爭都是政策的另一種手段的繼續。殖民地反對帝國主義的民族戰爭必然是它們的民族解放政策的繼續。這種戰爭可能導致目前“大”帝國主義強國之間的帝國主義戰爭，但是也可能不導致，這要取決於許多情況。

舉一個例子：英法兩國為了爭奪殖民地打了七年仗，也就是說，進行了七年帝國主義戰爭（這種戰爭無論在奴隸制的基礎上或

原始資本主義的基礎上，以及在現代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的基礎上都可能發生)。結果法國被打敗，並且喪失了自己的一部分殖民地。幾年以後，又發生了北美合眾國反對英國的民族解放戰爭。法國和西班牙（當時這兩個國家仍占有今天美國的一部分），由於仇視英國，也就是說，為了自己的帝國主義利益，便同起義反對英國的合眾國締結了友好條約。當時法軍同美軍一起打英國人。我們看到這是一場民族解放戰爭，在這場戰爭中，帝國主義競爭是一個沒有多大意義的偶然因素，同我們在1914—1916年戰爭中（在奧塞戰爭中，民族因素同決定一切的帝國主義競爭相比，沒有多大的意義）所看到的情況恰恰相反。由此可見，死板地應用帝國主義這個概念，並且由此得出“不可能”發生民族戰爭的結論，那是何等的荒謬。比如波斯、印度和中國聯合起來反對某些帝國主義強國的民族解放戰爭，是完全可能的和可以設想的，因為它是從這些國家的民族解放運動中產生的，至於這種戰爭是否轉化為目前帝國主義列強之間的帝國主義戰爭，這要取決於很多具體情況，但擔保這些情況一定會產生，那是令人可笑的。

第三、即使在歐洲也不能認為民族戰爭在帝國主義時代不可能發生。“帝國主義時代”使目前的戰爭成了帝國主義戰爭，它必然要引起（在社會主義還未到來以前）新的帝國主義戰爭，它使目前各大強國的政策成了徹頭徹尾的帝國主義政策，但是，這個“時代”絲毫不排斥民族戰爭，——例如，小國（姑且假定是被兼併的或受民族壓迫的國家）反對帝國主義強國的民族戰爭，——正如它不排斥東歐大規模的民族運動一樣。尤尼烏斯對奧地利的判斷是很正確的，他不僅估計到“經濟”方面，而且估計到特殊的政治方面，指出“奧地利沒有內在的生存能力”，認為“哈布斯堡王朝並不是資

产階級国家的政治組織，而只是由若干社会寄生集团組成的联系薄弱的辛迪加”，“奥匈帝国的灭亡在历史上不过是土耳其的崩潰的繼續，同时也是历史發展过程的要求”。至于某些巴尔干国家和俄国，情况也并不妙。在“大”国在这次战争中弄得筋疲力尽的条件下，或者在俄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条件下，民族战争完全可能發生，甚至会取得胜利。帝国主义列强的干涉实际上并不是在一切条件下都能實現的，这是一方面。而另一方面，如果有人“信口开河地”說：小国反对大国的战争是沒有希望的，那我們就必须指出：沒有希望的战争也是战争；其次，“大国”內部的某些現象——如革命的爆發——可以使“沒有希望的”战争成为大“有希望的”战争。

我們所以詳細地論述似乎“再也不会会有民族战争”这个不正确的論点，不仅是因为它在理論上显然是錯誤的。如果“左派”在只有在非庸俗的馬克思主义基础上才能成立第三国际的时候，对馬克思主义理論表示漠不关心，那当然是極其可悲的。而且这个錯誤在政治实践上也是極其有害的，因为人們会从这得出“解除武装”的荒謬宣传，因为除了反动战争以外，仿佛再也不会会有任何战争；人們从这还可以得出对民族运动更荒謬的和簡直是反动的漠視态度。当欧洲的“大”民族，即压迫許多弱小的殖民地人民的民族的成員，以所謂学者的姿态声称“再也不会会有民族战争”的时候，这种漠視态度就是沙文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的民族战争不仅是可能的和可以設想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进步的、革命的，虽然为了取得胜利，或者需要被压迫国家的大多数居民（我們所举的例子印度和中国就有几亿人口）的共同努力，或者需要国际形势中的某些情况（例如，帝国主义列强由于力量的削弱、它們的战争、它們

的对抗性矛盾等等，無力进行干涉) 特別有利的配合，或者需要某一大国的無产階級同时举行起义反对資产階級(我們列举的这后一种情况，从对無产階級胜利所期望的和有利的观点来看，是最主要的)。

但是必須指出，如果責难尤尼烏斯对民族运动漠不关心，那是不公正的。因为至少他已經指出，社会民主党党团的罪过之一，就是对喀麦隆一个土著領袖因“叛变”(显然是因为他在战争爆發时企圖起义)而被处死刑一事默不作声，同时他在另一个地方专门(对那些把自己算作“社会民主党人”的列金、連奇这伙先生們及其他坏蛋)強調指出，殖民地民族也是民族。他極其肯定地說：“社会主义承認每个民族都有独立和自由的权利，都有独立掌握自己命运的权利”；“国际社会主义承認自由、独立、平等的民族的权利，但是，只有它才能建立这样的民族，只有它才能实行民族自决权。而这个社会主义的口号——作者公正地說——也和其他一切口号一样，不是为現存的东西辯护，而是指南針，是無产階級革命的、改造的、积极的政策的刺激物”(第77頁和78頁)。因此，誰要認為一切左派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像某些荷兰和波兰的社会民主党人那样，已經陷于眼光狹小、歪曲馬克思主义的境地，甚至連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民族自决也加以否認，那就大錯而特錯了。关于犯这个錯誤的荷兰和波兰的特殊根源，我們还要在別处談到。

尤尼烏斯的另一个錯誤論断，是同保衛祖国問題有关的。这是帝国主义战争期間一个極為重要的政治問題。而尤尼烏斯却硬要我們相信，我們党对这个問題作了唯一正确的提法，即在这場帝国主义战争中，無产階級反对保衛祖国，是因为这场战争具有掠夺、奴役和反动的性質，是因为有可能和有必要来抵制它(并竭力

把它變成) 爭取社會主義的國內戰爭。尤尼烏斯一方面很好地揭露了這次戰爭的帝國主義性質, 指出它不同於民族戰爭; 可是另一方面, 又犯了非常奇怪的錯誤, 企圖用民族綱領對這次非民族的戰爭作牽強附會的解釋! 這听起来几乎是不可置信的, 但却是事實。

資產階級拚命叫喊外國“侵略”, 以便欺騙人民群眾, 掩蓋戰爭的帝國主義性質, 而帶有列金和考茨基色彩的官方社會民主黨人為了向資產階級獻媚, 特別熱心地重複着這個“侵略”的理由。考茨基現在還拿這個“理由”當借口! 他現在向那些天真而輕信的人保證說(順便指出, 是通過俄國的組委會分子斯彼克塔托爾), 他從1914年年底就轉到反對派方面來了。尤尼烏斯在竭力駁斥這個理由時, 舉了一些歷史上極有教益的例子, 來證明“侵略和階級鬥爭在資產階級歷史上, 並不像官場上傳說的那樣, 是互相矛盾的, 而是兩者互為手段, 互為表現的”。例子是: 法國波旁王朝會引起反對雅各賓黨人的外國侵略, 1871年資產者引起反對巴黎公社的外國侵略。馬克思在“法蘭西內戰”中寫道:

“舊社會還能創造的那種高度英雄偉績不過是民族戰爭, 而這種戰爭現在則成了政府玩弄的十足的欺騙勾當; 這種欺騙勾當的唯一目的不過是推遲階級鬥爭。當階級鬥爭變成內戰的熊熊火焰時, 這種欺騙勾當也就破產了。”⁹³

尤尼烏斯在引証1793年的例子時寫道: “法國大革命是一切時代的典型例子。”並由此得出結論說: “因此, 歷來的經驗證明, 不是戒嚴狀態, 而是可以喚起人民群眾的自尊心、英雄氣概和道德力量的忘我的階級鬥爭, 才是保護國家、保衛國家、反對外敵的最好辦法。”

尤尼烏斯的实际結論是：“是的，社会民主党人有責任在历史的大危机时期保衛自己的国家。而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的重大罪过，也恰恰在于它在1914年8月4日的宣言里庄严地宣布：‘我們决不会在危急时刻，使我們祖国处于無防御状态’，同时却又自食其言。它在最危急的时刻已使祖国处于無防御状态。因为在这个时刻它对祖国的首要义务是：向祖国指出这次帝国主义战争的真实内幕，撕破掩盖这种侵害祖国行为的爱国主义的和外交的謊言网；大声地明确地声明，对德国人民来說，在这场战争中無論勝負，都会招致灭亡，必須竭力反对用戒严状态来扼杀祖国；宣布必須立即武装人民，讓人民来解决战争与和平的問題；坚决要求在整个战争期間連續（不断）召开人民代表會議，以保証人民代表机关对政府、人民对人民代表机关的細心监督；要求立刻废除一切政治权利上的限制，因为只有自由的人民才能胜利地保衛自己的国家；最后，要用1848年爱国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的旧的真正民族綱領，即馬克思、恩格斯和拉薩尔的綱領；統一的伟大的德意志共和国的口号，来抵制帝国主义的战争綱領——旨在保存奧地利和土耳其，即保存欧洲和德国反动势力的綱領。这就是应当在全国面前展开的旗帜，它应当是真正民族的、真正解放的旗帜，它和德国的优良传统，和無产阶级的国际阶级政策的优良传统相一致”……“因此，在祖国利益和無产阶级国际团结之間的难于决择，促使我們的国会议員以‘沉重心情’站到帝国主义战争方面去的悲剧性的冲突，乃是一种純粹的想像，是一种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虛构。相反地，無論在战争时期或和平时期，国家利益和無产阶级国际的阶级利益都是完全一致的，因为無論战争或和平都要求大力展开阶级斗争，極其坚决地維護社会民主党的綱領。”

尤尼烏斯就是这样論斷的。这样論斷显然是錯誤的，既然我国沙皇制度的公开的和暗藏的走狗普列汉諾夫和契恒凱里先生，甚至于馬尔托夫和齐赫澤先生，都幸灾乐祸地抓住尤尼烏斯的話，不去考虑理論上的真理，而是考虑如何脫身，灭迹，混淆工人視听，那末，我們就必須比較詳細地來說明尤尼烏斯的錯誤的理論根源。

他建議用民族綱領来“抵制”帝国主义战争。他建議先进階級要面向过去，而不要面向将来！1793年和1848年，無論在法国、德国或整个欧洲，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都是客觀地提到日程上来的。“真正的民族”綱領，即当时民主派的資產階級民族綱領，同这种客觀的历史形势是相适应的，在1793年，資產階級和平民中最革命分子曾經实行过这种綱領；而在1848年，馬克思也代表整个先进的民主派宣布过这种綱領。当时在客觀上同封建王朝的战争相对立的是革命民主战争、民族解放战争。这个时代的历史任务的内容就是这样的。

現在，对欧洲各先进的大国來說，客觀情况就不同了。目前的向前發展——撇开可能的、暫时的后退不說——只能走向社会主义社会，走向社会主义革命。从向前發展的观点看来，从先进階級的观点看来，客觀上能够抵制帝国主义資產階級战争、高度發达的资本主义战争的，只有反对資產階級的战争，也就是說，首先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爭夺政权的国内战争（沒有这种战争，就不能大大前进），其次是在一定特殊的条件下可能發生的保衛社会主义国家、反对資產階級国家的战争。因此，有些布尔什維克（好在只是个别的，并且立即被我們拋到号召派那边去了）准备采取有条件的保衛祖国的观点，即在俄国革命胜利和共和国胜利的条件下

保衛祖國的觀點，他們雖然忠于布爾什維主義的詞句，却背叛了它的精神；因為卷入歐洲各先進國家的帝國主義戰爭的俄國，也是以共和國的形式來進行帝國主義戰爭的！

尤尼烏斯說階級鬥爭是反對侵略的最好手段，只是運用了一半馬克思辯證法，在正確的道路上走了一步之後，馬上又離開了這條道路。馬克思辯證法要求對每一特殊的历史情況進行具體的分析。至於階級鬥爭是反對侵略的最好手段的說法，不論對推翻封建制度的資產階級或對推翻資產階級的無產階級來說，都是正確的。正因為這對任何階級壓迫來說都是正確的，這過於一般化，所以對這一特殊場合是不夠的。反對資產階級的國內戰爭也是一種階級鬥爭，只有這種階級鬥爭才會使歐洲（整個歐洲，不是一個國家）避免侵略的危險。要是“大德意志共和國”在1914—1916年存在的話，那它還會進行這種帝國主義戰爭。

尤尼烏斯幾乎得出了正確的答案和正確的口號：要進行爭取社會主義、反對資產階級的國內戰爭，只是他害怕徹底說出全部真理，而在1914、1915、1916年向後轉了，陷入了“民族戰爭”的幻想。要是不從理論方面，而純粹從實踐方面來看問題，那尤尼烏斯的錯誤也是很明顯的。德國的整個資產階級社會、各個階級，一直到農民，都是擁護戰爭的（在俄國大概也是這樣，至少是大多數富裕農民和中農以及很大一部分貧農，顯然都為資產階級帝國主義所迷惑）。資產階級已經武裝到了牙齒。在這種情況下，宣布成立共和國、常設國會、人民選舉軍官（“人民的武裝”）等等的綱領，實際上就是“宣布”（具有不正確的革命綱領的）革命！

尤尼烏斯在這裡說得完全對，革命是不能“製造”的。革命是在1914—1916年提到日程上來的，因為革命潛伏在戰爭中，並在

戰爭中發展起來。必須以革命階級的名義“宣布”這一點，大胆地徹底地指出它的綱領：在戰爭時代，沒有反對反動透頂的、罪惡的、使人民遭受無法形容的災難的資產階級的國內戰爭，社會主義是不可能實現的。應當設法採取系統的、徹底的、實際的措施，這些措施在革命危機發展的任速度下都必須是絕對可行的，符合日益成熟的革命路線的。這些措施在我們黨的決議中已經指出：（1）投票反對軍費開支；（2）破壞“國內和平”；（3）成立秘密組織；（4）舉行士兵聯歡；（5）支持群眾的一切革命行動[⊖]。所有這些步驟如能順利實現，必然會引起國內戰爭。

宣布偉大的歷史性的綱領，毫無疑問，有着巨大的意義，但不是宣布舊的、對1914—1916年來說已過了時的德國民族綱領，而是要宣布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社會主義綱領。你們資產者打仗，是為了掠奪；我們一切交戰國工人向你們宣戰，是為了爭取社會主義，——這就是還沒有叛變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者，如列金、大衛、考茨基、普列漢諾夫、蓋得、桑巴等人於1914年8月4日在國會里應當發表的演說的内容。

看來，可能是雙重錯誤的想法造成了尤尼烏斯的錯誤。毫無疑問，尤尼烏斯是堅決反對帝國主義戰爭和堅決擁護革命策略的，儘管普列漢諾夫這班先生對尤尼烏斯的“護國主義”幸災樂禍，還是抹殺不了這個事實。對於這種可能的和可以想像得到的誹謗，必須立即給以直接的反擊。

但是，第一、尤尼烏斯還沒有完全擺脫德國那些即使是左派社會民主黨人的“包圍”，這些人害怕分裂，害怕徹底說出革命的口

⊖ 見“列寧全集”第4版第21卷第139--140頁。——編者注

号[⊖]。这种害怕心理是錯誤的，德国左派社会民主党人将来应当而且现在就应当消除它。只要他們同社会沙文主义者作斗争，便可以做到这一点。而他們正在坚定不移地、真心誠意地同本国社会沙文主义者作斗争，他們同馬尔托夫和齐赫澤这班先生的重大的、原則的根本区别就在这里。因为馬尔托夫和齐赫澤这班先生（像斯柯別列夫一样）一只手打着欢迎“各国李卜克内西”的旗子，一只手和契恒凱里和波特列索夫亲热拥抱！

第二、看来，尤尼烏斯本想实现一种类似孟什維克的、想起来令人可悲的“阶段論”的东西，想开始从对小资产阶级“最方便”、“最通俗”、最能接受的地方来执行革命綱領。这是一种类似“蒙哄历史”、蒙哄庸夫俗子的东西。他們說，誰也不会反对保衛真正祖国的最好办法，而真正的祖国就是大德意志共和国，保衛的最好办法就是建立民警、常設国会等等。他們說，这样的綱領一旦被采納，它本身便会到达下一个阶段，即社会主义革命。

大概就是这种論断有意無意地确定了尤尼烏斯的策略。不用說，这种論断是錯誤的。讀了尤尼烏斯的小册子，令人感到他是一个孤独者，他沒有那种习惯于想出革命口号并經常用这种口号精神教育群众的秘密組織的同志。不过这种缺点——忘記这一点是極不正确的——并不是尤尼烏斯个人的缺点，这是德国所有左派

⊖ 尤尼烏斯对于“胜利好还是失败好？”这个问题的議論，也有同样的錯誤。他的結論是：二者都不好（破产、軍备扩充，等等）。这不是革命無产阶级的观点，而是和平主义的小资产者的观点。要是說到無产阶级的“革命干涉”——虽然，無論尤尼烏斯或“国际”派的提綱都談到这一点，可惜太一般化了——，那就必須从列的观点提出問題：（1）不冒失败危險，能不能进行“革命干涉”？（2）不冒同样危險，能不能抨击本国资产阶级和政府？（3）我們是不是从未說明，而反动战争的历史經驗也沒有說明，失败会促进革命阶级的事業？

分子的軟弱性造成的，因為他們被考茨基的虛偽、學究氣、對機會主義者的“友好”這些卑鄙的東西四面八方包圍着。尤尼烏斯的擁護者雖然孤獨無援，但是已經能夠着手印發秘密傳單並同考茨基主義作戰了。他們也一定能夠繼續沿着正確的道路前進。

寫於 1916 年 7 月

載於 1916 年 10 月

“社會民主黨人文集”第 1 卷

署名：尼·列寧

按“文集”原文刊印

关于自决問題的爭論总结

齐美尔瓦尔得左派的馬克思主义杂志“先驅”第2期(1916年4月《Vorbote》第2期)上刊载了拥护民族自决和反对民族自决的两个提綱,一个是以我們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編輯部的名义發表的,一个是以波兰社会民主党反对派机关报“工人报”編輯部的名义發表的。讀者在前面可以翻到轉載的前一提綱[⊖]和翻譯的后一提綱⁹⁴。在国际范围内,这个問題这样广泛地提出来,几乎还是第一次。20年以前(1895—1896年),即1896年国际社会主义者倫敦代表大会以前,代表三种不同观点的卢森堡、考茨基和波兰独立拥护者(波兰社会党)曾在德国馬克思主义杂志《Neue Zeit》[⊗]上討論过,但是在这次討論中,仅仅提出波兰問題⁹⁵。据我們所知,到現在为止,只有荷兰人和波兰人还多少系統地討論过自决的問題。我們希望“先驅”杂志能够推动英国人、美国人、法国人、德国人、意大利人来討論这个目前如此迫切的問題。無論是直接拥护“自己”政府的普列汉諾夫、大衛之流所代表的正式的社会主义,或者是暗中維護机会主义的考茨基分子(包括阿克雪里罗得、馬尔托夫、齐赫澤等人)所代表的正式的社会主义,在这个問題上竟撒謊到这种程度,以致在很长时期內,一方面,他們不得不拚

⊖ 見本卷第137—150頁。——編者注

⊗ “新时代”。——編者注

命装聋作哑和迴避問題，而另一方面，工人則必然要求对“棘手的問題”給以“直接答复”。关于国外社会主义者之間各种观点的斗争經過，我們將尽力及时地报导給讀者。

而对我们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來說，這個問題还有特別重要的意义。这次爭論是1903年和1913年爭論⁹⁶的繼續；這個問題在战争时期曾經在我们党员中引起某些思想波动；由于像馬尔托夫和齐赫澤这样著名的格沃茲迭夫的或沙文主义的工党領袖們采取詭計来迴避問題的本質，這個問題已經尖銳化了。因此，对国际范围内已經展开的这种爭論作一个哪怕是初步的总结，是很必要的。

从提綱上可以看到，我們的波兰同志就我們的某些論点，如有关馬克思主义和蒲魯东主义的論点，对我们作了直接的答复。但他們大部分不是直接而是間接地答复我們的，同时他們提出了自己的論断。現在我們来看看他們間接的和直接的答复。

1. 社会主义和民族自决

我們曾經肯定地說，要是拒絕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行民族自决，那就是背叛社会主义。他們却回答我們說：“自决权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这是根本的分歧。这种分歧的根源在哪里呢？

我們的論敌反駁說：“我們知道，社会主义一定会消灭任何民族压迫，因为它正在消灭造成民族压迫的階級利益”……这种关于消灭民族压迫的經濟前提的談論有什么必要呢？在很早以前，在爭論政治压迫形式之一，即一个民族把另一个民族强制地留在本國疆界以內的問題时，这个前提就是尽人皆知和無可爭辯的。这簡直是企圖規避政治問題！而下面的这些議論愈發使我們相信

这一估計：“我們沒有任何根据可以假定，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民族会有經濟政治单位的性質。它大概只有文化和語言单位的性質，因为社会主义文化范围的地域划分（既然这种划分仍将存在）只能按生产的需要来进行，并且这一划分問題当然不应当由掌握自己全部政权的个别民族来单独解决（像“自决权”所要求的那样），而应当由一切有关的公民来共同确定……”

后面这个关于共同确定而非自决的論点，波兰同志非常欣賞，甚至在他們的提綱里重复了三次！然而再三重复並沒有把这个十月党人的反动論点变成社会民主党人的論点。因为所有反动分子和資产者都是使被强制留在本国疆界以內的民族在下議院內享有“共同确定”国家命运的权利的。威廉二世也使比利时人在德国下議院內享有“共同确定”德意志帝国命运的权利。

我們的論敌竭力逃避的正是值得爭論的，即专门提出討論的分离权的問題。这是可笑的，甚至是可悲的！

我們在前一提綱中已經說过，要解放被压迫民族，首先要在政治方面实行双重改革：（1）各民族一律平等，关于这一点沒有爭論，这只同国内發生的事情有关；（2）政治上的分离自由[⊖]。这同确定国界有关。只有这一点是值得爭論的。可是正好在这个問題上，我們的論敌却默不作声。他們無論对国界問題，或者甚至对一般的国家問題，都不願加以考虑。这是类似 1894—1902 年的旧經濟主义的某种“帝国主义經濟主义”，旧經濟主义曾經断定：資本主义已經胜利，因此政治問題無關紧要。帝国主义已經胜利，因此政治問題無關紧要！像这种非政治的理論，是同馬克思主义根本

⊖ 見本卷第 137 頁。——編者注

敌对的。

馬克思在批判哥达綱領时写道：“在資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間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轉变时期。与这个时期相适应的是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無产阶级的革命专政。”⁹⁷直到現在，这个真理对社会主义者說来，还是無可爭辯的，这个真理承認，国家将一直生存到胜利的社会主义轉变为完全的共产主义的时候。恩格斯关于国家消亡的名言是大家都知道的。我們在前一提綱中特意着重指出，民主制是一种国家形式，它将随着国家的消亡而消亡。在我們的論敌沒有用某种“非国家”的新观点来代替馬克思主义以前，他們的論断是完全錯誤的。

他們不談国家（也就是說不談确定国界問題！），而談“社会主义文化范围”，也就是故意在这方面选择一种不明确的說法，来抹杀有关国家的一切問題！这是一种可笑的推論：如果沒有国家，当然也就沒有国界問題。那时也就不要什么民主政治綱領了。国家一旦“消亡”，共和国也就不再存在。

我們在提綱第5节（注释）[⊖]中曾提到德国沙文主义者連奇的文章，他在自己的文章里，引証了恩格斯的“波河和莱茵河”一文中一段有趣的話。恩格斯在那篇文章中說道：“富有生命力的欧洲大民族”在吞沒許多沒有生命力的小民族的历史發展过程中，其疆界愈来愈靠居民的“語言和感情”来确定。恩格斯把这种疆界叫作“自然疆界”⁹⁸。大約在1848—1871年，在欧洲进步的資本主义时代，情况就是这样的。現在，反动的帝国主义資本主义愈来愈經常地打破这些按民主方式确定的疆界。現在有种种迹象說明，帝国

⊖ 見本卷第144頁。——編者注

主义要把欧洲和世界其他部分 不够 民主的疆界，許多兼并的地方，留給代替它的社会主义。那怎么办呢？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在一切方面恢复和徹底实行充分的民主时，难道会拒絕按 民主 方式确定国界嗎？难道不願意考虑居民的“感情”嗎？只要提出这些問題，就能使人清楚地看到，我們的波兰同事是怎样从馬克思主义滾向“帝国主义經濟主义”的。

旧的“經濟主义者”嘲笑馬克思主义，他們告訴工人說，在馬克思主义者看来，“只有”“經濟”才重要。新的“經濟主义者”或則認為取得社会主义胜利的民主国家将沒有疆界（类似沒有物質的“感覺”綜合），或則認為疆界将来“只”根据生产需要来确定。实际上，这些疆界将按民主方式，即依照居民的意志和“感情”来确定。資本主义强制这种感情，从而給各民族的亲近增加了新的困难。而社会主义則是組織 沒有 階級压迫的生产，保證国家 全体 成員的福利，从而为發揮居民的“感情”提供 充分的余地，正因为这样才促进和大大加速各民族的亲近和融合。

为了使讀者摆脱这个笨重的“經濟主义”休息一下，我們援引一个沒有参加我們爭論的社会主义著作家的論点。这位著作家便是奥托·鮑威尔，他也有自己的“小小論点”，即“民族文化自治”，但是，他对一系列最重要的問題却說得很对。例如，在“民族問題和社会民主党”一書第 29 节里，他極其正确地指出 帝国主义 政策被民族的观念形态掩盖起来了。在第 30 节“社会主义和民族原則”里，他說：

“社会主义公社任何时候都不能把好多民族强制地包括在自己的組成內。試想想看，对于一个拥有全部民族文化財富的，充分和積極参加立法和管理工作的、并且配备有武装的民族，是不是能

够强制地使它服从异族的社会机构的統治呢？任何国家权力都以武装力量为基础。由于机构的巧妙，现在的人民军队同从前的騎士軍和雇佣軍一模一样，仍然是一定的人物、家族、阶级手里的工具。而社会主义社会民主公社的军队只能是武装的人民，因为这支军队是由具有高度文化的人组成的，他们自愿地在公共的工厂里工作，并且完全参加国家各个方面的生活。在这种情况下，异族統治的任何可能性都会消失。”

这說得很对。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要消灭民族的（和一般政治上的）压迫是不可能的。为此必须消灭阶级，也就是说，要实行社会主义。然而，以经济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决不完全归结于经济。要铲除民族压迫，必须有社会主义生产这个基础，但是，在这个基础上还必须要有民主的国家组织、民主的军队等等。无产阶级把资本主义改造成社会主义之后，就会造成完全铲除民族压迫的可能。“只有”——“只有”！——在各方面都完全实行民主，直到按照居民的“感情”确定国界，直到有分离的完全自由，才能使这种可能变为现实。同样地，只有在这种基础上，才能在实际上彻底铲除民族间的任何细微的摩擦和不信任，加速民族的亲近和融合，结果使国家消亡。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論，而我們的波兰同事却錯誤地离开了它。

2. 在帝国主义时代民主制 能不能“实现”？

波兰社会民主党人过去对民族自决的一切論爭，都是建立在民族自决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能实现”这个論据上的。远在1903

年，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党綱委员会里，我們火星派就嘲笑过这种理由，并且說明这是在重复（想起来真令人可悲）“經濟派”对馬克思主义的諷刺。我們在自己的提綱里特別詳細地談到这个錯誤，正是在这一点上包含了整个爭論的理論基础，而波兰同志不願（或者不能？）答复我們的任何一个論据。

應該通过經濟分析来証明自决在經濟上是不可能的，就像我們用經濟分析来証明禁用机器或使用劳动貨幣等是办不到的一样。誰都不想作这种分析。誰都不会武断地說：即使在一个国家內也可以“例外地”在資本主义制度下使用“劳动貨幣”，正像一个小国在帝国主义最猖狂的时期，可以例外地甚至不經過战争和革命就实现那不能实现的自决一样（1905年的挪威）。

一般說，政治民主仅仅是一种資本主义上層建筑的可能形式（虽然在理論上对“純粹”資本主义來說是一种正常形式）。正如事实所表明的，不論資本主义或帝国主义都是在各种政治形式下發展的，并且使所有这些形式服从于自己。因此，說民主的一种形式和一个要求“不能实现”，在理論上是根本不正确的。

波兰同事对这些論据都沒有答复，这就使我們認為在这一点上的爭論已經結束。可以說，为了明确起見，我們作过極其具体的断言：波兰恢复独立的“可能性”現在是取决于这次战争的战略等因素，否認这一点是“可笑”的。可是沒有答复！

波兰同志只是重复显然不正确的断言（第2节第1条），他們說：“在合并异族地区的問題上，政治民主形式已被消除；公开用暴力来解决……資本决不会讓人民来解决自己的国界問題”……似乎“資本”能“讓人民”来选择它的为帝国主义效劳的官吏！或者說，像废除君主建立共和、废除常备軍建立民警等有关民主的重

大問題，似乎不“公开用暴力”也完全可以得到根本解决！波兰同志主观上原想“加深”馬克思主义，但是，他們这样做完全失败了。客观上，他們所說的不能实现这些话，正是一种机会主义，因为他們沒有說明：不进行一系列的革命，就“不能实现”，正像在帝国主义制度下，整个民主、民主的一切要求都“不能实现”一样。

波兰同事只有一次，即在第2节第1条末尾談到亚尔薩斯問題时，抛弃了“帝国主义經濟主义”的立場，对民主的一种形式的問題作了具体的答复，而沒有作“經濟上”的一般引証。但是这种做法恰恰是錯誤的！他們写道：如果一部分亚尔薩斯人不征求法国人的意見，就“强迫”他們接受把亚尔薩斯并入法国，而一部分亚尔薩斯人又倾向于德国人，这样就有引起战争的危險，这是“分立主义的、非民主的”做法!!!这种混乱思想是十分可笑的，因为自决的前提（这是显而易見的，而且我們已經在提綱里特別強調过）是有同压迫国家分离的自由；并入某一国家的前提是得到該国的同意，这在政治上“通常是”不講的，正像在經濟上不說資本家“同意”取得利潤或者工人“同意”取得工資一样！这种說法是可笑的。

作为一个馬克思主义的政治家，在談到亚尔薩斯問題时，应当攻击那些不为爭取亚尔薩斯的分离自由而斗争的德国社会主义的恶棍，攻击那些并不反对用暴力合并整个亚尔薩斯的法国资产阶级的法国社会主义的恶棍；攻击那些恶棍，是因为他們都为“本”国帝国主义效劳，害怕成立一个分离出去的即使是很小的国家；并且必須指出，承認自决的社会主义者怎样才能在几个星期內解决問題而不违反亚尔薩斯人的意志。如果不这样做，而談論什么法国的亚尔薩斯人“强迫”法国合并的可怕危險，那簡直太玄妙了。

3. 什么是兼并？

这个问题在我们提綱第7节[⊖]里已經十分明确地提出来了。波兰同志沒有回答这个问题，他們避而不談，却強調說（1）他們反对兼并，（2）解释他們为什么反对。这当然是一些很重要的問題。不过这是另外一些問題。要是我們多少还关心我們的原則在理論上的周密性及其明确性，既然在我們的政治宣传鼓动工作中运用这个概念，我們就不能迴避什么是兼并这个问题。在集体討論中迴避这个问题，不能作别的解释，只能說是放弃立場。

为什么我們提出这个问题呢？这在我們提出这个问题时就已經說明了。因为“反对兼并就是承認自决权”。兼并的概念通常含有（1）暴力的概念（强迫合并），（2）异族压迫的概念（合并“异族”地区等等），有时含有（3）破坏 status quo[⊗]的概念。这几点我們在提綱中已經指出，这些意見並沒有受到批評。

試問：社会民主党人能不能籠統地反对暴力呢？显然不能。这就是說，我們反对兼并并不是因为兼并是一种暴力，而是由于其他原因。同样地，社会民主党人也不能贊成 status quo。不管你們怎样打轉，总迴避不了这个結論：兼并是违反民族自决，是违反居民意志来确定国界。

反对兼并就是贊成自决权。“反对把任何民族强制地留在某个国家疆界以內”（我們在提綱第4节里[⊙]也特地用了这种意思相

⊖ 見本卷第145—147頁。——編者注

⊗ 現狀。——編者注

⊙ 見本卷第141頁。——編者注

同而措詞略有改变的說法，而波兰同志在这里对我们的答复是十分清楚的，他們在自己提綱第1节第4条开头就声明他們“反对把被压迫民族强制地留在兼并国疆界以內”，这也就是贊成民族自决。

我們不想作字眼上的爭論。如果有一个党在它的党綱里（或者在人人都应当执行的決議里，問題不在于形式）說，它反对兼并[⊙]，反对把被压迫民族强制地留在它的国家疆界以內，那末，我們就会宣布我們同这样的党在原則上是完全一致的。只抓住“自决”这个字眼，那是愚蠢的。要是我們党内有人想用这样的精神来改变我們党綱第9节的字眼、說法，那我們認為同这种同志的意見分歧完全不是原則性的！

問題仅仅在于我們的口号要有政治上的明确性和理論上的周密性。

特别是現在，由于战争的关系，兼并問題的重要性是誰都不会否認的。然而在口头上討論这个問題时曾有这样一种說法（我們在报刊上沒有看到这种說法）：对某件坏事提出抗議，并不一定等于承認排斥这种坏事的正确概念。这种說法分明是站不住脚的，因此，显然在任何报刊上也不会出現。如果有一个社会主义政党宣称它“反对把被压迫民族强制地留在兼并国疆界以內”，那末，当它一旦执政，它就必須这样做。

我們絲毫也不怀疑：如果明天兴登堡对俄国取得一半胜利，而这个一半胜利表现为成立一个新的波兰国家（因为英、法两国想要稍微削弱沙皇政府），这从資本主义的和帝国主义的經濟規律来

⊙ 卡·拉狄克在“伯尔尼哨兵报”（*Berner Tagwacht*）上发表的一篇文章里用过“反对新旧兼并”这样的字眼。

看，是完全“可能實現”的；如果后天社会主义革命在彼得堡、柏林和华沙取得胜利，那末，波兰的社会主义政府也将同俄国政府和德国政府一样，不再把乌克兰人“强制地留在”“波兰国家疆界以内”。如果“工人报”編輯部的成員参加这个政府，他們無疑会牺牲自己的“提綱”，从而推翻“自决权不能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理論”。如果我們認為不是这样，那我們提到日程上来的，就不是和波兰社会民主党人进行同志般的討論，而是像对待沙文主义者那样，同他們作無情的斗争。

假定我到欧洲任何城市的街上去当众声明，以后又在报纸上声明，我“抗議”人們不讓我买人作奴隶。那毫無疑問，人們有权利把我看作一个奴隶主，或者看作奴隶制的原則或制度（随便那一种）的拥护者。虽然我对奴隶制的同情是表现为抗議的反面形式，而不是正面形式（“我贊成奴隶制”），但这是誰也欺騙不了的，政治“抗議”完全等于政治綱領，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如果再来說明这一点，那就甚至太不像話了。無論如何，我們坚信，要是在第三国际里，不再讓那些把政治抗議和政治綱領分开并且把这两者对立起来等等的人有立足之地，那我們至少不会遭到齐美尔瓦尔得左派（我們不是說一切齐美尔瓦尔得分子，因为那里还有馬尔托夫和其他考茨基分子）的“抗議”。

我們不願在字眼上爭論，我們坚决希望波兰社会民主党人尽快地正式提出取消我們的（也是他們的）党綱以及国际綱領（1896年倫敦代表大會的決議）中第9节的建議，并对有关“新旧兼并”和“把被压迫民族强制地留在兼并国疆界以内”的政治思想提出自己的定义。我們現在談下面一个問題。

4. 贊成兼并还是反对兼并?

波兰同志在自己提綱的第1章第3节里極其肯定地声明，他們反对任何兼并。可惜，我們在同一章的第4节里又遇到一种不得不認为是兼并主义的論断。这一节是从下面这句……如何說得温和些呢？……奇怪的話开始的：

“社会民主党反对兼并、反对把被压迫民族强制地留在兼并国疆界以內的出發点是反对任何的保衛祖国（着重号是作者加的），因为在帝国主义时代，保衛祖国就是保衛本国資产階級压迫和掠夺异族的权利。”……

这是什么話呢？这怎样理解呢？

“反对兼并的出發点是反对任何的保衛祖国”……但是要
知道，任何民族战争和任何民族起义都可以叫作而且至今一直普遍地叫作“保衛祖国”！我們反对兼并，但是……对这一点我們却是这样理解的：我們反对被兼并者为摆脱兼并者而进行的战争，我們反对被兼并者为摆脱兼并者而举行的起义！这难道不是兼并主义的論断嗎？

提綱的作者用这个理由說明自己的……奇怪的論断：“在帝国主义时代”保衛祖国就是保衛本国資产階級压迫异族的权利。但是，这种論断仅仅对于帝国主义战争，也就是說，对于帝国主义列强或列强集团之間的战争是正确的，因为交战国双方不但都在压迫“异族”，而且还为了誰能更多地压迫异族而进行战争！

显然，提綱的作者提出“保衛祖国”的問題，完全不是像我們党所提出的那样。我們反对在帝国主义战争中“保衛祖国”。这無

論在我們党中央委員會的宣言或伯尔尼決議^①中已經說得一清二楚，伯尔尼決議已轉載在用德文和法文出版的“社会主义与战争”的小册子里。我們在自己的提綱中（第4、6兩节的注釋）^②也曾兩次着重指出這一點。顯然，波蘭提綱的作者反對任何的保衛祖國，也就是說，連民族戰爭中的保衛祖國也反對，也許他們認為“在帝國主義時代”進行民族戰爭是不可能的。我們說“也許”，是因為波蘭同志在自己的提綱里並沒有說明這種看法。

這種看法在德國“國際”派的提綱和尤尼烏斯的小册子里已經明顯地表露出來了，關於這本小册子，我們特地寫了一篇文章^③。除了在這篇文章里所說的以外，我們還認為那些被兼併地區或國家的反對兼併的民族起義正可以叫作起義，而不叫作戰爭（雖然我們認為這個名詞的爭論無關緊要，但是我們聽到過這種反對意見，所以引用了它）。已被兼併的比利時、塞爾維亞、加里西亞、阿爾明尼亞一定要把它們反對兼併的“起義”叫作“保衛祖國”，而且叫得正確。無論如何，這一點是誰也不敢否認的。可是，波蘭同志反對這種起義的理由是：在這些被兼併的國家內也有資產階級，它也在壓迫異族，或者說得更正確些，它可能壓迫異族，因為問題僅僅涉及“它的壓迫權利”。因此，用來估價某次戰爭或某次起義的，不是它的實際社會內容（被壓迫民族反對壓迫民族的解放鬥爭），而是目前被壓迫的資產階級可能實現它的“壓迫權利”。假定說，比利時將在1917年被德國兼併，而在1918年舉行起義，爭取自己的解放，那波蘭同志一定會反對起義，因為比利時資產階級有“壓迫

① 見“列寧全集”第4版第21卷第9—18頁和第138—139頁。——編者注

② 見本卷第142頁和第144頁。——編者注

③ 見本卷第298—313頁。——編者注

异族的权利”呀！

这种議論既沒有一点馬克思主义的气味，又沒有一点革命的气味。如果我們不背叛社会主义，那就应当支持反对我們主要敌人即大国资产阶级的任何起义，只要这不是反动阶级的起义。如果我們拒絕支持被兼并地区的起义，那在客观上我們就是兼并者。正是在“帝国主义时代”，在这个开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无产阶级今天才要竭力支持被兼并地区的起义，以便明天或者同时进攻被这种起义削弱的“大”国资产阶级。

可是波兰同志的兼并主义又更进了一步。他們不但反对被兼并地区的起义，而且反对这些地区任何独立的恢复，即使和平的恢复也反对！請听：

“社会民主党对帝国主义的压迫政策所造成的后果不負任何责任，它同这些后果作最激烈的斗争，但是决不主张在欧洲树立新的国界标志，恢复被帝国主义拆除的国界标志。”（着重号是作者加的）

現在德国和比利时、俄国和加里西亚之間的“国界标志已被帝国主义拆除”。看来，各国社会民主党無論怎样都应当反对恢复这些标志。1905年，“在帝国主义时代”，挪威自治議會宣布同瑞典分离，而瑞典反动派所鼓吹的反对挪威的战争，因为瑞典工人的反抗和国际帝国主义局势的变化而沒有成功。社会民主党是应当反对挪威分离的，因为这無疑等于“在欧洲树立新的国界标志”！！

这已經是直接的公开的兼并主义了。这用不着反駁，它已不攻自破。沒有一个社会主义政党敢采取这样的立場：“我們反对任何兼并，但是对于欧洲，我們准許或容許兼并，因为兼并刚刚实行”……

現在只要談一談这个錯誤的理論根源，这个錯誤使我們波兰同志得出了如此極為明显的……“沒有可能”的結論。对欧洲另眼相看，是沒有根据的，关于这一点，我們下面再講。提綱中的下面兩句話說明了这个錯誤的其他根源：

……“凡是在被帝国主义車輪輾压过的已經形成的資本主义国家中，为社会主义准备条件的資本主义世界的政治集中和經濟集中，都是通过帝国主义压迫的残酷形式进行的”……

替兼并这样作辯护，是司徒卢威主义，而不是馬克思主义。記得俄国 1890—1900 年情况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清楚地知道司徒卢威、庫諾夫、列金这伙人歪曲馬克思主义的这种共同手法。关于德国司徒卢威分子，即所謂“社会帝国主义者”，恰好在波兰同志的另一提綱（第 2 章第 3 节）中写道：

……（自决口号）“使社会帝国主义者有可能証明这个口号是一种梦想，說我們反对民族压迫的斗争是历史上一种非法的感伤行为，并且是破坏無产階級对社会民主党党綱的科学根据的信任”……

这就是說，作者認為德国司徒卢威分子的立場是“科学的”！
恭禧，恭禧。

这种奇怪的論据吓唬我們，說連奇、庫諾夫、帕尔烏斯之流反对我們是对的。但是，只一件“小事情”就駁倒了这种論据，那就是連奇这伙人始終坚持自己的意見，而在沙文主义者創办的德文“鐘声”杂志第 8—9 期上（我們在自己的提綱中特別提到这两期），連奇同时又証明自决口号“沒有科学根据”（波兰社会民主党人显然承認連奇的这种論据是無可反駁的，这在我們所引証的他們提綱的論断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反对兼并的口号也“沒有科

学根据”!!

因为連奇很了解我們給波兰同事指出的那个简单的道理，即“承認”自决同“反对”兼并既沒有“經濟上、政治上的”区别，也沒有一般邏輯上的区别。但是，波兰同事却不願意回答这一点。如果波兰同志認為連奇反对自决的論据是無可反駁的，那就不能不承認这个事实：連奇的所有这些論据也是反对同兼并作斗争的。

作为我們波兰同事所有論断的基础的理論錯誤，使他們成了不徹底的兼并者。

5. 为什么社会民主党要反对兼并?

从我們的观点来看，这个問題的答案是很清楚的：因为兼并违反民族自决，換句話說，它是民族压迫的形式之一。

从波兰社会民主党人的观点来看，需要特別說清楚我們为什么反对兼并，而这些說明（提綱第1章第3节）必然会使作者被許多新的矛盾纏繞不清。

他們引用两个論据来“証明”为什么我們（不顧連奇的有“科学根据的”論据）反对兼并。第一个論据是：

……“为了在軍事上保證帝国主义国家的胜利，必須在欧洲实行兼并，社会民主党拿事实反对这种論断，即兼并只会加强对抗，因而也就会扩大战争的危險”……

这样来答复連奇之流是不够的，因为他們的主要論点不是兼并在軍事上的必要性，而是兼并在經濟上的进步性，兼并就是帝国主义时代的集中。既然波兰社会民主党人承認这种集中的进步性，拒絕在欧洲恢复被帝国主义拆毀的国界标志，同时又反对兼

并，邏輯究竟在哪里呢？

其次，兼并会加强哪种战争的危險呢？不会是帝国主义战争，因为这种战争是由别种原因引起的；目前帝国主义战争中的主要对抗，無疑是英德之間和俄德之間的对抗。这里無論过去和現在都不存在兼并。这是指加强民族战争和民族起义的危險。怎么能一方面宣称“在帝国主义时代”民族战争是不可能的，而另一方面又提出民族战争的危險呢？这是不合邏輯的。

第二个論据是：兼并“在統治民族的無产階級和被压迫民族的無产階級之間造成一道鴻沟”……“被压迫民族的無产階級会同本民族的資產階級联合起来，并且把統治民族的無产階級看作敌人。这样，不是無产階級反对国际資產階級的国际階級斗争，而是代之以無产階級的分裂和思想上的蜕化”……

这两个論据我們完全同意。但是，在同一个問題上同时提出这两个相互排斥的論据，这是否合乎邏輯呢？在提綱第1章第3节里，我們看到上述把兼并看成無产階級分裂的論据，紧接着在第4节里我們看到这样的說法：在欧洲必須反对取消已經实行的兼并，必須“教育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的工人群众去共同进行斗争”。如果說，取消兼并是一种反动的“感伤行为”，那就不能这样来論証：兼并在“無产階級”之間会挖一道“鴻沟”并会造成他們的“分裂”，相反地，必須把兼并看作各民族無产階級亲近的条件。

我們說：为了使我們能够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和推翻資產階級，工人应当更加紧密地团結起来，用争取民族自决的斗争，即反对兼并的斗争，来促进这种紧密的团結。我們始終是这样主张的。而波兰同志們認為欧洲兼并是“不能取消的”，認為民族战争是“不可能

的”，这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因为他们正是拿民族战争的論据来“反对”兼并的！正是用兼并会给各民族工人的亲近和融合造成困难这种論据来反对兼并的！

換句話說，为了反对兼并，波兰社会民主党人不得不到他们根本抛弃了的理論貨色中去拿論据。

在殖民地問題上，这一点就更加清楚了。

6. 在这个問題上是不是可以把殖民地同“欧洲”对立起来？

在我們的提綱里已經說明：在資本主义制度下，立刻解放殖民地的要求，也同实行民族自决、人民选举官吏、建立民主共和国等要求一样，是“不能实现”的（也就是說，不經過一系列的革命是不能实现的，沒有社会主义是不巩固的）；而另一方面，解放殖民地的要求就是“承認民族自决”。

波兰同志对这两个論据的任何一个都置之不理。他們企圖把欧洲和殖民地地区別开。只是在对待欧洲的問題上，他們成了不徹底的兼并者，拒絕取消兼并，因为兼并已經实行。而对于殖民地，他們提出無条件的要求：“从殖民地滾出去！”

俄国社会主义者应当要求：“从土尔克斯坦、希瓦、布哈拉等地滾出去”，但是，如果他們也为波兰、芬兰、乌克兰等地要求同样的分离自由，据說，那他們就会陷入“烏托邦主义”、“非科学的”“感伤主义”等等。英国社会主义者应当要求：“从非洲、印度、澳大利亚滾出去”，但是不能要求从爱尔兰滾出去。用什么理論根据才可以解释这个显然不正确的差別呢？要迴避这个問題是不行的。

反对自决者的主要“根据”是：“不能实现”。对“经济和政治集中”的引证隐隐约约地表现了这种思想。

显然，集中也是通过归并殖民地来进行的。殖民地和欧洲各民族，至少和欧洲大多数民族在经济上的差别首先表现在：殖民地已卷入商品交换，但是还没有卷入资本主义生产。帝国主义改变了这种情况。顺便指出，帝国主义就是资本输出。资本主义生产在殖民地愈来愈迅速地移植起来。这就使殖民地不能摆脱对欧洲财政资本的依赖。从军事观点来看，也和从扩张（扩充）观点来看一样，殖民地的分离一般说来，只有随着社会主义才能实现，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或者由于例外，或者在殖民地和宗主国付出一系列革命和起义的代价时才能实现。

欧洲大部分附属民族（虽然不是全部，如阿尔巴尼亚人，俄国的许多外族）的资本主义比殖民地发达一些。正是这一点才引起对民族压迫和兼并的更大的反抗！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任何政治条件下（其中包括在分离的条件下）资本主义的发展在欧洲要比在殖民地更有保证……关于殖民地（第1章第4节），波兰同志说：“在那里，资本主义还面临着独立发展生产力的任务”……在欧洲这就更加明显：资本主义在波兰、芬兰、乌克兰、亚尔萨斯发展生产力，毫无疑问要比在印度、土尔克斯坦、埃及以及其他最纯粹的殖民地更兴盛，更迅速，更独立。在商品生产的社会里，无论独立的发展或任何一种发展，没有资本是不可能的。欧洲各附属民族既有自己的资本，又有在各种条件下容易取得资本的可能。殖民地却没有或者几乎没有自己的资本，除非在政治屈从的条件下，在财政资本的情况中，才能取得资本。由于这一切，要求立即无条件地解放殖民地究竟是什么意思呢？从“乌托邦”这个名词的庸俗

的、諷刺“馬克思主义的”含意來說，这个要求就更“烏托邦”得多，这难道还不明显嗎？而司徒卢威、連奇、庫諾夫这班先生們，正是从这种含意上来使用烏托邦这个名詞的，遺憾的是，繼他們之后还有波兰同志。其实，在这里，对庸俗地習慣了的东西作适当的退却，包括一切革命的退却，被理解成“烏托邦主义”了。但是各种革命运动，包括民族革命运动，在欧洲的环境下比在殖民地更可能实现，更頑强而自觉，更不容易征服。

波兰同志說(第1章第3节)：社会主义“会給不發达的殖民地民族以無私的文化援助，而不是統治他們”。这完全正确。但是，如果認為已經轉向社会主义的大民族、大国家不能通过“無私的文化援助”来爭取欧洲被压迫的小民族，那有什么根据呢？正是波兰社会民主党人所“給予”殖民地的这种分离自由，才会爭取欧洲有文化和有政治要求的被压迫的小民族同社会主义大国結成联盟。因为大国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将意味着：每日劳动時間較少，每日工資較多。爭取摆脱資產階級桎梏的劳动群众，为了取得这种“文化援助”，一定会尽一切力量来同先进的社会主义大民族建立同盟和融合，只要昨天的压迫者不損害长期被压迫的民族的高度民主自尊心，只要使长期被压迫的民族在各方面，包括国家建設、建成“自己”国家的經驗等方面处于平等的地位就行。在資本主义制度下，这个“經驗”就是战争、孤立、閉关自守、享有特权的小民族的狹隘的利己主义(荷兰、瑞士)。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群众在任何地方都不同意根据上述純經濟的理由而閉关自守；而政治形式的多样化，脱离国家的自由，国家建設的經驗，——在任何国家沒有消亡以前，这一切都将是丰富的文化生活的基礎，加速各民族自願亲近和融合过程的保証。

波兰同志把殖民地同欧洲区别开并且对立起来，这样便立刻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推翻了他們所有的錯誤論据。

7. 馬克思主义还是蒲魯东主义？

波兰同志破例地不用間接方式，而用直接方式来反駁我們引証馬克思对爱尔兰分离問題所持的态度。他們的反对意見究竟是什么呢？照他們看来，援引馬克思在 1848—1871 年所持的立場，“沒有一点价值”。他們發表这个异常气愤而坚决的声明的理由是：馬克思“同时”反对“捷克人和南方斯拉夫人等等”要求独立的願望⁹⁹。

这种理由所以特別令人气愤，是因为它特別站不住脚。照波兰馬克思主义者的說法，馬克思不过是一个“同时”談两种截然相反的事情的糊塗虫而已！这完全不对，完全不是馬克思主义。正是波兰同志所提出而又不加以运用的那个“具体”分析的要求，促使我們来看一看，馬克思对各种不同的具体“民族”运动采取各种不同的态度，是不是从同一个社会主义世界觀出發的。

大家知道，馬克思拥护波兰独立，是从欧洲民主派反对沙皇政府的势力和影响——可以說是反对沙皇政府的無限权威和压倒一切的反动影响——的斗争利益出發的。这个出發点的正确性在 1849 年就得到了最明显的和事实上的証明，当时俄国农奴主的軍隊镇压了匈牙利爭取民族解放的和民主革命的起义。从那时起直到馬克思逝世，甚至更晚一点，到 1890 年（当时沙皇政府同法国勾結，竭力要發動反动战争来反对不是帝国主义的而是民族独立的德国），恩格斯始終是首先而且坚决主张同沙皇政府作斗争的。因

此，也正因为如此，馬克思和恩格斯曾反对过捷克人和南方斯拉夫人的民族运动。任何人如果不是为了鄙弃馬克思主义才注意馬克思主义，只要看一看馬克思和恩格斯在 1848—1849 年所写的东西，就可以知道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是把在欧洲充当“俄国前哨”的“一整批反动民族”同德国人、波兰人、馬札兒人等“革命民族”直接地肯定地区分开来的。这是事实。在当时指出这个事实，無疑是正确的，因为在 1848 年各革命民族为自由奋斗过，当时自由的主要敌人是沙皇政府，而捷克人等确实是反动民族，是沙皇政府的前哨。

这是每个忠于馬克思主义的人都应当进行具体分析的具体例子，它究竟向我們說明了些什么呢？它只說明：（1）欧洲几个大民族和最大民族的解放利益高于各个小民族解放运动的利益；（2）民主要求应当从全欧洲范围来看，現在应当說从世界范围来看，而不应当孤立地来看。

如此而已。这里絲毫也沒有否定波兰人常常忘記而馬克思始終遵守的那个起碼的社会主义原則：“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能自由的”。馬克思当时所处的是沙皇政府在国际政治方面具有压倒一切的影响的时代，如果这具体形势又以同种形式重演，即有几个民族开始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如 1848 年在欧洲开始实行的资产阶級民主革命），而其他民族却是资产阶級反动势力的主要支柱，那我們还是应当主张同后面这些民族进行革命战争，“粉碎”它們，摧毁它們的一切前哨，不管它們那里已經掀起了什么小民族的运动。因此，我們决不当抛弃馬克思运用的策略范例，而应当从具体的分析中吸取有益于将来的極其宝贵的教訓。抛弃这些范例，就是口头上信仰馬克思主义，实际上同馬克思主义决裂。民主运

动的个别要求，包括民族自决在内，并不是什么绝对的东西，而是世界整个民主主义（现在是整个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一小部分。在个别的具体情况下，部分可能和总体相矛盾，那时就必须抛弃这一部分。某一国家的共和国运动可能只是其他国家教权派或财阀君主派进行阴谋的工具，那时我们就应当支持这个具体的运动，但是，如果根据这点就从国际社会民主党人纲领中抛弃共和国的口号，那就可笑了。

从1848—1871年到1898—1916年这段时期（这里所举的是帝国主义发展史中最重大的阶段，即从西班牙美利坚帝国主义战争到欧洲帝国主义大战）的具体形势，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呢？沙皇政府显然无疑地已不再是反动势力的主要支柱了，第一、因为它受到国际财政资本，特别是法国财政资本的支持；第二、因为发生过1905年革命。当时，许多大民族国家——欧洲各民主国家——与沙皇政府相反，向世界传播了民主和社会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活到帝国主义时代。现在已经形成了一撮（五六个）“大”帝国主义强国的体系，其中每个国家都在压迫其他民族，而这种压迫是人为地延缓资本主义崩溃的办法之一，是人为地支持那些统治世界的帝国主义民族的机会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的办法之一。当时解放各个最大民族的西欧民主运动，是反对沙皇政府利用各

⊖ 梁贊諾夫在格律恩堡編的“社会主义历史文庫”（1916年第1册）上發表了恩格斯在1866年写的关于波兰問題的一篇極有趣的文章。恩格斯着重指出，無产階級必須承認欧洲各大民族的政治独立和“自决”（right to dispose of itself），同时又指出“民族原則”（特别是拿破仑运用的），即把任何一个小民族和这些大民族等量齐观的荒謬性。恩格斯說：“俄国是大量赃物”（即許多被压迫民族）的占有者，“而在算賬那天必須全部归还”。¹⁰⁰無論拿破仑政府或沙皇政府，都是利用小民族运动来达到它們反对欧洲民主运动之实的。

个小民族运动来达到反动的目的的。現在沙皇帝国主义同先进資本主义的、欧洲的帝国主义在共同压迫許多民族的基础上結成的联盟，是反对社会主义無产阶级的，而社会主义無产阶级現在已被拆成沙文主义即“社会帝国主义”部分和革命部分了。

这恰恰就是波兰社会民主党人所忽視的形势的具体变化，他們沒有履行諾言，去作具体的分析！可見，在同样一些社会主义原則的运用上也有具体变化：那时主要是“反对沙皇政府”（并且反对它用来反对民主运动的那些小民族运动），拥护西方大民族的革命人民；現在却要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以及社会帝国主义者的步調一致的統一战綫，主张利用一切反帝民族运动来达到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現在，無产阶级反对整个帝国主义陣綫的斗争愈透徹，則“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能自由的”这一国际主义原則也就显得愈紧要。

蒲魯东分子为了进行教条主义者所理解的那种社会革命，竟忽視了波兰的国际作用，抛弃了民族运动。現在波兰社会民主党人的做法也完全是教条主义的，他們破坏了反社会帝国主义者的国际陣綫，由于自己在兼并問題上的动摇而（在客观上）帮助了社会帝国主义者。因为国际無产阶级斗争陣綫同各小民族的具体立場的关系已經改变了；那时（1848—1871年）小民族的作用是既可能成为“西方民主运动”和革命民族的同盟者，又可能成为沙皇政府的同盟者；而現在（1898—1914年）小民族已失去了这样的作用；它們今天的作用是培养寄生現象，因而也就是培养“大国民族”社会帝国主义的源泉之一。現在重要的不是什么 $\frac{1}{50}$ 或 1% 的小民族在社会主义革命以前能不能获得解放，而是在帝国主义时代，無产阶级由于客观原因分成两大国际陣营，其中之一已被大国資

产阶级的残羹剩饭(顺便指出,也由于对小民族的双重或三重的剥削)所腐蚀,而另一阵营不解放小民族,不用反对沙文主义的精神,即反对兼并而拥护“自决”的精神教育群众,自己是不能得到解放的。

波兰同志忽视了事情的这个最主要的方面,他们不是从帝国主义时代的主要障地,不是从国际无产阶级的两大阵营来观察问题。

这里还有两个证明他们拥护蒲鲁东主义的明显例子:(1)他们对1916年爱尔兰起义的态度,这一点下面再谈;(2)他们在提纲中(第2章第3节、第3节末尾)声称:“不应当用任何东西来掩盖”社会主义革命的口号。这正是一种极端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以为把社会主义革命的口号同在一切问题(包括民族问题)上的彻底的革命立场联系起来,就可以“掩盖”社会主义革命的口号。

波兰社会民主党人认为我们的纲领是“民族改良主义的”。请对照一下两种实际主张:(1)主张自治(波兰的提纲第3章第4节)和(2)主张分离自由。要知道,我们双方纲领之间的区别就在这里,而且也仅仅在这里!改良主义的纲领正是前者,而不是后者,这难道还不明显么?改良主义的变革,就是不破坏统治阶级的政权基础,只要统治阶级在保持其统治的条件下作一些让步。革命的变革却要破坏政权基础。民族纲领中改良主义的措施并不废除统治民族的一切特权,并不造成完全平等,并不消灭任何民族压迫。“自治”民族同“强国”民族是不平等的。波兰同志如果不是硬要忽视(像我们的老“经济主义者”那样)对政治概念和政治范畴的分析,就不会看不到这一点。1905年以前,自治的挪威作为瑞典的一部分而享有极广泛的自治权,但是同瑞典不是平等的。

只有在它实行自由分离之后,才在事实上表明和証明它享有平等权(这里順便补充一句,正是这种自由分离,才为根据平等原則实行更紧密更民主的亲近打下了基础)。当挪威还只实行自治的时候,瑞典貴族享有一种額外特权,而这种特权并没有被“削弱”(改良主义的实質就是削弱禍害,而不是消灭它),只有实行分离才能被完全消灭(这是綱領中革命变革的基本标志)。

順便說一說,自治是一种改良,在原則上它和作为革命措施的分離自由不同,这是毫無疑問的。可是,大家都知道,改良实际上往往只是走向革命的一个步驟。正是自治才能使被强制地留在某一国家疆界以內的民族最終組成一个民族,聚集、認識和組織自己的力量,选择完全适当的时机,以使用……“挪威的”方式声明:我們是某某民族或某某边区的自治議會,宣布全俄皇帝已經不再是波兰的国王,等等。人們通常都“反对”这种做法,認為这样的問題不是用声明,而是要用战争来解决的。对,这种問題在大多数場合都要用战争来解决(正像大国的政体問題在大多数場合只能用战争和革命来解决一样)。可是不妨想一想,这种对革命政党政綱的“反对意見”,是否合乎邏輯?难道我們反对为正义的和对無产階級有益的事業、为民主和社会主义而进行的战争和革命嗎?

“但是,我們不能拥护各个大民族之間的战争,不能拥护为了也許只有一两千万人口的某个小民族不彻底的解放而断送两千万人的生命!”当然不能!这并不是因为我們抛弃自己綱領里的完全的民族平等,而是因为一个国家民主运动的利益必須服从几个和一切国家民主运动的利益。假定两大君主国之間有一个小君主国,它的国王因为亲緣及其他种种关系而同两大邻国君主都有“联系”。其次,假定在这个小国里宣布了实行共和制,赶走了它的君

主，那在实际上就意味着两大邻国要为恢复这个小国某一君主进行战争。毫无疑问，整个国际社会民主党以及这个小国社会民主党里一部分真正的国际主义者在这种场合，就应当反对用共和制代替君主制。共和制代替君主制，这并不是一种绝对的东西，而是一种民主要求，它应当服从整个民主运动的利益（当然，更要服从整个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利益）。这种情况想必丝毫不会引起各国社会民主党人之间的意见分歧。但是，假如有一个社会民主党人根据这点就建议取消国际社会民主党纲领中的共和国口号，那一定会被认为是一个疯子。人们就会对他說：无论如何你不能忘记特殊和一般在逻辑上的基本区别。

这个例子使我们多少能从另一方面来观察工人阶级的国际主义教育问题。这种教育工作——对于这种工作的必要性和极为迫切的重要性，在齐美尔瓦尔得左派中间是不可能有意见分歧的——在压迫的大民族中和被压迫的小民族中，在兼并的民族中和被兼并的民族中，能够具体地相同吗？

显然不能。要达到使一切民族完全平等、密切亲近和进而融合的共同目的，显然要走各不相同的具体道路，就拿达到一张纸的中心点的方法来说吧，可以从纸的一端向左走，也可以从纸的相对的一端向右走，反正都会达到。如果压迫的、兼并的大民族中的社会民主党人仅仅一般地鼓吹民族融合，而忘记了，哪怕是一分钟忘记了“他的”尼古拉二世、“他的”威廉、乔治、彭加勒等等也主张和小民族融合（用兼并手段），忘记了尼古拉二世主张和加里西亚“融合”、威廉二世主张和比利时“融合”等等，那末，这样的社会民主党人在理论上是可笑的教条主义者，在实践上是帝国主义的帮凶。

在压迫国家里，工人的国际主义教育的重心必须是宣传并且

要工人坚持被压迫国家有分离的自由。不这样，就没有国际主义。如果压迫民族的任何一个社会民主党人不进行这种宣传，那末我們就可以而且应该鄙视他，把他看作帝国主义者，看作坏分子。这是绝对的要求，哪怕在社会主义未实现以前，分离的机会只有千分之一是可能的和“可以实现的”。

我們应当教育工人“漠视”民族的差别，这是无可争辩的。但是，不能教育他们漠视兼并主义者。对于某一小民族究竟属于它的国家还是属于邻国，还是由它们自己来管理的问题，压迫民族的成员应当抱“漠视”态度，应当按照小民族的意愿去解决。谁不抱这种“漠视”态度，谁就不是社会民主党人。要作一个社会民主党人国际主义者，就不应当专为本民族着想，而应当把一切民族的利益、一切民族的普遍自由和平等置于本民族之上。这在“理论”上大家都是同意的，但是在实践上有人恰恰表现出兼并主义的漠视态度。祸根就在这里。

相反地，小民族的社会民主党人应当以我们这个总公式——各民族“自愿联合”的末尾两个字为其鼓动工作的中心。他既可以赞成本民族的政治独立，又可以赞成本民族加入邻近某个国家，同时又不违反他的作为国际主义者的义务。可是，他在任何场合都应当反对小民族的狭隘观点、闭关自守和各自为政，而主张顾全整体和总体、部分利益服从全体利益。

不仔细考虑问题的人，会以为压迫民族的社会民主党人坚持“分离自由”而被压迫民族的社会民主党人坚持“联合自由”是“矛盾的”。可是，只要稍微思索一下，就可以知道要达到国际主义和民族融合这一目的，除了实行这个原理以外，没有也不可能有别的道路。

現在我們來談一談荷蘭社會民主黨和波蘭社會民主黨的特殊原理。

8. 荷蘭和波蘭社會民主黨人國際主義者 立場中的特殊之點和共同之點

毫無疑問，反對自決的荷蘭和波蘭的馬克思主義者是國際社會民主運動中最優秀的革命者和國際主義者。但是，為什麼像我們看到的那樣，他們的論斷會有一大堆錯誤呢？沒有一個正確的一般論斷，除了“帝國主義的經濟主義”以外，什麼也沒有！

這一點完全不是由於荷蘭同志和波蘭同志的特殊不良的主觀品質造成的，而是由於他們國家的特殊的客觀條件造成的。這兩個國家（1）在現代列強“體系”中都是孤立無援的小國；（2）在地理上都處於競爭最激烈的、勢力強大的帝國主義掠奪者（英國和德國；德國和俄國）之間；（3）這兩個國家都對於過去自己是“強國”這點極為懷念，並且竭力保持往時的傳統，因為荷蘭曾經是一個比英國強盛的殖民大國，波蘭曾經是一個比俄國和普魯士更有文化更強盛的大國；（4）這兩個國家直到現在還保持着壓迫異族的特權：荷蘭資產者擁有最富庶的荷屬印度；波蘭地主壓迫烏克蘭的和白俄羅斯的“農奴”，波蘭資產者壓迫猶太人，等等。

在愛爾蘭、葡萄牙（它有一個時期曾被西班牙兼併）、亞爾薩斯、挪威、芬蘭、烏克蘭、拉脫維亞邊區、白俄羅斯邊區及其他許多地方，你們不可能找到由這四個特殊條件結合而成的那種特殊性。而問題的**全部實質**正在於這種特殊性！當荷蘭和波蘭社會民主黨人用一般的論證，即關於一般帝國主義、一般社會主義、一般民

主制、一般民族压迫的論証来反对自决时，真可以說是錯上加錯，一錯再錯。但是，只要一剝掉这个显然錯誤的一般論証的外壳，从荷兰和波兰的特殊条件的特殊性来看問題的实质，他們的特殊立場就是可以理解的和完全合理的。可以說（不怕成为奇談怪論），荷兰和波兰的馬克思主义者拚命反对自决，他們所說的并不完全是他們所要說的，換句話說，他們所要說的并不完全是他們所說的[⊖]。

我們在提綱里已經举了一个例子[⊖]。果特反对本国实行自决，但是贊成受“他的”民族压迫的荷屬印度的民族实行自决！我們認為，他比德国的考茨基、我国的托洛茨基和馬尔托夫那样在口头上假装承認自决的人，是更忠誠的国际主义者和更接近我們的志同道合的人，这难道有什么奇怪嗎？毫無疑問，馬克思主义一般的和基本的原則所規定的义务，就是为受“我本国”民族压迫的民族的分离自由而斗争，但是完全沒有必要把荷兰的独立放在首位，因为它的狹隘的、守旧的、自私的、愚蠢的閉关主义愈来愈严重；讓全世界都燃烧起来吧，这与我們無关，我們过去的猎获和它的極其丰富的“余产”——东印度已使“我們”心滿意足，其余的事情更与“我們”無关了！

另一个例子：在大战爆發之后，波兰社会民主党人卡尔·拉狄克由于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中为国际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取得了極大的功績。他在“民族自决权”一文（載于“光綫”杂志——《Lichtstrahlen》¹⁰¹ 1915年12月5日第3卷第3期，該杂志由尤·

⊖ 提醒一下，所有波兰社会民主党人在自己的齐美尔瓦尔得宣言中都承認一般的自决，仅仅在措詞上有些不同。

⊖ 見本卷第144頁。——編者注

博尔夏特主編，是一种激进左派的月刊，为普魯士書报检查机关查禁)中，激烈地反对自决，仅仅引用了荷兰和波兰权威者的話来为自己辯护，并且在其他許多地方提出这样一种論据：自决会助长“好像社会民主党的責任就是拥护爭取独立的任何斗争”的这种思想。

从一般理論来看，这种論据簡直令人憤怒，因为它显然是不合邏輯的：第一、如果局部民主要求不服从整体要求，那就沒有也不可能有任何局部的民主要求，而这种局部民主要求也不会不濫用民主。我們既沒有責任支持“任何”爭取独立的斗争，也沒有責任支持“任何”共和国运动或反神甫运动；第二、沒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任何一个反民族压迫的說法不帶有这同样的“缺点”。拉狄克本人在1915年“伯尔尼哨兵报”第253号上就曾用过“反对新旧兼并”的公式。任何一个波兰民族主义者都将合法地从这个公式中“得出”結論：“波兰已被兼并，我反对兼并，也就是說我拥护波兰独立。”記得卢森堡在1908年写的一篇文章¹⁰²里發表过这样的意見：用“反对民族压迫”这个公式就够了。但是，任何一个波兰民族主义者都可以說，也完全有权利說，兼并是一种民族压迫的形式，因而，如何如何等等。

关于这些一般的論据我們暫且不談，就拿波兰的特殊条件來說吧，現在波兰的独立不經過战争或革命是“不能实现”的。如果仅仅为了恢复波兰的独立而贊成全欧战争，那就是最坏的一种民族主义者，就是把少数波兰人的利益放在受尽战争折磨的几亿人的利益之上。可是，波兰社会党右派¹⁰³正是这样的，他們只是口头上的社会主义者，而波兰社会民主党人要比这派人正确千百倍。現在，在毗邻的帝国主义强国現今力量对比的情况下提出波兰

独立的口号，实际上就是追求烏托邦，陷于狭隘的民族主义泥坑，忘記了全欧革命至少是俄国和德国革命的前提。这就像 1908—1914 年在俄国提出自由联合的口号作为一个独立口号一样，等于追求烏托邦，在客观上帮助了斯托雷平工党（现在是波特列索夫—格沃茲迭夫派，其实，是一样的貨色）。但是，如果把社会民主党党綱中自由联合的要求完全去掉，那就是發疯！

第三个例子，也許是最重要的一个例子。在波兰提綱里（第 3 章第 2 节末尾）我們讀到一段反对波兰成为独立緩冲国的話，認為这是“一些弱小集团的烏托邦。要是这种思想得以实现，那就会使波兰成为一个四分五裂的国家，成为某个列强集团的軍事殖民地，成为它們获得軍事利益和經濟利益的傀儡，成为受外国資本剝削的地区和未来战争的战場”。如果这是反对現在提出波兰独立的口号，那是很正确的，因为仅仅是波兰一国的革命，那不会有什么改变的，而波兰群众的注意力却会离开主要方面：他們的斗争同俄国無产階級和德国無产階級的斗争的联系。現在波兰無产階級本身只有同邻国無产階級共同斗争，反对狭隘的波兰民族主义者，才能对社会主义和自由的事業，包括对波兰的自由事業有所裨益，这不是奇談怪論，而是事实。波兰社会民主党在反对波兰民族主义者的斗争中所作的巨大的历史貢獻，是不能否認的。

但是，那些从当前时代的波兰特殊条件来看是正确的論据，如果从它所具有的一般形式来看，显然是不正确的。只要进行战争，波兰就会成为德国和俄国之間的战場，但这并不是反对在两次战争的間隔时期有更广泛的政治自由（因而，也是政治上的独立）的理由。同样，对外国資本的剝削，对外国利益的傀儡的作用的看法，也是如此。波兰社会民主党人現在不能提出波兰独立的口号，

因为身为無产階級国际主义者的波兰人，对此并不能有何作为，只能像波兰社会党右派那样，向帝国主义君主国之一献媚。可是，俄国工人和德国工人会不会成为兼并波兰的参加者（这就是教德国和俄国的工人农民去干最卑鄙最卤莽的事，同残杀异族人民的劊子手相安無事）或者波兰会不会获得独立，这对他們并不是無关紧要的。

当前的形势無疑是非常混乱的，要想使所有参加討論的人仍然是国际主义者，只有一条出路，那就是俄国的和德国的社会民主党人要求讓波兰有無条件的“分离自由”，波兰社会民主党人則应当为大小国家的無产階級斗争的因結而奋斗，在当前时期或目前阶段不必提出波兰独立的口号。

9. 恩格斯給考茨基的信

当考茨基还是一个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他在自己的“社会主义与殖民政策”一書中（1907年柏林版）發表了恩格斯1882年9月12日写給他的信，这封信对于我們感到兴趣的問題有重大的意义。下面就是这封信的主要部分：

……“依我看来，移民地，即欧洲人占据的土地，加拿大、好望角和澳大利亚，都会独立的；而只有那些被征服的本地人居住的土地，印度、阿尔及利亚以及現在荷、葡、西等国的屬地，無产階級不得不暂时接过来，并且尽快地引导它們走向独立。这一过程究竟怎样展开，还很难說。印度也許会鬧革命，甚至很可能鬧革命，既然爭取解放的無产階級不可能进行殖民战争，那就必須容許它这样做，自然，一鬧起来，不遭到任何破坏是不行的。但是，这类事情

是任何革命都免不了的。在其他地方，如阿尔及利亚和埃及，也可能發生革命，这对我們來說当然是最好不过的事情。我們在自己家里将有足够的工作要做。只要欧洲和北美一实行改造，就会产生巨大的力量和做出極好的榜样，使各个半文明国家自动地跟着我們走，单是經濟上的需要就会促成这一点。至于这些国家在社会和政治發展中究竟应当經過哪些阶段才能同样达到社会主义的組織，我認为我們对此只能作出一种相当空泛的假設。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胜利了的無产階級如果強迫任何异族人民接受任何幸福，那就一定会使自己的胜利遭到破坏。当然，这决不会排除各种各样的自衛战争”……104

恩格斯根本沒有認为“經濟上的”因素自己会直接調解一切困难。經濟变革会使一切民族傾向于社会主义，但是同时又可能引起革命(反对社会主义国家)和战争。政治适应經濟是必然要發生的，但是不会一下子發生，不会順利地、简单地、直接地發生。恩格斯認为只有一个絕對国际主义的原則才是“确定無疑的东西”，他把这个原則运用于一切“异族”，也就是說，不仅仅运用于殖民地民族，因为強迫他們接受幸福，就是破坏無产階級的胜利。

無产階級决不会因为一完成社会革命就能变得潔白無疵，保險不犯錯誤和沒有弱点。可是，各种可能犯的錯誤(以及自私自利——企圖騎在別人头上)，必然会使無产階級認識这个真理。

我們齐美尔瓦尔得左派分子确信，就連在1914年以前还没有离开馬克思主义轉而维护沙文主义的考茨基也确信，社会主义革命完全可能在最近的将来發生，正如同一个考茨基有一次所說的那樣，就在“旦夕之間”。民族的反感不会很快消失；被压迫民族对压迫民族的仇恨(也是完全正当的)暂时还会存在，只有社会主义

胜利以后，在各民族間徹底确立了完全的民主关系以后才会消散。如果我们想忠于社会主义，现在就应当对群众进行国际主义教育，但是在压迫民族中不宣传被压迫民族有分离的自由，就不能进行这种教育。

10. 1916 年的爱尔兰起义

我們的提綱是在这次起义以前写的。这次起义应当作为审查理論观点的材料。

反对自决的人会得出結論說：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小民族的生命力已經消耗淨尽，它們不能起任何反帝的作用，支持他們純粹民族的願望不会导致任何結果，等等。1914—1916 年的帝国主义战争的經驗用事实駁斥了这种結論。

战争对西欧各民族，对整个帝国主义來說，是一个危机时期。每次危机都抛开了俗例，撕破了外壳，扫清了一些过时的东西，揭示了更深刻的动力和力量。从被压迫民族的运动看来，危机究竟揭露了些什么呢？殖民地有过多次的起义嘗試。当然，压迫民族在軍事检查机关的协助下，曾竭力設法把这些嘗試隱瞞下来。然而大家还是知道，英国人曾在新嘉坡残暴地镇压过自己的印度軍队的起义；在法屬安南（見“我們的言論报”）和德屬喀麦隆（見尤尼烏斯的小册子[⊖]）人民也有过起义的嘗試；在欧洲，一方面，爱尔兰举行的起义，被不敢讓爱尔兰人参加普遍义务兵役的“爱好自由的”英国人用死刑平定下去了。另一方面，奥国政府以“叛逆罪”把捷克議会議

⊖ 見本卷第 298—313 頁。——編者注

員判處死刑，并且以同样的“罪名”把捷克士兵整团整团地槍決了。

当然，这里所举的例子是極不完全的。但是它仍然可以表明：由于帝国主义的危机，民族起义的火焰無論在殖民地或在欧洲都燃燒起来了；尽管有残忍的威胁和鎮压，民族的同情和仇恨还是表現出来了。但是要知道，帝国主义的危机还远沒有达到它的頂点：帝国主义資產階級的强大势力还沒有被摧毀（战争打得“筋疲力竭”时，就可以被摧毀，不过現在还沒有达到这种程度）；帝国主义列强内部的無产階級运动还十分薄弱。一旦战争打得筋疲力竭，或者即使在一个强国中資產階級政权在無产階級斗争的打击下动摇起来，像1905年沙皇制度政权那样，那时将会怎样呢？

1916年5月9日，齐美尔瓦尔德派以及几个左派分子的机关报“伯尔尼哨兵报”就爱尔兰起义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目是“歌兒唱完了”，署名卡·拉·¹⁰⁵。爱尔兰起义被說成是十足的“盲动”，因为据說，“爱尔兰問題是一个土地問題”，农民由于实行改良而安定下来了，現在民族主义运动是“純粹城市小資產階級的运动，虽然声势浩大，但是社会上拥护它的人不多”。

这种教条式和書呆子式的奇怪評价，同俄国民族自由派、立宪民主党人阿·庫利舍尔先生的評价（1916年4月15日“言論报”¹⁰⁶第102号）是吻合一致的，这是毫不奇怪的，因为庫利舍尔先生也罵这次起义是“都柏林盲动”。

但願像俗語所說“塞翁失馬，安知非福”。許多同志都不了解，他們否認“自决”，輕視小民族的民族运动，是陷入了什么样的泥坑。現在他們在帝国主义資產階級代表的評价同社会民主党人的評价“偶然”吻合一致的影响下，眼睛总該睜开了吧！！

如果起义的嘗試除了暴露出一群陰謀者或荒唐的狂热者而

外，並沒有激起群眾絲毫的同情，那才可以科學地稱為“盲動”。愛爾蘭的民族運動有悠久的歷史，它經歷了各個不同的階段，結合了各種階級利益，這個運動的表現之一，就是在美國召開了群眾性的愛爾蘭民族代表大會，（1916年3月20日《Vorwärts》[⊖]）主張愛爾蘭獨立；另一個表現是，經過長期的群眾鼓動、遊行示威、報館被封等等之後爆發了一部分城市小資產者及一部分工人的巷戰。誰把這樣的起義叫作盲動，誰就是萬惡的反動分子，或者是永遠不能想像社會革命是一種活生生的現象的教條主義者。

因為，如果認為沒有殖民地和歐洲弱小民族的起義，沒有帶着一切成見的一部分小資產者的革命爆發，沒有那些不自覺的無產階級或半無產階級群眾反對地主、教堂、君主和民族等等壓迫的運動，就可以產生社會革命，那就是放棄社會革命。大概，有一支隊伍在這一邊排好隊，喊道：“我們贊成社會主義”，而另一支隊伍在那一邊排好隊，喊道：“我們贊成帝國主義”，這就是社會革命吧！只有根據這種迂腐可笑的觀點，才會罵愛爾蘭起義是“盲動”。

誰要是等待“純粹的”社會革命，誰就永遠要落空，誰就是不懂得真正革命的口頭革命家。

· 俄國1905年的革命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它由人民中一切具有不滿情緒的階級、團體和分子的一系列的戰鬥構成的。其中包括帶有最荒謬的成見和最模糊的鬥爭幻想的群眾，有受日本資助的小集團、投機分子和冒險分子等等。但是客觀上，群眾運動挫傷了沙皇政體，為民主制掃清了道路，因此，覺悟的工人領導了這個運動。

⊖ “前進報”。——編者注

欧洲的社会主义革命，不能不是一切被压迫者和不满者的群众斗争的爆发。一部分小资产阶级和落后的工人，必然会参加这种斗争，——没有他们的参加就不能有群众性的斗争，就不能有任何的革命——因而他们必然会把自己的成见、反动的幻想、弱点和错误带到运动中来。可是客观上他们是向资本进攻的，而觉悟的革命先锋队，先进的无产阶级，则会表现出这种各式各样的、五光十色的、复杂的、表面上分散的群众斗争的客观真理，它能够统一和指导这个斗争，夺取政权，夺取银行，剥夺大家所憎恨的（虽然憎恨的原因各不相同！）托拉斯并实现其他的专政措施，以求最后推翻资产阶级和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而社会主义的胜利远不是一下子就能“清除掉”小资产阶级的渣滓的。

波兰的提纲（第1章第4节）上说，社会民主党“应当利用殖民地的新兴资产阶级反对欧洲帝国主义的斗争来加剧欧洲的革命危机”（着重号是作者加的）。

在这方面，把欧洲和殖民地对立起来是决不容许的，难道这还不明白吗？欧洲各被压迫民族的斗争能导致起义和巷战、破坏军队铁的纪律和戒严状态，这种斗争将比遥远的殖民地的日益发展的起义更加无限有力地“加剧欧洲的革命危机”。爱尔兰起义给予英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政权以同样有力的打击，这种打击的政治意义要比亚洲或非洲的起义大一百倍。

法国沙文主义报纸不久前登载了一个消息，说比利时秘密杂志“自由比利时”第80期已经出版了。当然，法国沙文主义报纸是常常造謠的，可是这个消息却近乎事实。而沙文主义的和考茨基主义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在战争爆发两年以来并没有为自己创办一种自由刊物，却奴颜婢膝地忍受军事检查机关的束缚（只有左派

激进分子才避开检查而出版了各种小册子和宣言，这是他們的荣誉)，而被压迫的文明民族，以创办革命反抗的机关报回答了空前残暴的軍事压迫！历史的辯証法是这样的：弱小民族是反帝斗争中的一个独立因素，是帮助反帝的真正力量即社会主义無产階級登上舞台的一种酵母、霉菌。

目前战争中各国总参謀部都处心积虑地利用敌对阵营中的每个民族运动和革命运动，德国人利用爱尔兰的起义，法国人利用捷克人的运动等等。在他們看来，这样做是完全正确的。如果不利用敌人的最小弱点，不抓住一切机会，那就不能严肃地对待严肃的战争，更不能預先知道某个火藥庫会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以怎样的力量發生“爆炸”。要是在無产階級爭取社会主义的伟大解放战争中，我們不善于利用反对帝国主义个别灾难的一切人民运动来加剧和扩大危机，那我們就不是好的革命家。如果我們一方面再三声明“反对”任何民族压迫，而另一方面却把被压迫民族某些階級中最活动和最有知識的一部分人反对压迫者的英勇起义叫作“盲动”，那我們就把自己降低到考茨基分子那样愚蠢的水平了。

爱尔兰人不幸之处，就在于他們起义得不是时候，因为当时欧洲無产階級起义的条件还没有成熟。资本主义不会安排得这样协调的，使起义的各个源泉不遭到挫折和失败，就立刻可以自行匯合起来。相反地，正是起义的时间、种类和地点的各不相同，才能保证整个运动广泛地深入地展开。群众只有在不适时的、部分的、分散的、因而也是遭到挫折的革命运动中才能取得經驗，获得教訓，集合力量，找到自己的真正領袖——社会主义的無产者，从而准备举行总攻击，正像各个城市和各民族的罢工、游行示威、部队暴乱、农民暴动等等准备了1905年的总攻击一样。

11. 結 束 語

同波兰社会民主党人的不正确的論断相反，民族自决的要求在我們党的鼓动工作中所起的作用，并不亚于武装人民、教会同国家分立、人民选举官吏以及其他几点被庸夫俗子們称为“烏托邦的”要求。相反地，1905年以后民族运动的活躍自然也使我們鼓动工作活躍起来了，如1912—1913年的許多文章和1913年我們党的決議。这个決議对事物本質作了确切的、“反考茨基的”（即对純口头上的“承認”决不調和的）定义[⊖]。

当时已經出現了一个不容忽視的事实：各民族的机会主义分子，如乌克兰人尤尔凱維奇、崩得分子李普曼、波特列索夫之流的俄国奴仆——謝姆柯夫斯基，都拥护罗莎·卢森堡反对自决的論据！不过波兰社会民主党人拿这个論据对波兰民族运动的特殊条件作了不正确的理論概括，并且这个論据立刻在实际上，在更广泛的范围中，不是在小国而是在大国的条件下，不是在波兰的狭小范围而是在国际范围内，在客觀上对大俄罗斯的帝国主义給予了机会主义的支持。政治思潮的历史（和个人观点不同）証明了我們党綱的正确性。

現在露骨的社会帝国主义者，如連奇之流，竟公然出面既反对自决，又反对否認兼并。而考茨基分子是假装承認自决，在我們俄国走这条道路的有托洛茨基和馬尔托夫。他們两人也和考茨基一样，口头上拥护自决。实际上呢？如果拿托洛茨基在“我們的言

⊖ 見“列宁全集”第4版第19卷第384—386頁。——編者注

論報”上發表的“民族和經濟”一文來看，就可看到托洛茨基那套用慣了的折衷主義：一方面，經濟使各民族融合，另一方面，民族壓迫又使各民族分離。結論呢？結論是：占統治地位的偽善態度仍然沒有被揭穿，宣傳沒有生氣，沒有觸及主要的、根本的、本質的、接近實際的問題，即對於受“我的”民族壓迫的民族應持什麼態度的問題。馬爾托夫及其他國外書記寧願干脆忘掉——多麼有利的健忘！——他們的同事和伙伴謝姆柯夫斯基反對自決的鬥爭。馬爾托夫在格沃茲迭夫分子的合法報刊（“我們的呼聲報”）上寫過擁護自決的文章，證明了要求民族自決並不一定要參加帝國主義戰爭等等這個無可爭辯的真理，但是迴避了主要的問題：俄國即使在和平時期，在更加野蠻的、中世紀的、經濟落后的、軍事官僚式的帝國主義基礎上也打破了民族壓迫的世界紀錄。他在秘密的自由刊物上也迴避了這一點。俄國社會民主黨人如果像普列漢諾夫、波特列索夫之流那樣“承認”民族自決，而不去為受沙皇制度壓迫的民族的分離自由而鬥爭，那實際上就是帝國主義者和沙皇的走狗。

不管托洛茨基和馬爾托夫主觀的“善良”願望如何，他們在客觀上都是以他們模稜兩可的態度支持了俄國社會帝國主義。帝國主義時代把所有“大”國變成了許多民族的壓迫者，所以帝國主義的發展也必然會使各國社會民主黨在民族自決問題上的思潮劃分得更加清楚。

寫於 1916 年 7 月

刊於 1916 年 10 月

“社會民主黨人文集”第 1 卷

署名：尼·列寧

按“文集”原文刊印

注 释

- 1 “关于农业中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新材料。第一编。美国的资本主义和农业”一书写于1915年。1916年1月初，列宁从伯尔尼把该书手稿寄给高尔基，以便由“帆船”出版社出版，但是在1916年并没有出版；到了1917年才由彼得堡的“生活和知识”出版社出版。

该书的准备材料（即该书提纲的各种方案和从美国1900、1910年两次调查中摘录的统计表）于1932年刊载在“列宁文集”第19卷第380—460页上。

列宁原来打算再写本书的第二编，来讨论德国的情形的，但是这个计划没有实现。——（正文第1页）

- 2 “箴言”杂志是社会革命党人公开的文学政治月刊；从1912年4月到1914年7月在彼得堡出版。——（正文第1页）

- 3 见马克思“资本论”1956年人民出版社版第3卷第801—835页，或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47年俄文版第19卷第2部分第164—191页。——（正文第8页）

- 4 指考茨基的小册子“取得政权的道路”（«Der Weg zur Macht»），1909年在柏林出版。——（正文第96页）

- 5 “新时代”（«Die Neue Zeit»）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杂志，从1883年到1923年在斯图加特出版。从1885年到1895年，“新时代”发表了恩格斯的一些论文。恩格斯经常给杂志的编辑部作指示，并且尖锐地批评它离开了马克思主义。恩格斯逝世以后，该杂志从1896年起经常刊载修正主义者的文章，在世界帝国主义大战期间（1914—1918年），采取中派主义的、考茨基主义的立场，支持社会沙文主义者。——（正文第96页）

- 6 “机会主义和第二国际的破产”一文是列宁用德文写的，发表在齐美尔瓦尔得左派的理論刊物“先驅”杂志(«Vorboten»)第1期上。在此以前，列宁以同一标题还用俄文写了一篇論文，在1924年第一次刊载在“無产階級革命”杂志第5期(总28期)上，后来編入“列宁全集”第4版第21卷(第400—414頁)。这篇論文同发表在“先驅”上的論文略有出入。——(正文第99頁)
- 7 四协約国就是結成帝国主义同盟的英、法、俄、意四国。这个同盟是在1915年意大利退出三国同盟(德国、奥匈和意大利)而加入另一帝国主义同盟即1907年締結的三国协約(协約国)之后形成的。——(正文第99頁)
- 8 “社会主义月刊”(«Sozialistische Monatshefte»)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內机会主义者的主要刊物，也是国际机会主义的刊物之一；它在世界帝国主义大战期間(1914—1918年)采取社会沙文主义立場；1897—1933年在柏林出版。——(正文第104頁)
- 9 費边社分子是英国資产階級知識分子集团于1884年成立的改良主义的、極端机会主义的“費边社”社員。該社以羅馬的統帥費边·孔克达特(“緩进者”)而得名，这位統帥以等待时机、迴避决战聞名。照列宁的說法，費边社是“机会主义和自由派的工人政策的最完善的表現”。費边社分子誘导無产階級脱离階級斗争，鼓吹用改良办法可以从資本主义和平地过渡到社会主义。在世界帝国主义大战期間(1914—1918年)，費边社分子采取社会沙文主义立場。关于对費边社分子的評述，見列宁的如下著作：“約·菲·貝克尔、約·狄慈根、弗·恩格斯、卡·馬克思等給弗·阿·左尔格等的書信集，俄譯本序言”(“列宁全集”第4版第12卷第330—331頁)、“社会民主党在俄国革命中的土地綱領”(“列宁全集”第4版第15卷第154頁)、“英国的和平主义和英国的不爱理論”(“列宁全集”第4版第21卷第234頁)等。——(正文第104頁)
- 10 工党(Labour Party)成立于1900年，是工会、社会主义的組織和集团的联合組織。成立的原因是为了在議會中有工人的代表。这个联合組織叫作“工人代表委员会”，1906年改名为工党。工党在最初成立时

按其成員來講是一個工人的政黨，但是按其思想體系和策略來講，則是一個機會主義的組織。工黨成立以後，吸收了大量的小資產階級分子。工黨從成立時起，它的首領們就執行同資產階級實行階級合作的政策。在帝國主義大戰期間（1914—1918年），工黨的首領們持以社會沙文主義的立場。工黨分子曾經數次組織政府（在1924年，1929年和1945年），在執政期間他們執行了反人民的對內對外政策。——（正文第104頁）

- 11 英國獨立工黨（Independent Labour Party—I. L. P.）成立於1893年。該黨領袖有詹姆斯·凱爾-哈第和拉·麥克唐納等人。獨立工黨以政治上不依賴資產階級政黨自居，實際上它“不依賴社會主義，而依賴自由主義”（列寧）。在世界帝國主義大戰期間（1914—1918年），獨立工黨最初曾發表反戰宣言（新曆1914年8月13日）。後來在1915年2月，該黨在協約國社會黨人倫敦代表會議上贊同會議通過的社會沙文主義的決議。從此以後，獨立工黨的首領拿和平主義詞句作幌子，採取了社會沙文主義立場。1919年共產國際成立後，獨立工黨的首領在左傾黨員群眾的壓力下，通過了退出第二國際的決議。1921年獨立工黨參加了所謂第二半國際，在第二半國際瓦解後，又參加了第二國際。——（正文第104頁）

- 12 英國社會黨（British Socialist Party—B. S. P.）在1911年成立於曼徹斯特。該黨骨干是1884年出現的社會民主黨人聯盟（其領袖有海德門、哈利·奎爾奇和托馬斯·曼等人），這個聯盟後來改名為社會民主黨。英國社會黨曾根據馬克思主義精神進行宣傳和鼓動，是一個“非機會主義的、真正不依賴自由派”（列寧）的政黨。該黨人數不多，並且脫離群眾，因而具有某種宗派主義的性質。

在世界帝國主義大戰期間（1914—1918年），黨內出現兩派：一個是以海德門為首的公開的社會沙文主義派，一個是以阿·英克平和費·羅特施坦等人為首的國際主義派。1916年4月該黨發生分裂。海德門及其擁護者占少數，他們退出該黨。從此國際主義分子成為英國社會黨的領導人，他們進行了反對帝國主義大戰的鬥爭。英國社會黨是1920年成立的英國共產黨的創始人。——（正文第104頁）

- 13 “我們的曙光”杂志是孟什維克取消派的合法月刊；1910—1914年在彼得堡出版。在它的周围形成了一个俄国取消派的中心。該杂志被封閉以后，从1915年1月起便开始出版“我們的事業”杂志。——(正文第104頁)
- 14 組織委员会(即組委会，“組委会分子”即由此而来)是孟什維克的領導中心；它是在1912年在孟什維克取消派以及一切反党集团和派別联合举行的八月會議上成立的。——(正文第104頁)
- 15 “普魯士年鑒”(«Preussische Jahrbücher»)是保守派的一种月刊，德国資本家和地主的刊物，1858—1935年在柏林出版。——(正文第106頁)
- 16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1936年俄文版第16卷第2部分第109頁。——(正文第106頁)
- 17 見“馬克思恩格斯書信选集”1953年俄文版第459頁。——(正文第107頁)
- 18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1946年俄文版第29卷第265頁。——(正文第108頁)
- 19 齐美尔瓦尔得左派集团是列宁在国际主义社会主义者第一次代表會議上組成的，这次會議于1915年9月初在齐美尔瓦尔得(瑞士)召开。列宁把这次會議称为發展国际反战运动的“第一步”。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維克在齐美尔瓦尔得左派中采取了唯一正确的徹底的立場。同时，这个集团里也有一些不徹底的国际主义者。对他們的批判，見列宁的“論尤尼烏斯的小册子”、“关于自决問題的爭論总结”(見本卷第298—313頁、第314—354頁)。——(正文第110頁)
- 20 “工人領袖报”(«Labour Leader»)是一种日报，創刊于1890年；后来成为英国独立工党的机关报。从1922年起，該报改名为“新領袖报”(«New Leader»)；从1949年起，又改名为“社会主义領袖报”(«Socialist Leader»)。——(正文第111頁)

- 21 “伯尔尼哨兵报”(«Bernener Tagwacht»)是一种日报,瑞士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1893年创刊于伯尔尼。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该报曾发表过李卜克内西、梅林以及其他一些左翼社会民主党人的文章。从1917年起,该报开始公开支持社会沙文主义者;现在该报仍在出版,采取的是反共产主义的、反民主主义的立场。——(正文第111页)
- 22 关于召开社会主义者第二次代表会议的决议草案是列宁为1916年2月5—8日(新历)在伯尔尼召开的国际社会主义者委员会扩大会议起草的。会议通过了决议案中的许多条文。在齐美尔瓦尔得右派的压力下,会议否决了列宁关于讨论“成立反对战争和民族主义的社会主义者的国际联盟”问题的提议。会议决定在1916年4月24日(新历)召开国际社会主义者第二次代表会议。本文原来没有标题。标题是由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加的。——(正文第113页)
- 23 国际社会主义者委员会(I.S.K.—Internationale Sozialistische Kommission)是1915年9月在齐美尔瓦尔得代表会议上选出的齐美尔瓦尔得联盟的执行机构。——(正文第118页)
- 24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向社会主义者第二次代表会议提出有关议程上一切主要问题的提案。这项提案由列宁起草,现刊印在本卷第163—173页。——(正文第113页)
- 25 这个提议由列宁起草,提交1916年4月24—30日(新历)社会主义者第二次代表会议。列宁的提议经1916年2月伯尔尼国际社会主义者委员会扩大会议讨论通过。——(正文第114页)
- 26 国际群众大会是国际社会主义者委员会在伯尔尼召开扩大会议的期间举行的。——(正文第116页)
- 27 列宁指1915年9月国际主义者齐美尔瓦尔得代表会议所通过的宣言关于对这篇宣言的评论,可以参看列宁的文章“第一步”(“列宁全集”第4版第21卷第350—355页)。——(正文第116页)
- 28 “向理智呼吁报”(«Appeal to Reason»)是美国社会党人的报纸,1895年创刊于堪萨斯州(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采取了国际主义的立场。——(正文第118页)

- 29 “战斗报”（«La Bataille»）是法国無政府工团主义者的机关报，于1915年11月在巴黎创刊。該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間采取鮮明的沙文主义的立場。——（正文第120頁）
- 30 “前进报”（«Vorwärts»）是日刊，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于1876年创刊，由威·李卜克内西等人主編。恩格斯在該报上會同各种机会主义的現象作过斗争。恩格斯逝世以后，从1896年起，該报經常發表統治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者的文章。在世界帝国主义大战年代（1914—1918年），該报采取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場。在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該报成为反苏宣传的中心之一，在柏林出版，1933年停刊。——（正文第121頁）
- 31 法国社会党于1902年成立。1905年，由法国社会党和法国社会主义党發起，組成統一的社会党。加入这个党的是各社会主义党派和团体的代表人物（盖得分子、布朗基分子、饶勒斯分子等）。法国社会党的領導权轉入在党内占多数的社会改良派（以饶勒斯为首）之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間，該党采取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場，它的議會党团投票贊成軍費开支，它的代表加入資產階級政府。在1920年12月25—30日的圖尔代表大会上，法国社会党發生分裂，当时多数人組成法国共产党，而以萊昂·勃魯姆为首的少数右傾机会主义分子退出代表大会，成立一个独立的政党，仍用原來的名字，叫法国社会党。
- 布尔德朗向1915年12月法国社会党代表大会提出的議案，被大会多数否决。这时布尔德朗便加入齐美尔瓦尔得联盟右翼。——（正文第122頁）
- 32 列宁的信在日内瓦會用法文以单頁形式出版。——（正文第124頁）
- 33 列宁指孟什維克的杂志“国际和战争”。这个杂志在1915年年底出了一期。——（正文第125頁）
- 34 国际社会主义者委员会从1915年9月到1917年1月出版了机关刊物——“伯尔尼国际社会主义者委员会。公报”（«Internationale Sozialistische Kommission zu Bern. Bulletin»）。公报用英、法、德文出版，共出了6期。——（正文第125頁）

- 35 齐赫泽党团 是第四届国家杜馬的孟什維克党团。——(正文第 125 頁)
- 36 “光綫报”是孟什維克取消派的合法日报;从 1912 年 9 月到 1913 年 7 月在彼得堡出版;是“有錢的资产阶級朋友出錢办的”(列宁)。——(正文第 125 頁)
- 37 “晨报”和“工人晨报”是孟什維克在彼得格勒出版的合法报纸。“晨报”于 1915 年 8 月出版,“工人晨报”于 1915 年 9—12 月出版。——(正文第 126 頁)
- 38 “现代世界”是文学、科学、政治月刊;1906 年到 1918 年在彼得堡出版。孟什維克,包括普列汉諾夫在內,积极参加这个杂志的工作。布尔什維克在同普列汉諾夫孟什維克护党派实行联盟的时期,以及在 1914 年初,曾經給这个杂志撰稿。1914 年 3 月的“现代世界”杂志刊载了列宁的“又一次消灭社会主义”一文(見“列宁全集”第 4 版第 20 卷第 167—188 頁)。
- 在帝国主义世界大战期間(1914—1918 年)这个杂志成了社会沙文主义者的机关报。——(正文第 126 頁)
- 39 “我們的言論报”是孟什維克—托洛茨基分子的日报;从 1915 年 1 月到 1916 年 9 月代替“呼声报”在巴黎出版。——(正文第 126 頁)
- 40 “号召派”是因孟什維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社会沙文主义集团 1915—1917 年在巴黎出版的“号召报”而得名。——(正文第 129 頁)
- 41 列宁指 1915 年 7 月社会革命党人在彼得格勒組織的代表會議。會議通过的決議号召人們站在沙皇政府方面积极参加战争。——(正文第 129 頁)
- 42 軍事工业委员会 是帝国主义大资产阶級于 1915 年在俄国成立的。资产阶級为了使工人受自己的影响,向他們灌輸护国主义的情緒,想出了一个在这些委员会下面成立“工人团”的办法。把工人代表吸收到这些团体里来,鼓动工人群众提高軍事工厂的劳动生产率,这是有利于资产阶級的。孟什維克积极参加资产阶級搞的这种冒牌的爱国主义的勾

当。布尔什維克則宣布抵制軍事工業委員會，并且在大多数工人的支持下，胜利地进行了抵制。——(正文第130頁)

43 列宁指屠格涅夫的散文詩“处世之道”中的文学形象(見屠格涅夫的“散文詩”1931年俄文版第24—25頁)。——(正文第130頁)

44 “社会民主党人报”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秘密的中央机关报，于1908年2月到1917年1月出版，共出了58号。創刊号在俄国出版，以后移到国外出版，起初移到巴黎，后来移到日内瓦。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中央机关报編輯部由布尔什維克、孟什維克和波兰社会民主党人的代表組成。

“社会民主党人报”刊載过列宁的八十多篇文章和短評。列宁在編輯部內为实行徹底的布尔什維克路綫进行了斗争。編輯部的一部分人(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对取消派采取了調和主义的态度，企圖破坏列宁的路綫。担任編輯的孟什維克馬尔托夫和唐恩在中央机关报編輯部怠工，同时又在自已派別办的报纸“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上公开捍衛取消主义。由于列宁毫不妥协地同取消派斗争，馬尔托夫和唐恩于1911年6月退出了編輯部。从1911年12月起，“社会民主党人报”由列宁主編。

在世界帝国主义大战初期，这个报纸經過一年的停刊以后，由列宁复刊。1914年11月1日(新历)出版了“社会民主党人报”第33号，刊載了列宁写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宣言。战时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刊載的列宁的文章，对于爭取实现布尔什維克党在战争、和平和革命問題上的战略和策略，揭露公开和暗藏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团结国际工人运动的国际主义分子，起了很大的作用。——(正文第131頁)

45 “斯托雷平工党”是工人对孟什維克取消派的称呼，因为他們迁就斯托雷平制度，同它妥协，企圖放弃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綱領和策略，以求得沙皇政府允許公开的、合法的、所謂“工人的”政党存在。——(正文第132頁)

46 列宁称这个口号为“十月党人的”口号，是因为它的性質和反革命的十月党的立場相同。

“十月党”或“十月十七日同盟”是工商業大資產階級和进行資本主义經營的大地主的反革命政党；是1905年11月成立的。十月党虽然口头上承認10月17日的沙皇宣言，但是無条件地拥护沙皇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十月党的首領是大工業家古契柯夫和大地主罗将柯。——(正文第133頁)

- 47 德雷福斯案件 是法国反动的君主派軍閥集团于1894年对总參謀部軍官犹太人德雷福斯組織的挑拨性的审判，誣告他进行間諜和叛国活动。軍事法庭把德雷福斯判处無期徒刑。但是，由于在法国展开了重审德雷福斯案件的社会运动，共和派同君主派进行了剧烈的斗争，德雷福斯终于在1906年宣告無罪。

列宁把德雷福斯事件叫作“反动軍閥所进行的千百次中的一次黑暗勾当”。——(正文第139頁)

- 48 薩比林事件于1913年11月發生在亚尔薩斯的薩比林城。这个事件是由于普魯士軍官侮辱亚尔薩斯人引起的。当时激起了当地居民（大多是法国人）反对普魯士軍閥的压迫的怒潮。关于薩比林事件，見列宁的“薩比林”一文（“列宁全集”第4版第19卷第464—466頁）。——(正文第139頁)

- 49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1932年俄文版第23卷第464、480頁。——(正文第140頁)

- 50 关于对倫納和鮑威尔的所謂“民族文化自治”的反动思想的批判，見列宁的“論‘民族文化’自治”（“列宁全集”第4版第19卷第455—458頁）、“关于民族問題的批評意見”（“列宁全集”第4版第20卷第1—34頁）。——(正文第140頁)

- 51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1935年俄文版第15卷第223頁。——(正文第143頁)

- 52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1930年俄文版第6卷第185頁。——(正文第143頁)

- 53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1932年俄文版第23卷第464頁。——(正文

第 143 頁)

- 54 “鐘聲”雜誌(«Die Glocke»)于 1915—1925 年先在慕尼黑以後在柏林由德國社會民主黨黨員帕爾烏斯(海爾方德)出版,他是社會沙文主義者,德國帝國主義的代理人。——(正文第 144 頁)
- 55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1930 年俄文版第 7 卷第 201—220 頁。——(正文第 144 頁)
- 56 列寧是指關於民族問題的決議案。該決議案由列寧起草,經有黨的地方工作人員參加的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中央委員會會議通過。會議于 1913 年 10 月 6—14 日(新曆)在克拉柯夫附近的波羅寧諾村召開。為了保密起見,會議稱為“夏季”或“八月”會議。決議案刊于“列寧全集”第 4 版第 19 卷第 384—386 頁。——(正文第 148 頁)
- 57 “工人報”(«Gazeta Robotnicza»)是波蘭和立陶宛社會民主黨華沙委員會的秘密機關報,1906 年 5—10 月出版,1912 年復刊,一直出版到 1916 年 1 月。1912 年波蘭社會民主黨分裂後,成立了兩個平行的委員會,於是出現了兩個華沙委員會,兩個都叫“工人報”的機關報:一個是由華沙總委員會的擁護者辦的,一個是由克拉柯夫的反對派的華沙委員會辦的。反對派的華沙委員會的報紙第 24 號和 25 號(有附刊)是 1915—1916 年在蘇黎世出版的。——(正文第 151 頁)
- 58 列寧指 1914 年 7 月 16—18 日(新曆)社會主義國際局執行委員會就能否恢復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統一問題“交換意見”而召開的布魯塞爾“統一”會議。派代表出席會議的有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中央委員會(布爾什維克),組織委員會(孟什維克),和接近組織委員會的組織:高加索區委會和“鬥爭”派(托洛茨基分子)、社會民主黨杜馬黨團(孟什維克)、普列漢諾夫的“統一派”、“前進報”派、崩得、拉脫維亞邊區社會民主黨、立陶宛社會民主黨、波蘭社會民主黨、波蘭社會民主黨反對派、波蘭社會黨(“社會黨左派”)等。

雖然會議僅限於交換意見而不通過大家必須遵守的決議,但是考茨基關於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統一的決議仍然被提付表決。決議以大多數表決通過。布爾什維克和拉脫維亞社會民主黨人拒絕表決這個決

議。——(正文第 151 頁)

59 “格沃茲迭夫主义”是因孟什維克格沃茲迭夫而得名。格沃茲迭夫是中央軍事工業委員會“工人团”主席，他反对工人的罢工斗争，公开支持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正文第 153 頁)

60 “梯什科主义”因梯什科(約吉赫斯)而得名。梯什科是波兰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之一，在政治活动上犯过没有原则和动摇的错误，在帝国主义大战时期接近国际主义分子，与卢森堡、李卜克内西同是德国斯巴达克运动的组织者，1919 年 3 月被捕，死于狱中。关于列宁对“梯什科主义”的评述，见“波兰社会民主党的分裂”(“列宁全集”第 4 版第 18 卷第 449—453 頁)、“也是‘统一分子’”、“国外团体和取消派”(“列宁全集”第 4 版第 19 卷第 449—451 頁、第 459—461 頁)等文。——(正文第 154 頁)

61 “齐美尔瓦尔得派”第二次国际代表会议于 1916 年 4 月 24—30 日(新历)在昆塔尔(瑞士)举行。大会的议程有下列这些问题：争取结束战争的问题，无产阶级对和平问题、议会工作、群众斗争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召开社会主义国际局会议的问题等等。左翼在这次会议上，比在齐美尔瓦尔得代表会议上强大。经过列宁的争取，大会通过了一项批评社会和平主义和批评社会主义国际局的工作的决议。昆塔尔代表会议促进了国际主义分子实行分立并且加强了他们内部的团结，后来在 1919 年，经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倡议，他们组成了第三共产国际。但是这次大会没有通过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使本国帝国主义政府在战争中失败，组织第三国际等布尔什维克策略的基本原理。——(正文第 155 頁)

62 “工人报”(«Arbeiter-Zeitung»)是日报，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从 1889 年起在维也纳出版，在世界帝国主义大战时期(1914—1918 年)采取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场。列宁称该报为“维也纳社会主义叛徒”的报纸。

1934 年该报被封閉。1945 年复刊，成为奥地利社会党的中央机关报。——(正文第 159 頁)

- 63 “我們的呼聲報”是孟什維克的報紙；1915—1916年在薩馬拉出版，採取社會沙文主義的立場。——（正文第160頁）
- 64 荷蘭社會民主黨代表大會於1916年1月8—9日在安亨舉行。——（正文第167頁）
- 65 見列寧的“論歐洲聯邦口號”（“列寧文選”兩卷集1957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卷第901—904頁）。——（正文第167頁）
- 66 “前進報”（«Avanti!»）是日報，意大利社會黨中央機關報，於1896年12月創刊。在世界帝國主義戰爭年代（1914—1918年），該報採取不徹底的國際主義立場，沒有同改良主義者斷絕關係。目前，該報是意大利社會黨中央機關報。——（正文第168頁）
- 67 國際社會主義者委員會通告是國際社會主義者委員會的告齊美爾瓦爾得聯盟各黨派書，經1916年伯爾尼國際社會主義者委員會二月會議一致通過。在這個會議上，以列寧為首的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中央代表團發表聲明，指出這個通告同國際社會主義者齊美爾瓦爾得第一次代表會議的決議相比，已經前進了一步，但是其中並不是一切論點都能令人滿意。通告發表在1916年2月29日國際社會主義者委員會公報第3號和1916年3月25日“社會民主黨人報”第52號上。——（正文第172頁）
- 68 列寧是指國際社會主義者委員會1915年9月29日的正式聲明，這個聲明發表在1915年11月27日國際社會主義者委員會公報第2號上。國際社會主義者委員會在聲明中指出，只要海牙社會主義國際局一恢復活動，它便不再執行齊美爾瓦爾得代表會議的決議，宣布解散。這樣一來，委員會就走上了促使第二國際恢復的道路。——（正文第172頁）
- 69 “德國國際社會主義者”（I. S. D.）是左派社會民主黨人（博爾夏特等人）的組織，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成立。該派加入齊美爾瓦爾得左派，它在同社會沙文主義者和中派分子劃清界限問題上所採取的立場，比羅·盧森堡的擁護者更徹底。但是，由於他們同群眾沒有取得廣泛的聯繫，很快就解散了。——（正文第174頁）

- 70 奥尔纳茨基就是格·瓦·契切林。——(正文第 174 页)
- 71 “共产党人”杂志由“社会民主党人报”报社于 1915 年在日内瓦出版。只出了一期(两期合刊),其中刊载了列宁的三篇文章:“第二国际的破产”、“法国社会主义者的正直呼声”和“意大利的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见“列宁全集”第 4 版第 21 卷第 181—232、316—323、324—333 页)。
列宁在杂志编辑部内进行了反对布哈林—皮达可夫反党集团的斗争,揭穿了该集团的反布尔什维主义的观点和利用杂志进行派别活动的企图。由于该集团的反党立场,列宁提出同它断绝关系和停止出版合办的杂志。从 1916 年 10 月起,“社会民主党人报”报社开始出版自己的“社会民主党人文集”。——(正文第 174 页)
- 72 “论德国的和非德国的沙文主义”一文第一次刊印在“保险问题”杂志上。
“保险问题”是布尔什维克的合法刊物。从 1913 年 10 月到 1918 年 3 月在彼得堡断断续续地出版。该杂志由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领导,它不但为实现工人的保险进行斗争,而且也为实现布尔什维克“不折不扣的口号”进行斗争。——(正文第 176 页)
- 73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37 年第 16 卷第 1 部分第 474—475 页。——(正文第 178 页)
- 74 “俄国旗帜报”是黑帮派的报纸,“俄罗斯人民同盟”的机关报,从 1905 年 11 月到 1917 年在彼得堡出版。——(正文第 178 页)
- 75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是 1916 年上半年写成的。早在 1915 年,列宁就在伯尔尼开始研究各国关于帝国主义的著作,从 1916 年 1 月起开始写这本书。这年 1 月底,列宁移居苏黎世,继续在苏黎世州立图书馆里进行写这本书的工作。列宁从几百本外文书籍、杂志、报纸和统计汇编中摘出的摘录、纲要、杂记和表格等共有 40 多印张。在 1939 年,这些资料用“帝国主义笔记”的书名印成单行本出版了。
1916 年 6 月 19 日(7 月 2 日),列宁写成本书,并且把手稿寄交“帆船”出版社。出版社里的孟什维克分子删去了书中对考茨基和俄国孟

什維克(馬尔托夫等)的机会主义理論的尖銳批評,把列宁原用的詞“轉变为”(資本主义轉变为資本帝国主义),改为“变成”,“反动性”(“超帝国主义”論的反动性)改为“落后性”等等。1917年初,“帆船”出版社改成“帝国主义是資本主义的最新阶段”的書名在彼得格勒刊印了这本书。

列宁回到俄国以后,給这本书写了序言。1917年年中这本书問世。——(正文第179頁)

76 这篇序言第一次刊載在1921年10月出版的“共产国际”杂志第18期上,标题是“帝国主义和資本主义”。——(正文第181頁)

77 “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是中派政党,成立于1917年4月。考茨基分子的“劳动友好社”是該党的主要組成部分。“独立党人”宣传同公开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因結”,替他們辯解,捍衛他們,要求放弃阶级斗争。

独立社会民主党在1920年10月在哈雷举行了代表大会,会上發生了分裂。党内大部分于1920年12月同德国共产党合并。右派分子单独成立了一个党,仍称独立社会民主党,一直存在到1922年。——(正文第185頁)

78 斯巴达克派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間成立的“斯巴达克”联盟的成員。战争初期,德国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組成了一个由卡·李卜克内西、罗·卢森堡、弗·梅林、克·蔡特金等人领导的“国际”派。这派又叫“斯巴达克”联盟。斯巴达克派在群众中进行了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革命宣传,揭露了德国帝国主义的掠夺政策和社会民主党領袖的叛卖行为。但是作为德国左派的斯巴达克派在一些最重要的理論和政策問題上,未能摆脱半孟什維主义的錯誤。因此他們發揮了半孟什維主义的帝国主义論,否認馬克思主义所理解的民族自决原則(即直到分离和成立独立国家),否認帝国主义时代可能發生民族解放战争,低估革命政党的作用而崇拜运动的自發性。列宁的“論尤尼烏斯的小册子”(見本卷第298—313頁)和“論对馬克思主义的諷刺和‘帝国主义經濟主义’”等著作,以及斯大林的“論布尔什維主义历史中的几个問題”的信(見“斯大林全集”1956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3卷第76—91頁)都批判了德国左派的錯誤。1917年,斯巴达克派加入了“独立党人”的中派政党,但

是同时保持自己組織上的独立性。在德国 1918 年 11 月革命后，斯巴达克派同“独立党人”决裂，在同年 12 月成立了德国共产党。——(正文第 185 頁)

79 見馬克思“資本論”1956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3 卷第 788 頁，或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1947 年俄文版第 19 卷第 2 部分第 156 頁。——(正文第 208 頁)

80 創辦人的丑事發生在 19 世紀 70 年代初德国加紧創辦股份公司的时期。随着加紧創辦公司而来的，是發了財的資產階級市儈所进行的騙人勾当，是交易所里的土地和有价証券的投机狂。——(正文第 210 頁)

81 “法兰克福报”(«Frankfurter Zeitung»)是德国資產階級報紙，从 1856 年起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出版。——(正文第 212 頁)

82 列宁指普列汉諾夫。——(正文第 220 頁)

83 法国人的巴拿馬运河舞弊案件，是指 1892—1893 年在法国揭露的被法国开鑿运河的巴拿馬运河公司收买的政客、官僚和報紙的大舞弊、大受贿案件。——(正文第 229 頁)

84 見“馬克思恩格斯書信选集”1953 年俄文版第 105 頁。——(正文第 276 頁)

85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1931 年俄文版第 24 卷第 529、530 頁。——(正文第 276 頁)

86 斯彼克塔托尔，即孟什維克謝·米·納希姆桑。——(正文第 281 頁)

87 見馬克思“資本論”1956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3 卷第 126 頁，或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1939 年俄文版第 19 卷第 1 部分第 126—127 頁。——(正文第 283 頁)

88 义和团起义是 1899—1901 年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起义。这次起义是由一个先叫作“义和拳”后来改名“义和团”的群众团体發動的。起义被德国將軍瓦德西率領的帝国主义列强討伐联軍残酷地鎮压了。参加鎮压起义的有德、日、英、美、俄帝国主义者。1901 年，中国被逼簽

- 訂所謂“辛丑条約”，按照这个条約，中国应当付出大量賠款，于是中国完全变成了外国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正文第 289 頁)
- 89 尤尼烏斯 就是罗莎·卢森堡。——(正文第 298 頁)
- 90 列宁是指全德左派社会民主党人代表會議。这次會議于 1916 年 1 月 1 日在柏林卡·李卜克內西寓所举行，通过了罗·卢森堡拟定的“国际”派的提綱。——(正文第 298 頁)
- 91 “不来梅市民报”(«Bremer Bürger-Zeitung») 是日刊，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不来梅派的机关报。該报于 1890 年創刊，1919 年停刊。在 1914—1915 年該报实际上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的机关报。在 1916 年轉入考茨基分子手中。——(正文第 300 頁)
- 92 “人民之友报”(«Volksfreund») 日刊，社会民主党的报纸，于 1871 年在布朗施威克創刊。1914—1915 年該报实际上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的机关报，在 1916 年轉入考茨基分子手中。——(正文第 301 頁)
- 93 見“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1954 年莫斯科中文版第 1 卷第 520—521 頁。——(正文第 307 頁)
- 94 “关于帝国主义和民族压迫的提綱”由“工人报”編輯部制定，發表在 1916 年 10 月“社会民主党人文集”第 1 卷里。——(正文第 314 頁)
- 95 关于对波兰独立的三种看法的評价，見列宁的“論民族自决权”一文(“列宁文选”两卷集 1957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1 卷第 821—878 頁)。——(正文第 314 頁)
- 96 列宁是指由于制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綱而在 1903 年引起的爭論。这个党綱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通过(見“列宁全集”第 4 版第 6 卷第 1—59、285—300 和 412—420 頁)。同时又是指 1913 年布尔什維克和取消派、托洛茨基分子及崩得分子双方在“民族文化自治”問題上的爭論(見“列宁全集”第 4 版第 19 卷第 488—494 頁；第 20 卷第 1—34、365—424 頁)。——(正文第 315 頁)
- 97 見“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1955 年莫斯科中文版第 2 卷第 31 頁。——(正文第 317 頁)

- 98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1934年俄文版第11卷第2部分第49—50頁。——(正文第317頁)
- 99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1930年俄文版第7卷第201—220頁。——(正文第334頁)
- 100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1936年俄文版第13卷第1部分第155頁。——(正文第336頁)
- 101 “光綫”(«Lichtstrahlen»)杂志(月刊),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的机关刊物,由尤·博尔夏特主編。該杂志于1913—1921年在柏林不定期出版。——(正文第343頁)
- 102 指罗·卢森堡的“民族問題和自治”一文,該文載于1908年和1909年“社会民主党評論”(«Przegląd Socjaldemokratyczny»)杂志第6、7、8—9、10、12和14—15等期。——(正文第344頁)
- 103 波兰社会党右翼,是在波兰社会党分裂后于1906年形成的一个独立組織。

以皮尔苏茨基为首的“右派”实行民族沙文主义政策。后来又从右派产生波兰社会党。

由于波兰资产阶级国家的成立,波兰社会党右派又采用了波兰社会党这个名称。右派领导政府以后,把政权交给波兰资产阶级,此后一贯进行反苏反共的宣传,支持反对苏维埃国家的侵略政策,支持占领乌克兰西部和白俄罗斯西部并且实行殖民地压迫的政策。1926年5月皮尔苏茨基实行法西斯的政变后,波兰社会党形式上处于在野党地位,但是实际上同法西斯分子合作,繼續进行反苏宣传。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間,波兰社会党又分裂了。一部分是反动的沙文主义派,取名“自由、平等、独立”(«Wolność, równość i niepodległość»—BPH),同法西斯分子实行合作,加入波兰反动的倫敦流亡“政府”。另一部分是波兰社会党左派,取名“波兰社会主义者工人党”,在1942年成立的波兰工人党的影响下,加入了反对希特勒占领者的統一战綫,为使波兰摆脱法西斯奴役进行斗争,采取同苏联建立友好关系的立場。

1944年，在波兰东部从德国占领中解放出来以及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成立之后，波兰社会主义者工人党又采用波兰社会党的名称，并同波兰工人党一起参加人民民主波兰的建设。1948年12月波兰工人党和波兰社会党合并，成立了波兰统一工人党。——(正文第344页)

104 見“馬克思恩格斯書信選集”1953年俄文版第356—357頁。——(正文第347頁)

105 卡·拉·就是卡尔·拉狄克。——(正文第349頁)

106 “言論報”是日刊，立憲民主黨的中央機關報，於1906年2月在彼得堡創刊。該報於1917年10月26日(11月8日)被彼得格勒蘇維埃軍事革命委員會查封。以後用別的名稱出版到1918年8月。——(正文第349頁)

列宁生平事業年表

(1915年12月—1916年7月)

1915

- 12月—1916年1月底** 列宁住在瑞士伯尔尼。
- 12月中旬** 列宁主持社会民主党人国际主义者會議，会上討論关于准备召开国际社会主义者第二次代表會議問題。
- 12月29日(1916年1月11日)** 列宁把“关于農業中資本主义發展規律的新材料”一書手稿寄給高尔基，准备在彼得格勒出版。
- 12月29日—1916年6月19日(1月11日—7月2日)** 列宁写“帝国主义是資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書，先在伯尔尼圖書館，后在苏黎世圖書館。
- 12月** 列宁給布哈林的小册子“世界經濟和帝国主义”写序言。
- 列宁写信給布尔什維克日内瓦支部，指出必須在特別決議中指責孟什維克搞彼得格勒軍事工業委员会“工人团”的假选举。
- 1915年12月—1917年1月** 列宁主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

1916

- 1月2日(15日)** 列宁主持齐美尔瓦尔得左派常务局會議，会上討論了荷兰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常委会代表資格問題和出版齐美尔瓦尔得左派机关杂志《Vorbote》(“先驅”)問題。

- 1月12日(25日)** 列宁主持齐美尔瓦尔得左派常务局会议，会上讨论了为即将出版的“先驱”杂志创刊号而采取的措施问题。
- 1月12日(25日)以后** 列宁的“机会主义和第二国际的破产”一文在“先驱”杂志创刊号上发表。
- 1月17日(30日)** 由于即将召开国际社会主义青年组织局会议，列宁写信给布尔什维克苏黎世支部，指示他们应如何在青年中进行工作。
- 1月23—26日
(2月5—8日)** 列宁参加伯尔尼国际社会主义者委员会扩大会议的工作，草拟关于召开国际社会主义者第二次代表会议以及关于代表资格的决议。
- 1月26日(2月8日)** 列宁在伯尔尼国际性的大会上就帝国主义战争和无产阶级的任务问题发表演说。
- 1月28日(2月10日)** 列宁写“论法国反对派的任务”的信。
- 1月28日或29日(2月10日或11日)** 列宁从伯尔尼迁往苏黎世。
- 1—2月** 列宁写“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的提纲。这个提纲在1916年4月“先驱”杂志第2期上发表。
- 2月3日(16日)** 列宁把1月23—26日(2月5—8日)的国际社会主义者委员会扩大会议的情况通知国外各布尔什维克支部，并且指示他们立即动员齐美尔瓦尔得左派的一切力量，选举参加即将在4月召开的国际社会主义者第二次代表会议的代表。
- 2月4日(17日)** 列宁在苏黎世作报告，题目是“两个国际”。
- 2月5日(18日)** 列宁的“组织委员会和齐赫泽党团有没有自己的路线？”一文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50号上发表。
- 2月13日(26日)** 列宁在苏黎世作“有关民族问题的‘和约条件’”的报告。

- 2月16日(29日) 列宁的“論俄国当前的口号:不割地的和平和波兰的独立”、“威廉·科尔布和格奥尔基·普列汉諾夫”两篇文章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51号上发表。
- 2月17日(3月1日) 列宁在日内瓦作“有关民族問題的‘和約条件’”的报告。
- 2月27日(3月11日) 列宁作关于停止出版“共产党人”杂志的指示,因为布哈林—皮达可夫反党集团企圖利用杂志进行派別活动,并且計划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报社出版“社会民主党人文集”。
- 2—3月 列宁写“国外組織委员会給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各支部的信”。
- 2月底—3月 列宁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向社会主义者第二次代表會議提出的提案”(提綱),組織把提綱譯成德文和法文的工作,并把提綱分發給国外各布尔什維克支部和各国左派国际主义者。这项提綱在4月9日(22日)伯尔尼国际社会主义者委员会公报第4号上发表。
- 2月底—4月 列宁写“是分裂还是腐化?”一文。
- 3月6日(19日) 列宁写信給挪威的亚·米·柯倫泰,委托他把載有齐美尔瓦尔得左派的決議和宣言草案的第1号“国际快报”譯成英文在挪威出版,并設法向美、英、瑞士、挪威等国散發。
列宁把提綱“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寄往挪威,是为了使瑞士和挪威左派社会主义者了解这个提綱。
- 3月12日(25日) 列宁的“論‘和平綱領’”一文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52号上发表。
- 3—6月 列宁在自己的著作中和給国外布尔什維克的信件中,揭露了布哈林—皮达可夫在馬克思主义理論和策略基

- 本問題上的反党观点，痛斥这个集团对党中央所要的两面手法。列宁也揭穿了实际上拥护布哈林—皮达可夫集团的季諾維也夫的两面手法。
- 4月5日(18日)** 列宁在布尔什維克苏黎世支部和波兰、拉脫維亞社会民主党人国际主义者联席會議上作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当前任务”的报告。
- 4月11—17日(24—30日)** 列宁参加在昆塔尔召开的国际社会主义者第二次代表會議的工作，組織并团结代表會議的左翼，领导決議起草委员会的工作。決議中批評了和平主义和社会主义国际局的活动。列宁竭力爭取通过这项決議。
- 4月16日(29日)以后** 列宁写关于国际社会主义者第二次代表會議总结的文章和报告的綱要。
- 5月20日(6月2日)** 列宁在日内瓦作报告，題目是：“国际工人运动中的两派”。
- 5月31日(6月13日)** 列宁的“論德国的和非德国的沙文主义”一文在“保險問題”杂志第5期(总第54期)上发表。
- 5—7月** 列宁写信給斯堪的那維亞国家的左派社会民主党人国际主义者，作关于准备召开中立国社会主义者代表會議的指示，并确定左派代表在这次代表會議上的策略。
- 6月19日(7月2日)** 列宁写完“帝国主义是資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書，并把該書手稿寄給“帆船”出版社。
- 7月4日和7日(17日和20日)之間** 列宁迁往苏黎世附近山区的一个小地方弗卢姆斯。
- 7月12日(25日)** 列宁的母亲瑪·亞·烏里楊諾娃在彼得格勒逝世。
- 7月上旬** 列宁写“論尤尼烏斯的小册子”和“关于自决問題的爭論总结”，这两篇文章在1916年10月“社会民主党人文集”創刊号上发表。

譯 后 記

編入本卷的列宁著作共 19 篇，其中 7 篇过去已有譯文，有的很早就在我国出現，并有几种版本。如“帝国主义是資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書，先有 1929 年上海啓智書局的刘堃平的譯本和 1930 年春潮書局章一元的譯本，繼有 1931 年莫斯科外国工人出版社“列宁选集”第 8 卷的譯文（唯真校訂），这个譯本以后于 1939 年又由生活書店出版过。其次，还有 1937 年新知書店吳清友的譯本，以后又有 1947 年莫斯科外国文書籍出版局“列宁文选”两卷集第 1 卷的譯文（唯真、李明、蒼木共同譯校）。

“关于农業中資本主义發展規律的新材料”一文，中国人民大学曾在 1955 年譯过。

其他几篇文章的譯文，則散見各种列宁文集，如：“机会主义和第二国际的破产”一文，見“列宁文选”两卷集第 1 卷；“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向社会主义者第二次代表會議提出的提案”和“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提綱）”，見“列宁选集”第 9 卷，后者又見 1946 年解放社“論民族殖民地問題”（张仲实譯）一書；“論尤尼烏斯的小册子”的大部分譯文，見“論民族殖民地問題”；“关于自决問題的爭論总结”一文，曾有几节先后分見若干专题文集，全部譯文見 1955 年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編譯的“列宁論民族問題”一書。

本卷根据原文并参照前人译文重新译校，“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校后，又由原译者唯真同志看过。参加本卷翻译的有杨兴锐、鲍世明、彭卓吾等同志，为本卷修辞的是王诚可同志，全书译文由陆梅林等同志作了最后校订。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